三联生活周刊·文丛

大学的精神

教育是让一个人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

蒲实 陈赛 等／著

哈佛、耶鲁、斯坦福、牛津、剑桥、麻省理工、海德堡

历时7年，追寻7所世界顶尖大学的精神底色，重新思考教育的意义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大学的精神

作者:蒲实 陈赛 等

ISBN:9787508668994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文丛总序
倡导生活与知识生产

《三联生活周刊》创刊之际，为自己确立的定位很有想象力：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10年之后，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这本杂志做了一项挺有勇气的决定：用五期杂志的封面故事，做一个超大型的抗战历史报道，纪念中国人民的奋斗与胜利。

媒体对历史进行报道，并不稀奇，甚至新闻本身也经常自我标榜——“历史的草稿”。只是，当杂志已经运行10年，各项报道手段日臻成熟，这个时候，周刊独特的新闻方法论对历史的发现与叙述是否有所贡献，以资证明自己存在之价值，才是挑战。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当然不错；只是，这部草稿的构成，是无数需要重新整理的碎片（新闻）。既然如此，我们的历史报道，在尘埃落定、草稿成形，历史事实被无数学者再三甄别，意义与价值日益分明，共识逐渐形成之际，可否反转回来，仍然将宏大历史“碎片化”呢？——碎片化本身，是一种传播技术与手段。用这种手段让概念的历史“新闻化”，并借此重新回到陌生的历史现场。如此，宏大的命题在事实与细节背后，也在传播的快车道上，是双赢。

主意既定，每期抗战主题封面之下，我们以一个“七天单元”承载对当期主旨之“事件报道”，其间“每天”单独成篇，每篇单独立意。有结构的七个“碎片”——历史现场的“事件新闻”，构成了战争不同时期的意义与价值，也构成了历史的连续性。

其实，如果你有意将新闻或报道当作一项技术来研究，它也是常常会让人着迷的。

2005年，对《三联生活周刊》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创办10年之后，它开始腾飞。杂志的销售量当年翻番，并由此走上长时段的增长之路。

为什么是这一年？很显然，我们被广泛关注的超大型的抗战历史报道，是重要原因。那么，支撑杂志起飞的历史报道，其成功的内在机理又是什么？我们的新闻方法论，最终自证了什么？三年后，清华大学邀请我去做演讲，分享《三联生活周刊》的新闻生产，到了这会儿，我找到了我们历史报道成功的原因。我们生产的不是新闻，而是知识。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伟大时代，与时俱进的知识，是稀缺商品。

所谓知识，简单说来，无非在对抗人类遗忘的过程中，比新闻存活的时间更长而已。也许，很偶然，有些知识，还能存活更长，成为常识。

在21年的时间里，《三联生活周刊》秉持着自己的使命：生产知识。这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我们有自己的方法论。

当然，生产知识，对杂志来说，是理想与使命，它是否达成，有待更长时间与更多读者的检验。如何检验？这份杂志自身存续多长，以及它与读者、时代和国家形成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是一种检验；把杂志有价值的内容编辑成一本本书——最基本的知识的载体，则提供了另一种检验的可能。

现在，这些书，一本一本编辑出来了，它是否生产了知识，是否有可能更长久存续，且看时间的选择了。

李鸿谷

2016年7月31日

第一章 哈佛大学：从绅士到精英

美国的镜子

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仅仅是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关乎学问，影响终身的学问，将传统传承千年的学问，创造未来的学问。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而这些投资会产生我们无法预测且常常是无法衡量的收益。

——德鲁·福斯特（哈佛第二十八任校长）



走进哈佛园，那些殖民风格或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罗马式的公共大厅和哥特式的教堂，还有爬满常青藤的古老红砖墙……如果说美国人对哈佛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大概与这种漫长时光所凝固的尊严有很大的关系。借用艾伦·布卢姆的话来说，那是“一个最沉溺于实际生活的民族向沉思生活表达的敬意”。

哈佛创立者的意图至今仍然镌刻在哈佛中心校园门口的墙上：“在神让我们安全抵达新英格兰之后，我们建立家园、提供谋生必需品，设立方便地点好敬拜神，也组建公民政府。紧接着我们最渴望的事情之一就是推进学习，并使之延及后代，唯恐当我们的现任牧师归于尘土时，留给众教会的是一群茫然无知的牧师。”

当时，乘坐“五月花”号客船的102名乘客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颠簸，于1620年初冬抵达北美大陆，因为艰苦的环境和疾病的困扰，仅有53人活到了第二年的初冬。这些定居新大陆荒野中的第一批移民如此深信教育对他们决心创立的美好社会的重要性。16年后，他们就在

一条叫牛津的破街上建造了哈佛学院。140年后，这个世界上才有了美国。

在《哈佛世纪——锻造一所国家大学》中，作者理查德·诺顿·史密斯认为：“哈佛的创办为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大学传统，这是它真正的重要性。到美国进行独立革命，摆脱英国的统治时，每个重要城镇和差不多每个教派也都有了学院。有些人认为这是危险的趋向，是美国在学校方面重量不重质倾向的开端。可是后来进修高等教育的方便所带来的好处，要比入学较难的大学制度保持极高标准的好处有价值得多：它鼓励多样化，使美国社会不至于产生单一而狭窄的受教育阶级。”

100年前，查尔斯·艾略特，哈佛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校长曾说：“在任何社会中，高等教育机构都往往是一面鲜明反映该国历史与民族性格的镜子。”

比起欧洲或者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美国人在高等教育上投入的财富和寄托的野心都是罕见的。他们认为大学应该追求真理，钻研高深学问，永远站在理解与反思社会的制高点，同时又希望它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他们将大学视为一种公平高效的精英筛选机制，将智力上最为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推送到社会上层，发挥他们的潜力，以便更好地领导这个国家；同时又认为教育应该是关于个人的心智与个性成长的，对每一个普通学生的人生负责，拓宽他们的视野，以便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碰到“较少地阻挡他们获取成功的障碍物”；他们还相信，大众教育是美国民主的基础，大学应该为社会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如果大学教育误导了学生，吞下恶果的终将是整个国家。相反，如果大学能教会学生准确自如地表达思想，清晰地思考，严密地分析问题，富有道德感，对国家大事敏感而有见地，社会将受益无穷。”

自从独立革命第一次将哈佛学院推上国家舞台后，它作为一所大学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之间的命运就有了千丝万缕的关联。独立革命期间，哈佛学院曾经一度关闭，用作军营。《独立宣言》的签名者中有八位来自哈佛，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当时接受了哈佛的荣誉学位。从此以后，哈佛毕业生持续影响着美国的政策，其中八位总统都是哈佛人。

直到今天，哈佛仍是映照美国最清晰的一面镜子。一方面，哈佛——就像美国——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最前沿的科技、遍及全球的影响力。全世界的人千里迢迢来到哈佛校园，摸一摸约翰·哈佛先生铜像的脚，就像他们到美国，总想在自由女神像前留个影。就像这个国家一样，从很多方面来说，哈佛都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地方，成功地融合了各种肤色与民族，但它的阶级分化也日益严重。“二战”以后，哈佛在科研上越来越成功，汇聚了越来越多的诺贝尔奖得主，但代价是文科不可避免地衰落，以及本科教育方向的迷失。它对于这个世界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常常伴随着对于“目的感”以及最初之精神理念的深层的不安全感。

因为美国人骨子里的实用主义，什么事情都要问一句，到底有什么用？人文学科在过去几十年是受到质疑最多的。那年在斯坦福采访，一位意大利文学教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起，经常有学生质问：文科的价值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读但丁？最后他无奈地回答说：“读点诗歌和小说，有助于你们科学家培养想象力。”在哈佛也一样。只不过人们会更含蓄一点。《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罗斯·杜塔特在哈佛读书时，选的是历史与文学专业。有一次他问导师，这个专业对他意味着什么？导师说：“你知道，如果你想去咨询公司或投行，历史与文学学位不会有什么妨碍。”

2012年，《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报告，分析为什么这么多常青藤的毕业生跑去为华尔街工作。2011年的数据显示，17%的哈佛毕业生

去了华尔街，耶鲁是14%，普林斯顿则是36%。“多么荒谬的数字！”这位作者评价说。他最后的结论是常青藤的教育出了问题。他们自称“自由教育”，却既没有教会学生怎么生活，也没有教会他们如何谋生。学生们在大学里读着笛卡儿、研究着恐龙灭绝的原因，毕业后所找的工作，却与所学毫无关系。这些人聪明绝顶、精力充沛，却完全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华尔街正是利用了他们的这种困惑，将这些美国最年轻最有才华的头脑网罗至麾下。

哈佛教育是“自由教育”——在自由探究精神指导下的不预设目标、不与职业挂钩的教育。这是哈佛近400年的历史上从未背弃过的原则。

“自由教育”最早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他认为，人的生活有“鄙俗”和“高尚”之分，前者以“劳作”谋生，后者则以“沉思”为理想。自由人应受的教育即“自由教育”，其目的是人的理性的自由发展和德行的完善。“自由”就是不“鄙贱”、不“卑陋”。后来，古罗马的塞尼卡将liberalis的内涵由“自由人”转变成“使人自由”，即心灵解放的含义。也就是说，自由教育是与灵魂相关的教育。

每当哈佛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边界变得过于模糊时，“自由教育”就会像一个人身体的免疫系统一般，急吼吼地亮起红灯。哈佛每二三十年一次的通识教育改革是最容易踩到红灯的，每次改革引发的争议，按一位教授的说法，“比迁祖坟还热闹”。因为作为自由教育的“公共面孔”，通识教育到底要教什么，什么知识或方法是每个学生都应掌握的，如何应对外部世界的变化，这些问题往往牵涉到一所大学最深层的自我认知，以及它对于知识与教育最基本的哲学与态度。

哈佛第一次尝试建立通识教育框架是在“二战”后。美国作为“民主”“自由”的一方对抗苏联危险的“集权主义”，知识的共同基础只能落在“价值观”上。人文学科内含的西方文明遗产，社会科

学所承诺的对普通生活的理性分析，以及自然科学作为现代化的进步力量，都完美地符合整个计划——以通识教育培养优秀公民，以优秀公民促进民主社会。

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动荡和越南战争的幻灭，无论学生还是教授，都已经厌倦了所谓的“共同价值观”“规则”“大课”，新的核心课程不再试图传授“价值观”，而是传授获取知识的“方法”——长久以来西方文明对“善与恶”的道德判断变成一种“道德推理”的智力训练；“二战”的历史可以与朝鲜的历史平起平坐，都是一种分析方法。就科学而言，你可以选择《人的进化》，也可以选择《恐龙与其亲属》……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大学已经在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运作和进步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学校研究经费在联邦政府预算中的份额稳步增长，各类机构也都认识到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大学教授开始成为政府、公司、大型基金会的顾问并备受瞩目。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教授总能进入内阁或者占据其他要职。还有什么比“方法论”更安全、实用的共同基础呢？

从2002年开始，哈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通识教改。此时它与美国所共同面对的，是“9·11”事件后对于世界的恐惧与茫然、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科技革命的剧烈冲击，以及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在这样一个极度不确定、不稳定、深度割裂的时代，怎么理解哈佛本科教育的共同基础？共同的知识核心要放在哪里？

教授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继续强调方法论，还是来点实在的干货、具体的事实？应该给学生更多的自主权，还是给他们更明确的指导？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分割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与比例？如何确定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轻重缓急？知识与所希望培养的能力之间是否真的有那么大的关联？科学到底要如何纳入自由教育的框架？哈佛的学习经验应该更多地与外部世界连接，但分寸要如何把握，才能避免过

度功利化的嫌疑？国际视野与美国价值观之间到底如何平衡？哈佛到底想做一所世界大学，还是一所美国大学？

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仍然是，到底哪些知识可以纳入“核心”的范畴？比如宗教，就是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英语系教授路易斯·梅纳德曾经提议单列一个“理性与信仰”（Reason and Faith）的知识范畴，关于宗教的学习能帮助学生理解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鼓励他们思考21世纪一些最棘手的问题，比如宗教暴力的文化冲突、关于干细胞或克隆的伦理学分析等。但这一提议遭到科学教授们的激烈反对，比如哈佛的明星学者史蒂芬·平克说：“把‘信仰’与‘理性’两个词平行放在一起，就像把天文学与占星术放在一起，说这两种思考方式是平等的一样。大学是关于理性的，纯粹而简单。在这里，除了宗教机构之外，信仰没有立足之处。而且，我们的社会也不缺这个。”最后，通识教育委员会达成的协议是，把宗教相关的课程列入其他的范畴，比如“文化与信念”（Culture and Belief），在类似“人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课程中可以触及宗教问题。

另外，随着学科之间边界的倒塌（比如生物学已经逐渐拓展到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边缘），为各个学科的知识整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要怎么贯穿到学生的教学中去？著名生物学教授E. O. 威尔逊就认为，未来最好的教学方法不是基于学科，而是基于问题，一上来就抛出那些不仅与学生个人切身相关，而且对人类亦影响深远的大问题，比如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里已经贯穿了物理、化学、生物、道德、法律等多个不同的学科，逼迫学生从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人类共同体验的核心成分。

处于守势的帝国

在世界大学里，哈佛拥有无上的财富、权力与荣耀。它不是象牙塔，而是帝国，以知识和思想为权力来源的帝国。它与外面的现实世界较量与合谋，斗争与妥协，进攻与防守，捍卫精英主义和学术自由。

哈佛学院：贵族与精英

来到剑桥镇，不由得感到自己得一本正经一点儿。比如，在电梯里遇到当地人，他们会机械性抽搐般咧嘴，闪现两排牙齿，再弹簧般复原，瞬间完成微笑，克制、冷漠、彬彬有礼。波士顿的英语速度很快，还残存着英式腔调。幸好哈佛若干年前就不再要求学生的装扮必须是西装领带皮鞋了，免了着装的烦恼。

或者，是哈佛校园和它周边那些殖民风格或新古典主义的建筑、罗马式的公共大厅和哥特式的教堂，还有爬满常青藤的古老红砖墙，把上了年头的时间凝固成老者的威严感，让我被看不见的先辈和无法描摹的传统摄了魂魄。即使是在哈佛最躁动叛逆的1969年，激进抗议的哈佛学生在占领哈佛主楼后，曾有示威者问，是否要砸掉文理学院院长的办公桌，也立即有人站出来反对："绝对不行。那可是查尔斯·艾略特先生（100年前的老院长）用过的。"今天，教育日渐被理解为一种消费和服务，大学生也早已不再轻易接受教师的训导。但在哈佛，人总会收敛一点。

在哈佛的十来天里，我常在以哈佛广场为中心发散出的小街上溜达，会发现些不经意的符号，泄露出剑桥镇的崇古心理。"剑桥"和"牛津"的街名，就已经够怀旧了。而那些在别的州难觅踪迹的皮鞋修理店、皮革打理店，摆放着焦油肥皂和雪茄的礼品店，总之，老玩意儿，就如地毯的线边一样，暗示着出没于此的一些人的品位与生活方式。

20世纪30年代，当哈佛从一个新英格兰地区的学院变为一所真正的大学时，哈佛本科生院的社会地位很贵族化。它掌握在波士顿的银行家、律师或政治家族手中，不以严肃的学术闻名，而是世俗的名利场。当时哈佛的教师很多是社会名流：他们首先是一名绅士，其次是一个教师，最后才可能是一位学者。学生绝大多数来自新英格兰与纽约，或是住在哈佛“金色海岸”（比如亚当宿舍楼）豪华公寓里的富家子弟。学院教育是闲人雅客式的，比如学习古典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体验学问的旨趣，熏陶审美和心灵。

即使今天的哈佛已是世俗化的平民精英大学，这一古老的身份仍隐藏在哈佛校园里，不时与我邂逅。有一天，即将结束“大一”的哈佛本科生薛晴（化名）带我们去桑德斯剧场旁边的安纳伯格大厅（Annenberg Hall）吃早餐。我对桑德斯剧场并不陌生：它的图像早已被现代媒体大规模地传播——360度环绕的三层观众台，泛着古旧木头光芒的大厅，已随着迈克尔·桑德尔正义公开课的全球传播被大众所熟悉。但安纳伯格餐厅很低调。我们早到了些，沉沉的木门上贴着标语：非请莫入，请尊重隐私。只有本科生是这里的主人，研究生进不去。一位胖警察把我们挡在门外，直到薛晴来，亮出学生证，我们作为她邀请的客人才得以进入。当9000平方英尺、如哈利·波特魔法学校般宏伟的大厅迎面而来时，我在古老的彩绘玻璃窗和辉煌的吊灯间看到了身份飞舞的幽灵。还有什么比私密性和排他性更能塑造优越感？

放眼大厅，一桌桌的年轻人正在低声而热烈地谈论着什么。据说新生饭堂里庞杂繁复的派系比高中只多不少，落座何处也事关归属与身份问题。一位哈佛学生在她描述校园生活的《哈佛日记》里如此建议道：“你该自问：我高考考了几分？答案会帮你在饭堂里选个合适的位子：跟体育生（低分的）、机会均等行动计划受益者（低分的）、贵族（低分，但投了大笔赞助费）、学识精英（高分、没赞助），或是亚裔、印度人（几乎满分的）同坐。”在没有固定班级的

哈佛学院，食堂与宿舍就是固定的社交场所了。薛晴迅速吃完早饭，留下我们，告辞离开，很匆匆。她说，她赶一门课。曾有一位斯坦福教授告诉我，斯坦福人偷着使劲儿，哈佛人却生怕别人觉得他不够忙。我试图跟长桌对面看资料的女孩儿搭讪，她似乎被外人的闯入和意外的即兴冒犯了，婉拒道："对不起，我感到不舒服。"

在哈佛，到处都不缺乏身份的符号：那些分布在哈佛校园和查尔斯河之间的英格兰古风、以波士顿显赫家族或哈佛校长命名的本科生宿舍楼——新乔治亚风格的洛厄尔楼，维多利亚风格的亚当楼，剑桥牛津建筑翻版的艾略特楼，古典主义的科尔克兰楼等等。这十几栋宿舍楼，百年来早已形成各自的传统：洛厄尔楼的清晨华尔兹舞会、星期四下午茶、年度戏剧节和春季酒神会；亚当楼的体育赛事、万圣节化装舞会、冬季盛宴和艺术展览；艾略特楼有"预科生（主要指波士顿和纽约的几所贵族私立高中）楼"的名号，是社交精英聚集之地，"比哈佛还哈佛"，以冷漠、势利、假知识分子和俱乐部闻名；科尔克兰楼的文化艺术节、红酒交流会、案例模拟和周日点心会；丹斯特楼则被称为"哈佛保守主义和漠视主义的最后堡垒"。20世纪初，劳伦斯·洛厄尔校长把哈佛学院的教育定义为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在洛厄尔看来，日后投身学术生涯的是少数，不应"将学生紧缩在知识探索的监牢里"，导致为"学术探究"付出"社会代价"。在哈佛，学生宿舍制不是为学术交流，而是为社会交往设立的。

我很想去这些传奇的宿舍楼里看看。四月一个周六的夜晚，我买了戏剧票，去洛厄尔楼看《仲夏夜之梦》。为了庆祝宿舍楼成立75周年，洛厄尔楼管会花了2万美元，用洛厄尔自己的乐团，制作了这台经典剧。从带蓝色圆顶的哥特式钟塔下中世纪般的石拱门进入，便是宽阔的中庭院落了，草坪四周围合着三四层高的宿舍楼，一水的红砖墙，屋顶阁楼的斜坡上垂直支出来方正的砖砌小天窗。舞台设在平日的宿舍楼餐厅里。移走了餐桌，硕大的空间能搭建两层的舞台布景，还能放下乐池和大约300张观众椅。这天的演出座无虚席，美妙的歌剧

把观众渐渐带入图书馆，然后带入森林，最终带入梦境。每个角色出场都很精心，伴着诠释他性格特征的音乐。想到我是在观看一场大学宿舍楼出品的戏剧，而不是坐在某个歌剧院里，便对哈佛的“一流”有所感悟。

歌剧结束，从洛厄尔楼出来，与一排鱼贯而入的女生在拱廊里擦肩而过。白天青春气的哈佛在夜幕里换了妆容：长发盘起来，素面描画得妩媚，规矩的羽绒服换成时装外套，膝盖以下露出裙摆和丝袜，高跟鞋踢踏，夜色荡漾。我想起电影《社交网络》里坐着“老男孩”贵族俱乐部的大巴车，受邀而至的美女，在“终极俱乐部”的私有楼宅前翩然鱼贯而入的场景。从洛厄尔楼出来走几步路，就是八大“终极俱乐部”之一的“飞行俱乐部”。周六正是聚会时间。美国国旗在罗马式门廊外飘扬，室内歌舞升平，大门掩着，私家护卫站在门廊的台阶上。我仿佛已经嗅到了里面酒精的气味。哈佛校方曾试图把这些俱乐部的私产收购了，但最终也没搞定，禁酒令也没法执行。

“烤猪”“蜜蜂”“凤凰”“德尔菲”“猫头鹰”，这些钟爱动物名的俱乐部，是哈佛学院的贵族社交圈：男性，出身世家，有权，富裕，人脉深广，排外，私密——它们是顶级名利场。被相中的高年级学生会被“拍肩膀”，经过筛选，新会员会收到古希腊或拉丁古文封印的手写邀请函。哈佛毕业的美国保守派作家罗斯·格雷戈里·多塞特（Ross Gregory Douthat）在他的回忆录《特权：哈佛与统治阶级的教育》中写道，这些俱乐部奉行严格的贵族等级秩序，“非会员男性被分流到地下室里，喝桶装啤酒，竞争派对上外貌相对差一些的女性。但若是‘猫头鹰’‘蜜蜂’‘飞行’的盛大节日派对，连最有魅力的姑娘都得争宠了”。

现代哈佛，最初那批崛起的知识精英也在这些俱乐部里获得了地位，比如“烤猪”里的保罗·尼采家族。当初是他们，把一批有学识的年轻人带入了国家的贵族权力圈，从此为各阶层智识上卓越的精英

开辟了成为统治阶层的通道。今天，终极俱乐部的成员更加多样，家族背景从曼哈顿上西区的“老钱”、犹太律师、非裔新贵、大使子女、印度医生、亚洲大腕儿到王室后代，不一而足，成为全球统治阶级的青年社交圈。

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说，未能进“烤猪”俱乐部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大约80年前，哈佛校长詹姆斯·布赖恩·柯南特决定根据个人天赋而不再是出身来选拔哈佛学生，这是有转折意义的决定。哈佛由此创造了一个知识精英阶层，拥有智力天赋和创造力的年轻人从此得以与拥有财富、权力及人脉的社会贵族阶层分享权力。但无论是精英还是贵族，对雄心勃勃的哈佛本科生来说，加入那些象征着社会上层的隐形俱乐部，是大学里的终极成就。

分数贬值：象牙塔内外

对哈佛人来说，课堂意味着什么？

在离哈佛校园不远的一栋小楼里，我见到哈佛《深红报》的主席罗伯特·萨缪尔斯（Robert Samuels）。这份历史悠久的报纸是哈佛最重要的记录者，任何版本的哈佛史都会引用它。这幢产权归报社所有的三层小楼，财政上独立于校方。在第二层的编辑室里，萨缪尔斯指给我看墙上排成一圈的肖像漫画，那是历届《深红报》美编的作品，人物是每一任该报的主席。他指着其中一幅说：“那是我，旁边那幅是我哥哥。”我环顾一圈，认出其中一张熟悉的肖像，那是富兰克林·罗斯福。

萨缪尔斯在一楼的办公室很宽敞，老板桌、高背大皮椅，墙上贴着《深红报》创刊号的海报。他把打包午饭的饭盒放进冰箱，沙发上还扔着一箱可乐。他说，他有时吃睡都在办公室。我问他一个星期花

多少小时在“深红”，他的回答让我吃惊：80~100个小时！也就是说，“深红”就是他没日没夜的大学生活。除了报道哈佛体育新闻，他还对《深红报》的管理和经营负责。编辑兼总裁朱莉·赵兹莫（Julie Zauzmer）也说，“深红”的管理层基本都要付出这么多时间。

我很难想象，他们如何完成学业。朱莉告诉我，在她的大学生活里，“深红”比课堂还重要。她第一学期的成绩很优秀，改变她大学生活轨迹的，是2009年发生在科尔克兰宿舍楼的一起枪击案，“毒品、谋杀、性，具有所有戏剧的元素，足以构成一个复杂的故事”。朱莉不仅报道了这起枪击案，而且全程跟踪了对谋杀嫌疑人的审讯。“每天早晨9点到下午4点，连着3个星期，我需要坐来回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为此逃了很多课。”但整个审讯过程让她感到有趣和好奇。“直到今天我仍觉得，最后被判一级谋杀的那个人，并不是三个嫌疑犯中扣动扳机的那个人。法律和技术上的严格程序与常识的判断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偏差？”这个问题让她无法抑制深入调查这件事的冲动，她说，“那时，我意识到，我想当个记者。”

不久，即将轰动美国的亚当·惠勒造假案开始浮出水面。惠勒是转校来哈佛的本科生，被曝申请时的成绩单、推荐信、论文等全是伪造和抄袭的。《深红报》让朱莉写一篇封面报道，她花了很多时间深入调查，最后出版了一本书。朱莉说，她本想在完成这些报道后就回到课堂，“但转身时发现，两年已经过去”。

我问朱莉，在遇到报道中的问题时——比如法庭审判中的法律程序问题，采访和写作中的技术问题等等，她会向谁求教。她说：“‘深红’是我的课堂，它聚集了一群从美国最牛的私立预备学校校报出来的编辑，他们教会了我很多。”她还会给波士顿地区的律师、记者打电话，给哈佛校友写信，向他们询问专业上的问题。我问她，是否也向教授咨询问题。她说：“很难想象会向他们咨询问题，哈佛

没有新闻系。但我会采访他们，他们是我的消息源。我所受的新闻训练是在《深红报》完成的。”

那年夏天，立志成为记者的朱莉获得了在《华盛顿邮报》实习的机会。她并不特别需要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她的职业生涯正在展开。

萨缪尔斯则告诉我，他打算进入咨询行业。华尔街投资银行和咨询业，仍然是哈佛本科毕业生的首选去向，因为它们最赚钱。

如果我们的聊天能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我最想与萨缪尔斯和朱莉分享的哈佛见闻，也许是关于课堂的回忆。

一个周三的下午，我跟随徐渊（化名）走进费正清中心地下一楼的多层环形教室。这种空间呈漏斗状的教室专门用于案例教学，便于讨论：讲台就像四面环山的盆地底部，多排座位自下而上变得开阔，教室可容纳60人，每个座位上都贴着学生的名字。徐渊是哈佛非洲研究系的博士生。作为研究型大学，哈佛教授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发表论文上，讲课之外的教学事务则由博士生助教来做。这是哈佛研究生院独特的助教制度，向研究而不是教育倾斜。徐渊是文理学院前院长、知名汉学学者柯伟林（William Kirby）的助教。柯伟林这学期上一门叫“在中国做生意”的课，第一次把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法用于本科生的课程。

今天柯伟林讲的是鲁冠球的万向集团。与所有哈佛课程一样，学生来到教室前，早已应该读过了课前资料，每门课的课前资料几十页不等。老师则以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方式，不停抛出一环扣一环的问题。

“公社农机厂是哪一年创立的？”

“中国处于什么历史时期？”

“‘文革’时期为什么可以集资建厂？”

“那时对它生产的零部件万向节有需求吗？”

“他是怎么卖出去的？”

“为什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会找到他？”

“企业的关键岗位有什么重大的人事变动？”

“家族为什么对中国企业很重要？”

……

没有哪个问题抛出后，没有人接招，有些手几乎一直在举。有些回答偏了，柯伟林稍加点拨，就会得到修正。一个半小时，20个至30个问题在空中来回抛接，极少落地。徐渊坐在后面，记录每个学生的表现。快到下课时，万向集团已被分析透彻，柯伟林放了一张他与鲁冠球在万向集团大楼前的合影。柯伟林做中国研究，就与中国建立很深的联系，这也是哈佛文科教授的共同点。哈佛学生在课堂上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很多是鲜活的一手材料。我还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旁听了一节关于美国政治的小型讨论课。授课人是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的知名政治记者约翰·金（John King），开场发言的是前驻华大使、犹他州州长洪博培，通过Skype视频客串的是佛罗里达共和党战略策划师。哈佛的课堂是观看真实世界舞台剧的贵宾席。

柯伟林的课结束后，徐渊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下，给几个学生答疑。他还负责给他们的论文和考试评分。

我还记得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在他的公寓里，他从盯了很久的电脑前起身走进客厅，木地板在脚下轻轻地嘎吱作响。他在窗户边可以前后轻轻晃动的沙发上坐下，两手交叉放在腹前，闭上眼，轻声叹

了口气。他告诉我，他正在给本科生批改作业，突然感到有些沮丧：“他们为什么比我写得还好？”我理解他那声轻叹的含义。对于一个将以学术为业，并为之付出多年时间的人来说，在学识上受到挑战，无疑是最被珍视的打击，更何况，挑战者是并无学术志向的、在学术营盘里摸爬滚打一番后就会奔向现实世界的年轻本科生。

徐渊有时会在看书间歇的时候研究一会儿美股，有时和朋友谈论一下经济形势，看看有什么理财之道。去年他在剑桥镇买了间公寓，最近升了些值，他感到满意。马克斯·韦伯和纯粹为学术而学术的洪堡式大学已成为过去。走在通往哈佛的林荫小径上，徐渊有时会愉悦地畅想，毕业后在离家很近的那所不太知名的学院谋个教职，未来，在波士顿的郊区买个别墅，实现美好生活的梦想。他对学术有真诚的热情，但也生活于现实世界。

在接连出现几篇漂亮的本科生论文和连着给出几个“A”后，他有疑惑：如果无法保证智识上的优越和不可替代，精英如何用唯一的资源——知识，与象牙塔外的社会权力平等地交换？进一步的困惑是，当下，以学术为业，特别是以人文领域的学术为业，价值有多大？更进一步的追问则让人忧心忡忡：大学作为庇护精英的知识机构，还能抗衡外部世界贵族式权力的侵蚀吗？象牙塔的堡垒最终会被攻破吗？如果那些并不把学术太当回事儿的本科生只能得B，甚至C，危机就不会发生，大学的门槛仍能阻挡现实世界的攻势。但悖论是，如果本科生院的学识水平未能逐年提高，大学作为知识传承和推进的机构，难道不是无能吗？而且，哈佛不是号称自己招收的是最聪明、最具学术潜力的学生吗？更何况，谁愿意花高昂的学费，来一个知识机构购买糟糕的成绩单呢？

《深红报》的本科生与徐博士对待大学课业的不同路径选择，让我想起了哈佛那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分数贬值”的争论。

2001年夏天，《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哈佛静悄悄的秘密：分数贬值》。2001年6月毕业的那届本科生，91%的人获得了“毕业荣誉”，而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比例还不到40%。媒体评论说：“哈佛荣誉学位沦落至中等水平。”其中，贬值最厉害的是人文学科，分数超过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生的成绩。而在理工科为主的麻省理工，却没有分数贬值问题。从此，哈佛开始了无休止的分数争论。

为什么“分数贬值”引人关注？它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简单追溯到80多年前的柯南特校长时代。

柯南特当校长时，哈佛是一个贵族统治的大学。学生拿一个“绅士C”的学分就行了，他们知道，他们的未来取决于家族的财富与人脉，与学分高低关系不大，大学不过是个确认贵族地位的橡皮图章。柯南特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波士顿人，也不是来自显赫的家庭，他是位有天赋的化学家，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科学家的地位。他就任时，还向前任校长、上层家庭出身的洛厄尔问自己的薪水。洛厄尔说，不知道，我都是把这笔钱用来补贴学校的。当时有哈佛校友八卦，柯南特的日子不太好过，洛厄尔留下偌大的校长楼，他的旧家具只填得满三间屋。

但柯南特很有远见。他第一次确切地回答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好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并未像他的同辈大学校长那样，仅仅是保护传统，而是试图建立一所前所未有的“精英型”大学。柯南特的“精英”与我们的“贤人”很相似，指那些在学识、能力、性格和道德上卓越的人，而不论其出身。这在哈佛历史上是革命性的。哈佛教育学院老院长、教育史学家帕翠西亚·格雷厄姆（Patricia Graham）告诉我，柯南特相信，有天赋的人平均分配在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不仅是新英格兰，也包括中西部各州；不仅是私立预备学校，也包括公立学校。而天赋与教育资源之间的不匹配，往往是经济

和地理障碍造成的。如果大学的使命是推进知识进步，那就要把这些有天赋的人吸纳进来。


帕翠西亚·格雷厄姆

两个制度促成哈佛转型为全国性的平民精英大学：全美奖学金，吸纳全国经济资源处于劣势、但有天赋的学生进入哈佛；坚决用系统的智力测试法寻找和测试天才。通过大学入学考试，柯南特在社会与经济优越感所构成的等级之外，建立了一种新的自尊——学术与智识的优越。贵族城堡降下了它的吊桥，被城池隔绝的大众精英得以进入大学。可以说，分数作为“鉴别卓越”的标准，构建了整个知识精英阶层。大学成为新时代的地位象征，它替代了过去的绅士阶层。

这就是为什么“分数贬值”对哈佛很重要的原因。一旦失去了“鉴别卓越”的信用，精英阶层也将逐渐瓦解。分数是知识机构发行的价值尺度，衡量知识与外部现实世界进行资源交换的地位；它也是大学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风向标，显示着庇护知识精英的机构——大学，在与外部世界权力较量中的进退。

“二战”后的20年，人们相信知识的作用，热烈地追求知识，哈佛是世界新思潮的中心。20世纪60年代的反智运动后，知识不再被信仰，学生不再听从教师和大学的教导，分数也从那时开始贬值。而今天，知识机构正被资本与消费主义所侵蚀，成为一件提供摆渡到现实世界服务的消费品。在哈佛学院，学生们一学期学术热情最高的时候就是开学的选课周和期末的考试周。“（除此以外的其他时间）还有

很多别的事要做——俱乐部聚会、课外活动、暑期实习。我和我的同学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相信，课堂只是另一个美化简历的机会，是一个集齐学分和推荐信的场所，这些东西会把我们送进人生的下一站。”一位哈佛毕业生如此写道，“当投行与咨询公司的招聘者向未来的统治阶级布道获取巨富的‘圣经’时，我想，人文学科教育的内在价值已经贬值到了最低点。很多教授直觉地意识到，课堂外真实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比课堂里正在进行的要重要得多。”

80年前，柯南特离任去当美国驻德国高级专使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天知道！但至少不会是在这个位置上了。”酸酸的离别话语，映射了他把学识精英带入统治阶层的艰辛。他也许未曾料到，80年后，哈佛历史最悠久的人文学科领域，却成为帝国最先沦丧的疆土，“绅士C”变身为“精英C”，在哈佛转世复活。不同的只是，已颇具服务意识的大学决定，何不皆大欢喜地给只需“精英C”的学生们一个“A”，好让他们走出校园时，更有市场竞争力。哈佛不一定能让学生感到开心，也不一定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关键是，哈佛让他们在各个领域处于世界之巅。在现代社会里，这意味着财富——然后，他们能够反哺哈佛，帮助哈佛保持顶尖的地位。

真理：攻守之间

教授俱乐部是学者们聚会的地方。哈佛每年有9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学者。哈佛的地理疆域接近200万平方米，一年支配的财政和基金收入接近400亿美元。上百个学术机构构成城邦似的自治的复杂系统。最优秀的知识创造者都普遍奉行强烈的个人主义，各自孤立，哈佛的巨型则加剧了这种分散和自主。来到哈佛，我迅速感受到它一盘散沙的原子状态。俱乐部则是能看到有形的“学术共同体”的地方。

一天晚上，在哈佛访学的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在俱乐部与几位中国学者吃饭。跟随他进入，大厅的壁炉前坐着位教授，正陷入沉思，另两位坐在围成一圈的沙发上看报。旁边的会客厅里某个沙龙正接近尾声，手持香槟聚成一团团讨论的人群正散开，笔挺的西装间夹杂着年轻的牛仔裤和球鞋，那架施坦威三角钢琴做背景，很像一幅油画。进入餐厅，在长桌坐下，杯酒间，学者们的讨论从金砖四国组建银行开始，再到中美关系，又进入到中西文化的对比，天马行空。席间，汉学家包弼德（Peter K.Bol）从另一桌起身走来，与秦亚青握手寒暄，谈谈彼此最近的学术兴趣。

放眼望去，每一桌的学者们都在兴致盎然地交谈，餐厅里氛围热烈。在本科生院，精英与贵族共存；但在以研究生院和教职人员构成的知识机构内部，哈佛自由的学术氛围对全世界的学者都有强大的吸引力。秦亚青说，在这里，他感到精神上的舒展。

凝聚松散哈佛的灵魂，是它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在哈佛，几乎所有学术型学者对于同行的尊重和知识的热爱，都超过了对其他任何事情的关心。一位即将从东亚系毕业的博士生告诉我，在哈佛，无论你多么显赫，来自什么世家，只要一谈到学术问题，立马所有人的姿态都放下来，完全平等地探讨。对以学术为业的人来说，唯一激发敬意的是智识上的成就。这位博士生已经在哈佛待了8年，8年来，他想还原中国宋代一位变法家的历史。为此，他要穿越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去找寻通向那个具体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时空和精神的路径。

他为此乐此不疲。在研究生院的食堂里，他兴致勃勃地与博士生同学分享前一晚在网络图书馆的新发现。8年前，他与他的导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探讨学术问题，两人一拍即合。8年里，马若德一直给他持续的、无条件的学术帮助，从未催促他。我问他，有没有感到过到外面世界去的冲动？他说，学以致用，终究要在真实世界实现所学的价值，但探寻万物运行规则的“道”的路程却很漫长。

正是在从事知识生产上，哈佛确立了它作为知识帝国的独立威望，哈佛崇高的声誉最终来源于其强大的学术研究能力。它奉行残酷竞争的彻底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年轻学者们会发现，他们处在“非升即走”、“不发表即死亡”的丛林法则中，必须以卓越的学术成就求得生存。他们有深深的孤独感与压力感，哈佛的研究生/博士生自杀的问题与本科生一样突出。但它也以最优越的学术自由制度，保证处于精英顶层的最具学术潜力、最优秀的学者，能够不受任何外界压力自由地研究。哈佛昂贵的终生教职意味着，没有经济困扰，也没有被解雇的后顾之忧。

但这个知识帝国的内部体系，正在发生巨变。走向现代的哈佛有时会与传统剧烈冲突。

在拉德克里夫学院的讲堂里，我聆听了一场著名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的演讲。他是哈佛历史系的毕业生，为爱因斯坦和乔布斯写过传记。哈佛很捧场：现任校长德鲁·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和她的丈夫查尔斯·罗森伯格（Charles Rosenberg）都来了，坐在第一排，艾萨克森正是受他们邀请来的。福斯特本人是研究美国内战的历史学家，而罗森伯格是研究医学史的科学史学家。坐在前排的还有好几位哈佛历史系的科技史学者。可容纳300人至500人的大讲堂座无虚席，不仅因为艾萨克森的名气，更因为科学史是哈佛历史学的明珠。

艾萨克森说：“在哈佛，我一开始学的是文学史，我想寻找探索人的创造力的道路。但随着我的成长，我明白，科学史才是通向理解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应用的唯一正确道路。”他说，当他开始写《基辛格：大国博弈的背后》时，“在《时代》杂志的档案馆里，我发现了基辛格的一段话。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我还是哈佛教授时，我一直以为，历史是某种伟大力量推动的，但当我参与到历史进程中近距离观察时，我发现了个体性格的力量。历史是在这些个体互动中创造

的”。伊萨克森说，后来，通过探索爱因斯坦与乔布斯，他发现了科学共同体互动的力量，从而找到了理解科学史的路径——“协同创新”。他调侃说：“今天来演讲，我在麻省理工与哈佛交界的一个路口遇到一位麻省老友。我们站在那儿交谈时，我在想，这会不会是麻省与哈佛融合的开始？”

讲堂里爆发出笑声，这笑声里潜伏着哈佛人的某种身份焦虑。麻省理工的人都住在以数字编号的宿舍楼里，气质严谨。虽然仅一条查尔斯河之隔，百年来，麻省与哈佛的学者基本不互相流动，有互不挖人的君子协定。麻省不是哈佛，哈佛也不是麻省。人人都清楚，20世纪末，科学占据了哈佛大学的中心，科学史之所以成为显学，是因为它与科学结盟。但潜意识里，哈佛更愿意在历史学这种学科里找到传统的荣耀和身份的认同，而不是数学。

20世纪末，科学通过与外部世界的资本联合，高速壮大。1974年，当哈佛医学院第一次与孟都山公司签署合同以获得研究资助与设备时，还必须完全秘密进行。但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哈佛以专利使用权作为股本投资合资公司的浪潮后，产、学、研综合体已初具规模。今天，哈佛有很多“教授企业家”，他们不但兼任公司董事和顾问，而且实验室也得到工业企业资本的支持。年老一代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如艾德沃德·普塞尔（Edward Purcell），在年龄很大的时候仍坚持给本科生教学，年轻一代的诺奖获得者进入公司则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知识市场”已根本改变了知识的生产模式和效率，对科学的探索不再出于纯粹的好奇心，而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

1979年至1991年间，德雷克·博克校长以一系列公开信和演讲号召哈佛“为社会服务”，象牙塔精心与社会保持的距离模糊了。博克推行世俗化的动机，来自回应当时校园里的政治运动，比如，种族和性别问题，但它的影响却溢出到了整个知识领域。博克说，“大学不是象牙塔”，“除非社会赞赏大学所做出的贡献，否则社会将继续削

弱大学的社会地位，将其看作另一利益群体，逐渐减少对大学的保护和支持，而这恰好是大学维持其卓越地位所必需的”。定义哈佛大学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逻辑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传统的哈佛曾以发展知识为唯一使命，与现实世界划清界限，以精英反叛贵族；而现代的哈佛，则以已经建立起来的知识阶层的身份，寻求向社会回归。

科学在与外部世界的联合中发展了自己。它探究事物与自然律，追求绝对真理，具有天然的知识上的独立性。一些社会学科也发展了自己。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埃尔文·罗斯（Alvin Roth）。罗斯的贡献不在理论上，而在应用。他所建立的肾脏捐赠分配系统是为了解决美国上千名患者因肾脏器官短缺而死亡的问题，因为患者与器官捐赠者的血型匹配效率太低。他所建立的学校匹配系统则是为了保证学生，特别是相对贫困、附近学校较差的孩子，能有机会选择合适的学校，因为在纽约这样的城市，资源并不短缺，但因为地理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却无法实现最佳的教育资源配置。罗斯的经济学有高深的算法，却散发着尘土的味道和社会关怀。打电话给他时，他正沐浴在加州的阳光里。2013年，他去了斯坦福。他告诉我：“经济学是关于真实生活的学科，它应该介入日常生活。”但他仍然把自己视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以非常平静的语气告诉我，接到获奖电话，他说，好吧，谢谢！然后他所做的事情是，继续喝完杯中的咖啡，开始工作。他不躲避公众的关注，他觉得诺贝尔奖带给他的好处是，让人们关注他所开创的新的知识体系——市场设计，经济学的应用分支。应用，已经在知识体系的阶梯上站稳了脚跟，它在被外界利用为工具的同时，也自我拓展了知识的疆界。

与这些学科相对的是，人文衰落了。它也试图改变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结果，它在世俗化的过程中丧失了成其为它自己的东西——有厚度的情感、道德、审美、精神，以及独立性。一个很讽刺的例子，就是校园里的“政治正确性”。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争取黑人与妇女平等权利的政治运动冲击了校园。1972年，一群黑人学生占领了校长办

公室所在的马萨诸塞楼，要求哈佛退出海湾石油公司的股份。海湾石油公司在安哥拉有业务，而安哥拉当时还处在葡萄牙殖民统治下。哈佛只有0.3%的股份，但在道德上，持股权却成了博克任期内无休止的漫长争论。最后的结果是，作为妥协，校园里的思想和言论在一些问题上不得不勒住自己的喉咙，这就是有点阴阳怪气的“政治正确性”。20世纪80年代，哈佛做了一项有关招生的秘密研究。结果发现，黑人和女性在学术上的表现与他们测验成绩所预示的程度一样差；研究还发现，“赞助性行动”反而会给少数族裔带来不良后果。但哈佛用强行的行政控制，阻止了研究结果的公开。

但哈佛就是哈佛。在斯坦福，人们能露骨地说，他们来到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创立企业；但在哈佛的语境里，它对精神上古老的故乡仍然有无法割裂的眷恋。知识市场化总或多或少意味着“受到外部世界的诱惑”，学术企业家、媒体学者和兼职顾问并不像在斯坦福那样理所当然，他们被有些人视为“失去了灵魂”，“核心消失了，外部关系迷雾重重”。其实，这是因为，曾经能够为科学文明发展指明方向的人文学科，陷入了自我认知的混乱。只有批判是仅存的力量，却无力建构新的思想。

但哈佛仍是哈佛。2001年上任的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试图把哈佛改造成更接近麻省理工的样子，最终失败了。萨默斯出身学术世家，是个坚定的精英主义者，曾官至美国财政部长。他印在我脑海里的形象，是一个西装皱巴巴、头发乱蓬蓬、沉浸在思维乐趣里的天才。他是知识尊严的捍卫者。他明白，一流的研究才是事关哈佛存亡的大计，哈佛的所有权力与荣耀都来源于它“思想帝国”的地位。为此，他要全力壮大科学——最具知识生产力的城邦，给这些院系最优厚的资源，并为他们在查尔斯河对面的阿尔斯顿大规模兴建科研基地。他明白，那些具有知识密集性、必须经过长时间艰苦训练才能掌握的知识体系，将日益壮大兴盛；而人文学科的城邦防守薄弱，最易失守。事实是，与科学联姻的人文学科都获得了更

高的地位（比如科学史），社会学科也不例外（比如计量经济学）。他敏锐地看到，“哈佛已经错失了网络时代开疆拓土的机遇（硅谷在斯坦福），必须准备好在生物医学领域抓住未来”。

放在麻省理工或斯坦福，萨默斯也许会被视为一位杰出的校长，但在哈佛，情况更为复杂。萨默斯的执政加深了帝国内部的分裂，一批哈佛曾引以为傲的明星学者——非洲研究系系主任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非裔教授、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亨利·盖茨（Henry Gates），文理学院院长柯伟林，哈佛学院院长哈里·刘易斯（Harry Lewis）等等，纷纷因与萨默斯理念冲突而离职或出走。在学校资源朝科学院系倾斜、大规模兴建科研基地的同时，校长掌握的资金越来越多，文理学院和许多人文专业的财政资金被大幅压缩。萨默斯的“知识达尔文主义”给人的感觉是，梵语系、斯拉夫语系，以及社会学的很多小分支学科，已经没什么存在的必要；而科学与经济学——资本最青睐、在市场中最有用的学科，才是霸权学科。在一些人文学者看来，萨默斯不是学者，而是一个带着政界和商界行事风格的集权者。

哈佛有它的规则。2006年，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萨默斯提出理论假设，女性之所以在一些学科领域人数较少，可能是因为数学的先天能力较差。作为经济学家，他非常学术地说：“无论研究方法有何不同，有比较清楚的证据表明，女性和男性的人口标准偏差和变异性有所不同。所以，如果男女的平均能力相同，那可能在数学能力上，居于顶端水平的男性比女性多。”他没有说完的是，从统计意义上，这也意味着，在底层水平，男性也比女性多。媒体立即过度反应，将这句话解读为“歧视女性”，萨默斯踩到了美国“政治正确性”的雷区。令人惊讶的是，哈佛的学术圈也对他真正说过什么毫无兴趣，也没有打算以校园内学术讨论的言论自由规则来对待这件事。与他一直处于冲突中的文理学院给他投了不信任票，他黯然离职。他的离任和

女性历史学家德鲁·福斯特的继任，充满了哈佛气质——人文学科虽然虚弱，但哈佛拒绝缺乏它精神特质的知识疆土的扩张，回到守势。

斯坦福的人曾告诉我，斯坦福是21世纪的大学，而哈佛属于20世纪。当好莱坞娱乐产业让来自加州的金发时尚俏女郎，穿着比基尼出现在哈佛申请材料的录像中，并以对健身、衣着、烫发（都是消费业）的敏锐洞察力为谋杀嫌疑人辩护胜诉，战胜来自显赫的金森顿家族的情敌，甩掉势利政治世家的男友时；当马克·扎克伯格决定离开哈佛，跟随纳普斯特（Napster）联合创始人肖恩·帕克前往帕罗阿托，以藐视一切的勇气吸引风投创立脸谱网（Facebook），并与富家出身的哈佛创业伙伴分道扬镳时，看起来，哈佛就像处于守势的古老城堡，被西海岸朝气蓬勃的灵魂遮掩了光芒。

但这也许正是哈佛人的坚守。那些无休止的争论，正是在过于复杂扑朔的现实里，为忠诚于知识与真理而发生的争论。一天下午，在萨默斯讲完全球化课后，我走到讲台前。我问他，他为什么留在哈佛。他说："我愿意待在大学里，因为这儿处处是与我趣味相投的人。"我又问，哈佛的灵魂是什么？他说："持续地战斗，确保大学是由思想的权威，而不是权威的思想所统治。这是一场人人有份的持续的战斗。永远不要试图寻找绝对真理，但要一刻不停地向它靠近。"

在哈佛学什么

对于一个十几岁初次离开家门，行将踏上通才教育征程的青少年来说，今天一所第一流的高等学府将给他以什么样的印象呢？他将有四年的时间去自由地发现自己——他步入到一个空间中，以往贫乏的知识荒漠被他逐渐抛在身后，而获得学士学位后

那种乏味的专业训练尚未来临。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晓的那个小小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更为广阔的天地，亲自领略它的乐趣，充分汲取知识的营养，以支撑自己去征服那片注定要穿越的知识荒漠。只要他想要获取任何高水准的生活，他就必须这样去做。如果他的选择不仅仅限于那些当时流行的或者是职业发展所提供的内容，而是关注那些能够使他自身全面发展的选择，那么大学生活是令人神往迷醉的，他可以成为自己所期望成为的一切，去关照和思索自己的种种选择。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大学岁月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它们是使他文明开化的唯一途径……面对这样一个行将接受教育的人，我们必须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他能够被称为受过大学教育，他应当学习什么？

——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

据说，在每个哈佛人的一生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时刻，他或她突然意识到哈佛的魅力。我想很多人的那个瞬间是在拿到长达上千页的选课单，为自己选择在哈佛的第一门课的时候。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毕业生参加毕业典礼

2013年哈佛新的通识教育计划正式推行，重新划分了学生需要涉猎的八大知识范畴领域，艺术与诠释、文化与信仰、经验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科学、物理世界科学、世界中的社会、世界中的美国，共计400多门课程。

修辞的元素

诗、诗人与诗意

5部音乐著作的首场演出

一门已死的语言中的爱：经典印度文学与理论

美国音乐剧与美国文化

佛教与日本文化

伊斯兰建筑中的纪念碑

文学与革命：文化转型时期的巨著

奥托曼帝国的视觉文化（15~17世纪）

俄罗斯与东欧的艺术与政治

当代中国的禁忌之爱

中世纪的想象：视觉、梦与预言

喜剧的宇宙

莎士比亚，早期戏剧

现代艺术与现代性

……

（摘自哈佛新通识教育计划“艺术与诠释”板块课程内容）

理解伊斯兰与当代穆斯林社会

西方的推理与信仰

经典希腊文明中的英雄概念

从希伯来圣经到犹太教，从旧约到基督教

研究佛教，穿越时间与空间

中国的日常生活文化

看见就是相信：摄影的历史

疯狂与药物：心理咨询历史上的主题

浪漫：从简·奥斯汀到小鸡文学

从布拉格起义到羽绒革命：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捷克

纳粹影院：第三世界的迷幻产物

动画、漫画、电影中的日本宗教

雅典、罗马与我们：身份的问题

……

（摘自哈佛新通识教育计划“文化与信仰”板块课程内容）



桑德斯剧场旁的安纳伯格餐厅，拥有9000平方英尺的就餐大厅

你为什么听到以及听到什么：音乐与声音的科学

如何搭建一个可居住的宇宙

爱因斯坦革命

时间

能量宇宙

什么是生命：从夸克到意识

科学的单位：从大爆炸到雷龙及其他

原始导航

科学与烹饪：从高级烹饪术到软物质科学

看不见的世界

气候—能量挑战

……

（摘自哈佛新通识教育计划“物理世界科学”板块课程内容）

人权：哲学入门

自我、自由与存在

“如果没有上帝，一切皆可允许”：有神论与道德推理

经典中国伦理与政治理论

自我、宁静与脆弱：西方与东方

道德推理与社会抗议

正义

自由

自然

生物伦理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道德质询

哲学家与暴君

医学伦理与历史

……

（摘自哈佛新通识教育计划“伦理推理”板块课程内容）



哈佛学生正在上一堂天文课

如果说，大学教育的价值在于为一个人的一生提供一个时间段，在此期间，他的求知欲最为旺盛，心智最为开放，并得以远离社会求速成的压力，学习如何发问，去怀疑既定的前提，学会天马行空的思考，那么，当几乎全人类的知识一起摆在他的眼前，而他必须从中选出32门值得花费四年时间的课程时，除了对于这场知识的盛宴充满兴奋之外，恐怕还有巨大的困惑与不安。

21世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21世纪前25年，何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是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威廉·科比在2003年一次通识教育改革会议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当一所走过了近400年历史的大学回头审视自我时，这是一个最

简单，却也最艰难的问题。从2013年开始，哈佛的本科生全面推行一套新的通识教育计划（Gen Ed），以取代20世纪70年代末设计的“核心课程”（Core-Curriculum）。

对哈佛学生来说，没读过莎士比亚更可耻，还是不知道染色体与基因的区别更丢人？哪些知识是重要到必须教给每个学生的？比如足够多的经济学知识让他们看懂华尔街的财务报表，足够多的科学素养让他们读懂《科学美国人》上的每篇论文，还是足够多的幽默感让他们看懂《纽约客》上的笑话？

“受教育”与技术训练不是一回事。尤其在西方“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视野之内，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必须理解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文化的与自然的——从而追求一种富有意义的人生。它要求一种历史性的视角，让一个人不至于陷溺于一时一地的现实考量，活得像一只“夏天的苍蝇”（埃德蒙德·博克）。这样的“教育”必然包含英国19世纪著名的诗人和学者马修·阿诺德所说的“曾经被了解过的与被述说过的最好的一切”。它必须理解整体——人类世界与它的历史，我们的文化与那些不同于我们的文化，自然世界与探究的方法，量化的与语言的技巧，还有活泼的艺术。

就像校徽上刻着的“真理”二字一样，“自由教育”——在自由探究精神指导下的不预设目标、不与职业相挂钩的教育，是哈佛大学在近400年的历史中一直坚持的一个理想，尽管在越来越世俗化和功利化的今天，这种坚持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有一种说法是自由教育就像教堂，专业教育则像医院。大家都知道医院是干什么的，但说不清楚教堂到底有什么用，但它确实还有某种深远的影响和作用，比如慰藉和回答人的真正需要。

哈佛通识教育委员会主席J.哈里斯在接待两位前去取经的中国学者时说：“自由教育的特点是又宽又深。所谓宽，是教给学生的整个

知识范围‘宽’，深则意味着要深入各个专业，每一门课都讲究深度。”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哈佛就把本科生的课程分成三个部分：主修课、选修课、通识课（此外还有写作课与课外活动）。按照J.哈里斯的说法，这些都是哈佛式“自由教育”的基本元素。主修课致力于培养学生对某一学科的深入理解，这是专业化时代的要求——只有当一个人深入钻研了某一复杂学科之后，不仅学会分析问题，还要能合理地解释解决问题的过程，才能明白真正的智力探究与探索是什么意思。即使一个人学生时代选择的专业与他未来的事业之间毫无关联，或者20年后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全部忘光，他至少懂得精通一门专业是怎么回事。

选修课占四分之一，是为了让学生按自己的兴趣自由探索主修专业之外的知识，比如一个文科生偶尔也会仰望星空，追问宇宙大爆炸是怎么回事；或者一个满脑子代码的计算机系学生可能也愿意欣赏一点贝多芬、莫扎特或印象派。

剩下四分之三则是通识课（General Education）。所谓通识课程，就是学校提供给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础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无论他们的专业或兴趣是什么。

在哈佛，主修课可以任意选、任意换，连专业也可以换，唯有通识课属于校方指定必修的，非选不可。这是大学主动为一个年轻人的4年求学生涯开出的一张关键处方，代表了一所大学对于知识与教育最基本的哲学与态度：一个人在大学期间应该学些什么？什么知识或方法是每个学生都应掌握的？大学最希望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比如哥伦比亚大学认为有些书是每个人毕业之前都应该读过的，不是任何一本书，而必须是荷马、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伍尔夫的著作……为什么？因为这些是最戏

剧性地建构了“西方”的著作者，他们的书是一些最直接的涉及什么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么的书，它们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教养的一部分。

哈佛大学则认为，比起古典名著或者最前沿的科学知识，某些学问的方法才是学生必须掌握的，比如你可以没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但必须在教授的指导下以评论和分析的方式研读过经典文学；你可以不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但你得懂得如何将历史作为一种探究和理解的方式，观察和分析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你可以没上过“经济学原理”，却不能没修过一门探讨社会问题基本原理的课程。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应该能理解物理学的基本观点：这个世界是一个理性的、可预知的系统，我们可以通过经验发现其规律；而一个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捣鼓细胞的生物系学生应该具备最基本的道德推理能力，以应对未来可能遭遇的道德困境。这是哈佛运行了30多年的通识教育系统——“核心课程”的基本观点：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本科教育的重心必须从具体知识的获取转化到“获取知识的方法与途径”。

哈佛著名的“正义课”就是一门“核心课程”。在第一节课的末尾，桑德尔教授就对学生发出了警告：这门课并没有教给你任何新的知识，而是通过将你原本熟知的事物变得陌生，给予你另一种看待事物的方法。“这是一种风险：一旦那些熟悉的东西变陌生了，就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他说，“自我知识就像失去的天真——无论这让你多么不安，你也不可能再回头。”

30年前，哈佛“核心课程”的设计者亨利·罗索夫斯对于“何谓一个受过良好教养的人”有着明晰的界定：能清晰而有效地思考和写作；在某些知识领域具有较高的成就；对宇宙、社会及人类自身有深邃的理解；勤于思考伦理道德问题，具有明智的判断力和抉择力；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于世界各种文化及时代有深刻的认识。



哈佛中心校园

今天，哈佛认为，“核心课程”已经过时了——既然只有10%的哈佛学生会选择以学术为业，而60%会进入商业、律师、医学等职业领域，为什么还要花费那么多的精力试图把他们塑造成学者、教授呢？但对于未来的律师、医生、商人们，这个汇聚了世界上最多天才的大学，却无法为21世纪前25年的“良好教育”开出一份明确的清单。对此，哈佛通识教育改革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英语系教授路易斯·梅纳德（Louis Menand）是这样分析的：“在知识专业化愈演愈烈的时代，绝大部分教授都是专门学科的专家，他们在自己的领域有足够的权威，他们能告诉你，如何才能成为英语教授、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等等，但对于一个‘普通的知识核心’，或者‘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的知识’，他们一样困惑，不可能在任何具体的内容上达成共识，这不是他们的惯常思维。”


JOHN W. WEEKS BRIDGE

2002年波士顿剑桥镇举办查尔斯河划艇大赛，9000多名各国运动员参赛，哈佛大学也派队参加

自由选修制：艾略特的改革

1869年，35岁的化学家查尔斯·艾略特上任为哈佛大学新校长。一个阴天的下午，他在麻省剑桥的教会发表就职演讲，信心十足地宣布哈佛的教育内容将覆盖全人类的知识。

人们在无休止地争论语言、哲学、数学或自然科学是否能很好地训练学生的心智，自由教育应该以文学素养还是科学素养为主。如今这样的争论对我们已经没有了现实意义。哈佛认为，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哈佛并不认为一定要在数学和古典文学、自然科学或形而上学之间做出取舍。我们将兼收并蓄，各取所长。

在《哈佛世纪：锻造一所国家大学》中，历史学者理查德·诺顿·史密斯写道，“1869年是同样可以看作现代美国的起点的年份”——南北战争刚结束没多久，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于这一年建成，美国工业正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发展。这个国家需要各种各样的专家：需要工程师建设桥梁；需要地质学家从地球的外壳中获得矿物宝藏；需要社会科学家计量这种使人头昏眼花的发展给人类造成的花费；需要心理学家探测人类隐藏的各种动机；需要立法者和管理者掌握专门的知识、实行多数人的统治……

在开发新大陆的过程中，崇尚实用主义的美国人对这些“有用的知识”有一种天然的尊重。1862年，美国联邦政府正式颁布《莫里尔赠地法案》，鼓励各州利用赠地的资金建造以农工技术为主的应用型大学。一大批州立大学应运而生，比如威斯康星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都是著名的赠地大学，它们在课程上并不排斥古典人文科目，但教学的重心却放在培养农工实用人才方面，以自然科学的

应用为主旨，“向社会的工业和生产阶级提供最好的设施，以使他们获得实用知识和精神文化”。

与之相对的，新英格兰的古老学院仍然死气沉沉，不断重复陈旧课程的传统还在延续，背诵仍是最重要的教学方法，强迫式的问答则是师生之间最基本的互动。上大学的人口比例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呈下降趋势，人们普遍感到高等教育的价值在下降。1858年入学的亨利·亚当斯在自传中回忆自己的哈佛岁月：“哈佛教给学生的东西并不多（当然也没有教给学生太多坏的东西）……四年哈佛学院的学习生涯，到最后你心中会留下一片空白，一个心灵的水印。”

事实上，在最初200多年的历史中，哈佛学院的课程几乎没有改变过：逻辑学、修辞学、希腊语、希伯来语、伦理学、形而上学，再加一点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各自分工明确——学生的逻辑能力由数学培养，其品位依靠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经典著作来塑造，演讲能力有赖于修辞学，他们的理想则通过基督教伦理养成。最终的目标则是培养基督教公民的心智与品格，使他们信奉上帝，获得真理与自由。

那是一个简单、清晰而明确的世界——人类知识的体系是稳定而完整的，真理是绝对的、永恒的，大学的目的就是保存它们，并传授给下一代。

从18世纪开始，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知识开始急剧扩张。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大学在摒弃神学影响之后逐渐形成了专业的学术分工，数学、物理、生物、化学、天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众多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学科日益形成了一个自我完善、相对封闭的学科体系。比起旧知识的传承，新知识的创造成了现代大学更重要的任务。



哈佛大学与康奈尔大学的学生正在进行一场长曲棍球比赛

另一方面，对“每个人都是可以受教育的”这一观念的确信，使得高等教育逐渐从作为社会和知识精英保留的特权变为一种普泛性的人权，尤其在美国这样一个靠教育立国的国家里。从一开始，知识就是通往自由与财富必不可少的条件。托马斯·杰斐逊曾说：“一个国家如果指望自己在文明中既愚蠢无知又能得到自由，那么它所能指望的，实乃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有的。”

在哈佛园与麻省大街的交界处，Dexter（戴克斯特）门上仍然铸刻着艾略特校长100年前的题词，外侧写着“进入本大学，在智慧中成长”，内侧则写着“离开后服务国家与人类”。正是他第一个打破了哈佛与剧烈变化的外部世界之间的隔绝状况。他的任命，不仅成了哈佛，也成了当时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科学将成为未来大学的基石，古典文科的中心地位将被颠覆，而哈佛将从一个古老的、地方性的宗教学院（学生500名，教师23人），变成一所全国性的

现代研究型大学。此后，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也纷纷效仿，完成由早期学院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变。

一位叫约翰·里德的哈佛学生这样回忆艾略特任校长时期的哈佛校园生活：“艾略特校长领导的哈佛独一无二。个人主义之风盛行：一个人如果只图玩乐，一无所获，也可以顺利通过考试毕业；但另一方面，任何人都可以从全世界的知识宝库中汲取他想要的一切营养。本科生几乎无人管制，他们可以住在任何他们想住的地方，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只要上课就行。校方从不打算把学生组织起来或者强调任何形式的统一。有些人来上学，口袋里装着一年1.5万美元的零花钱，开着车带着仆人，住在高档公寓的豪华套房，而同班的其他人却在阁楼里挨饿。”



哈佛大学校园内的墙上张贴着各种学术讲座的广告

在对本科生的教学上，艾略特采取的是最放任自由的一种方式——将所有的课程向所有的学生开放，取消一切必修课程，让学生完

全根据兴趣选择学习内容。因为他相信，19岁或20岁的年轻人应该知道他们最喜欢什么，最适合学习什么。即使无所爱，至少也应该有所恶。硬把一个学生推向他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兴趣的领域去学习是愚蠢的。

在他上任之前，哈佛学生的学习选择权微乎其微。科目大部分是必修课，唯一可选的只有自然科学与现代语文。如果你想选修拉丁文，无论上大学时拉丁文有多好，都必须等到三年级——就因为那是为三年级学生准备的课程。1909年，当他40年的校长生涯走到尽头时，必修课只剩下了一年级新生的英语写作课和外语课，二、三、四年级的学生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课程。

艾略特年轻时曾经游学德国，自由选修制一定程度上显然受到德国大学“学术自由”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大学是世界上最容不得独裁者的地方。另一方面又是出于非常美国式的实用主义的目的：正是通过自由选修制，他才得以将大量专业、实用的知识纳入到哈佛的课程之中。例如，语言学的学习不再局限于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传统，而是加入了东方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现代英语。哈佛学院的课程大量扩充，从原来的70多门课程增加到400多门。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科目”的概念——包括科目名称和编号，供各年级学生选修。学分制也由此而生。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法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教师不再一个人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朗读或演讲，而是通过接连不断地提问、质疑，启发学生对某个问题的思考、讨论、争论。

上任之前，艾略特曾在《大西洋月刊》上两度撰文呼吁“新教育”，提出了他的美国大学观：“美国大学还未从本有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美国大学一旦出现，绝不应该是外国学府的翻版；也不应该如同暖房中的植物，而是从美国社会习俗及政治环境中慢慢自然而形成的产品，提供给一般人实现他的人生目标，也满足英才的雄心壮志。

美国的学院是独特的，美国的大学也将是原创的，没有类似或相同的学府可以与之平行比较。”

1894年，上任25年后，艾略特已经创造出一所崭新的美国大学。它不仅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同时也是最富有的大学。它提供的课程比其他大学都多，任课的是美国最庞大、最受人尊敬的一支教职员队伍。他着手改造了衰败的法学院、医学院，又于1872年建立了文理研究生院，作为师生们进一步探索高深学问的场所，次年颁发了第一个哲学博士学位。在当时美国1000名一流的科学家中，有237人毕业于哈佛，171人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93人毕业于耶鲁。

不过，在《知识的自由市场》一书中，路易斯·梅纳德教授认为，艾略特对美国大学最具独创性的一项改造是，在学院（本科）之上交叠添设了职业研究生院，只有经过本科学习，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才有机会进入职业研究生院，比如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完成职业训练。在此之前，哈佛的职业学院仍然遵循着古老的学徒制，法学院只要住校满18个月即可获取学位，医学院学生只要上过两个学期的课程，跟随过一个医生实习，就可以成为医学博士。据说威廉·詹姆斯在哈佛医学院（1864年入学）读书时，期末考试只有一道口试题：“如果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就能回答任何问题！现在，请告诉我你的家庭以及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改动，成了美国内战后高等教育的关键变革：一方面在日渐功利化、世俗化的社会里保留了英式古典自由教育的精髓——本科的学习应该抱着单纯的求知之心，为知识而知识；另一方面又迎合了社会的需求，大大抬高了某些职业阶层的社会地位——未来的医生、律师、商人们必须经过四年自由教育的熏陶，才能专心学习谋生所需的知识。

只有这样，才能如艾略特所愿，培养出工业社会的领袖，“实干家、能做出成就的人，他们成功的事业生涯可以大大增进公共福

祉”，而不是“这个世界无精打采的观察家、纯粹的生活游戏的旁观者，或者那些对别人的劳动过分挑剔的评论家”。他认为，这是一所大学对即将来临的美国都市社会以及工业社会必须承担的责任。

从价值观到方法论：寻找共同的知识核心

德雷克·博克，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在他的《回归大学之道》一书中回忆了这样一件往事：20世纪70年代，在哈佛课程改革期间的一次教师会议上，有人尖锐地质问他：在哈佛新的核心课程中，通过两学年自然科学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达到怎样的水平？他镇定地回答：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学生一定程度的科学素养，使所有毕业生能够阅读并理解发表在《科学美国人》或者《科学》上的论文。会议结束后，慈祥可敬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康拉德·布洛赫找到他。“德雷克，”他带着德语口音说道，“连我都没法看懂在《科学》或《科学美国人》上发表的所有论文。”

这个故事很能说明当下大学教育的困境：现代大学是按照专业分工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专业化带来科学的进步与知识总量的增长，但也导致学科之间的壁垒重重，不可沟通。一两个世纪前，也许还有科学家期望掌握所有领域的知识，比如威廉·詹姆斯，他可以在艺术、医学、法学、心理学、哲学之间游刃有余，多有建树，但现在已经没人奢望如此了。但是，对一所真正的大学而言，为学生寻找一个共同的知识核心，在他们各自的天赋与兴趣之外，发展他们的综合知识能力与教养，又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通识教育”就是作为一种与“专业化”“职业化”“功利化”相抗衡的力量，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国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崛起而成为一种教育潮流的。

很多人将通识教育视为对知识之“宽度”的追求，相对于专业化对知识之“深度”的追求。就像哈佛另一位老校长阿伯特·劳伦斯·洛厄尔所说的，“在复杂的现代社会，最理想的自由教育是，广泛涉猎、学有专攻”。洛厄尔是艾略特的继任者。他对艾略特的改革很不满，认为选修制虽然给了学生自由，却也导致他们知识结构的支离破碎。他不能理解“那些研究古生代蟑螂的左后腿”的学生，更公开瞧不起实用性的教育，认为哈佛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让年轻人把思考当成“获得面包的一种手段”。他在任期间，重新制定了本科生的课程计划，实行“集中—分配”制度，要求四年16门全课程中有6门集中在一个专业，另外6门分散在专业以外的三大学科领域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还有4门课程可以自由选修，这种结构一直延续至今。

具备宽广的视野当然是好事，但“宽度”是否足以成为一种目的？艾伦·布卢姆就曾经讽刺通识教育中所谓“宽泛”的主导思想，就像过去品行放纵的时代里“开放”一样。他认为，让学生随意挑选一系列不同的专业，鼓励他们四处看看，在那些从未涉足的专业里看看是否能发现一些过人之处，这或许是有益的，但根本不是真正的通识教育。“如果我们对于人类共同面临的那些重大问题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就不可能有郑重严肃的通识教育。”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他这样写道。

关于美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起点，一般会追溯到1917年至1919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当时很多美国公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要卷入欧洲事务，美国政府于是认为很有必要对美国公民进行西方文明史教育，让他们明白美国与欧洲文明的关系，以及美国参与欧洲战事的必要性。联邦政府向各个大学拨款，希望建立有关课程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哥伦比亚大学是第一个开设这类课程的学校，课程名字最初就叫“战争目的”（War Aims），由哲学教授弗雷德里克·伍德布里奇（Frederik Woodbridge）教授。战后，这门课程逐渐发展成了较系统

的“当代文明”课程，规定全校一年级必修，当时是每周上课5天，每天3课时。从此“当代文明”年年教授，从未间断过。

1943年，同样在战争最激烈的岁月里，哈佛大学的12位教授与校外专家每周聚会一次，反复商讨“通识教育”的问题。两年后，一份被称为“哈佛红皮书”（以下简称“红皮书”）的报告正式出台，名为《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

“红皮书”一开始就对“通识教育”做了明确的定义：它并不是关于“一般”知识的空泛的教育，也不是普及教育意义上的针对所有人的教育。它指学生整个教育中的一部分，该部分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

当时的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B.Conant）说：“无论在信息时代可以获取多少信息，无论在技术时代发展多少专业技术，无论数学、物理、生物、科学如何发达，无论可以掌握多少门外国语言，所有这些都加起来仍然不足以提供一个真正充分的教育基础。因为这样的教育计划既缺乏与作为个体人的情感经历的联系，又缺乏与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实际经历的接触。”它没有触及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美国的文化模式”，或什么是在古老的“传统中形成的智慧”。

科南特曾经任驻德国大使，十分崇拜德国的高等教育，认为德国的大学才是真正自由研究的天堂，而就在这样一个高等教育如此发达的国家，究竟是什么产生了集权统治的温床？是什么原因导致自由德国的灭亡？大学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科南特（前排左四）同爱因斯坦（前排左三）等12名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合影

事实上，自美国建国以来，大学一直自觉承担着某种程度的国家使命。它们不是国家机器，不是政府附属机构，却作为相对独立的思想智库，为国家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资源。当整个西方世界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大学又决定承担起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社会的价值的守护者角色，而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一名负责任的公民，为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和公共事务做好准备，则是最基本的目标——“美国教育的要务不是使少数幸运的年轻绅士学会欣赏‘美好生活’……我们的目的是培养最大量的未来公民，理解自己的责任与利益，因为他们是美国人，是自由的人。”

“红皮书”被奉为美国通识教育的“圣经”，但它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哈佛学院或者高等教育设计通识教育课程计划，而是为美国社

会草拟一份完整的教育哲学。科南特要寻找的“共同知识核心”，不仅是一所大学的共同文化基础，也是整个美国现代社会的共同文化基础。

根据“红皮书”的建议，完整的大学教育必须包括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两个部分，前者旨在培养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所需能力——毕竟，现代社会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必须为谋生做准备，而他们的成功之路往往在于选择一种专门化程度较高的职业，比如化学家、工程师、医生、商人等；后者则从“人的完整性”的角度，而非从狭义上“个人能力”的角度，探讨教育如何为人生做准备，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

无论作为一个“整全的人”，还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他们需要具备4种品质或能力：有效的思考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做出恰当判断的能力、辨别价值的能力。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判断力，因为在专业化时代，没有人能成为所有领域的专家，每个人都必须信任绝大多数领域里造诣更深的其他人的意见，因此特别需要具有一种智慧，借以判断：谁是专家，谁是冒牌货；谁是水平较高的专家，谁是水平较低的专家。

那么，如何训练这四种能力呢？

“红皮书”一开始设想的是一个简单的课程结构，由6门课构成，其中3门作为所有学生必修的共同核心——即“那些构成了所有哈佛学生共同经验以及导入了西方文化传统研究和普遍关系思考的学问和思想”，包括“文学精选”“西方思想与制度”，再从“物理学原理”或“生物学原理”中任选1门，必须在大学一、二年级修完。到三、四年级，另行选修3门更高深一些的通识教育类课程。

“西方思想与制度”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内容涵盖欧洲制度的发展，以及古希腊至今的社会思想等。



罗伯特·赫钦斯

“文学精选”属于人文科学领域，目的在于使学生充分了解作品本身，而非对特定的作者和时期的介绍。这门课的阅读清单中列出了荷马、柏拉图、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托尔斯泰以及《圣经》等。这门课的设计显然受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芝加哥大学名著课程运动的影响。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罗伯特·赫钦斯是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他认为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最好的方法是通过阅读和讨论西方经典名著。他认为，名著中包含了人的心智赖以获得洞察力、理解力和智慧的最佳材料。在不朽的经典面前，现在世界所说所想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是新鲜的，经典作家探测了人性必须提供的几乎每个问题的深度，并以令人吃惊的深度和洞察力解释了人类的思想和态度。而阅读和讨论这些名著，从某种角度来说，是让现代人参与到有史迄今的伟大对话中，让对话得以继续下去。

但“红皮书”同时对名著运动提出了质疑：第一，如果单纯以阅读名著作为通识教育的内容，难免有与时代脱节的风险；第二，名著运动过于偏重古典文科，而忽略了科学素养的养成。现代科学的创新和变革精神也是西方文化的主要动力——“科学所做的，远非只是给人类的美好生活提供物质基础。事实上，它在精神层面上直接培养了人道主义价值观。科学既是在精确的论据之上形成客观、中立的判断结果，也是培育这种态度的源泉。因此，在民主社会公民的培养过程中，科学的态度与习惯是尤其有价值的。”

科南特校长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曾经参与“曼哈顿计划”，因此尤其关心如何向非科学专业的学生传达科学的深奥与精确。毕竟，科学刚刚制造出了一颗原子弹，谁也不能说这跟自己没关系。“二战”后，他亲自给哈佛本科生教一门通识课——“自然科学4”，既非科学史，也非科学哲学，而是着重展示科学的原则与方法。哈佛政府系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50多年前读本科时曾上过这门课。他说这门课其实是失败的，不但没有缩小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鸿沟，反而使之扩大了。这是一个警示，很多时候我们都高估了学习某种知识与形成某种相应能力之间的关系。至于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鸿沟，至今仍是一个不可解的难题。

至于“红皮书”后来的命运，通识教育计划虽然于1945年10月通过，但到了1949年，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课程扩展到31门，并且越来越趋向专业化与狭窄化，直到1978年被“核心课程”计划所取代。“核心课程”不再试图教授“价值观”，而是获取知识的“方法论”——一种“安全、不流血、实用”的共同基础。

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应该怎么生活

2007年10月21日，哈佛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她的就职演讲中特别提到一封来自50年前的信，这封信是1951年科南特校长委托哈佛档案馆保存，并转交给“下一世纪开始时”的哈佛校长的。在信中，他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触即发，“很有可能使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包括剑桥在内遭到破坏……我们都想知道，自由世界在未来的50年里会如何发展。”

“正如科南特所处的时代一样，我们也处于一个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忧虑不安的世界，我们面对的是不确定。”福斯特校长说。

哈佛最新一轮的通识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回应。全球化与科技革命是其中最大的两个不确定因素，所以新课程计划中加重了科学的比例，并且一再强调“国际化视野”和“合作意识”。

作为一项古老的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哈佛都认为，真正的学者“必须拥抱孤独，并把孤独作为自己的新娘”。至少在这个世纪，他们希望培养的，绝不是象牙塔里孤独的学者，而是能在未来世界里长袖善舞、应付各种各样挑战的人。在所有的现代心智训练中，他们尤其强调这样一种训练：将学生置于一个陌生的环境，让他们接触超越他们理解力——甚至也超越教师理解力——的现象，让他们失去方向，然后通过学习和思考，重新找到方向。也许这才是21世纪前25年所谓的“良好教育”。

2007年通过的《通识教育工作组报告》是这样写的：“我们在报告中所描述的通识教育计划的理想，就是要使本科生能够在一个他们毕业后将成为什么人和他们将过什么样的生活视野下，在哈佛课堂的内外进行一切学习。”

从这个角度来说，哈佛所认可的“共同的知识核心”如今回到了“生活”本身。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生活？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结构？什么样的成功才包含真正的幸福？

按照福斯特校长的说法，哈佛校徽上的“真理”（Veritas）是指一种基于理性、挑战、不安和怀疑的理解之道。但如果这种理解之道能帮助一个学生直面未来生活的各种变故与不确定性，更好地与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打交道，理解它的复杂性，以及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从而拥有一个更美好和富有意义的人生，有何不可呢？

以政治为业——一个专业学院的样本

介入，但保持独立。



格雷厄姆·埃里森

采访进行间，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的秘书推门进来：“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的电话。”格雷厄姆起身接听。“来参加《李光耀》新书的书会吗？”……“人不少。”……“当然，一点问题没有，再见。”坎贝尔是主管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雷厄姆告诉我，他现在仍然每周去华盛顿。“那儿有很多朋友、学生和同事。肯尼迪学院的同事阿什·卡特（Ash Carter）现在在那儿当国防部副部长，隔壁办公室的约翰·侯德然（John Holdren）现在是奥巴马总统的科学顾问。”

哈佛与华盛顿的地理距离，或多或少影响了哈佛介入政治的姿态。哈佛人本来就有参政的传统，出过8位总统。“它与华盛顿有足够远的距离，使得它不至于陷到它的漩涡里，而可以跳出来，站得更高看问题。但两者的距离又足够近，来回跑，非常容易。斯坦福是一所伟大的大学，但到华盛顿得长途飞行，所以在政治上远一些。在哈佛，每天都有华盛顿的人过来，每天也有人过去。”格雷厄姆说。频繁往返的结果之一是，肯尼迪学院与美国政府之间形成了一个小型旋转门，学院的教授很多曾在政府任过职。“作为政府的旁观者，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是华盛顿的人，在一些政策上的处理方式肯定会有所

不同。现代政府越来越密集化，充满了细枝末节，每天充斥着一个接一个的电话，从一个会议跑到下一个，一个接一个文件，常常忘记了目标是什么，要实现什么。哈佛提供了一个跳出来、保持距离、高屋建瓴的思考机会，能够从战略层面来看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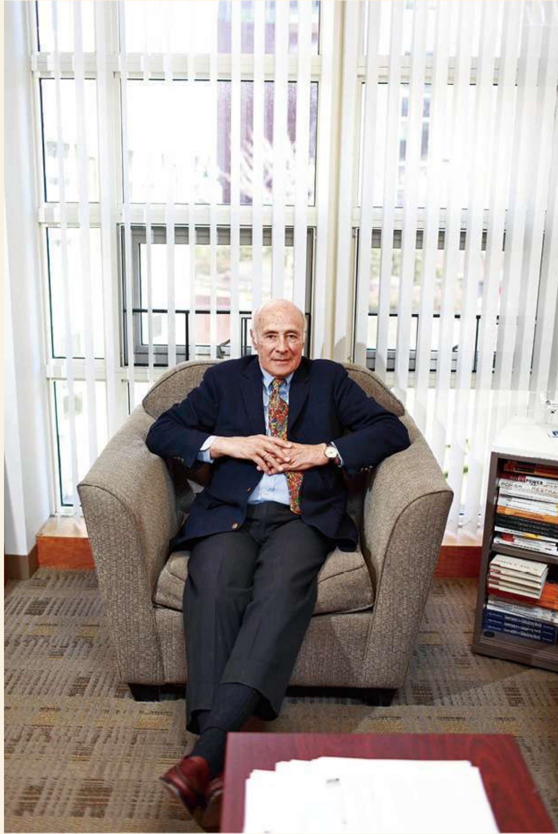
格雷厄姆·埃里森本人就是这样的。他是在卡特政府工作时，接到哈佛时任校长德雷克·博克的邀请，回来组建肯尼迪学院的。在他任内，学院从一个差点奄奄一息的小项目成长为大型学院，与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八大学院并列，构成本科生院和研究生院之外的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教育的壮大，与博克校长任内经世致用、服务社会需求的入世治校理念有很大关系。格雷厄姆·埃里森曾给里根那一届的国防部长当过特别顾问，也当过克林顿那一届的国防事务助理国务卿。年轻一些的院长，比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也是在当国防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时候，被哈佛校长给叫回来的。现任院长大卫·埃尔伍德（David Ellwood）也曾做过克林顿的助理国务卿。哈佛很喜欢自己的毕业生在外走一圈，做出成绩后，再回来。

等待格雷厄姆时，我在学院贝尔福中心的走廊里巡视了一圈，可以很快捕捉到海报、告示栏、书展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俄罗斯”“冷战”“核”“朝鲜”。格雷厄姆告诉我，贝尔福起源于“冷战”，这是它的烙印。“最初，贝尔福是一个研究型的机构，全名叫科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它的缔造者是一位生物化学家——保罗·多蒂（Paul Doty），他的目的是组建一个顶尖的研究团队，防止核战争，所以，迫切要学习国际安全知识，要理解科技在国际关系政策中的作用。当时贝尔福的很多科学家都曾参与过原子弹制造。他们充满愧疚感，担心原子弹最后会成为毁灭全世界的灾难。这就是我们的起点。我也是‘冷战一代’，是‘冷战老兵’，那时，与苏联的竞争主宰了国际关系。”1991年，“冷战”结束。“战争的新的可能性、和平的扩散、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内战、常规战争、生化武器、恐怖主义等等，都需要大规模的国际安全知识。‘冷战’结束后，学院先

是充满着胜利主义的乐观喜悦，然后发生了很多很幸运的事。这种热情的产物就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预言民主制度会取得胜利，所有人都会变得一样。‘9·11’事件与金融危机后，形成了反思主义的思潮——反思美国的普世价值观，反思民主制度也需要调整，反思自由市场也需要修修补补。华盛顿现在的瘫痪，也让人们开始反思民主的不作为和无效率。”

今天，肯尼迪学院所研究的政策问题则是全方位的：家庭、移民、健康、就业、经济发展等等，无所不包。格雷厄姆说，哈佛在18世纪有了法学院，19世纪有了医学院，20世纪有了商学院，所以在建院时，他的宏愿是“以卓越的专业技能为公共需求服务”。如何定义“以政治为业”？这是一个模糊又困难的问题。进入政府，并不需要像律师与医生那样的资格证和执业证考试。“政治家也许更像企业家。在这里，他们学到的是政治家做什么，如何进入政界，作为一个政治家需要什么要求和条件。在美国的政治体系内，当政治家基本等于决定做一位募款人，筹款是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的事情；如何赢得选举，不至于失业，要有自己专长的政策领域。我曾问一位英国议员，他如何看待他的政治生涯，他说：‘我得找到2到3个可以成为专家的政策议题，这是我唯一能够对政策过程施加影响的方式。’所以，我们给新的国会议员开设课程，由专门的人给他们讲解每个议题。对在官僚体制内的人，比如国务院和军队的官员，有很多政治职位，比如助理国务卿，通常平均任期只有两三年。你必须一上任就对情况很熟悉，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否则任期一晃就过去了。美国的政治体制没有给总统提供培训的职业轨道，他们一般通过阅读历史和总统传记来学习，奥巴马就读了很多总统传记。中国的政治体制则更像议会体制，官员在各个层次上得到培训。”

约瑟夫·奈告诉我，从哈佛博士毕业50年来，除了在政府任职过5年，他从未离开哈佛。“之所以选择回政府学院，是因为我对把政治科学理论与实际政府事务结合起来很感兴趣——怎么才能把社会科学



约瑟夫·奈

最优秀的成果，与政策制定的经验结合起来？我刚刚博士毕业时，曾在政治系教书，但实际上应该叫作政治科学系，这个系仅仅研究学术理论。肯尼迪学院也研究政治理论，但目的是为了应用于解决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政治系培养教授，学生毕业后留在大学教书、研究；而学院的学生在毕业后最终都将进入政府。”

“培训”而不是“教学”，是专业学院区别于研究院的地方。从传统看来，这是“匠”与“大师”，或者“术”与“道”的区别，“技能”总显得低一个档次。如果说研究生院是哈佛学术传统延续的地方，那么专业学院就是哈佛实用主义彻底践行的产物。“象牙塔与真实世界的距离在这里更模糊。教授通常一脚在学校，一脚在职业学院。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教授更倾向于培养学生成为教授，在他们的领域做研究，对与真实世界距离过近很不习惯。哈佛也面临着挑战，如何在培训和教学之间分配最高标准的最佳奖学金？”格雷厄姆说。

“在学校里，你可以在课堂里说出‘权力的真理’，学校与政府的距离给了你这样的自由度。但毕业后去政府任职，你很可能知道‘真理’所在，但却不会公开地说出来，因为你如果在政府里也谈论‘权力的真理’，那下一次的会议可能就不再邀请你了。一个认为X是正确的人，常常会在会议里说Y。很多年轻的学生对此感到不舒服，但这是需要正视的冲突：认识到权力与真理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认

识到真实世界的复杂政策是多种力量艰苦较量和斗争的结果。不可调和的矛盾会一直存在下去，它本身就很重要，也是健康的矛盾。”

保持学院与真实世界的距离，是最微妙的持续斗争。约瑟夫·奈告诉我，在他担任院长期间，“最艰难的决策与预算有关”。“如果你想壮大，就必须增加教员的数量，这个成本非常高，意味着你必须筹款。21世纪初，美国经济衰退了一阵子，原来的募款人不再继续提供资助，但人已经招来了，得继续养着他们。我们有好几年预算紧缩。有时会有捐赠者来找你，说，我给你捐100万美元，但你得让这个人进你们院。我的回答是，不，外界的资金不能决定教职的任命。但要拒绝100万美元，在经济困难的时期，真的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最终，我没有拿到那笔钱。”对私立大学来说，“校长和院长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全国跑，到处筹钱。像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这样的学校，资金主要来源是私营部门和个人捐赠，这对学校的独立非常重要”。

付出的代价是筹款的时间负担。约瑟夫·奈在他的任期内共为学院筹集了约300万美元，“政府学院不是有钱的学院，从事公共服务的校友不及商学院、医学院的校友富有”。“任院长期间，四分之三的时间都花在筹款上，这是与政府保持距离的最重要的缓冲带”。

格雷厄姆·埃里森告诉我，在美国，私立大学比公立大学的地位更高，是因为它依赖于私有资金的基础，从而保证了对学术和思想自由最重要的独立性。“许多政府资助的大学，没有很强的独立性，特别是当政府改变想法的时候。比如，加州大学，在政府破产后，也就无以为继。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会有影响和渗透他们的强烈欲望和诱惑，他们会认为，自己出了钱，为什么不让他们为我们服务，比如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即使是在哈佛，像医学院，有一些很核心的科学研究也是联邦政府资助的，因为这些项目的研究经费竞争很激烈，所以有时政府有发言权。而对私人捐赠者来说，他们当然也想有发言权，

想施加影响。但因为哈佛的力量更强大，足够强大到可以对募捐者说，你会受到尊重，能以你的名字命名某个教职或中心，但你对学院的事务没有发言权。比如，有一位贝尔福中心的捐赠者，他捐了很多钱，他对能源问题很感兴趣，也了解哈佛的规则，他知道他从来无法影响研究的结果——石油的价格、产量等等。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捐赠者，以为可以影响研究结果，但哈佛有足够的谈判能力来抵制这些压力。”

“以一系列多元的捐赠来源，避免任何人处于控制地位上。”约瑟夫·奈告诉我，“这是保持学院独立的核心。在政府里，你的角色是把事情做成，并忠诚于你的雇主，不能公开地批评。但在学院，你可以更加自由地批评政府。”

哈佛人劳伦斯·萨默斯

萨默斯的命运，绝对是哈佛式的。



劳伦斯·萨默斯

天才怪杰

周三下午，“哈佛楼”201教室，萨默斯主讲的“全球化”课程即将开始。大约30来个学生分散在宽敞的大教室里，席间还坐着些慕名前来旁听的访问学者。14点，萨默斯从侧门准时步入教室，浅灰色西装，徒手，没有公文包，也没有笔记本电脑。他漫步到讲台上，提前来到教室的助教已准备好PPT（幻灯片演示文稿），打出标题：“欧洲债务危机”。

这门有10多个专题的“全球化”课程，萨默斯从不需要借助任何备课本，一切都存储在他的头脑中，PPT的唯一作用，是演示各种数据统计图。他在讲台上来回踱步，然后走下来，站在第一排前，然后走到教室中间，继而踱回讲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一会儿再起身，就

像一个陷入沉思的人，旁若无人地大声自言自语，可以说上一个半小时。他的语速镇定而缓慢，有时停下来几秒钟，等待大脑的巨型内存把信息转变为语言输送到嘴边；有时好像轻微卡住，习惯性地“呃，呃……”好像在试图搜索和抓住合适的词汇，好赶上思维的速度。他的思绪从“一战”“二战”出发，跨越“冷战”与苏联解体的历史，跨越从民族主义到欧洲联合的主权观念演变史，像一列缓缓启动的列车，渐渐加速，驶入欧盟诞生与推进的历史轨道——然后是国家间关税降低，共同的市场建立了；然后是从比利时到荷兰。

当我开始感到历史列车加速向前的强大惯性时，他开始抛出问题：“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会不会觉得哪儿不对劲儿？”“答对了！荷兰人的护照控制现在可以一路通到比利时人的机场内。这意味着，任何能进入比利时机场的人，也能够进入荷兰。现在，荷兰和比利时就必须得有共同的安全防卫了。”“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扩张和交叉，都会有一连串的后果；整合一件事，通常意味着，你必须整合更多，如此循环下去，否则，逻辑就会受阻。”他继续抛出问题：“你们看到深化与扩大整合的矛盾在哪里了吗？”“信任，在多深层次上扩大信任。”“没错。”……所谓“庖丁解牛”，大抵如此。在那条轨道上疾驰，当欧元问题祭出时，已有了预料中的答案。哈佛力求向本科生传授“方法论”，它的含义是，抵达理解事物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萨默斯的课曲径通幽。

哈佛学生告诉我，他对时间非常吝啬，但随时随地会被有挑战性的问题刺激，然后一头扎进去，与人辩论。一次课堂上，有个公共卫生学院的学生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给其他国家贷款时，往往设定了很多苛刻的条件，这是不是有点像医生给身患绝症的病人看病，却先要让病人满足条件，才施救助一样？这个问题是在讽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趁火打劫并事先规避自己救助政策的风险。萨默斯曾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而且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他一跳而起，和这个学生辩论了半个多小时。

课后，我走到讲台前，他正在答疑。他的体型已经恢复到担任财政部长时的规模，他开始去健身房。2001年他刚当哈佛校长时，就像只硕大的速龙，眼里闪着犀利的光——他对知识、对变革、对采取行动，也对比萨饼有无限的胃口，在他扩张的体型内，有着膨胀的抱负。他非常活跃，在校园里行色匆匆，不断抛出问题和要求。几年后，他却在哈佛教师的一片谴责和反对声中黯然辞职。我问他，作为克林顿那一届政府的财政部长和奥巴马那一届政府的经济委员会主席，他有没有考虑过到华盛顿或纽约的某个智库机构去任职。他告诉我："我在哈佛已经40年了。在这里每天的工作，都能让我找到一种神经质般的兴奋感。这儿有太多天才的学生和教师。"

萨默斯28岁就拿到了哈佛的终身教职。也许天才太容易沉浸于孤独的精深宇宙里，直到今天，他仍有些不修边幅——西装有点小褶，一小撮没工夫管束的头发倔强地翘着。他有时还会穿两只不同颜色的袜子，言辞锋利直率。他有时会在学校餐厅吃饭，边吃饭边和学生说话，永远都在探究，永远都在与人辩论，口水和面包渣喷溅在衬衣上，有时还被牛排卡住喉咙。有一次，哈佛橄榄球队准备与耶鲁橄榄球队决战，萨默斯去动员。他说："有天，呃，我跟耶鲁校长里奇·列文打电话。他号称他的橄榄球队更牛，你们能，能相信吗？他接下来打算干什么？打算宣布他们更有天赋吗？"然后有点紧张地笑起来。橄榄队的一位球员在他的大学生活记录中带着调侃地回忆，那天末了，萨默斯喊住大家和他打一局，点了这位队员，结果，那枚橄榄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正好砸到了萨默斯脸上。

我问一位有时与萨默斯一起参加筹款晚宴的教授，觉得萨默斯怎么样？他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不太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缺乏社交技巧。"若是在加州，这也许不是致命的；但这是哈佛，更何况他是校长。这位教授告诉我，筹款晚宴上，他们得与那些有出息的（上流社会的）校友社交，不动声色地表现出赞许，鼓励他们："你们一定能做到的。"一定能从兜里掏钱的。但在好几次晚宴上，

萨默斯中途，有时甚至是在一句话的中途，就走神了。只要无法激起他智识上兴趣的谈话，他随时会转移注意力。他甚至会在一些公开场合谜一般地睡着，比如当一些国家元首在哈佛演讲时。他只有被安排以打羽毛球的形式来和校友交流时才感到自在，因为竞技性的东西能让他保持一会儿专注。

搅局人

2001年10月，陆登庭校长（Neil Rudenstine）辞职，萨默斯继任。他跨上马背，扬鞭喝令，哈佛就像受惊的马，脱缰疾驰。哈佛很多人起初都误判了萨默斯，对他的任命打了个呵欠——“经济学家，预算平衡选手，管理型，似乎是个资本主义的冷漠代言人，只需保持前进方向，确保哈佛机器的现金流源源不断。”后来在《大西洋月刊》成名的哈佛毕业生罗斯·格里高利·道特哈特如此描述他。

看起来，萨默斯是带回来些政界的作风。他的身边围绕着一些华盛顿的老部下：校长办公室主任、校友会代表、公共关系副主席、校长特别助理、新闻发言人等等，都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白宫或参议院助手。这些人大多不是哈佛毕业生，是剑桥镇文化的外来者。在哈佛的传统里，校长应该是个抵御外部世界的物质主义对大学精神家园冲击的角色。他是共同体的一分子，而不是自视高人一等的领导。我第一次要求采访他，他不同意给一个小时，便说：“你跟我的秘书说说。”跟“我的人”说说，是萨默斯的惯用语，很不受哈佛帝国公民的待见。一位教授曾评价说，这是“荒唐、言不由衷”，“把华盛顿的拉帮结派行事风格带进来，还自诩坦白、正直”。初到哈佛，我曾向一位与萨默斯接近的教授询问，如何才能说服萨默斯接受采访。他善意地建议：“告诉他你都采访过哪些政界的人。他不把自己视为学者，而更看重他财政部长的身份。”他在校园里到处停的带司机的

“林肯城市”，他前呼后拥的出行风格，看起来，都与哈佛格格不入。

但萨默斯的自我认知，在我看来，始终充满着矛盾。一方面，哈佛的学术共同体觉得他疏离了他们；但另一方面，他出身于一个学术世家，伯伯和舅舅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卓越的经济学家，萨默斯一直把自己的智力优势看得无比重要，对知识有无限的兴趣。他有些笨拙的社交，他的不修边幅，他不够优雅的吃相，他的口无遮拦，他拘谨的谈话方式，似乎又是华盛顿社交圈的异类。萨默斯之前的财政部长叫罗伯特·鲁宾，是他的哈佛恩师。有一天，在一个重要的场合，鲁宾介绍萨默斯说：“现在，我们热烈欢迎财政部的第一副部长萨默斯先生。”这句话一出，萨默斯脸就红了，他好像很不适应“部长”的头衔。当我问萨默斯，他如何看待大学与政界、商界的距离时，他回答说：“它们之间的距离一直都在缩小。政治圈、商业圈都越来越尊重专家学者，尊重他们的专业知识。他们需要专家学者，需要学术界。大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边界一直都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相互渗透。”也许，这是对他看似矛盾的行为的一个注解：他把自己视为一个学者，但他不再以矛盾对立的方式看待学术界与“外面的人”的区别。他是个在智力上超级自信，甚至有点骄傲的人，他的“官僚气”与其说是贵族主义作风，不如说是种自我掩护。曾有人问他，哈佛和华盛顿有什么区别。他回答：“哈佛和华盛顿都是官场，我不确定华盛顿是不是更官场些。”

他有无比清晰的理念。他告诉我：“我认为美国今天最大的威胁是，人们对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有太多的理由和争论，这些争论遮蔽了真正有价值的行动——为什么不能简单地直接去做，并把它做到最好？精英主义是非常有力量、非常重要的思想，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维度、以非常多元化的方式做到最好的自己。对大学而言，它最有价值的目标就是培养全面的学生，使追求学术的人能够在各自不同的专业领域攀越巅峰。不要忘掉了首要的任务：吸引能做出最大贡献的

人，而这些人通常有最雄伟的抱负和最卓越的才华。”过去十几年，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已深刻改变了美国社会，若要让哈佛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萨默斯认为，必须动些大手术，才可永葆哈佛精神。“竞争，”他告诉我，“如同商界的激烈竞争，是大学的力量”——就像哈佛在橄榄球赛上必须视耶鲁为竞争对手一样。一次伦敦之行的校友会晚宴，他来晚了，直到他的席间演讲开始，他也没吃上饭。当时在场的人透露，他以一贯的达尔文主义式的刻薄语气说道：“这样一个不能即时把沙拉快速端上桌的国家，注定只能沦落进第二梯队。”

这个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者，力求捍卫哈佛的顶尖地位，确保哈佛在世界的教育和研究领域处于前沿。但哈佛不是行事直率、如丛林社会的华尔街（萨默斯是金融拯救方案的重要参与者）。他的直率改革藐视哈佛错综复杂的生态和文化传统，像个搅局的人，在哈佛掀起轩然大波。

萨默斯上任后，要搞课改。他认为本科生课程不应只是永无止境的各种“方法论”，而应该来点实在的干货，讲点事实。但当他问一位历史系教授，为什么教了好几代人的“艺术13”选修课消失了？他回忆说，那位教授的表情里夹杂着自以为是与欢喜，回答道，你怎么能指望任何一位有自尊心的学者，在短短一个学期里，像发射大炮一样，把学生从“洞穴时代的艺术”直接打到“毕加索”？教授们认为，自己的领域已经过于专业化了；研究永远比通识教育重要，自己才是学校永久的主人和最重要的资源。

他想重振学术纪律，理清学者和外部世界扑朔迷离的关系。撞入他视野的是非洲研究系的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17名“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哈佛教授的最高荣誉职位）之一，地位很高，超越行政机构之上，直接向校长汇报，可以在任意一个院系授课，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最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做过总统候选人顾问，制作过个人的说唱Rap CD。最重要的是，非洲裔。

非洲学系是前任校长陆登庭不惜重金打造的“梦之队”，而韦斯特是灵魂人物。萨默斯低估了拿韦斯特开刀的微妙处境。他把韦斯特叫到办公室谈话，直接指出他因为去给参选总统助阵，有三周没给学生上课；批评他多年来没什么新的学术成果，全靠吃老本，把过去的著作翻来覆去改改出版；给学生的分数放水；而他的Rap CD简直就是毫无学术价值的烂货。媒体报道，事后，萨默斯自我感觉良好，该说的都说了。韦斯特却很愤怒。

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哈佛学术圈本来就对萨默斯存有偏见，加上涉及少数族裔，舆论对萨默斯很不利。哈佛的“媒体明星学者”并不少：风靡全球的法学院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就是代表。我在哈佛时，桑德尔正在东欧各国旅行，行程近一个月；他通过邮件给我发来两张他在桑德斯剧院上“公正”课的照片。“这两张是相当戏剧性的。”他在邮件里特意解释——其中一张，倾斜的背影，满头银发，伸直的右臂，正指向上千名学生的座席，充满力量；另一张，两手揣在裤兜里，正向讲台下踱步，马上要跌入上千的人群中。这种戏剧性的展示，无疑是为了追求传播性。在一部分教授看来，这也是拓宽知识疆域的一种方式。萨默斯无疑管得太宽太紧，这种带着集权色彩的监督管理方式，与复杂多元的哈佛学术生态系统相抵触，也违背了学者自由、不受干扰地从事研究的传统。韦斯特说，“萨默斯就像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微妙和危险情况中的暴徒”，并宣布准备出走普林斯顿。

萨默斯进行了多次私下的和公开的道歉，韦斯特不依不饶。幸好，一件偶然的小事救了萨默斯。韦斯特形容说，“萨默斯就像以色列总理沙龙”，而萨默斯是犹太后裔。这一有反犹倾向的言论，立即扭转了舆论的方向。哈佛对韦斯特说，你走吧，慢走不送。在哈佛，谁都可能成为闯入瓷器店的公牛。

哈佛人

萨默斯任内做了几件了不起的事。他为哈佛筹募了十几亿美元的基金，哈佛基金达到了260亿美元，把剑桥、牛津甩出几条街；在他任内，本科生的小课数量翻了三倍，学生能有更多机会与教授互动；他设立了更多的本科生奖学金，给贫困的优秀学生建立无障碍完成学业的绿色通道；他还认为，对人类社会进步很重要的一些学科，如基础科学、教育学科、公共服务学科等等，因为不赚高薪，缺乏吸引力，于是推出奖励制度，对选择读不赚大钱的重要学科的研究生给予经济补贴；他提拔年轻的、有潜力的副教授，而不是给吃老本的成名学者终生教职；他在阿尔斯顿进行了大量收购，兴建了科研基地。

在保守的哈佛，他的言行风格和改革政策得罪了很多学者。理念的冲突、校长与各院系间权力与资金分配的消长、学科间的不平衡，扑朔迷离。最后，因为一个“女性智力可能不如男性”的不谨慎言论，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教授对他投了不信任票，萨默斯宣布辞职。

萨默斯说，那天他的“感情非常复杂”，他对自己与文理学院的同事们之间的不快表示遗憾。“有一些时候，我本来可以更聪明、更谦恭地挑战这个团体，这是我要吸取的教训。”那天，萨默斯发表声明：“我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我与文理学院同仁的隔阂，已经使我无法推进对哈佛的未来至关重要的革新日程。因此我认为，学校最好选择一名新的领导者。”在哈佛校园里，很多学生都很喜欢他。宣布辞职那一天，他走出马萨诸塞楼的校长办公室，很多学生都上前围着他，拥抱他，他与学生们握手，场面很动人。

美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近30年来，大学校长已经变得非常被动和沉默寡言。他们不出格，不主动作为，小心谨慎，对学校发生的一切不表现出兴趣，只求保证大学机构的正常运转。人们很怀念哈佛历史上的一些校长，比如詹姆斯·科南特。他当哈佛校长长

达20年之久，当时，他坚持要把贵族的大学教育面向所有有天赋的人，推行精英教育。他的这一番主张，在校内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但他坚持己见这么做了。而今天的校长们则恰恰相反。哈佛一位教授说：“也许，劳伦斯·萨默斯渴望成为一名领袖，而我们的文化需要的是一位经理。”



哈佛大学时任校长萨默斯宣布将于本学年结束后辞职，拥戴他的学生希望其留任

自“冷战”结束，漠视主义成了哈佛精神的一部分。一位哈佛毕业生如此形容哈佛的气质特征：“塞得满满的简历，没有牺牲的特权，没有理想的抱负。”哈佛失去了伟大的动力。也许，“9·11”事件是个使哈佛重新变得伟大的机会。恐怖主义袭击发生后，萨默斯发表演讲，呼唤大学应承担起对美国的道德责任。他赞扬美国军队，鼓励毕业生参军。在美国学术界批判性的反美氛围中，他的言论显得大胆又激进。一代又一代的哈佛校长都未曾让“海军后备训练项目”进

过哈佛校园，但萨默斯却同意了。“后备训练项目”给贫困的本科生支付大学本科的学费，作为条件，这些学生毕业后需进入海军服役。哈佛的传统文化不愿意把学生送上战场，这跟最初那些贵族学生的父母施加的压力有关。越南战争中，哈佛是反战的，它不仅拒绝了“后备项目”，而且教授都给学生打高分，以免他们毕业后不得不选择去当兵。这个奖学金后来被“驱逐”到了麻省理工。

这一次，萨默斯鼓励介入。他允许“海军后备训练项目”出现在招生简章上，允许进行校园招聘。他以爱国主义的论调鼓动：“如果哈佛的学生中有人加入了海军后备训练项目，每个哈佛学生都应该为此感到自豪。”他哀叹“后越战时代东海岸精英与一些主流价值观的分裂”，希望这场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因为不存在“越战的道德模糊性”，可以实现“学院与整个国家的和解”。

但哈佛已不再是希望变得伟大的哈佛。因为“海军项目”在同性恋问题上的政策是“不问，不说”，违背了哈佛支持同性恋的自由主义立场，它受到抵制，最终未能进入校园。当美国士兵开赴伊拉克战场时，哈佛却因一位伊斯兰学生在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做了一篇题为《我的美国圣战》的演讲，而陷入四分五裂——媒体铺天盖地的质疑，哈佛内部则充满言论控制还是言论自由之争，好像给了哈佛人漠视伊拉克所发生的一切的理由。一位2001年毕业的老哈佛人写道：“没有来自华盛顿的号召，没有对志愿者的动员。……我的朋友中有几位加入了志愿者，但他们是出于不得已，哪怕没有‘9·11’事件，他们也必须去空军和国务院。一些‘烤猪’的朋友也加入了不同的分支，似乎旧世界的贵族义务还残存于这些俱乐部里。而对我们剩下的人，参加军队或中情局或外交部，则意味着冒太大的风险——不仅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个人抱负，我们对财富、声望和权力的梦想。……‘9·11’的战争，也许会是我们这代人被铭记的关键时刻，但却不包括我们这代人的精英。我们不属于那些在遥远的土地上战斗与死亡的年轻美国人，他们是在哈佛不占主流的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

子弟。”看看那年他们的毕业留言就知道：“有一个基本可套用的公式：大家好，我想告诉大家，我刚在Y（比如国家航空航天局、时尚设计公司、货币基金组织）过完夏天，刚抵达X（纽约或华盛顿，洛杉矶或伦敦）。我会在这儿待一年，干Z工作（通常是投行、白宫发言人办公室），然后去P（欧洲、里约）旅行一圈，结束后去Q入职（摩根士丹利、耶鲁法学院、斯坦福医学院）。是不是快疯了？附件里有照片！”

萨默斯不断地告诉哈佛学生，“满足于发展你所独有的才能，发展你能做出独特贡献的能力。你不仅仅由于责任感受到重视，而是因为你所取得的成就”；“奉献的方法有多种，可以通过你的智慧来奉献，通过你出色的求知欲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来奉献，要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这个世界能够，而且将会向更好的地方前进。并非因为进步已经预定，也并非因为进步是某种天赐之物，而是因为，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贡献取得进步”。也许哈佛人记住的，不是“贡献”，而是“成就”；“智慧”毋庸置疑，却没有人肯定，世界是不是变得“更好”。

萨默斯曾希望给哈佛“留下遗产”。我问他，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能重新做一次校长，你会做什么？他告诉我：“我对自己当时所做的事情非常自豪。”我问，你有遗憾吗？他回答：“我不是容易回顾过去、唏嘘遗憾的人。我遗憾，在我的校长任期内有那么多的争议，而我是那些争议的重要部分。但我相信，有如此之多的强烈争论，正是由这所大学的蓬勃发展而生。”但愿如他所言。

第二章
耶鲁大学：卓越灵魂与领袖的摇篮

精英主义、公民使命与自由教育

传统的力量在保守的耶鲁，尤为体现出时间的威严。



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斯特林图书馆一层的回廊

地处小城纽黑文的耶鲁和哈佛、麻省理工必然有所差异；有近400年历史的哈佛、有300多年历史的耶鲁若与有800年历史的剑桥、牛津相比，历史的系统又必然有不同的品性；有浓厚清教传统和与传统家族盘根错节的东部常春藤，与西海岸毗邻硅谷资本的斯坦福则有很不相同的精神与追求。全球化背景下的21世纪的大学，很多时候都被趋同的力量所冲击，呈现出越来越相似的面貌。每个大学都是精英主义的，都是研究型的，都推行以人为本的自由教育，都宣称自己是未来领袖的摇篮。但在比较之中，时间、空间与传统的因素，又决定性地塑造了大学的气质，使其成为独一无二的自身。1923年，耶鲁人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曾评论，耶鲁的社会系统“有一种其他大学所不能比拟的道德上的压力”，“在普林斯顿或哈佛可能会过得快活的古怪或不那么好竞争的人，在耶鲁则很可能被它强大的机器所摧毁，并且受到极度的敌意。一个在耶鲁如鱼得水、活力充沛和诚实的人，来到普林斯顿，则可能因它的平凡和闲散而堕落。哈佛出来的人则打上了鲜明的哈佛性格：他们像普林斯顿人一样爱讽刺，但又没那么褊狭和男孩子气。他们像耶鲁人一样世故老练，但又没那么严厉和生硬”。1982年，耶鲁毕业的学者托马斯·贝尔金（Thomas Bergin）曾写道：“在康奈尔，随性是一种风格，没有人很赶时间的样子。在耶鲁，教师与学生永远都在高速运转，忙碌、充满竞争和狂热。这让我开始思考‘耶鲁性’的精髓。在我看来，耶鲁的不同就在于，那种古老的、清教主义的服务使命感、竞争然后获得嘉奖的精神，依旧徘徊在纽黑文。”当我们离开耶鲁时，我们得出的结论与他们在30年前甚至90年前得出的结论并无多大差异，只是参照系略微不同而已。传统的力量在保守的耶鲁，尤为体现出时间的威严。

这几年一直萦绕于心的，还有一个问题：究竟应以什么样的路径，去走进一所大学？择校读书的学生，研究教育理念、课程设置与制度设计的教育者，进行某个领域学术和思想探讨的学者，以及出国

培训、申请和游学的教育服务机构，都是沿着不同的路径去认识一所大学的，甚至连接受本科教育的学生和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博士生，看待大学的视角也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路径是什么呢？知识分子——学者、教授、科学家和思想家，他们的学术追求和学问造诣，无疑对一所大学至关重要；然而，又如何能忽视作为大学教育服务对象的学生？即使对学生来说，大学的学习与知识无疑很重要，但又如何能忽略大学生活更丰富的面向——食宿、课外活动、俱乐部、文化生活，直至友谊、爱情和职业追求？就算象牙塔里的学习、生活和研究都有了，大学也并非是个无忧无虑的纯粹仙境，它总在与外部现实世界发生着关联，被其塑造，对其回应，并力图形成影响——耶鲁的校歌是这样唱的："为了上帝，为了国家，为了耶鲁。"这是大学育人之外更广泛的使命。不仅如此，大学是教育与研究机构的同时，它的肌体里还有很多别的器官：教堂、美术馆、博物馆、音乐厅、剧院……它们构成了活跃的文化、艺术与精神生活，参与者不仅是师生，还有市民。这还没有结束：牛津、哈佛、耶鲁的博物馆与艺术馆里，有太多艺术珍品，甚至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展；这些或馈赠或购买的艺术品，都构成了大学财富的一部分。对，财富，是一流大学之所以一流的物质基础，围绕着私立大学的财富，又有多少故事，看看全世界最富有的耶鲁大学那些慷慨的捐赠者和天才的基金管理大亨吧。而为了获得校友的捐赠，大学又费了多大的心思去维护校友网呢？看看那些旨在缔造身份感的各种住宿共同体与俱乐部，我们就会恍然大悟。





耶鲁中国学联组织硕士毕业生对在校学生就业做经验分享。活动结束后，部分中国留学生合影

写到这里，我发现，大学是一个自在的生命体，在这生命体之内，蕴含着独一无二的精神与气质。这是我们选择走进耶鲁的路径。

精英主义、自由教育和领袖的摇篮

在耶鲁，有一种从不公开表述、无法明确指明，却极被看重的高贵意识，那就是服务社会、贡献国家。

局外人，耶鲁人

纽约的耶鲁俱乐部位于曼哈顿中城范德比尔特大街（Vanderbilt Avenue）50号，离中央车站很近。转过一条街，能看到22层高的俱乐部大楼时，我先被身旁拐角处灰色石头墙壁里嵌着的一个小小的纪念装置吸引。这是一块金属牌，上面写着：“内森·黑尔（Nathan Hale），美军指挥官，1773届耶鲁毕业生，在搜集情报时被敌人抓获，于1776年9月22日晨被执行死刑。他最后的遗言是：‘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只有一次生命奉献给我的祖国。’”金属牌右上角，是纽约耶鲁俱乐部的圆形俱乐部徽章，与几步外俱乐部前悬挂着的美国国旗和蓝色的耶鲁校旗遥相呼应。就在这个街区不远的地方，还有好几个驻扎纽约的常青藤大学的俱乐部：哈佛俱乐部、普林斯顿俱乐部、宾大俱乐部和康奈尔俱乐部。它们以如此壮观的空间体量簇拥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繁华地段，成为美国私立藤校的俱乐部文化坚实的物质化存在。

私人俱乐部必然是以“非请莫入”的姿态示以非会员的。对大学俱乐部来说，“会员”则莫过于该校的学生与毕业生了。一进旋转门，守候在门左侧的侍应迎头便问：“有member（会员）邀请吗？”想象着把这样的场景移植国内，名校大学生毕业后享有大都会黄金地段的某幢古典主义老建筑内的会所式服务，大学的身份在这些场所像隐形的城堡，准入法则隔绝出内外两重社交空间，不禁让人颇觉古怪。

在一楼大厅的沙发坐下，等待耶鲁毕业的孟克文（Christian Murck）先生之际，环视四周，不过是寻常酒店大厅的模样。22层的俱乐部里有3个餐厅、3个酒吧、一个可容纳500人的宴会厅、140间客房、一个图书馆和一个体育中心。除了专门的图书馆，这些设施听起来与星级酒店似无多大分别。来往的男人女人着装都比较正式，但想到他们其实也就是在此住宿或预订餐饮，私下揣测起私人俱乐部虚张声势的心态来，好像是故意为了引起局外人窥探的好奇心而矫作神秘似的。

一身黑色西装的孟克文先生很快出现在大厅中，他从纽约上西区的家乘地铁过来，说话短促而简洁。我们跟随他沿扶梯上楼，在墙上巨幅油画里的伊莱休·耶鲁（Elihu Yale）的注视下，来到主休息室。酒吧间就在主休息室旁，要了咖啡，在休息室的沙发上坐下，星级宾馆的错觉早已退却。在这环绕着古香古色镶木墙壁、壁炉，铺陈着细密地毯和悬挂着五位耶鲁毕业生肖像油画的宽阔休息大厅中，人们围坐在沙发上、壁炉边、大窗户前低声聊天。墙上那几位美国绅士——威廉·霍华德·塔夫特、吉拉德·福特、乔治·H.W.布什、比尔·克林顿和乔治·H. W.布什，从高处俯视着大厅中的一切，提醒我们，这里是耶鲁人的私密场所。俱乐部1997年百年纪念的时候，它的会员包括乔治·H. W.布什、希拉里·克林顿、比尔·克林顿、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和纽约州前州长乔治·帕塔基（George Pataki）。不好意思正眼打量那些零零散散坐着聊天的人，却感觉余光里晃动的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富家子弟——安森·亨特的影子。安森·亨特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叔叔曾怂恿他参加一家全美最难申请加入的城市俱乐部——只有出生于曾“为建设纽约出过力”的家庭的人（1880年前就富有的家庭）方能加入。但安森在入会后并没拿那个俱乐部当回事儿，而是加入了纽约耶鲁俱乐部，而且从没放弃过这里。有时他会到这里喝威士忌喝到醉；有时会在这里打桥牌打到晚餐时分，然后去某人房间喝上四五杯纯鸡尾酒，过一个快乐而乱糟糟的晚上；亲戚都去外地的别墅度假时，他也会在这里的宾馆住上一段时

间。耶鲁校友是他毕业后在纽约的主要朋友圈，只是随着大学的朋友纷纷结婚生子，大家也逐渐忙碌于各自的家庭了。恍惚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尼克·卡洛韦也正坐在某张沙发上，埋头写着他曾给《耶鲁每日新闻》写过的那些不冷不热的文章，等着晚餐时间的到来；《虚荣的篝火》里的谢尔曼·麦考伊，富裕的华尔街债券交易员，这会儿正准备起身上楼，在房间里泡个澡，然后躺在皮面的床上，等着做按摩。这时，一位侍应生走过来低声对孟先生说，有会员抱怨他带来的客人鞋子穿得不合时宜，意外地把我的思绪拽回了现实。在这各自窃窃私语的大厅里，摄影师同事淹没在茶几后面的那双新百伦跑鞋竟处于一些人默不作声的目光审视之下，顿觉空气中飘浮着挑剔的视线，愈加有局外人之感了。大概是为了缓解尴尬，孟先生向我们道歉说，他也并不知道这里的着装规矩。

这种“局外人”的感觉，哪怕在耶鲁待了很多年，也不一定会随时间而逝。动身前往耶鲁所在地纽黑文之前，曾与在耶鲁英语系教过10年书的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有过一次长聊。德雷谢维奇如今已离开耶鲁，成为一位专职作家。当我向他提及我尚未到纽黑文便已隐隐知觉的疏离感时，他笑道：“你抓住了耶鲁的某种特质。即使对我这样一位耶鲁大学的教授来说，因为我不是在耶鲁长大的，我也从未感到我真正成为过耶鲁的‘局内人’。”德雷谢维奇来自纽约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本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说，作为一个犹太人后裔，“我有时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否太具‘犹太性’。就连20世纪50年代就一直在耶鲁教书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也曾写到过他自己的犹太文化特质，以及他在耶鲁的被排斥感”。虽然耶鲁在不断改变，变得更加多元和兼容并包，但“它的变化并不如它自己想象的那么大”。德雷谢维奇还在耶鲁任教的时候，“曾有一些从美国南部来的或者家境相对贫穷的学生过来告诉我，他们总感觉到，自己不属于那个‘部落’。”在耶鲁的环境里如鱼得水的，依旧是从美国东北部昂贵的私立预备高中出来的学生，他们不少人的父亲、祖父甚至更长的家族成员都曾是耶鲁毕业生。耶

鲁本科生入校后，会被分配到它的12个“住宿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s）去（现在正在新建两个住宿学院）。这是中国大学生比较陌生的组织结构和大学生活经验：“住宿学院”不仅是食堂与宿舍，而且是石墙与带锁的大门围合起来的社交与活动场所。这是耶鲁，以及哈佛和普林斯顿等美国东部常青藤学校从牛津与剑桥那里模仿来的“学院”制度，在哈佛叫“住宿楼”（Residential Houses），在普林斯顿叫“饮食俱乐部”（Eating Clubs）。本科生居住在哪个“住宿学院”，是随机分配的，唯有一个例外：如果你的父母或亲戚也是耶鲁校友，你可以选择同样的住宿学院——这种家族时间的累叠与加权，也就让耶鲁大学与一些美国东部古老家族的传统交织在了一起，也才有了“耶鲁的老贵族血统”这种说法。



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左三），耶鲁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耶鲁也因此笼罩上了某种神秘感。谈到耶鲁的生活经验，德雷谢维奇告诉我：“他们有心照不宣的规则、不为人知的握手方式、自己的语调和着装密码。”我问他，为什么要用“他们”这个词？他说，

他是与耶鲁签约10年的教授，并非终身教授，而耶鲁大学的很多终身教授和行政人员本身就是耶鲁毕业的——这个比例非常之高。“耶鲁人更倾向于相信耶鲁人。如果你不属于耶鲁的系谱，你不会被耶鲁人视为他们的一分子。”在耶鲁，教授间的等级也是很微妙的。“教授们开会的时候，会议的一些部分，比如做决策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教授是得先起身离开的。但如果你是耶鲁毕业的年轻教授，你学生时代的教授就是现在耶鲁的老教授，那么通过私人关系的渠道，你能得到外来者难以知晓的信息。”在耶鲁的10年中，德雷谢维奇曾无数次想到过、也与朋友们探讨过一个隐喻：波士顿的街道没有明确的路标告诉初来乍到者如何前行，它是为世世代代在那里生活的人准备的，而在加州，你第一次上路就会得到清晰的指引。“在耶鲁，有很多规矩和行事方式，但就是没有人告诉你是什么。而只要你张口一问，你就已经把自己标注成了局外人。耶鲁的人都很热情，都有种官方的、正式的客气，彬彬有礼，从不会有人对你说，‘你不属于这里’。但就是有种微妙的感觉，从这种贵族式的环境中蒸腾出来，那种无穷无尽的、生活日常的气息熏烤着你，无言地提醒你外来者的身份。”德雷谢维奇有一位好友在斯坦福大学教书。“她是耶鲁毕业生，她的父亲是哈佛教授。她这样评价东部的大学：哈佛就像是政治局（politburo），而耶鲁就像是梵蒂冈。”自1766年起，耶鲁所有的校长除一位以外，均毕业于耶鲁，其中仅有个别校长本科阶段没有在耶鲁就读。1918年在耶鲁获得文学学士，后来成为耶鲁董事会成员的维尔玛斯·刘易斯曾这样总结耶鲁选聘校长的标准：“耶鲁校长必须是耶鲁人（即本科毕业自耶鲁的人），必须有个性，有宗教信仰，必须是国际知名学者。如果他是人文学者，要深深地尊重科学，如果是科学家，则要热爱艺术。他必须是现代人，但要了解过去并有远见。他绝对不能过右或过‘左’，但也不能走中间道路……”



位于高街（High Street）64号的耶鲁“骷髅会”总部，又称“墓穴”

对“纯正”的耶鲁人来说，耶鲁的生活却如呼吸空气一般寻常了。从纽黑文附近一个镇上的高中毕业后，孟克文以优异的成绩被耶鲁录取。1962年，结束在“老校园”（Old Campus）的“大一”新生住宿生涯后，他搬入了刚刚建好的莫尔斯学院（Morse College）。他为此感到高兴。他并未特别钟情于耶鲁那些刻意效仿剑桥大学修建并人工做旧的学院式哥特建筑，他说“我喜欢现代主义的建筑”。大学期间，他是耶鲁击剑队的队员，很多时光都在体育馆里度过。耶鲁的秘密社团与俱乐部文化对他没有什么独特的吸引力。“升入本科高年级后，本来有机会加入秘密社团，但我拒绝了。这些秘密社团运行的方式是，同一个班级里的12~15个人——由高一年级的人选定，每周两个晚上待在一起，吃晚饭、谈话聊天，他们不能向‘局外人’透露任何席间谈话的内容。当我进入‘大三’的时候，我已有自己的一群朋友了，不想再花这么多时间与另外的人待在一起。”他在记忆里搜索了很久，才在某个似乎已被遗忘的角落里回想起来，“大学时代是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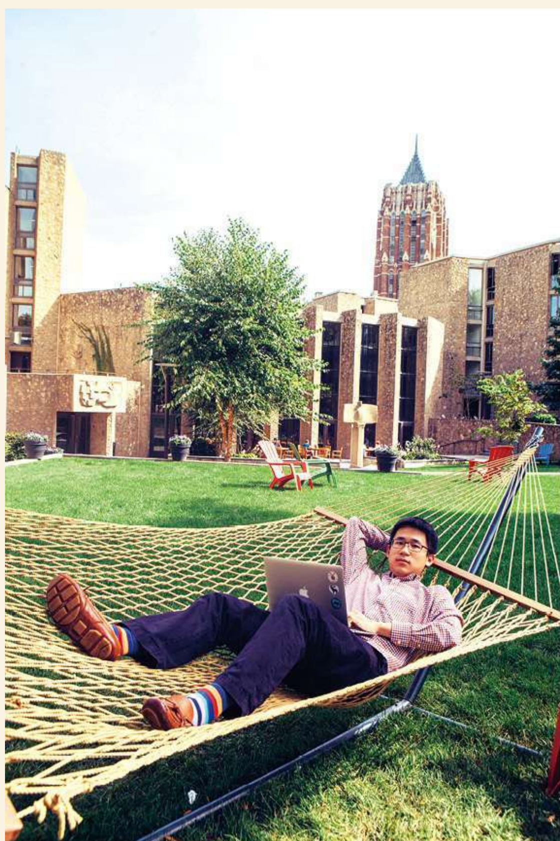
一位好友，是伊丽莎白俱乐部（Elisabeth Club）的成员。但那不是一个秘密社团，也不仅是只有高年级学生才能参加。俱乐部或秘密社团，这不是大部分人会选择的方式。”孟先生告诉我，他其实也并不常来耶鲁俱乐部。约在这里，既出于方便，也是为了帮助我写作。我们到达纽黑文后，有一次，与一位耶鲁毕业生一同穿行于耶鲁的建筑之间。经过高街64号的“骷髅会”俱乐部时，我问她，是否对这个秘密社团产生过探究的好奇。她回答说“没有”，“耶鲁有太多的活动、组织和场所，可以让我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了，甚至无暇去关注那些‘兄弟会’似的俱乐部”。

倒是耶鲁的“局外人”，更触摸得到那道隐形的墙之所在。当一位不是耶鲁毕业的耶鲁教师谈及“伊丽莎白俱乐部”时，他这样告诉我：“那个俱乐部位于校园中心地带一幢美丽的老房子里，只有受俱乐部成员的邀请才能进去。我知道我不会受到任何人的邀请，因为我没有对的语气语调，着装的方式也不对，也没有耶鲁的学位。在我面试耶鲁教职的时候，我曾被带到过那个俱乐部里，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去那里。他们用非常文雅的方式喝茶，完全是以美国东部贵族对英国老贵族生活习俗模仿的方式。”而对于纽约的耶鲁俱乐部，没上过耶鲁的作家约翰·欧哈拉（John O’Hara）曾带着几分艳羡的口气写道：“如果耶鲁给过我学位，我就可以加入耶鲁俱乐部了。那里的伙食很不错，图书馆藏书多，地点也方便。我想去的时候，也不必蹭朋友的了。”

住宿学院

从北京的人大附中高中毕业后，王安迪被耶鲁大学本科录取。今年他上“大三”，刚刚选定了经济学作为专业方向——在耶鲁，本科生接受通识教育，进校时是不分专业的，要到“大三”才定方向，修够了某个专业的学分，即可拿到这个专业的学位。耶鲁本科大学生的

身份不是以某个系（或学院）的某个班级来定义的，而是以住宿学院来定义的。作为本科生生活与社交中心的学院（colleges）与以专业知识门类划分的专业学院（schools），由此形成了耶鲁大学两套并行又交错的主体组织结构。中秋节刚结束的一个中午，王安迪答应带我们去他所在的伊兹拉·斯泰尔斯（Ezra Stiles）学院看看。



留学耶鲁大学的学生王安迪

耶鲁的这种住宿学院制度，以及与哈佛相似的住宿楼（Residential Houses）制度，都是仿效剑桥与牛津大学所建。2013年去哈佛大学采访时，曾很想看看哈佛住宿楼内里的情形，几番努力，却终未如愿，只能远观克尔克兰楼（Kirkland House）、昆西楼（Quincy House）、洛厄尔楼（Lowell House）、亚当斯楼（Adams House）等这些颇有传奇色彩的宿舍楼，借助文字遐想学生们私密空间的活力与格调。那一次，我浅尝私立大学之“私”：身着警服的保安把守在仅供“大一”新生就餐的安纳伯格大厅（Annenberg Hall）外，我们必须受邀才能进入。2014年去牛津大学，这个古老学院制的发源地，却实现了参观学院的心愿。牛津的学院是真正的历史性体系，在近800年的时光中穿行，权势的阔绰早已洗尽铅华，隐退到平和雍容的幽静中去了，与哈佛帝国权力顶峰的声势是截然不同的。在基督教堂学院大门前，门房依旧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身穿黑色西服，头戴圆礼帽；墨顿学院那条“牛津的最后一条石路”上，脚下的中世纪鹅卵石有硌脚的触觉；在皇后学院的中世纪图书馆里，木头和皮革的气味，古籍书架上的尘埃和波斯地毯的光华，

都是无须言说的古老。而在耶鲁，那些20世纪20年代完成的老建筑，包括斯特林图书馆的石头，都人工做旧过，以显得足够苍老；英语系大楼前的石阶中间，也人为做出了一些凹槽，使其看上去就像经过了几个世纪踩踏的一样——都显得有点刻意。

随着王安迪进入伊兹拉学院墙内的世界时，一方面，我感到释然，那个略有些势利和隐秘的美国“精英主义”生活空间终于敞开了一扇可供窥探的门；另一方面，却又略感索然无味，亦步亦趋的模仿，难免有种附庸的造作。来耶鲁前，人们曾向我形容，这些住宿学院是“极为华丽”的，都是哥特式的古典建筑，中间有一个庭院；古老的奢华之外，它们最近都翻修过了，看上去就像升级换代的大公司会议中心。“无论你是从纽约特权的上西区来，还是从肯塔基州或是中国来，若有人指着需要钥匙才能打开铁门进入墙内的这一切告诉你，你就是这里的主人，你继承了这一切，然后交给你可以打开整个华贵王国的所有城堡的钥匙，谁也无法完全拒绝那种诱惑。”



斯特林图书馆和耶鲁大学建筑系毕业生林缨（林徽因的侄女）设计的“女儿桌”

学院的居住条件不可谓不宽裕。阳光温暖的午后，绿茵茵的草坪上散落着几把色彩艳丽的椅子和支起的几张吊床，四面围合的是毛石建筑，还有一座意大利圣吉米纳诺前哥特式托斯卡纳风格的钟塔。伊兹拉学院是1961年建成的学院，现代主义简洁风格的餐厅里供任意自选的菜品很丰富。有重大节日，比如“中世纪狂欢节”的时候，这里就成了盛装舞会的舞厅。从餐厅出来，我们来到地下的“新月剧院”，一层的健身房、练舞房、几个钢琴房、图书馆和一个用于做手工活儿的艺术作坊，所有的生活设施应有尽有。伊兹拉和与它毗邻的莫尔斯学院由于是新建的，宿舍大都是单人间，可以放下一张不小的书桌。王安迪的宿舍是套间，与另外两个室友——一个学政治与经济学，一个准备学医——共用一个客厅。客厅虽然算不上宽绰，但也有书架、电视机和沙发，足可以会客用。设施这么齐全，而耶鲁的每个住宿学院，人数都仅在500人左右，每个人所获得的基础设施与教育资源，是相当“贵族化”的了。牛津最有贵族传统的基督教堂学院本科生的人数是420人，这是学院500年来固执维持着的“一小撮”的数量，目的是为了“确保学院制一对一的高质量辅导，由每个领域最顶尖的人来因材施教、面对面授课”。如此相比之下，耶鲁学院没有一对一的导师制，仅仅是个生活与社交场所。若要论本科教育的“贵族范儿”，其实又是不及牛津的。但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耶鲁又有其更“精英主义”之处：全校共12所住宿学院，招收本科生不超过6000人，面向的却是有3亿多人口的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国际学生——在美国的一般州立大学，每年的本科新生数量大约是6万人，是耶鲁新生数量的10倍多，加之耶鲁是全美最富有的大学，其个体教育资源的丰裕程度，的确是金字塔之巅。耶鲁是美国一流大学中第一个选择限制招生数量以保证质量的大学。时任格里斯沃尔德校长在1955年度的《校长报告》中提出，要尽可能提高教师和学生之比，较低的学生与教师比和学生与教师积极的双向交流始终是耶鲁突出的特征。今天，耶鲁共有学生1.1万余人，而各类教师近3000人，生师比不足4∶1。

即使耶鲁，包括哈佛，学习的都是牛津和剑桥，但它们终究是诞生于美国社会的大学。在有800年历史的牛津，越古老的学院地位越高，更接近贵族传统和历史的核心，传承下来的、随时间累积的财富也越多，学院间是有层级的。学院的财产捐赠传统和自治传统，使得其学院就像是拥有私产的联邦州郡，构成了大学松散的组织体系。本科生教育是牛津和剑桥的重中之重，其学院制的本科教学也非常昂贵，最耗费人力。而在耶鲁与哈佛，无论是“住宿学院”还是“住宿楼”，在财务上都不是独立的，仅有一些活动经费，仍是学校财务体系的一部分。人们谈起耶鲁最老的学院，如乔纳森·爱德华（Jonathan Edward）学院，也不过70来年的历史，与最年轻的莫尔斯和伊兹拉学院相比，不过也就年长20年。王安迪告诉我：“学院间几乎没有差别。唯一的差别可能是，老学院多一些校友，捐的活动经费多一些，搞的活动更多一些。”这些活动可能包括，暑假去长岛坐船航行，寒假去雪山滑雪，“一路总是有很多好吃的，经费由学院补贴。”在耶鲁，主要的教学与研究活动仍然是在专业学院（schools）里进行的。这也是耶鲁大学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分量相对更平衡的原因。

在牛津的学院里，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在规模严格限制的小学院里共同生活，共同进餐，参加社交活动、体育竞赛、舞会等，让他们形成了非常紧密的个人联系，培养的是集体主义和同学之间的充分信任感。在耶鲁，我同样感受到一种紧密的共同体意识。一位一家三代都是耶鲁大学毕业生的耶鲁人告诉我：“住宿学院的目的，就是为了生产耶鲁校友。”“通过在大学内部创造一种名义上互相竞争的‘亚身份’——‘我住在乔纳森·爱德华’、‘我住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我住伯克利（Berkeley）’，这种‘亚身份’反而加强了同属于耶鲁的身份归属感。”

在耶鲁读书丝毫不轻松。“有种四面八方而来的无形的压力。这里什么都得好，成绩得好，社团活动得好，业余爱好得好，公益服务

得好。每个人的日程表都是满满的。”王安迪告诉我。在学业之外，他参加和组建过好几个社团，包括加入一个服务于纽黑文地区的小额信贷基金的社团，给《耶鲁每日新闻》写评论和报道，还跟着耶鲁音乐系的一个学生学吉他。“有时候我与朋友讨论，他与女朋友在一起的时间也是日程表上预定好的，什么时间见面、什么时间分开，都得按规划来。这就是耶鲁人的生活方式。大家都有一种惺惺相惜的、自然而然的情感，但哪怕是爱情关系，也得是有所设计的。”我说，斯坦福大学的人曾告诉我，他们觉得东部大学的人都爱表现出自己很忙，但在西海岸，人们都在加州的阳光下生活得从容而悠闲，每个人都像浮在水面上的鸭子，只不过两条腿在水面下不断地扑打而已。王安迪沉默了一下，说：“很有意思。这也许是因为东部大学的密度更高吧，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见面都会问在做什么，怕别人觉得自己不忙。”这种“忙”，我还未到纽黑文，就已经感觉到了。发出采访邮件，收到的回复中，无人不在约定时间后，加一句自己的时间很紧张。到了耶鲁，无论是与什么人聊天，想要多说几句，时间一到，便一声再见，各奔下一个日程安排。校方安排了一位陪同我们采访的耶鲁毕业生，在那几天中，每当我们采访，她还得趁着间隙匆匆离开，到另外的地点去执行别的接待任务，然后又匆匆赶回来接上我们的日程。

在耶鲁待上一段时间，就会觉察到每个人都体现出的某种相似性：完美无缺的牙齿，标准的笑容，恰如其分的正式的礼貌，某种程式化的幸福饱满的语调……一位耶鲁毕业生用她充满演讲技巧和不乏激情的排比句告诉我，她在耶鲁获得了一生最有价值的友谊，大学时代最好的六个女孩都有了各自的天地，有的在华尔街干得风生水起，有的成了上市公司的高管，有的成了受人尊敬的医生，有的在国外的国际组织工作。“我们总是彼此报告自己的近况，在节日时相互问候。”有时我却难以想象，她们怀揣的没有延绵余地、被一个个时间段细致分割的日程表，是否可以滋生出真实而深厚的情感来。有位耶

鲁大学的老师如此告诉我：“耶鲁的学生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亲密感和友谊。这里擅长生产成功，而不是意义。”

10月的第一天，阴雨的午后，我们再次来到伊兹拉学院，参加一场“院长下午茶”（Master’s Tea）。在住宿学院里举办下午茶，是耶鲁的传统活动。院长邀请各个领域的名流、大腕级人物，来与学院的学生面对面交流。一位从加纳来的“大三”国际学生谈起他所参加过的“下午茶”，充满溢于言表的兴奋。在“下午茶”上，他见到了“摩根·弗里曼、丹泽尔·华盛顿、克林顿夫妇和梅丽尔·斯特里普”。我们参加的这场，嘉宾是尼日利亚记者和作家赫隆·哈比拉（Helon Habila），他刚刚获得了耶鲁大学文学节颁发的韦登·坎贝尔（Windham Campbell）虚构作品奖。沿着那条穿越庭院的小径来到茶室，门边的大桌上已经沏好了一壶热茶，新鲜出炉的烤蛋糕摆在盘子里，还有苏打水、咖啡和各种点心。茶室很宽敞，很多张布艺沙发沿着墙壁延展，中间点缀着实木茶几和雕饰精美的台灯，散发着温暖的蛋黄色光晕。人们慢慢从各处聚集起来：学院的学生、耶鲁的学者、纽黑文爱好文学的市民……哈比拉以他略带磁性的低沉声音开始朗读起他的小说《等待天使》的其中一段，是一位在尼日利亚政治运动中被捕的记者狱中的日记。朗读结束后，他邀请人们提问。

“你的小说结构充满了戏剧性。你会写剧本吗？”

“你觉得你的作品有政治上的责任和社会意义吗？或者，这些并非你的诉求？”

“作为用英语写作的作家，你怎么看非洲语言在你的小说中的角色？”

“你平时读什么文学之外的书？”

……

窗外不远处，哥特式的哈克尼斯钟楼传来了音乐般的清脆钟声，蛋黄色光晕把茶杯里散发出的热气照得如一团凝固的雾。哈比拉的思绪慢慢回到他的小说所承袭的英语文学传统上，谈到了莎士比亚，谈到了民族国家，最后，谈到了他钟爱的南非作家库切。这个时候，在另一个学院，乔纳森·爱德华学院，“院长下午茶”的嘉宾、令全美所有大学和投资机构都仰慕的耶鲁大学资产投资总管戴维·史文森（David Swensen）也正要结束他与听众们的对话。正是他与他的“梦之队”，将耶鲁的财富带到了历史的巅峰。不久前的《华尔街日报》以“耶鲁再次战胜哈佛”为标题，报道了2015年财年大学基金的收益状况。1985年，耶鲁大学的基金财富为13亿美元；在史文森的管理下，今天，耶鲁基金的总量已达到256亿美元。

文化生活的韵律

美国大概没有哪所大学，能够与耶鲁丰富的文化与艺术生活相媲美了。在耶鲁的12个专业学院中，除了著名的法学院，还有3个全美顶尖的专业：戏剧学院、艺术学院和音乐学院。到达纽黑文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去帕克街（Park Street）上的耶鲁卡巴莱剧院（Yale Cabaret）看了场演出。耶鲁戏剧学院有三个剧院，大学剧院（University Theater）、耶鲁剧院（Yale Repertory Theater）和卡巴莱剧院，其中卡巴莱剧院完全是由耶鲁大学的学生自己管理运营的。戏剧学院一共只有200名学生，这些剧院都可为他们所用。

走进剧场，中间一条白布铺出舞台来，两侧是几张餐桌和几排椅子。来看戏的人先坐下来晚餐，如果吃过了，就坐在椅子上喝点什么。指引每个人坐下来的人、负责点餐的人，都是耶鲁的学生。演出尚未开始，耶鲁大学的学生、老师和纽黑文的居民已经来了不少。不少人是耶鲁戏剧学院的，相互都很熟识，便热火朝天地聊起天来，基

本每个人手边都有杯红酒，更是助兴。等到演出开始，所有餐桌上的人差不多也都吃完了，再没有觥筹交错的声音，观众席上安静下来。

当晚演出的剧本是苏格兰著名作家戴维·夏洛瓦（David Harrower）的《母鸡身上的刀子》，由耶鲁大学的杰西·拉斯穆森（Jesse Rasmussen）执导，从制作、舞台布景、服装和道具设计到声效和舞台管理，都是耶鲁大学生组成的团队。舞台布置特别简单，就是贯穿剧场中心的白布两头的两张铺着洁白被单的床，象征着剧中出现的主要人物的家。一开场，一个偏远的、不识字的无名村妇与她的丈夫威廉姆·泡利用苏格兰乡村口音讨论她的感觉和她用语言描述对事物的渴望。她非常虔诚，对上帝的爱深信不疑。但也很敏感，渴望用语言描述她所看到的大自然的一切：风、云、雷电、麦田等等。有一段非常能抓住人心的表演，女主角在旷野里不断尝试着用语言描述她所看到的一切。她有时迸出如上帝听写给她的词句：“天空布满云朵”“大风吹动麦穗”“远方有树与绿色的草”；有时她竭尽全力，却又败下阵来，在欲说却不可言说之间挣扎。她意识到：“是上帝赋予每个事物以名字，是上帝要我说出它们的名字来。”三位演员全都说惟妙惟肖的苏格兰英语，带着古英语词语和充满恰当瑕疵的语法，他们的语言模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村边来了一位会读书写字的人，无名的女人在他的鼓励下第一次开始用笔写字。她从未见过笔，但她第一次写，就像是受到神的启示一样，从她荒芜的语言世界里自发地流淌出字母。他们之间发生了微妙的情感变化，最终，她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情感，并迸发出身体的激情来。当她在获得语言的过程中得到了思想意识的启蒙，她却又从此离开了伊甸园，与丈夫决裂。

在我们拿到的手册上，耶鲁戏剧艺术评论者摩斯（Davina Moss）如此写道：“我们感知的极限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感知视觉、嗅觉、肌肤相亲。但我们怎么知道这还不够？灵魂——如果那时有这样一个朦胧的词的话——在我们的意识边缘发出摇曳的微光，诱惑我

们将其看清楚。……这部戏所描述的世界，是一个彼时彼地的世界，另一个世界，事物还都没有成形，但你看见，那些遥远的人，怎样不可阻挡地匍匐着爬向你。”



戏剧学院院长詹姆斯·邦迪



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教授詹姆斯·列维雷特

演出很成功。我们到后台化妆室道贺，已经晚上10点多，他们正在吃盒饭里的晚餐。饰演年轻无名女人的伊丽莎白·施塔尔曼（Elizabeth Stahlmann）毫无芥蒂地与几位同学摆出姿势来，配合摄影师。她是戏剧学院的高年级学生，表演自然又散发着情绪的张力。她说，未来充满着变数，“也许会去百老汇，但谁又知道呢？”管理和运营卡巴莱剧场是很不容易的事，全在学生的业余工夫。戏剧学院的教授詹姆斯·列维雷特（James Leverett）告诉我，戏剧学院的学生每天从早晨9点或10点开始上课，一直上到下午两点，然后开始彩排的实战训练，通常一直排练到晚上11点。这是为大学的剧院做排练，耶鲁的剧院每年要生产40场戏，大至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小至学生的专题研讨剧。这些规定的项目完成后，他们才能开始为卡巴莱排练，“不知道要到几点才能睡觉了。”

除了卡巴莱，在更为重要的耶鲁剧院，戏剧学院的院长詹姆斯·邦迪（James Bundy）告诉我，今年还有3场世界首次演出的戏，最近的一部是波拉·弗戈尔（Paula Vogel）的《下流》（ *Indecent*），另外还有两部经典大戏，莎士比亚的《辛白林》和萨缪尔·贝克特的《快乐的日子》。虽然耶鲁剧院的观众“主要来自耶鲁共同体和纽黑文地区，有时也会有人从波士顿和纽约过来看”，但这家剧院却是世界级的。因为这几个剧院的存在，耶鲁的学生相比其他学校的学生对戏剧制作有更整体的经验。“如果他是演员，他很可能有制片和导演的经验；如果他是剧本作家，他很可能也有表演的经验。”



耶鲁大学卡巴莱剧场后台休息室里，演员们在表演结束后尽情放松

40年前，梅丽尔·斯特里普也是在耶鲁的这些剧院里开始她的演员生涯的。在耶鲁大学的3年时间里，她演出了40部话剧，平均每年扮演12~15个角色。1976年，她从耶鲁毕业的时候才25岁，今天，她已成为美国获得奥斯卡奖最多的影后。列维雷特向我们回忆起她，自豪不已。那时他作为舞台总监，在离纽黑文很近的康涅狄格州奥尼尔（O’Neil）中心参与一场话剧，施特里普也在其中，“那时，我根本连到耶鲁来教戏剧的梦都不曾做过。”“那是一部关于20世纪20年代舞蹈明星伊萨多拉·邓肯的剧。因为是关于剧本的工作项目，每一个人都必须随时把剧本拿在手中。梅丽尔当时扮演伊萨多拉，还同时扮演另一个角色，她是最终把剧本串起来的人。她在一天的时间里就背诵完了所有的台词，剩下的时间，她就拿着剧本，把它卷起来，当成教鞭使。那时她就是个明星了。每个人都说，如果我们仍然有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电影工厂，她一定能成为电影明星。她很快证明了自己。”

那天看完《母鸡身上的刀子》，从剧院出来，是个晴朗的夜晚，星空清晰而璀璨。坐在我旁边观众席上的学生还在草坪上热烈讨论那晚的演出。其中一个人说："我应该把那个剧本找来先读一读。"我忍不住想，在这里邂逅的这些年轻人，谁知道哪一天就会在哪部戏或电影里大放异彩呢？在戏剧学院附近的那几条街上漫步，满眼都是即将在剧院演出的剧目海报。桑顿·怀尔德的《千钧一发》（ *The Skin of Our Teeth*）就将在耶鲁剧院上演了。大作家怀尔德就是耶鲁1920届校友，而另一位耶鲁校友、戏剧学院毕业的大导演和剧作家伊利亚·卡赞，初出道时在百老汇导演这部舞台剧和其他几部剧，很快就在纽约戏剧界成了名。

在耶鲁并不算长的日子里，一有空闲，我们便去逛耶鲁大学艺术馆。艺术馆就在老校区后面的小教堂街（Chapel Street）上，紧连着艺术系的大楼。而艺术系与英语系一样，是从老校区的围墙里生长出来的两栋楼——可见艺术系与英语系在耶鲁的传统地位。第一次去，带我们参观艺术馆的是耶鲁艺术系本科生。她在新馆的入口处让我们停下来，仔细观察天花板。

"你能看到什么？"

"灰色的蜂巢。"有人回答。

"管道与灯光。"另一个人回答。

"对，你能看到这些混凝土三角形后面的所有管道，从电灯到空调。所有这栋建筑的空调都在屋顶里能看出来。"这位年轻的学生解释说。这栋现代建筑的新馆是现代建筑大师路易斯·康在耶鲁建筑系任教期间，为美术学院所做的设计。"他当时对功能作为建筑形式的一部分非常感兴趣。在他看来，建筑是一种斗争，而不是一种奇迹，让建筑保持日常运转的那些部分应该在建筑里体现出来。"我们仰脖看着天花板，感叹建筑大师的别出心裁。接着，她把我们带到德国艺

术家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的当代作品《未出生的人》（*Die Ungebornen*）前。

“这幅作品让你联想到什么？上面的黑点使你看到了什么？”她问。

“像一面混凝土的墙。”“像外太空。”“火烧之后。”“灰飞烟灭。”人们七嘴八舌地猜测。“艺术家对探索无限性和宇宙星系很感兴趣。这些散落的点都是星星在太空中的地理位置。”她解说道，“艺术家出生在1945年的德国，‘二战’结束的时候。他是希望处理历史问题的德国艺术家。这幅图中飘浮在空中的小衣服都曾在集中营中被穿过。中间的那棵树令人想到断裂的骨头、矿物等许多东西。……他喜欢关于宇宙中漂浮的灵魂这样的神话，这些小衣服也许就是那些本可以降临人间，却由于各种原因——比如父母在战争中死亡，没能出生的孩子的灵魂，它们便在星际与地球之间的空间中漂荡。”耶鲁艺术馆每天都接待许多来纽黑文参观与旅行的人，有的是专程来这里看耶鲁的艺术馆的。艺术馆时常组织一些为公益服务的讲解游，还邀请纽黑文的中学生和小学生过来上艺术课。在这种互动中，耶鲁大学也成了纽黑文城市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不仅如此，耶鲁的艺术馆就是艺术课学生的课堂，他们的许多课就是在这里上的。围坐在一件艺术真品前听教授们讲解上两堂课，与在艺术史书上的彩色照片上看艺术，是多么不同的体验呀。

接着我们被带到老馆的一幅凡·高的画前——《夜晚的咖啡馆》。她让每个人凑上去仔细看，讲述自己的感觉。然后她继续抛出一个个问题：“色彩和笔法哪一处让你印象深刻？”“画中的人物有什么特征？”……人们继续思考、讲自己的感受、讨论，然后她开始讲解。在这个欧洲油画的展厅里，耶鲁还有13世纪至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托斯卡纳油画、15世纪的锡耶纳作品、17世纪荷兰与弗兰德斯的作品——3幅彼得·保罗·鲁本斯，还有18世纪的法国与意大利

油画，以及19世纪的印象派绘画——包括克劳德·莫奈、埃德加·德加、保罗·塞尚和马奈的作品。这些都是耶鲁校友的捐赠或者用艺术基金购买的。仅仅是欧洲油画，一个大学的美术馆就能有这样丰富的珍贵藏品，令人暗自感慨其财富。艺术馆每年都增添一些新的艺术品，仅2014年，艺术馆就新进了德拉克洛瓦的《山边小径》、16世纪至17世纪的中国罗汉雕塑、7世纪的手抄佛经卷轴、李·弗里德兰德（Lee Friedlander）的现代画、阿比盖尔·雷诺德（Abigail Reynolds）的摄影作品等等。

第二次再去，为我们讲解亚洲艺术馆馆藏的是亚洲馆馆长江文韦（David Ake Sensabaugh）。有几位捐赠人对亚洲艺术馆的中国馆藏做了很大的贡献。一位是威廉·莫尔（William H. Moore）女士，她捐赠了不少青铜器、银器和瓷器花瓶。莫尔家族与耶鲁有很深的渊源。金融家威廉·亨利·莫尔（William Henry Moore）的外祖父就是18世纪中叶的耶鲁毕业生，而莫尔不仅是律师和金融家，还参与创立了很多家钢铁、铁路、保险公司和银行，莫尔家族的几代人都是耶鲁的毕业生。江文韦告诉我，莫尔老太太的这批捐赠，是为了纪念她在耶鲁读书的儿子。另一位捐赠者是小莱纳德·汉纳（Leonard C. Hanna, Jr.），耶鲁1913届本科毕业生，他捐赠了很多中国画，其中包括王鉴与董其昌的画。还有一位捐赠者，亨利·卢斯，耶鲁毕业生，《时代》《财富》与《生活》杂志创始人和出版家，他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卢斯（H. Christopher Luce）也是耶鲁1972届本科毕业生。克利斯托弗不仅捐赠了唐三彩，而且去年还捐赠了佛经手抄卷轴。还有一位收藏者也很重要，是19世纪随耶鲁—中国雅礼学会在湖南长沙的柯强（John Hadley Cox），他是耶鲁1935届毕业生，当时从中国的文物市场（有时就是地摊上）买回来很多包括盗墓者发掘和考古发掘的墓葬品。讲及中国艺术史，江文韦就可以在这里给学生们看藏品。他告诉我，就中国佛教艺术和青铜器收藏而言，耶鲁的收藏还是远不及哈佛，而普林斯顿则有特别好的书画收藏，耶鲁大概更能代表湖南长沙从战国直至宋朝的较完整收藏。他以这里的收藏为基础，

写了一本《学士与藏家：耶鲁的中国艺术》，讲述了元朝以来“文人”作为新的学士理想出现后对艺术审美的影响，由此分析了耶鲁艺术馆所藏的那幅清代的《十八学士图》。

在耶鲁的周末，我们去学院街（College Street）的吾尔西音乐厅（Woolsey Hall）听音乐会。恰逢开学不久的家庭日，很多耶鲁本科生的家长都来校园探访。学生们都是盛装出席，男生穿黑色燕尾服系领结，女生穿一袭黑色无袖的晚礼服长裙，聚在音乐大厅外罗马式的圆形穹顶下聊天，看上去就像一幅油画。那天的演出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耶鲁合唱俱乐部（Glee Club）的无伴奏合唱，第二部分是耶鲁乐团演奏的卓阿基诺·罗西尼的《赛密拉米德》序曲和美国作曲家唐纳德·格朗瑟姆（Donald Grantham）的一首曲子，第三部分是耶鲁爱乐乐团演奏的斯特拉文斯基的《普尔钦奈拉》选段和柴可夫斯基的《F小调第四交响曲》选段。最具感染力的部分，是一位耶鲁音乐系的毕业生回到以色列后，组建了一支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青年组成的合唱队，他希望通过音乐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历史隔膜。那天，他从中东带来了他的这支合唱队，在他的指挥下，他们清唱了一曲充满中东宗教韵味的苏菲歌曲 *Adinu*（他解释说，“ *Adinu*”就是“爱”的意思）。然后，他们加入耶鲁合唱团，合唱了一曲耶鲁的传统校歌《美好的大学时代》（ *Bright College Years*）。两个多世纪以来，耶鲁人都一直是这样唱的：“为了上帝，为了国家，为了耶鲁。”如果说在耶鲁的这段时间里，它大多数时候让我感到它是美国的，那么在那首合唱曲子至少有8个声部的、震慑人心的高潮处，我感到，它也是世界的。演出结束的时候，身旁的家长们起立鼓掌，然后说着各自的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和中文，彼此问候。

“自由”与“领袖”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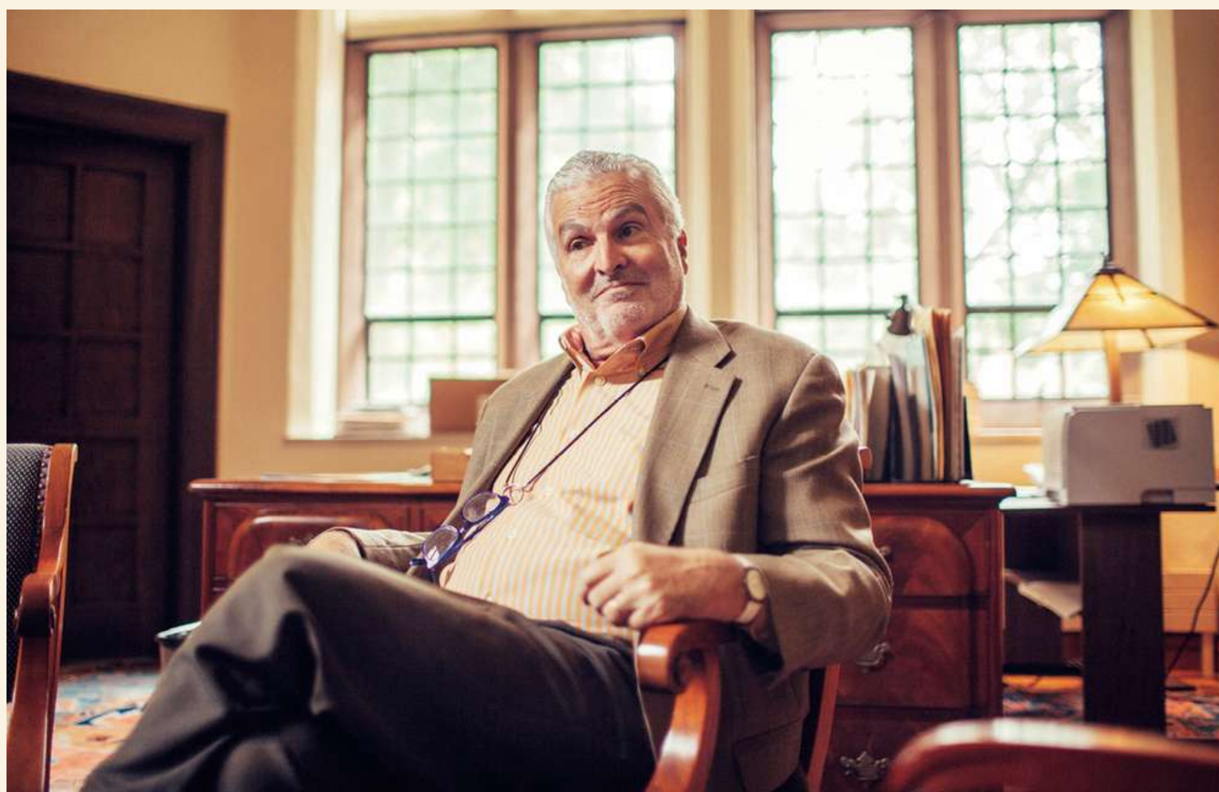


耶鲁法学院大楼一角。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就是在耶鲁法学院相识的

9月末的一个晚上，耶鲁法学院迎来了一位政治评论家——普利策奖得主、福克斯新闻评论员查尔斯·克劳特汉默尔（Charles Krauthammer）。他要讲的是对奥巴马时期内政与外交政策的看法。不到19点，法学院一楼可容纳300人至400人的列文森报告厅已经座无虚席。一番幽默的自我介绍与寒暄后，克劳特汉默尔开始猛烈抨击奥巴马的内政与外交政策。他是持保守主义立场的评论家。他不仅批评奥巴马放弃了传统的、以社会保障安全网为基础的美国式自由主义，在教育、医疗和能源领域追求欧洲的福利制度国家模式，也批评他的外交未能在亚洲和中东维持住地区的均势。有些意外的是，演讲结束，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齐声为他鼓掌，就像一场精彩的演出正在谢幕。耶鲁人的政治热情感染了我。一位“大三”时选择了政治学作为专业的耶鲁人告诉我，她之所以选择政治，是因为她想从政。她还在思考自己的路该怎么走，但她可以肯定的是，理想主义的政治热情依旧存在于一些耶鲁人当中，虽然她也不确定，现实会在多大程度上、以多快的速度修正这种理想。

诗人与文学批评家J. D.迈克兰奇（J. D. McClatchy）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期刊《耶鲁评论》的总编，在耶鲁英语系任教。他说，1974年他拿到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他知道至少在那时，耶鲁与哈佛是明显不同的。“哈佛的学位证书最后一句话是，这本证书随‘所有的权利与特权’授予你；而耶鲁的学位证书上最后一句是，

随‘所有的权利与责任’授予你。对我来讲，‘特权’与‘责任’有天壤之别。在耶鲁，人们有一种公认的信仰：在这里所受的教育，如果不能对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公民的人产生影响，那么这种教育就不值一提。”他告诉我，在耶鲁，有75%的本科生从事社区服务，帮厨房干活、给纽黑文的残疾小孩当辅导员等等。他在普林斯顿也教过10年书。他说，与哈佛、普林斯顿相比，耶鲁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教育强调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在耶鲁，有一种从不公开表述、无法明确指明，却极被看重的高贵意识，那就是服务社会、贡献国家。”迈克兰奇这样一说，许多我们在耶鲁所经历的像珠子一样散落的、易被忽视的细节，便在我脑中串了起来。



在耶鲁大学英语系任教的诗人、文学批评家J. D.迈克兰奇

在耶鲁的10天里，我见到许多耶鲁本科生，他们带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校园，游览美术馆，讲解耶鲁的历史和艺术品；中秋的夜晚，排成长队的耶鲁学生在天文台观看月食，天文系的学生一直守在望远镜边，为所有提问的人答疑，直到深夜零点过后才最后离开；耶

鲁中国学生会为了给即将就业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组织了一场毕业生的就业分享会，他们一些人从硅谷、波士顿和纽约赶来分享经验；内森·黑尔，那个我们在纽约俱乐部纪念性装置上读到的为国牺牲的指挥官的名字，他的铜像就立在耶鲁最核心的“老校园”的草坪上；法学院的老教授在向听众介绍来演说的克劳特汉默尔时，给他的头衔中，除了“政治评论家”，还有“爱国者”；一位耶鲁人曾指着某条街的一排商店告诉我，纽黑文曾衰落下去的那段时期，那一排商店几乎倒闭，是耶鲁不遗余力地帮助了纽黑文街区的复兴；还有那些无一不与某个耶鲁校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捐赠的建筑、基金、油画与艺术品，它们的历史若与牛津、剑桥相比，都很年轻，却也在近300年中形成了某种历史性的系统。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查尔斯·莱文（Richard Charles Levin）曾说过，耶鲁有两个有别于其他伟大研究型大学的特点，一是更加致力于本科教育，二是注重培养“领袖”。无论今天“领袖”成了一个多么陈词滥调的概念，但在耶鲁，“领袖”的意识是具体而真实的。

耶鲁法学院在美国无疑是最好的。法学院招生院长阿莎·兰嘉琶（Asha Rangappa），耶鲁法学院毕业生，这样向我解释法学院如何在那些标准的申请材料——本科成绩单、LSAT（法学院入学考试）成绩、两页的个人陈述和250字的小论文中，找到耶鲁愿意接纳的那200人：“申请人的本科成绩单几乎都是全A，近乎满分的LSAT成绩，很多的课外活动。使其脱颖而出的，是申请人在陈述与论文中表现出的激情与兴趣。耶鲁法学院要培养的人，不是背诵法条的律师，而是能够创造性运用法律框架实现某种目标的人。”耶鲁法学院的学生并不都在本科时学习过法律预科（pre-law），相反，他们来自很多不同的专业背景。“很多人的学科背景是政治学、经济学、英语，也有很多物理学、化学、艺术系出身的人，歌剧演员、希腊拉丁语古典学系背景，都可以来这里。重要的不是专业，而是他们是否在自己所学的那个专业领域发挥了最大的努力、获得了最优秀的成绩，以及对于学习之外的某种事物的兴趣和激情。”与其他大学的法学院相比，耶鲁毕

业生的职业选择也是最为丰富的。兰嘉琶说：“从政的、去律所的、组建新组织的，各种选择。像我，从这里毕业后，就选择做过一段时间联邦调查局情报官员。”与想象不同的是，因为耶鲁法学院非常富有，它接受很多家庭背景并不优越的学生，提供“按需分配”的经济资助。毕业后，典型的职业轨迹虽然是做法官和去律所，但也有很多人去政府部门，去非营利性组织，或者创业、写书。“有些学生毕业后会选择薪水不那么高的工作——他们并不愿意去赚钱很多的律所，而选择帮助穷人做法律援助工作——薪水也就够租房和吃饭，遇到诸如这种情况，法学院会免掉他们的助学贷款。很多慷慨的捐赠者很愿意给学院钱，让未来的学生能够做他们真正想做的事，包括支持甚至鼓励他们去做那些收入菲薄的理想主义的工作。”希拉里·克林顿在耶鲁法学院读书时，就曾在耶鲁—纽黑文医院儿童研究中心工作，她一直关注的是贫困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儿童的福利。虽然耶鲁在应对外部世界的冲击时，也变得越来越实际，但这种理想主义在今天的法学院，依旧存续了下来。

莱文校长曾说：“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他认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大学毕业后才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的东西，而不是耶鲁大学教育的任务。在他看来，耶鲁所要培养的领袖，就本科教育来说，核心是通识，也就是“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这种教育所熏陶出来的批判性的独立思考能力，能够让人胜任任何职位，驾轻就熟地精通任何学科，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耶鲁在文化上的保守品格，使得它在每个大学面临变革压力的关头，都很好地保护了“自由教育”的传统，某种意义上，比锐意进取的哈佛更接近牛津、剑桥式的“贵族式教育”传统。19世纪上半叶，美国工业革命的时代，东部大学都在推行选修课制度的时候，耶鲁却反对取消课程中“已经死亡的语言”，反对使课程更实用，反对以德国大学模式改造耶鲁。耶鲁的教授认为，学生“要从纯数学中学习论证推理的艺术；从物质科学中了解事实、归纳过程和可

能证据的多重性；要在古典文学中发现一些最有品位的完美的典范；通过英语阅读学会运用自己语言讲与写的能力；通过逻辑和思想哲学学习思维的艺术；通过修辞和辩论术，学习讲话的艺术；通过不断地练习写作掌握准确表达的能力；通过即席的讨论，成为果断的、语言流畅的和朝气蓬勃的人”。耶鲁人告诉我，直到今天，耶鲁的计算机系也依旧更侧重理论而不是应用，老教授们更希望能够在理论与智识上有所突破，而不是创办一个伟大的公司——虽然创业之风已逐渐在耶鲁劲吹。

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耶鲁毕业生，孟克文的人生轨迹是很典型的“耶鲁式”的。那是一个“自由教育”尚能从容彰显其价值的时代。孟克文本科学习的是历史和英语，毕业后，他还不确定自己去哪儿，有些想去法学院，但又觉得为时尚早，就在耶鲁—中国协会的安排下去香港教英语。“我只是想看看世界，非常偶然的，却改变了我的人生。”他说，在那次长达3年的香港与台湾旅行中，“我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就决定继续学习中国历史，去了普林斯顿大学读中国史。”一切都不疾不徐，从容不迫：从1968年入学到1978年毕业，他在普林斯顿一学习就是10年，其间在日本待了两年，其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两年。他有足够的余地，在他的人生轨道上应对不期而遇的生活的碰撞：哥大毕业后，他发现中国历史这门专业在各个高校都没有空出来的教职——“‘二战’后开始研究中国的那一批教授都还没有退休，要是晚5年，我就在大学教书了。”于是阴差阳错，他去了纽约的银行业，“那个银行通过一步步收购，最后与曼哈顿大通银行融合，成了今天的摩根大通集团。”22年的银行生涯后，他成了一家咨询公司的亚洲主管，在北京待了8年，之后成为中美商会的主席。他告诉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曾想去法学院，最后却从未去过；也曾想在大学里当一个中国史教授，也没有当成。后来的职业生涯，充满了激进的变数——这也是美国经济和我所受的大学教育的好处：你不必在一条职业道路上一扎到底，却总可以换行业。如果我是今天的大学毕业生，要去金融业，我还得拿一个MBA学位。但在我那个时候，大银行

都有自己的培训项目，18个月，学习金融知识，就可以胜任。”耶鲁与普林斯顿所受的“自由教育”，让他足以胜任职业的转变与人生轨道的换挡。“对我来说，大学时培养的英语和中文的读写能力，以及我从历史学中培养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是最重要的，一生受用。很多人认为常青藤学校，特别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大学生涯，会给你未来的职业生涯和一生提供一个强大的人际关系网，但至少，这对我不是特别成立。我有很多亲密的耶鲁朋友，他们是我生活中的朋友，但我们却不一定在职业上有什么来往。”

但“老耶鲁”还是在发生着难以抗拒的变化，即使在安静的小城纽黑文，这种变化比纷繁热闹的波士顿和纽约要来得缓慢一些。J. D. 迈克兰奇告诉我，当他在耶鲁英语系学习的时候，“系里的老教授全是泰斗级的人物，他们年龄偏老，但个个都是世界顶级学者。”那时的英语系非常有活力，“文学已不再仅仅是文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各种理论与意识形态，让文学不再仅是文本，而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那时，雅克·德里达、保尔·德曼都曾在这里上过课。”而今天，“在英语系的名单上，除了哈罗德·布鲁姆——他的高龄已不允许他来学校授课，而是在家给学生授课，他坐在椅子里，学生们坐在地上——其他的同事，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他有些叹息地说：“耶鲁英语系依旧非常有声望，但对我来说，也许我属于那个‘老耶鲁’。”他在英语系教的课包括一门“创造性写作”，一门颇具实用性的课程。“要是在过去的耶鲁，开这门课程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哪个学生过来问那些老教授，如何才能写出好文章来，老教授们只会用瘦骨嶙峋的指头指着图书馆里的一排排书说：‘去读狄更斯，去读福克纳，学习写作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但学生给教职员工的压力越来越大，英语系不得不增开了这门课。”过去一直旁观哈佛的各种改革，并对自己谨慎的保守有略胜一筹之感的耶鲁，也开始向更实用主义的大学借鉴经验了。耶鲁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副院长文森特·威尔钦斯基（Vincent Wilczynsk）告诉我，当他在2012年筹建学院的工程、创新与设计中心时，参照的模

式主要是麻省理工的新媒体实验室、西北大学的设计研究所和斯坦福的设计学院。但与麻省和斯坦福不同的是，耶鲁的工程与设计中心仍然与产业资本保持着距离。“企业不会找上门来让我们解决它们的实际问题。我们仍是按自己的思路和节奏研究，从而能够创造和引领产业。”



耶鲁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副院长文森特·威尔钦斯基





耶鲁大学新建的工程与设计中心，参考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媒体实验室和斯坦福大学的设计实验室

当我阅读容闳、詹天佑和李赋宁、夏志清这些前人笔下，或为国家前途而发愤，或沉浸于拉丁语、古英语这些古老学问和精神追求中的耶鲁留学往事时，我隐约感到，耶鲁也在发生着变化。在一场耶鲁中国学生会组织的就业经验分享会上，几位优秀的毕业生与校友们讲了很多投递简历、电话或现场面试的经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进入了

以当下标准来看很理想的职业：投行、硅谷巨头公司，或拿到了风投创业。这也是台下所有即将毕业的耶鲁学生向往的去处。孟克文告诉我，他作为董事长的耶鲁—中国协会（雅礼协会）最近做了一项调查，耶鲁的中国学生毕业后，最理想的去处是麦肯锡、高盛，或去硅谷创立公司。对美国学生来说，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容闳

友谊与权力的传奇：耶鲁的秘密社团

如果说哈佛的“终极俱乐部”像名利场，势利、张扬和浮华，那么安静居于小城纽黑文的耶鲁，其“秘密社团”要保守和内敛很多，也更具宗教情结。一位“骷髅会”成员说：“家庭，耶鲁、国家、骷髅会，这就是推动力。”

常青藤的“俱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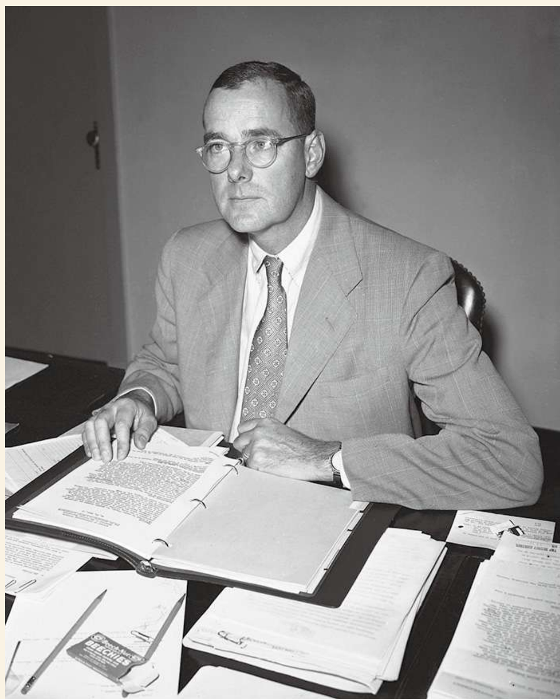


耶鲁毕业生詹姆斯·安哥列顿，描写“骷髅会”与美国中情局的电影《特务风云》中的情报人员原型。图为他作为前中情局反间谍部门主管，正在华盛顿接受质询

对常青藤名校的俱乐部与社团发生兴趣，是源于一部虚构电影《特务风云》（ *The Good Shepherd*）。电影讲述的是中情局诞生的故事，虚构的成分居多，但却有松散的人物与事件原型。

片中两位情报人员的原型是詹姆斯·安格列顿（James Jesus Angleton）和小理查德·比塞尔（Richard M.Bissell，Jr.），两位都是耶鲁毕业生，中情局官员。现实中，安格列顿是1954年至1975年中情局的反间谍官员。在耶鲁的时候，他是一个诗人，也是耶鲁文学杂志 *Furioso*的编辑，“二战”期间，这本杂志发表过很多有名诗人的诗，包括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和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小理查德·比塞尔在耶鲁读的历史学，1932年本科毕业，1939年又在耶鲁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本人曾拒绝加入耶鲁的“骷髅会”，现实中真正加入过“骷髅会”的是他的

哥哥威廉·比塞尔。小比塞尔后来加入了中情局，1961年至1962年，是国家侦察办公室的主管。在片中，这两位情报人员都被虚构为耶鲁最古老的秘密社团“骷髅会”的成员。



耶鲁毕业生小理查德·比塞尔，《特务风云》中的另一角色原型

剧中的中情局局长原型，则是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美国第五任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是普林斯顿毕业生，加入过普林斯顿最古老的学院社团American Whig-Cliosophic。值得一提的是，杜勒斯的哥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同为两个大学秘密社团Phi Beta Kappa（美国大学优等生之荣誉学会）和Whig-Cliosophic的成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这部电影把耶鲁“骷髅会”描述成美国情报共同体孵化器。虽然中情局的历史研究共同体后来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电影里历史事实的不准确之处，但这些人物真实与虚构的身份中有一个共同点却引起了我的好奇：他们在耶鲁或普林斯顿读书期间，都与某种组织紧密的学生团体组织，或叫俱乐部，或叫秘密社团发生过联系。

初来乍到，一位耶鲁英语系的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和一群年轻的耶鲁同事去校园中心的Mory’s俱乐部吃饭。“那是只提供给耶鲁校友的饮食俱乐部。如果你想成为会员，你得受到另一位已是会员的耶鲁校友的推荐。我们这群教师中有一个耶鲁本科毕业的，她邀请我们去那儿吃饭。那里的食物很糟糕，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去那里吃饭。这位会员来自一个南非家庭，政治导向非常正确，她的学术立场也是‘左’派的、进步主义的，她有所有‘正

确’的政治观点。当我们在席间谈到耶鲁的时候，她提到她也加入了一个耶鲁的秘密社团。我问她是哪个社团。她说秘密社团的规矩是，你不能说。在那个时刻，我感到她就夹在秘密社团的规则与她的进步主义政治观点之间。她感到非常尴尬，最后不得不说出这个社团的名字，但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件极为沉重的大事。”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们决定去探访一下“骷髅会”被称为“墓穴”的总部。大概是因为光线明亮，这座楼没有表现出阴森的样子，但却冷冷的。1856年，“骷髅会”成员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校校长，将骷髅会组建为“卢塞尔信托协会”。从那时起，这个秘密社团就搬入了今天所在的“穴址”：高街64号。“骷髅会”的成员把这座“墓穴”称为“庙”。我们看到的大楼，是1903年扩建、1998年修缮过的楼。19世纪的时候，墙上还爬满了绿藤，遮得只露出个门来，真的像个墓穴，这些绿藤后来都被砍掉了，看上去的确更像个庙宇。高街64号位于耶鲁校园特别核心的位置，从老校区的门一出来，街对面正对着的就是，与耶鲁大学美术馆毗邻，和英语系大楼隔街对望。这是一幢有100多年历史的希腊埃及式褐色砂岩石楼，石墙上果然如很多文章里所描述的那样，仅有很窄很暗的窗户，根本看不到里面。事实上，如若不是窥探者，是不会想到要走近它的：和这条街上的其他建筑不同，这座楼不是直接临街的，而有一片前院，需要穿过前院的小径，才能到达它深凹进去的大门，更何况，那些狭窄的窗户都很高，超出了一般人身高可及的范围。

这是一幢三层楼高、带有阁楼的建筑，我们进不去。在耶鲁大学书店里，我找到唯一的一本写“骷髅会”的书，叫《骷髅会的秘密》（*Secrets of the Tomb*）。书的作者是《纽约客》撰稿人、耶鲁毕业生亚历山德拉·罗宾斯（Alexandra Robbins）。她本人也曾是一个耶鲁秘密社团的成员，这个身份帮助她采访到很多“骷髅会”的成员，阅读到耶鲁大学图书馆的文献档案。她这样描写“墓穴”的内

部：“墓穴里堆着很多东西，里面就像个多层楼的储物空间，到处都是些驼鹿头、蜡烛、套着盔甲的骑士模特、鹿角、中世纪的艺术品、老照片、手稿等混杂物。有一套俄式的茶壶，有一尊大象背着的佛像，一口装满毛织毯的箱子，一尊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的小雕塑。很多物件都是骷髅会校友的赠品，看上去就像个维多利亚时代有收藏癖的人的家。”她这样描述骷髅会大楼的一个房间：“有一个房间被称为‘德国屋’，摆满了德国的古器物，很多早于普法战争，房间内暗色的木墙上刻着德语词。墓穴内的一幅画上描绘了一个敞开的墓葬，四个骷髅躺在石板上，周围放着一顶小丑帽、一本打开的书、几件数学仪器、一个乞丐的袋子，还有一顶皇冠。下面有一行字：‘谁是傻子？智者、乞丐，还是国王？无论贫穷或富贵，死者皆平等。’墓穴内还有5张反映德国大学学生生活的照片。”这些内部装饰，都说明了骷髅会的德国渊源，虽然与德国的联系早已不复存在。



耶鲁“骷髅会”精英会员：美国第27届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罗宾斯写道：“虽然屋顶挑高很高，也是镶木墙壁，有一种哥特式的基调和条顿风格的影响，但每个房间之间的装饰风格又是不连续的。”一位20世纪80年代从耶鲁毕业的骷髅会成员曾说，这里就像是一个住宿学院里的寝室，“桌上有成百上千支笔，一半都没有笔帽，到处是上了年头的学期论文。沙发下面扔着袜子，还有些漏了气的橄榄球”。时间与死亡是“墓穴”里内饰的主题。墙上有一处刻着拉丁文“Tempus fugit”，意为“时光飞逝”；墙上挂满了人、麋鹿和野牛的骷髅；墙上挂着一幅题为《死亡与拿破仑》的彩色木版画；门厅放着一块匾，刻着“Memento

mori”（记住你必将死亡）。一位20世纪70年代的骷髅会成员这样解释这些死亡意向：“这不是关于恐怖，而是一种让人在年轻时体验到存在的有限的环境。每次我们环顾四周，便想起国王与乞丐的骷髅并无不同。”不断被提醒的死亡，也让成员们意识到，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成就自己，必须要尽早。

1933年“骷髅会”成立100年时，其纪念手册的第一页上，写着这样一段话：“骷髅会没有历史。怎么会有呢？我们传统的精髓正是不做改变。野蛮的20世纪的思想家被时间与空间的问题所困扰，但女神知道，只有一种时间，‘骷髅时间’，只有一种空间，她的神庙，外物皆不存在。”一位“骷髅会”成员曾解释，骷髅会成员聚会的时间是周四和周日晚7点55分，而按照“骷髅会”的计时方式，是8点整。“骷髅会”有意把时间调快了5分钟，让“墓穴”里的时间与外面世界的时间不同。

关于“秘密”的传统

骷髅会的许多故事，无论是历史真实性的还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人们认识与想象耶鲁的一面棱镜。更宽泛地说，是对精英主义老学校的权力统治着这个国家的想象。幕布之下，耶鲁、哈佛和普林斯顿都努力维持着它们的神话意义——存在着许多追求声望、关系网和友谊的秘径。耶鲁无疑是他们之中做得最突出的，秘密社团就是这样一条秘径。1968年，当被问到为什么耶鲁的社团比其他大学的社团更能维持其神秘感，哈佛一位教授回答道，这与耶鲁一直更加强调成就和竞争力有关；而这种以个人成就为导向的校园氛围，很晚才进入哈佛大学。

1893年，耶鲁毕业的威廉·莱昂·菲尔普斯（William Lyon Phelps）批评自己母校的社团制度说：“哈佛从来没有过像我们的高

年级社团那么有影响力、那么具有反民主排他性的东西。”“每个人都看到了，想加入社团的人在‘大二’的时候是如何小心翼翼地选择同伴，是如何有技巧地操纵周日下午在惠特尼大道上的散步，是如何特别小心地不被人发现与‘呆子’待在一起。”正是这种带有“操纵”感的“耶鲁性”，成为纽黑文校园独特的品性。1871年，一位耶鲁人写道：“要仅用社会联系来评判一个人，实在很愚蠢。但如果仅用他的奖状或者奖学金来评判一个人，也更加愚蠢。用一种武断的标准来评价一个人无疑都是不公平的，但如果一定要用一条仅有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没有什么比加入社团体系更能掂量一个耶鲁人的分量了。”



Mory’s餐厅是只提供给耶鲁校友的饮食俱乐部

通常，秘密社团的成员占高年级学生人数的不到十分之一，每周四和每周日晚上聚会。直至20世纪中期，理想的社团成员都是“格林威治出生，安多佛长大”的东海岸精英（格林威治指纽约曼哈顿的格林威治村，安多佛是指安多佛菲利普斯中学，是麻省一所私立的寄宿

预备中学）。秘密社团与“耶鲁老贵族”几乎是同义词。他们与学校中心俱乐部式的Mory’s餐厅里的工作人员态度有几分相似。那里的服务员用英国管家式的傲慢端上干酪汁或嫩肉片，如果你想多要一点酸辣酱，他们就会提起弯弯的眉毛。

19世纪30年代，美国掀起了一场影响广泛的“反共济的改革”。反对共济会式秘密社团的人，决意要减少秘密社团对美国统治精英的影响，甚至资助了一位总统候选人。整个美国的氛围，都要求根除有任何秘密暗示的组织。在耶鲁，首当其冲的社团是Phi Beta Kappa，成立于1780年的秘密社团。Phi Beta Kappa是Philosophia Biou Kybernetes的缩写，意为“热爱智慧，指引生命”，主要是学者间讨论文学、哲学、宗教和伦理道德的组织，算是当时最秘密的耶鲁社团了。在那次运动风潮中，Phi Beta Kappa不得不脱去神秘的面纱，组织的握手方式和标识被公布出来，秘密的仪式也被禁止。可是，一旦褪去神秘性，Phi Beta Kappa也就失去了它往日的名望，后来几十年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19世纪70年代一度在耶鲁校园完全消失。

有意思的是，“骷髅会”恰好是在Phi Beta Kappa被削弱的时候出现的，却在维持自己的神秘性上有增无减。1833年，耶鲁学生威廉·H.卢塞尔（William H. Russell）根据他在德国交流一年的经验，依照与德国“光照派”紧密联系的秘密社团的模型，成立了“骷髅会”。卢塞尔出身于19世纪美国最富裕的家庭之一，他是旗昌洋行创始人萨缪尔·卢塞尔的后代，也是耶鲁学院的创始人和最早的理事成员阿迪亚·卢塞尔（Noadiah Russell）的后代。那时，旗昌洋行是美国在中国最大的商贸公司，做丝绸、茶和鸦片贸易。“骷髅会”的第一批会员包括阿尔方索·塔夫脱（Alphonso Taft），未来的战争部长、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和未来总统威廉·塔夫脱的父亲。一位“骷髅会”成员曾这样说出秘密社团能够在耶鲁孕育并成为一种传统的原因：“那些社团的创建者都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学生。他们是统治

精英阶层很成人化的一群人，喜欢用制度化的方式来做他们所理解的高尚行为。”



位于约克街214号的耶鲁第三古老的秘密社团“狼头”总部

一位耶鲁大学的学生告诉我，今天，社团已经变得不像过去那样重要。在校园里，也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能够脱颖而出，兄弟会似的社团，已不是21世纪大多数耶鲁人的选择。也许她说得并不错。耶鲁大学有很多历史悠久的秘密社团，第三大秘密社团“狼头”，其总部在214号约克街（York Street）。我们前去寻访时，214号这个门牌号竟然在213号与215号之间消失了。我们在一连串有极为相近的门牌号间打转，一直摸到了戏剧学院和卡巴莱剧院，也未能找到214号。我在街边停下，决定询问一位穿着合唱团T恤迎面走过来的学生。她说，我刚刚经过212号，那么我继续走下去，应该就是214号了。我问她听说过“狼头”吗，她回答说，不知道。待她离开，我才发现，我们身后那栋铁门紧锁的庭院里，草坪间的一条小径通向一幢褐红色的房子，还有一个可能是厨房的辅楼与主楼相连。庭院没有门牌号，沉寂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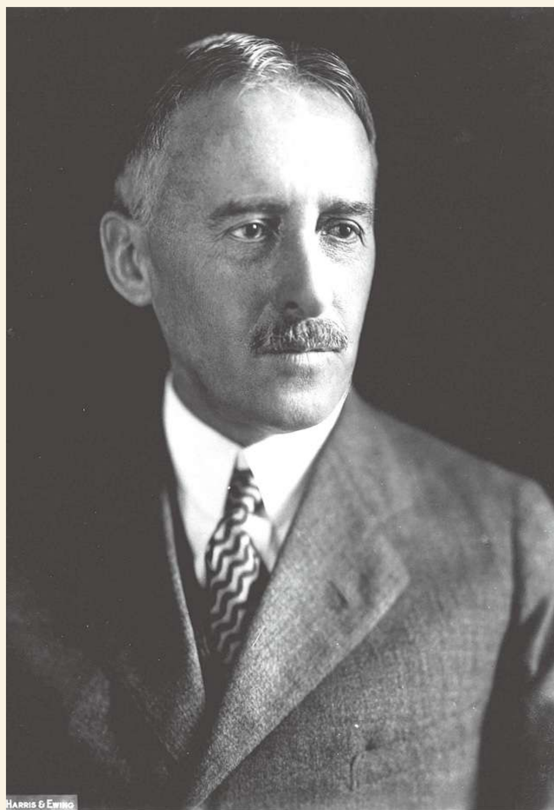
没有任何人活动的迹象。我想起那座“骷髅会”的“墓穴”，也是没有标注门牌号的，就像是有意的匿名。虽然它是个体量不小的建筑群，但它缄默地立在那里，如果不是事先看过它的照片，又刻意留意，很容易在这校园最心脏的地带来来往往很多次都不会注意到它。于是我猜想，身后这栋没有门牌号的庭院，应该就是“狼头”。回去查找资料一对比，果然没错。再想到那位被我问路的耶鲁学生，她其实从未意识到这个秘密社团的存在。

尽管如此，耶鲁的社团系统于校园存续了170多年，如今，其成员身份对学生们依旧是有吸引力的。对住在住宿学院的学生来说，他们的学习成绩不再有班级排名，学院内的希腊式生活又显得边缘化，秘密社团仍旧是一种终极手段的认可，会员身份仍是对大学里极为有成就的有余力者的肯定与嘉奖。据说，曾有一位很杰出的耶鲁高年级女孩，因为没有被秘密社团选中，羞愧万分。每到周四，她都会躲在斯特灵图书馆顶层的一个罕有人至的角落里，好让周围的人以为自己正在参加某个秘密社团的聚会（秘密社团的成员是禁止告诉外人自己加入了秘密社团的，所以她这样做不会有穿帮的可能）。直到快毕业前的某一个周四，她在图书馆被自己的室友撞到，一切才暴露。一位曾经的耶鲁教授告诉我，即使是那些口头说自己并不在乎秘密社团的耶鲁人，其实内心里，还是相当把它当作一回事。“半个世纪以前，黑人和女性在耶鲁读书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现在，他们的人数占到了接近一半。有趣的是，这些过去被排斥在外的群体进入耶鲁后，都按照耶鲁的老剧本扮演起了角色。老的人被替代了，但形式却没有太多的变化，就像它的墙与大门并未改变一样。”

权势与友谊

在罗布·科恩导演的电影《骷髅党》（ *The Skulls*）中，男主角卡勒布·曼德雷克（Caleb Mandrake）加入了纽黑文的一个秘密社

团，被带到社团的一个隐居处。影片中，他被载上一艘20世纪20年代的游艇，送到了一个被称为“绿宝石”的小岛上。在碧绿的草坪、宽阔的网球场、茂密的森林和装修豪华的19世纪老房子中，曼德雷克与社团里最有权力的校友一起交谈。这些校友包括，参议员、哈佛法学院的招生官员、学校的校长，还有他自己的父亲，一位即将进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电影的原型毫无疑问是耶鲁的“骷髅会”。它在离纽约340英里的地方有一座40亩的私人小岛，坐落在圣劳伦斯河以北两英里的亚历山大里亚湾。骷髅会的成员如果想去，只需要订一艘船来纽黑文接他们即可，在远离尘嚣的环境中“加固友谊”。这座岛是一位会员的捐赠，维持岛的运营，也是靠会员的捐赠。但是这些年来，维持岛运营的经费，就像维持“墓穴”运营的经费一样，都在渐渐减少，那座小岛也就变成了有些荒芜的废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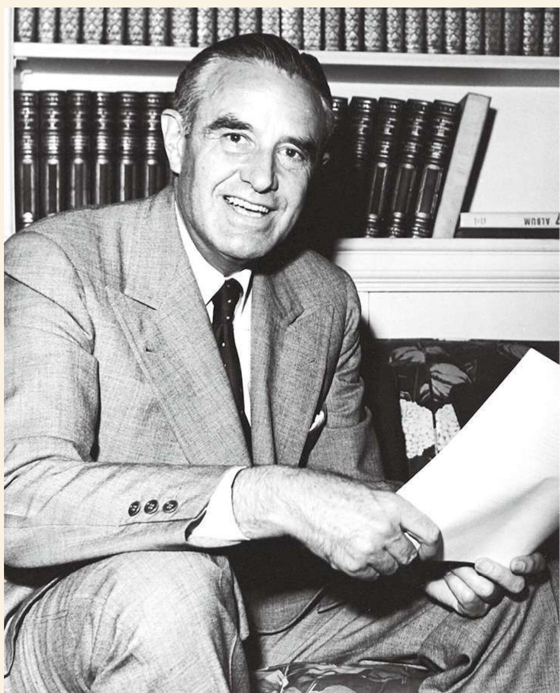
美国前国务卿、战争部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

“骷髅会”的成员中有很多权贵人物。比如，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1878年会员），国务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1888年会员），富豪、银行家、船王、外交官、纽约州州长、马歇尔计划主持人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1913年会员），参议员、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Forbes Kerry，1966年会员），老布什和小布什总统（分别是1948年和1968年成员），耶鲁大学前校长亚瑟·哈德利（1876年成员）和另一位校长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1849年成员），它就像美国未来的统治阶级青年时代的社交俱乐部。耶鲁的第

二大秘密社团，“卷轴与钥匙”（Scroll and Key），也有像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音乐家科尔·波特（Cole Porter），美国铁路和航运大王、海军准将科尔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这样的人物。“卷轴与钥匙”是耶鲁最富有的秘密社团，不过一直处在“骷髅会”的阴影下。过去，这个社团基本是召纽约来的会员，不过近些年，也开始越来越像“骷髅会”那样，把课外活动的突出表现作为招募标准之一了。

虽然耶鲁的秘密社团已经很贵族化了，与美国东部的金融、工商和政治世家也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与哈佛的“终极俱乐部”和普林斯顿的“饮食俱乐部”略不同的是，它相对还是更注重能力和才华，而不仅是家庭背景。20世纪20年代，耶鲁学院引入了住宿学院制度为本科生提供社交场所之后，加入秘密社团也就不是一个必要的选择了。一位20世纪60年代的耶鲁毕业生告诉我，他没有选择任何“兄弟会”式的组织。他说：“住宿学院给了我丰富的社交生活。在那里，我结识了很多有趣的人，参加了很多有趣的活动，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更喜欢耶鲁的住宿学院制度，而不是普林斯顿的餐饮俱乐部系统，这是更好的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20世纪60年代，‘餐饮俱乐部’很像兄弟会，是选择性的。而在寄宿学院里，每个人都被分开来，并不是一个社交上选择性的过程。”当他被邀请加入一个秘密社团时，他拒绝了。在耶鲁，从宾夕法尼亚乡下来的拿奖学金的男孩也可以在高年级时加入秘密社团，但在普林斯顿和哈佛，来自正确的家族和私立寄宿学校谱系更加重要。

青年时代的这种联谊，在会员之间建立了某种默契。他们有一些心照不宣的秘密，比如，约翰·克里的前姐夫和密友戴维·索恩（David Thorne）也是“骷髅会”1966年的成员。他说，他仍把象征“骷髅会”的数字“322”作为自己办公室的分机号码，而约翰·克里也仍然用“322”作为记忆一些事情的密码。一位20世纪80年代的“骷髅会”成员说：“骷髅会最大的好处是建立关系。在世界其他地方，



美国金融家、政治家、船业大亨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

你或者偶然或者出于选择，认识其他人，但在“骷髅会”，你见到的人都是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见到的人。这是一种让成就极高者相识的强制性安排。”从1989年乔治·H. W.布什成为美国总统直到2008年，其间的20年，都是耶鲁人担任总统，其中两位是“骷髅会”成员；在耶鲁的历史上，出了5位总统，其中有3位是“骷髅会”成员。2004年，寻求连任的小布什与参加竞选的时任参议员约翰·克里角逐总统，成了一次1968年和1966年“骷髅会”成员之间的对决。不能不说，“骷髅会”是统治精英的权力俱乐部。

与这个关系网联系最深的，当属布什家族。1989年，当乔治·H. W.布什被问到，他为何选择耶鲁时，他回答：“我的家族有耶鲁传统。我的很多叔叔、我的哥哥，还有我父亲都去了那儿。我的很多朋友也在那儿。”乔治·H. W.布什的父亲参议员普利史考特·布什、哥哥约翰·布什、舅舅约翰·沃克尔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尔三世，以及舅公小乔治·赫伯特·沃克尔、侄儿雷·沃克尔，全部都是耶鲁“骷髅会”成员。普利史考特从耶鲁毕业后，加入了“骷髅会”成员威廉·哈里曼创立的美国当时最大的私有银行W. A. Harriman & Company；而当哈里曼创立W. A. Harriman & Company的时候，他得到了“骷髅会”成员培西·洛克菲勒的资助。当乔治·H. W.布什从耶鲁毕业的时候，他去了“骷髅会”成员尼尔·马龙（Neil Mallon）管理的做能源设备的德莱赛工业公司，离开德莱赛后，又从“骷髅会”成员的亲戚和朋友那里融资成立了石油公司。

在沃尔特·艾萨克森和伊凡·托马斯所著的《智者：六个朋友和他们所创造的世界》（ *The Wise Men: 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一书中，他们写道，威廉·哈里曼曾说，耶鲁“骷髅会”给了他意义。“我瞧不起哈佛的‘烤猪’俱乐部。它太自鸣得意。但在‘骷髅会’里，你必须为耶鲁做些什么。”“他经常回到高街的‘墓穴’，有一次甚至哀叹他在巴黎和会谈判越南战争的职责阻碍了他回来聚会。他对‘骷髅会’完完全全地信任，以至于在年度晚宴的交谈中，他会公开谈论国家安全事务。但是他拒绝告诉他的家人任何关于‘骷髅会’的事。”他的妻子曾收到过一封信，发现信上自己的名字是用象形文字写的。哈里曼说：“噢，这是‘骷髅会’寄来的。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呃，我的意思是，我不能告诉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哈里曼提着装满秘密协议的箱子在伦敦和莫斯科间穿梭时，他选择的外交公文箱的数字是“322”。

在耶鲁的几日，我们不断路过“墓穴”。直到快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再次造访它。也许是对耶鲁有了更多的认识，当我站在那幢建筑下时，“骷髅会”已不仅仅是个传奇，而成了一种不易摧毁的容器、刻在石头里被纪念的传统和仪式化的秩序。

第三章
斯坦福大学：硅谷的心脏

梦想家的孵化器

如果你问一个问题：你想要影响什么？在加州理工，你得到的答案也许会是：我想影响物理、数学或者化学。但在斯坦福，最有野心的回答是：我想要影响人类。

海边的亿万富翁



史蒂夫·布兰克，硅谷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创办过8家企业，退休后常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讲授创业课程

开车一个多小时从帕罗奥多（Palo Alto）去帕斯卡德罗（Pascadero），刚好经过加州1号公路，据说这是美国最美的一条公路，可以一直开到洛杉矶。左边是青山峡谷，右边是碧海蓝天，阳光明媚，美得惊人。

史蒂夫·布兰克（Steve Blank）的家就在海边一个巨大的农场里，门口写着：小心有蛇，以及濒危生物。

来斯坦福大学之前，一位正在北京创业的工程系毕业生告诉我，对于想要创业的斯坦福学生来说，史蒂夫·布兰克就像是《星球大战》中的尤达大师。他写的书在硅谷被奉为创业圣经，你一定要去见见他。

“在中国，如果你事业失败了，意味着什么？”刚刚落座，这是布兰克老师问我的第一句话。

“在这里，失败的创业者，意味着有经验。投资者甚至会更青睐他们。”他说。

史蒂夫·布兰克是俄罗斯移民，最近他刚刚知道自己可能跟列宁有亲缘关系。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愿意相信自己在硅谷的多次创业也有一种类似于革命者的气质。从1978年来到硅谷，他一共创办了8家企业，失败过两次。第二次创业失败，一夜之间失去3500万美元。他说，他给母亲打电话：“妈妈，我刚损失了3500万美元。”

他母亲在电话那头惊慌道：“咱们可不能回俄罗斯啊！”

他说：“没关系，我的风险投资人刚刚给了我1200万美元，我现在要重新开始一家新的公司。”

那是他的最后一家公司，结果，两个投资人各自得到了10亿美元的回报。不久，他买下了帕斯卡德罗的这处农场。

“硅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不是在这里出生，这意味着你的父母不在这里，社群不在这里，文化不在这里。它是一个黄金之地，因为你可以重新发明你自己。这里的社交系统、政治系统、金融系统都支持你的再造和冒险。这里的文化允许你失败，而且是有尊严的失败。”

从帕斯卡德罗回帕罗奥多的公路上，会经过一处地势的最高点，从那里可以俯视硅谷的全景：一道狭长的山谷从旧金山湾南端一路由西北向东南绵延到圣何塞。很难想象，50年前，这一片绵延近40英里的山谷里还长满了苹果树和杏树。现在错落其间的，则是全世界最具活力的高科技公司：谷歌、苹果、英特尔、思科（CISCO）、惠普……还有无数正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里孵育着的小公司，正在埋头于实现他们所认为的Big Idea（伟大的想法）。它们90%都会失败，但大浪淘

沙，总会有那么几个公司，有一天突然就爆发了，这个世界的面貌因此又要有点什么变化。

在西方世界，很少有城市或者地区取得这样的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它变成了宇宙的中心。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19世纪的巴黎、20世纪的纽约……这个时代，如果你不曾来过硅谷，总难免有种失落感，仿佛错过了点儿什么，类似于时代脉搏的东西。

黄昏时分，从东部海面而来的雾气弥散在山谷之间，使这块黄金之地笼罩上了一层复杂的况味。但在山谷的心脏地带，依稀可以辨认出斯坦福大学胡佛塔高高的红顶。我想起一位斯坦福教授说的，因为斯坦福大学在这个世纪的特殊地位，无论他去世界上任何一所精英大学，无论对方名声如何显著，都觉得是在拜访省城。

创业精神是斯坦福大学最根本的精神气质

从一排长达一英里的高大棕榈树中驶进来，是一片巨大的椭圆形草地，草地正对面是一组西班牙风情的主四合院，一种明艳的黄色，在阳光下显得明朗活泼，背后是加州粗犷的山脉。

从这个学校正门入口的气势中就很容易看出主人的性格——125年前，加州铁路大王利兰·斯坦福为了缅怀独子（小利兰·斯坦福）的早夭，出资4000万美元（相当于如今的10亿美元）和8180公顷的牧场土地，用于兴建一所“高水平的大学”，以使加州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在这里免费接受教育。

“为培养学生的个人成功和人生的直接有用性，为人类与文明促进公共福利，教授法律规制下的自由，灌输爱以及对于追求生命、自由与幸福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尊重……”这是老斯坦福在1885年写下的校训，乍一听还以为是《独立宣言》——很少有大学会这么直白地把

“个人成功”“有用”“幸福”这种词挂在嘴边，但实用主义态度之下，又有着心怀天下的理想主义气质。

老斯坦福是一个梦想家。1852年，28岁的他在东岸的律师事务所不小心被一把火烧了，于是打起包袱到西部来冒险。他曾经做过共和党领袖、加州州长以及美国参议员，还建造了第一条横跨美国东西的铁路——美国太平洋铁路的西部路段。这段铁路要经过内华达的崇山峻岭，犹他州的无人荒漠，要在人们认为毫无可能的地方打通几十个隧道、架设几十座桥梁，还要通过印第安人的聚居地。

即使以这样的远见和魄力，若能穿越百年，站在胡佛塔俯视他当年创建的大学全景——以文理学院为核心，往西是工学院，往南是环境学院，往东是教育学院、法学院，西北是医学院，东北方向是体育学院——恐怕也会让人感到难以置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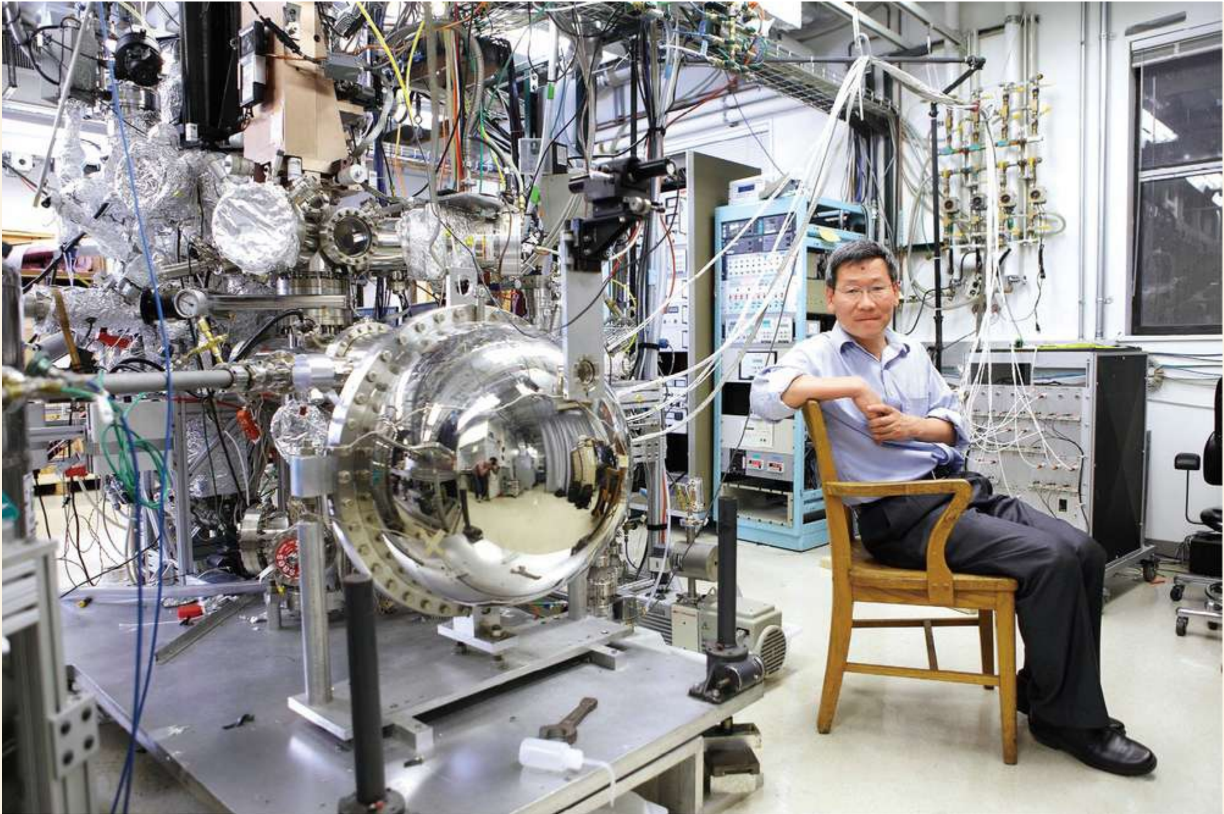
即使在美国，这样全面的院系设置都很罕见。而且，几乎每一个学院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十分强大——工学院在全美排名第一，法学院与耶鲁比肩，商学院的排名仅次于哈佛。很难想象，仅仅在50年前，斯坦福还只是一所普通的地区性大学，绝大部分的学生来自加州，整个大学的年度预算只有160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

当历史学家回望过去，总是能找到一些转折点，或者十字路口，一个人或者组织，做出一个关键的决定，抓住或者没有抓住一个足以影响其未来格局的机会。1951年，斯坦福大学的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决定在校园创办工业园区，将校园的土地租给当时的高科技公司使用，就被认为是这样一个瞬间。这一决定不仅奠定了硅谷的基础，也彻底改变了斯坦福大学的格局，他本人也因此被尊称为“硅谷之父”。

大部分大学都不认同教授经商，认为商业活动有悖于学术精神。但特曼却认为赚钱是好事，他自己在硅谷最早上市的三家科技公司的

董事局里都占有席位。他鼓励教授和学生不仅要在斯坦福进行学术研究，更要将学术成果直接转化为商业产品，以推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惠普的两位创始人）是第一个响应特曼教授号召的，他们借了几百美元，在车库里发明了他们的第一个电子产品——声音振荡器。

50年后，斯坦福迎来了另一位“硅谷教父”——现任校长约翰·亨尼西。2000年他接任校长之职后，学校的创业气氛变得更浓。斯坦福的公共关系部门宣称，有5000家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斯坦福的创意、教职工或者学生。亨尼西本人恐怕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校长。在一次给学生的讲座中，他直言创业精神是斯坦福大学最根本的精神气质。如果大学的知识只是停留在大学的围墙之内，而不能取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就会阻碍研究者创新的动力。斯坦福物理系教授沈志勋告诉我：“很多人以为斯坦福的教授们个个都开公司，赚很多很多钱，这是不对的。在这里，每个教授都在挑战各自学术领域里最前沿的问题，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很自然地出来很多东西，比如专利、技术，然后转化成公司、财富。否则大学与企业有什么区别呢？”



斯坦福大学物理系沈志勋教授，SLAC首席科学家

沈教授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89年来斯坦福大学读博士，之后留校任教，目前是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室温超导。“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叫层展效应（Emergence），就是你把几样简单的东西放在一起，它会突然展现出完全意想不到的复杂现象。比如，你如果把生命的每个元素分开来，是很无聊的，氢、氧……跟水是差不多的。但组合起来，却是这么有意思的生命，有感情，会思考。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出现这么奇妙的现象？”

“这个问题实在太复杂了，超导只是其中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一旦进入原子层面，你会发现，一般的导体里有很多电子在做单独的事情，而在超导里所有的电子都在齐心协力做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以前认为，这种现象只有在极低温下才可能实现，但现在

发现，有可能是在高温下面实现。为什么大自然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我们怎么样来掌握这个规律？以后怎么样用这个规律？”

“在美国，超导是一个战略行业。室温超导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做出来，但一旦做出来，它的影响就是革命性的，不会亚于硅对20世纪的影响。”

“大学就应该做一些超前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可能会变成技术。比如我们在寻找室温超导的过程中发现有一种材料、一种机制，可以在高温下收集太阳能，这样就有可能把现在两种非常不同的太阳能技术结合起来，解决现在太阳能再往前走的一些瓶颈问题。”

当一两个人具备了影响全世界的能力

斯坦福夫妇去世时曾留下遗嘱，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卖地，所以，今天的斯坦福大学在某种程度上仍维持着当初“农场”的原貌。校园横跨6个行政区，49英里公路，4.3万棵树。虽然校园用地日趋紧张，但三分之二的土地仍然保持开放。我们到斯坦福的时候，正处在夏季与秋季之间的假期，偌大的校园更显得空空荡荡。走累了，随处都能遇到一处小树林，在树下的长椅上长长地睡上一觉。

哈佛大学的学生报纸《深红报》（ *The Crimson*）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谈到斯坦福的崛起以及对东部常青藤大学构成的挑战。文中引用了爱德华·费斯克（Edward Fiske）的观察：美国东岸大学是按照英国大学的模型建立起来的——一个封闭的、自成一格的象牙塔，而斯坦福开放式的校园是向外的，它对于科技、工程的崇尚及对传统束缚的拒绝，都反映了典型的美国价值观。从这个角度来说，斯坦福是第一所伟大的美国大学。



斯坦福大学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大学，学生来自世界各地

更确切地说，这是西岸特有的精神气质。加州一直是狂野的西部，梦想家的乐园。来到这里的人，血液里多多少少都有点冒险的基因，无可救药的乐观。

“在这里，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都想着怎么以最小的资源获取对于这个世界最大的影响力。”阙宗仰告诉我，“个人的力量也许很小，但你可以尽量把它放大。雅虎、谷歌、苹果……都是一两个人，但具备了影响全世界的能力。这不仅是斯坦福，也是整个硅谷给人的感觉。”

半年前，28岁的阙宗仰刚刚拿到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就被斯坦福工学院聘为材料系的助理教授。他说自己上周刚和SLAC首席科学家沈志勋、纳米之父保罗（Paul Alivisatos）一起吃晚餐，“我听他们晚餐之间的谈话，他们所谈之事的远见是我所无法想象的。”

比如沈志勋问了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宗仰，20年后，我们要怎么处理大型的计算问题？会不会像谷歌一样都放在云端？是不是所有的基因实验也都在云端计算？"

保罗也问了一个问题："瑞士正在做超级对撞机，寻找希格斯玻色子，那是花费几百亿欧元做的实验。宗仰，你能不能想到一个方法，用1%的成本在旧金山做这个实验？"

阙宗仰的研究方向是大型能源转换与储存。"世界上一共有3种能源：太阳能、化学能、电能。除了核能之外，太阳是唯一能解决地球能源问题的。太阳一天的能量就能供地球用一年，问题在于没办法储存。电池的价格、能量密度太低，支持一辆车也许可以，但一个家庭、一个办公室，甚至一个城市怎么办？"

他们的想法是先把太阳能转化成化学能量，比如氢、甲烷、乙醇、丙烷，可以大规模储存和运输，比如在撒哈拉沙漠把太阳能存成化学能，然后运到芝加哥，或者东京。但就日常使用而言，化学能量还是得转换成电能，所以他们要研发燃料电池，能很高效率地把化学能再变回电能。"我们希望做得比引擎还要小，就像一个黑盒子的发电厂，进来是乙醇，出来是电，里面的运作决定了效率和污染程度。"

"如果你要影响全球规模的能源转换，不能只是一个手机一个手机地解决，而是一个社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转换。所以我们想研究的是大型的能源转换的东西，不是一瓦两瓦，而是兆瓦。"

"我们的研究就是这样：90%的可能是要失败的，但一旦成功，就会有影响全球的能力。"

"如果你问一个问题：你想要影响什么？在加州理工，你得到的答案也许会是：我想影响物理、数学或者化学。但在斯坦福，最有野

心的回答是：我想要影响人类。”

工程师与创业家

工程师对这个世界有一种特殊的关怀，他们喜欢创造一些有用的东西，帮助这个世界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创业者在精神上或许有着某种天然的契合。当一个人谈到他为什么要创业时，背后的动机往往与某个问题有关，一个让他感到不爽的问题，就像身体某处痒痒一样，必须除之而后快。解决这些问题未必是多么巨大的进步，但它的确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工程系学生山田（Alyson Yamada），原为芭蕾舞演员，因腿伤不能再跳舞，转而报考斯坦福大学工学院，并希望发明医疗设备，帮助治疗腿伤，但最终爱上了工程，尤其是设计和制造

在斯坦福，关于一个工程师能做什么，定义一向与别处不同。硅谷最好的高科技公司几乎都是由目光远大的工程师创办的，工学院几乎所有的教学楼上都顶着这么一位工程师的名字：盖茨、保罗·艾伦、比尔·休利特、杨致远、黄俊生……谷歌的算法是在计算机科学系几百米之外的实验室里写出来的；雅虎的第一台服务器就在工学院的教学大厅里摆着。在各种课堂和讲座里，苹果公司的设计师会亲自过来跟他们谈苹果手机的设计，马克·扎克伯格给他们讲当年自己是怎么为脸谱网编程的。英特尔的创始人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思科的前任CEO（首席执行官）约翰·莫格里奇（John Morgridge）都在斯坦福任教多年。就在今年春季，PayPal（贝宝）的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计算机科学系新开了一门创业启蒙课，据说课堂都被挤爆了。所以，在这里，一旦你有一个好的想法，总是被导向“我们能不能开个公司，做点有用的东西出来？”

校园西边的沙山路（Sandhill Road）是风险投资资本扎堆的地方，号称西部华尔街，吸收了全世界28%的风险资本。作为斯坦福的学生，在大学两英里以内，随时可以找到风险投资公司为你服务。

“传统资本只看中有既定盈利模式的生意，而风险资本更愿意走向未经证明的新想法。”在商学院富丽堂皇的大食堂门口，我约了风险资本家兼商学院教授彼得·温德尔（Peter Wendell）喝下午茶。他是美国席拉创投公司（Sierra Ventures）的创始人，这家公司成功投资过200多家公司，投资额超过15亿美元。他在斯坦福商学院兼职讲授“企业家精神与风险资本”已经有21年了。与他一起讲课的还有谷歌的主席埃里克·施密特与谷歌前市场沟通部总监雷蒙德·纳斯尔。他们有70个学生，每两三个人组成一组，每一组都有一个硅谷的风险投资人做顾问。大部分学生是冲着创业来的，他们想知道怎么从风险投资那里拿到钱。

“如果有人想从外面带一个想法来硅谷，找这里的工程师帮他们实现，是挺可笑的想法。”电子工程系的研究生宋煌告诉我，“投资人首先看重的，一定是你这个团队实现技术的能力。而且，斯坦福的工程师多多少少都有点创业头脑。”

工学院的现任院长詹姆斯·普拉默（James Plummer）曾经提出，斯坦福要培养“T型工程师”。所谓“T型工程师”，是指在深厚的工程与技术知识的根基之上，再加上一系列对学生们未来事业可能至关重要的“软技能”——创新、创造力、创业精神。



在大学路附近的一家创业公司孵化器内，一个年轻的团队正在创业中

1998年，斯坦福技术风险课程（Stanford Technology Venture Program，STVP）的设立就是为了培养这样的“软技能”。创始人是一位叫汤姆·拜尔（Tom Byer）的教授，他在硅谷闯荡多年后回到学校任教，用自己多年的创业经验设计了一套课程。他的信念是，一个工学院的学生，无论将来要自己创业，还是在公司里打工，都需要具备

一种批判性思考、商业分析和建立团队的技巧，以应对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身份转换。斯坦福技术风险课程后来逐渐发展成整个大学的创业中心，每年招收1000多名学生。

斯坦福技术风险课程的主管蒂娜·西利格（Tina Seelig）女士说自己曾给学生们出过一道题目：如何用5美元赚到最多的钱？而她的学生们想出的最有创意的一种解决方案是，把自己的课堂演示时间卖给一家硅谷公司，这家公司用这段时间来招聘。他们甚至没花掉5美元。

西利格女士身材高大，精力旺盛，说话时有一种硅谷成功人士典型的意气风发，“我所做的，就是给学生们问题。让他们从一个非常小的问题开始，然后慢慢变大，直到他们能自如地面对这些问题，并从各种可能的角度来审视它们。我希望他们明白，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机会，问题越大，机会越多，这就是创业者最本质的思维方式。”

赚钱，还是改变世界

“如果你告诉很多人，你有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想法，大部分人会告诉你，这是个坏主意。大部分时候，他们是对的。因为大部分你认为能改变世界的想法，并不会真的改变世界，理由有很多。但有时候，它们的确会改变世界。所以，如果你真的想鼓励人们做一些能改变世界的事情，你怎么做？”在斯坦福工学院的盖茨楼采访电子工程系的系主任马克·赫洛维茨时，他突然冒出这样一个问题。

赫洛维茨教授连长相都有点像比尔·盖茨，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纵使再天才自负，仍掩饰不住技术宅男式的腼腆。

“你要做的是，告诉他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去找一些相信你的人，你们能找到钱，那就去试试吧。这中间并没有什么很深的哲学，只不过是一种理解，理解技术很重要，理解激情很重要，还有宽容失

败的意愿。就算失败，也没有关系。”



李萌

刚到帕罗奥多那天，李萌带着我们去逛大学路。大学路是帕罗奥多的市中心，这条路直接通往斯坦福大学，也是整个硅谷的发射台。中午时分，顶着金光灿灿的加州阳光穿越这条街，几乎每一家咖啡馆都人满为患，人字拖、牛仔裤、套头衫在这里都是公认合乎时宜的穿着。李萌一路详加指点，这个咖啡馆里可以遇到拉里·佩奇，那个咖啡馆是彼得·蒂尔的最爱……

据说美国最有野心的年轻人通常会去4个城市：纽约、华盛顿、洛杉矶、帕罗奥多。在金融危机的泥潭中，前三个城市仿佛气数已尽，只有帕罗奥多这个小镇仍然吸引着那些怀揣远大梦想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创业是获得金钱与自由，也是改变世界最理所当然的一种方式。

李萌就是从纽约来到帕罗奥多寻梦的设计师。她正在开发一个能捕捉虚拟空间记忆的手机APP（应用程序）。她说，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虚拟空间，应该有一种工具能帮助人们把这些空间里的重要记忆捕捉下来。

在她的引荐下，我们还认识了马特和亚历克斯，一个是斯坦福设计系的毕业生，一个是MIT（麻省理工学院）工程系的毕业生，简直是黄金组合。他们一个住在旧金山，一个住在山景城，每天在中间的帕

罗奥多会合。他们的小公司正在大学路附近一个叫Dogpatch Lab的孵化器里孵化。这个孵化器虽小，但曾经走出过Instagram（一款用于图片分享的移动应用）。Instagram的创始人也是两位斯坦福的毕业生，一个好点子在一两年甚至几个月里就造就一家数十亿美元的大公司，这种故事在这条街道上没少发生。

与他们的学长一样，马特和亚历克斯也在设计手机APP，叫Simpleprint（简印），能将手机里的照片快速制作成相册。马特曾经在养老院里做过义工，他觉得这样的工具能够帮助老人维系与子孙辈的情感。

凌乱的工作桌上摆着他们的创业圣经——《精益创业：新创企业的成长思维》，作者叫埃里克·莱斯（Eric Ries），是史蒂夫·布兰克的学生。据说书中介绍的是美国硅谷最新流行的一种创业方法：迅速发布一款产品，不断测试用户的反应，并不断调整。对马特来说，这与他在斯坦福D.school（设计学院）学到的基本原则不谋而合：找到需求，然后快速做出原型（prototyping），不断调整，不断从错误中学习，非常有实验性。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没有人提到钱的问题，仿佛在这个新时代的淘金之地，金钱反而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元素。



Instagram的两位创始人都是斯坦福的毕业生，他们公司的价值在两年内从0增加到10亿美元

“在硅谷，赚钱与改变世界之间有一条非常微妙的界限。”斯坦福商学院的一位校友克里斯·拉森（Chris Larsen）告诉我：“你不能在任何一端走得太远。离钱太远，你得不到最好的投资人、最好的工程师，他们都想知道自己的股票能值多少钱；向赚钱靠得太近，你失去激荡人心的魅力。比如你参加一个派对，有人问你在做什么？你说我想赚很多钱，对话就此结束。但是，硅谷好的一面是，一旦有了钱的动机做基础，你就不必太管它了，可以全身心投入‘改变世界’的那部分。因为你有一种信任感，只要你真的做一些很革命性的事情，钱一定就在那里，而且多到你无法想象。不像在纽约，钱、市场、合约是你唯一考虑的问题。”

克里斯·拉森是Eloan与Prosper.com（两家金融科技公司）的创始人。这两个公司都是直接针对银行系统的：Eloan消灭了贷款中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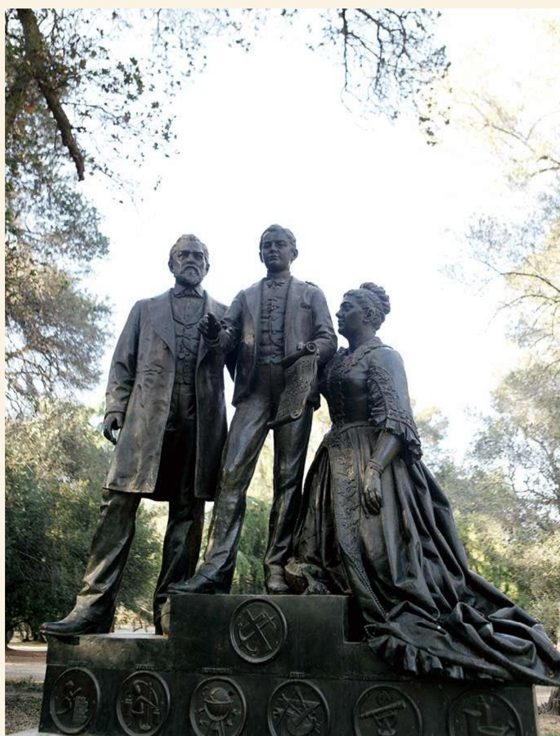
人，使贷款交易的过程透明化，你能在网上看到一切交易过程，明码标价。Prosper则更超前一点：钱不再来自银行，而是直接来自个人。

“我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被银行绑架了。我想通过技术改变银行和华尔街。但不能直接攻击，因为他们太强大了，但有了技术作为核心，我们就可以绕道而行，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

我问他，创业的乐趣到底是什么？

他说：“就像做一个美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创业是美国人的理想，你创造就业，改变经济，给你的投资人赚很多钱，是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

悲伤天使



在旅程的最后一天，我们去了悲伤天使的雕像，那是小利兰·斯坦福最初安葬的地方。这所大学最初的建立是因为一个15岁男孩的早夭，父母不希望他的死亡如此空虚，如此无意义——也许这种悼念的特质至今仍存留在这所大学的潜意识里。

悲伤天使静静地跪在一片小树林里，低头哭泣，十指纤长。夕阳西下，四周非常安静，只有一个老妇人在不远处画画。

斯坦福一家的雕塑，旁边就是他们的墓冢

“父亲，别说没有什么值得你为它活着的。有很多事情值得你活着。为人类活着吧。”

按照校史的记载，这是当时老斯坦福在梦中听到病重的儿子告诉他的话，醒来时发现他已死去。我很怀疑这段历史的真实性，但无论真假，对这所名为斯坦福的大学来说，似乎都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从工程师到企业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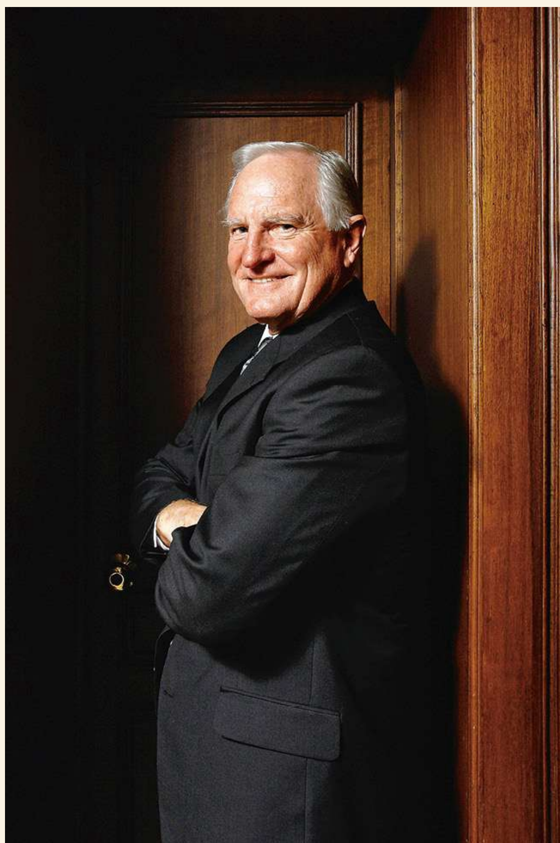
克雷格·巴雷特，出生于旧金山，1957级斯坦福毕业生，本科，读博，做博士后，留斯坦福任教，出色的材料工程科学家。如果不是1973年的一次机缘和一个决定，克雷格·巴雷特（Craig Barrett）也许可以在美丽的斯坦福校园怡然终老。但命运将他卷入一个日后将变得伟大的企业——英特尔，与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和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等硅谷巨人共事余生。

——专访英特尔前总裁、董事会主席克雷格·巴雷特

斯坦福：崛起前夜

与我谈话的这天早晨，巴雷特刚刚去领了捕猎用的射箭执照。他在蒙大拿有一片很广阔的牧场，333英亩。他热爱徒步、狩猎和钓鱼，小时候曾梦想当个护林员，现在终于当上了牛仔。人们慕名而来，以每小时350美元的价格，在他的牧场住上3天，跟“英特尔先生”一起钓鱼、骑马、共进晚餐，钱都捐给自然保护基金。他对我说：“过几

天我会去草原上实战一下，在大风中寻鹿。”他最自豪的往事是驾驶两人座的F-16战斗机，以及从犹他州骑车到墨西哥。



克雷格·巴雷特

不过，斯坦福时代的巴雷特可没有这么飞扬。问他，当年大学校园里他最喜欢的地方和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哪儿？他哈哈大笑说：“我想应该是材料与工程学院的那个实验室，在那里花的时间，比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多。那时我是个学生，得靠研究助教这份工作养活自己。”那时的他也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就是工作，工作之余打打沙滩排球。我猜想青春时代的巴雷特，大概生活三点一线，有点书卷气，中规中矩，沉浸在科研里。他曾发表了40篇有关微观结构对材料特征影响的论文，在学术上很出色。

那时的斯坦福，是个较为纯粹的大学。“硅谷”刚刚才开始孕育，直到1971年，才正式出现了“硅谷”这个名词。当时只有少量的几个小公司，就连惠普和Varian（瓦里安）也还不大，学校与外面的世界还有一堵无形的墙，保持着象牙塔的清静。巴雷特说，对他影响最深的人是他的两位博士生导师，威廉姆·尼克斯（William Nix）和奥列格·舍碧（Oleg Sherby），两位老教授现在都已退休。“大学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他们紧密的合作中度过的。他们教会我理解如何推进一个研究项目——提出好的问题，搜集准确的信息，提出假设，并小心地加以验证。”今天，斯坦福的许多教授都与企业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往往是某个公司的顾问或董事会成员，拿公司股份。学问之外，他们能给学生提供很多人脉资源。“但我那个时候还不是

这么回事。”巴雷特说，尼克斯和舍碧教授都把40多年的岁月贡献给了材料机械属性的研究和讲学，实验室就是他们的天地。20世纪60年代的斯坦福，一个教授所能给予学生的最珍贵的影响，就是严格的学术训练。斯坦福岁月给巴雷特留下的最深刻的烙印，就是成长为一名材料工程师。直到今天，“工程师”仍是他最引以为自豪的身份。

斯坦福大学与企业的联姻在那时已初露端倪。美国海军和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湾区的存在，产生了一定数量的科技公司和航空航天企业。“我想，‘冷战’和‘星际争霸’是对斯坦福产生了影响。那时，人们对军事成就兴趣浓厚。基础研究不仅对私有部门和经济繁荣发挥作用，而且也在军事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那时候，斯坦福大学的很多研究不是军方资助的，而是政府的其他部门，比如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当然也有一些国防部的项目，但主要的那些研究也不是直接导向军事和国防的，而是为了从广义上理解基础科学的趋势。”巴雷特说。

围绕斯坦福，存在着两股力量。“当时，斯坦福大学与研究所——那时叫‘斯坦福研究院’——的关系就已经很密切，研究院附属于斯坦福大学。那时候，研究院进行了很多政府秘密级别的研究，特别是军事研究。我想，这在当时，比学校与工业的联姻显得更为突出。那时候，在校学生有很多反对政府秘密研究的抗议游行，但没有人反对过与工业相连的研究。工业研究被视为是好的，非秘密的政府研究也没人反对。把秘密的政府研究驱赶出校园，只留下与工业研究相关的东西，是大势所趋。最后的结果是，‘斯坦福研究院’从斯坦福大学独立了出去，跟大学不再有关。”

斯坦福选择了它的历史方向：没有秘密军事研究，它的路径是开放式的。后来人们会问，为什么是斯坦福孕育了硅谷，而不是离它不过一小时车程的加州伯克利大学？伯克利的历史更久远，诺贝尔奖得主比斯坦福更多。在《硅谷的秘密历史》一书中，史蒂夫·布兰克

（Steve Blank）的说法是："二战"期间，斯坦福和伯克利都是美军的秘密武器实验室。但关键的区别是，斯坦福负责研发的是导弹和监视卫星，而伯克利是核武器。所以，斯坦福可以鼓励教授和学生走出去，自己创办公司，而伯克利只能处于一种封闭状态。不过，巴雷特不这么看。他觉得，斯坦福和伯克利都是硅谷的母体。他的亲密合作伙伴、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和安迪·格鲁夫就都毕业于伯克利。

这条道路与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特尔曼（Fred Terman）在20世纪30年代所开创的道路形成合力。特尔曼目睹自己最优秀的学生毕业后在当地找不到工作，不得不纷纷去东海岸就业，就鼓励学生自创公司。在纽约通用电气公司任职的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和在麻省理工继续深造的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在老师的感召下回到斯坦福，创立了民用高科技公司——惠普，这是硅谷的薪火。斯坦福校园的一大片空地被用来以很低的租金租给一些小的科技公司。这些公司当时还不为人知，但日后却成为重要的技术和企业诞生地，其中包括肖克利实验室的"八叛逆"创建的仙童半导体公司。

对年轻的巴雷特来说，那是个振奋人心的时代。当时，从仙童半导体的母体内诞生出很多创新型的半导体公司，其中包括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于1968年创建的英特尔。巴雷特的内心于是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他告诉我："半导体业在硅谷才刚开始起步，恰好，我所做的材料科学的研究，对于硅的制造非常重要。那时我给硅谷的一些半导体公司做顾问，包括仙童半导体，我当时开始想，我所掌握的技能，应该能对这个初生的行业非常有用。何况，我自身开始对更加注重应用性的研究越来越感兴趣，而不仅仅满足于做基础性研究。半导体这一行非常有趣；人们当时都有一种心态，就是要把实验室里研究出来的工程原型，尽快地转化成市场中的产品，从想法变成产品的周期非常短，这很吸引我。相比基础性研究，你大概得在实验室里待

上十余年，兴许才能出点结果，然后能给市场提供点产品，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巴雷特决定加入摩尔与诺伊斯的团队。开始，他只打算暂别斯坦福，离职一年，保留教职。1974年，他短暂地回到斯坦福。“我的教职只能保留一年，我没有太想清楚是否还要这个教职，还不能最终决定，所以回来了。但我很快发现，我的心思都留在了英特尔做的那些事情上，这比我在斯坦福做的事情有意思多了。我很快决定，回英特尔。那边的工作是全职的，不能兼做教授，所以我永久性地辞掉了在斯坦福的教职。”



斯坦福Cecil H. Green（塞西尔·H.格林）图书馆的一个阅览室

当外面的世界变得更精彩，吸引着巴雷特走出校园之墙的时候，斯坦福大学已经准备好崛起成为一个世界一流大学了。

从工程师到企业家

巴雷特也许未曾料到，他会在英特尔待35年，他更未料到，英特尔会如此幸运地成为巨头。他说：“1974年，我加入英特尔，它一年的收入才4000万美元，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当我2009年离开的时候，它每天的收入就已经是1.4亿美元了。在硅谷，每天都有上千个启动项目，每年有无数个小公司建立起来，但一个小公司能在几十年里成长为如此规模巨大的公司，就像惠普和微软一样，这种概率非常小，这

种运气很少出现。”“1974年，英特尔与当时同时存在的许多小公司并无多大区别，但英特尔幸运地做出了一个个恰巧正确的决定，它变得与众不同，脱颖而出。要成为一个价值四五百亿的大公司，真的很不容易，概率很小很小，从来如此。”在硅谷这样一个充满冒险与不确定性的地方，你最常听到的词除了“风险”“企业家精神”“创业”和“资本”外，就是“运气”了。

很难在当时就知道，什么是“恰巧正确的决定”。就像1965年，当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在《电子学》杂志上发表文章，预言集成电路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数量将每年翻一番（后来又修正为两番）时，集成电路才刚问世7年，当时只能将几十个元器件集成在一块芯片上。摩尔当时的话听起来好像是科幻小说，不断有专家认为，芯片集成的密度已经到顶，摩尔错了。只有后来的事实证明，摩尔的预言是有远见的。1985年，英特尔放弃了记忆性芯片生产，把赌注全部押在微处理器上，把公司原本多样化的芯片生产模式改造成单一性生产个人电脑的芯片。当安迪·格鲁夫做出这样非凡的决定时，很少有人敢判断说，这是“正确的”。

巴雷特说：“能成为三位绅士团队中的一员，与他们紧密合作大约30年，是我莫大的荣幸。鲍勃是集成电路的发明者之一，摩尔发现了伟大的‘摩尔定律’，而格鲁夫是一位伟大的工程师和管理者，他们每个人都是硅谷半导体业的传奇。我耳濡目染，获益匪浅。”1999年，巴雷特接过格鲁夫的总裁职位。曾有人问他，跻身于这些伟大的前任中有何感觉？他略微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面无表情地说：“我的个子比他们高。”很难想象，他如何与笃信“偏执狂才能生存”又生性多疑的格鲁夫保持了近30年的最亲密关系。仅仅是如此长时间的稳定伙伴关系，在硅谷这个分分合合随时发生的地方也非常罕见。巴雷特并未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对我说：“我们稳定的合作关系的确是一种奢侈，因为英特尔一直在成长，成长得非常稳定，非常强大。作为高管，你仍然能在其中看到足够的成长与上升空间，与公司壮大同

步。英特尔没有因为收购或并购而发生所有权的变化，管理层也没有变动。”

巴雷特说他从未受过任何商业与管理方面的专业训练。我问他，他是如何从一名工程师转变为企业家的？他说：“我必须承认，我学的是工程，教的是工程，最后的工作也是工程师。但我认为，工程的教育和训练，对解决商业和管理上的问题，非常有效。工程学本身，就是一门系统性解决问题的学问。你得学习如何找到问题，学习如何搜寻正确的信息，学习建立假设，然后给出回答，最后检验你的回答到底正不正确。这些工具和技能在商业上非常有用。我相信，工程师所受的训练，对于商业世界来说，同样适用。如果你看看美国前500强企业的CEO名单，你就会发现，他们中间绝大多数都是工程师。”他立刻意识到，他说的这话会被反驳，于是说：“我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得小心才是，因为我太太现在是雷鸟商学院的主席。也许她应该跟你说，MBA是个进入商界的好学科，其实有时我觉得，工程学也是。”事实上，今天的斯坦福大学工程院，已经专门为工程学的学生开设了商学院课程。

1986年，英特尔曾经营惨淡，日立、东芝等日本芯片制造商的效率和质量对英特尔造成沉重打击，英特尔从曾经的支柱产业——存储器制造领域全线撤退。作为工程师的巴雷特受命寻找问题的答案。他向国内芯片制造设备的供应商询问日本公司是如何使用这些设备的，向购买芯片的大主顾们打听他们在日本供货商处参观时的见闻，再到英特尔公司自己的日本合作伙伴那里做调查，研究每一条有关竞争者如何设计和管理他们业务的公开的和学术上的信息。最后，他回到公司，从头到尾革新了英特尔公司的制造流程，并设计了一种能在所有下属工厂快速推广新制造技术的办法。巴雷特认为，这是他工程师的思维和工作方法发挥了作用。在他接手英特尔时，微处理器性能的提高再也不是推动计算机产品推陈出新的决定力量，而是微处理器价格的下降，英特尔感受到了来自超威半导体公司（AMD）和国民半导体公

司的竞争压力。巴雷特于是再次以工程师的方式解决问题——他宣布，英特尔的资本投入将放慢，他将致力于提高英特尔已有工厂的生产能力和效率，同时开拓新的业务，比如影像处理和网络设备领域。

作为工程师，巴雷特对技术发展的趋势有很深刻的理解，他认为，这是一个高科技企业决策的基础。我问他，为硅谷发展奠基的重大技术进步是不是都已成型，剩下的就是创造性应用和小修小补的完善了？他说："你有些夸张了，还有太多的基础学科需要进展下去。就以晶体管的历史为例吧，从它诞生到现在，五六十年了，其间仍然不断有重大的发现。我们今天所造的晶体管，10年前还从未出现，而我们现在一天就能造出万亿个来。再看看通信，人类从有线通信到了无线通信，再到光纤和卫星，始终有巨大的科技进步在发生，而且也将继续发生。硅谷现在有了新的社交网络的发明，比如脸谱网和推特。它们之所以能被创造出来，是因为我们有摩尔法则，有通信技术的盛宴，还有能够大量存储的芯片。脸谱网是站在前人基础发明之上的——晶体管、玻璃纤维、记忆存储等等。我相信，互联网、数据服务、社交网络、电子成像、电子内容创造，都将继续取得重大进展。你再看看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与重大难题，有多少都与电脑更大更强的计算能力、通信能力和存储能力有关？""我想，跨学科的融合是大势所趋，比如，工程与生物学的结合——计算机参与到DNA分析中，参与到药物试验的模拟中。把过去那些互不干涉的基础技术，跨领域地结合起来，硅谷又将迈出重大的步伐。"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巴雷特执掌英特尔时的战略目标很明确：英特尔的疆域将超越个人电脑处理器领域，要用芯片优势将世界范围内所有的电子产品囊括其中，包括计算机网络、通信和消费电子产品。

新生代

巴雷特感到，今天的斯坦福与硅谷的性质在发生改变。他觉得，革命性的改变力量是风险投资行业的成长。“20世纪60年代，风险投资才刚起步。英特尔初创时，能够拿到的资金是非常有限的。随着风投行业的成长，硅谷有越来越多的启动项目，越来越多的资本，越来越多的创业活动。今天的硅谷，与40年前确有不同，钱的供应，一下子宽松了。”在巴雷特看来，“硅谷最独特的企业家活动受到几个因素的推动：从事出色研究的斯坦福大学，聪明绝顶的学生和教授，催生企业的伟大想法，以及不可或缺的风险投资资本。”

工程师和技术精英也不再是创业的唯一群体了。巴雷特也看到，“有一批基于现有技术应用的创业者，比如，谷歌和脸谱网。他们不再是以革命性的技术创造来推动变革，而是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交方式”。正因为如此，巴雷特在任期间，也在改变英特尔引以为傲的“工程师导向”的文化，而越来越以消费为导向。巴雷特多次公开表示，如今英特尔正在生产创造客户需求的产品，而不再是那些满足需求的产品。

巴雷特认为，1995年至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崩溃，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硅谷最根本的禀赋——冒险的热情，创业的精神和有活力的资本。“经济危机只是暂时减缓了投资的速度和创业的速度，但几年之后，它又很快恢复过来。”巴雷特恰好受命于危机中。2001年，在芯片产业有史以来最漫长的衰退中，他力排众议，在研发和制造方面投资了280亿美元。他看好硅谷的活力，相信危机终会过去。

而斯坦福大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果巴雷特是今天斯坦福的一名年轻教授，也许，他不必再辞去斯坦福的教职，也能去英特尔创业。风险与工业资本慷慨地反哺着斯坦福大学的每一个实验室。在能源环境学院的一个实验室里，气候与能源项目的主管萨利·本森告诉我，她的项目有1.2亿美元的基金，分别来自通用电气、埃克森石油、杜邦、丰田这样的大型企业。他们从事的是最基础的科学研究，要解

决的是最复杂的环境与气候问题，包括新材料的发明、二氧化碳的捕获等。但是，在项目进程中，由于与工业资本的密切联系，随时产生的应用性成果都能迅速获得新的项目资金，成立新公司。他们现在有一位做机械研究的博士生和一位从事透明导体电子研究的学生，已经获得了风险投资。“在别的学校，你做研究，然后在一本研究期刊上发表文章，然后可能有公司会看到，来找到你，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在斯坦福，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得更快。”

英特尔也在斯坦福实现着巴雷特所说的工程与生物学结合的跨学科研究。翻一翻斯坦福新闻，就会一目了然：“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与英特尔在常用于计算机微处理器的硅芯片上直接合成了疾病相关的高通量多肽阵列，这一新技术有强大的应用潜力”；“英特尔与斯坦福大学近日宣布了英特尔的第二个博爱对等程序——斯坦福阿尔茨海默病和淀粉样蛋白病研究程序，这种技术与超型计算机执行的运算相似”；“英特尔与斯坦福大学用点对点技术研究老年性痴呆与蛋白质病变研究计划。简单地说，点对点技术可以充分利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个人电脑使用者的未利用空间，集结起来成为一个虚拟超级电脑，用来加速各种疾病的研究，让新药可以快速开发与上市”。

斯坦福与硅谷的未来，仍然充满着想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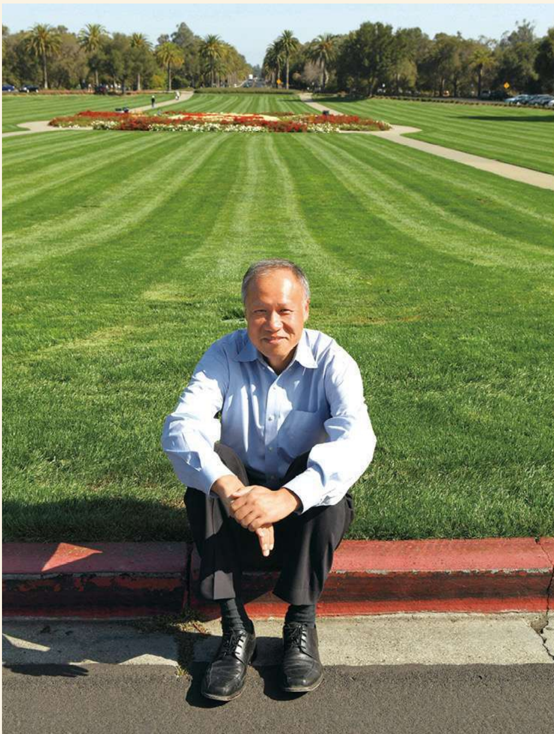
（特别感谢何铮鸣与芭芭拉·克雷格夫人的帮助。）

谢青：斯坦福与硅谷岁月

在帕罗阿托高尔夫俱乐部大厅的沙发上等谢青（Ken Xie）时，我翻了翻大理石茶几上的花名册。每个会员都有一张很正式的夫妻合影或全家福，露着优裕生活所滋养的自然优雅的笑容。

硅谷许多有成就者的相片陈列于此，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其中有思科总裁兼CEO约翰·钱伯斯，第一位硅谷的华人企业家李信麟，谢青的照片在倒数第三页，同一页上还有过去思科的技术奇才、后来去了瞻博网络（Juniper Networks）的吴宗宪（Woo Hsien Chung），以网购比价和搜索引擎成名于硅谷的美籍韩裔企业家梁民正（Michael Young）。

从清华园到斯坦福



谢青

谢青准时出现。他身高1.95米，西裤就像被扯长过似的。他年少时在北京的什刹海体校打过排球，打到18岁，才奉父母之命，告别体坛，进清华无线电系学习。但篮球他一直还打，后来结识对他职业生涯来说极为重要的合作伙伴——邓锋与柯严，现在名气极盛的“北极光风投”的创始人，就在硅谷的篮球场上。

谢青49岁，极为谦逊，有工程师的稳重，丝毫看不出来他的野心。他在全球网络安全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他参与创立的第二个公司NetScreen（一家致力于发展新型的与网络安全有关的高科技产品的公司），2004年被网络设备制造巨头瞻博网络以40多亿美元巨资收购，那是大陆工程师硅谷创业光辉岁月的巅峰。今天国内许多网络安全公司的创始人，当年都曾在NetScreen工作过。作为股东，谢青在40岁时已身家过亿。他的第三个公司Fortinet（飞塔），2009年在纳斯

达克上市，市值30多亿美元。谢青并不觉得自己爱冒险，他觉得“但凡背井离乡、只身来到美国的移民，身上必有一股子劲儿，天生有点儿冒险基因”。1992年至1997年是中国留学生在硅谷的第一波创业潮，谢青觉得，“硅谷对外来人很宽容、很开放，哪怕你英文说得不是那么溜，也不是问题。”

谢青父母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他说自己“头20多年的日子在清华转，后20多年绕着斯坦福转”。清华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很难抹掉。他的几次创业伙伴，绝大多数是清华出来的斯坦福校友。他一度因另立门户，与同班同学邓锋形同陌路，两人现在都是业内大佬。谢青说：“友情和工作关系还是分得开，现在，大家能聚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就聚聚，聚不到一起也就算了。”另一个印记是，他已坐拥丰厚资产，但“直到现在，家人还是劝我有空时去斯坦福拿个博士学位”。拿学位，学而优则仕，对中国学子来说，是一条被赋予期待的寻常路。当年，谢青没去申请的美国中部某校读书，直接到了硅谷。他的清华导师在斯坦福访学期间，受到那里创业氛围的鼓舞，开了公司，他去帮忙。后来上了斯坦福，做第一个公司，没修完学分又二次创业。他对此既有些耿耿于怀，又颇感与众不同：“大概加州这儿的中国人，极少有人是没读完学位就辍学的吧？”

谢青认为，这恰是斯坦福的独特之处。“它的传统，不是你得学多么好，几年拿个学位，而是你有能力把一个好的想法变成一份实业。”“互联网创业最好的年龄其实就是大学时代，接触的东西很多，却还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你想得越开，创造的东西就越好。一旦进了公司，做得很专，反而失去了创造性。微软、戴尔、思科、雅虎、谷歌、脸谱网，无一不是学生时代创下的。”但同时，“斯坦福又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学业优秀是你能力的证明，证明自己的能力，才有人愿意与你合作”。斯坦福“本科不分专业，同学之间随机组合，交友广泛，跨学科交流，且不限制毕业时间，鼓励你干点别的”。相比之下，“清华把这几年管得太死”。谢青在斯坦福讲一门

关于云计算与安全的课，“邀请上市公司的CEO给学生授课，这是斯坦福的传统。清华和北大也应该这么做”。

在高尔夫俱乐部餐厅落座，我问他是不是刚才有应酬。他说，不，他来这儿只是运动健身的。他一周只有两到三个商务午餐，晚上基本无应酬，周末更是陪家人的时间。国内老板很多饭局和应酬，“大概要吃很多次饭，打很多场高尔夫，彼此才能建立起信任，才敢投钱。要不然，钱被人卷跑了怎么办？”而在硅谷，不需要太多人际关系的智慧，只一杯咖啡，一个好点子，“投资人就敢直接往你账户里打钱”。谢青对信用社会有切身的感悟。“美国人从小就知道，撒谎的成本极高，代价极大。在学校里，老师如果规定作业要自己完成，结果发现你和同学互抄了，不良的信用记录会跟随你很久”。谢青说，在斯坦福，与人相处很简单，“身份”是个没人在意的话题。如果你做出个好东西，“大公司不会想着自己也轻而易举地弄一个出来，而是会以高价来购买你的创造”。在斯坦福，想法总能待价而沽，实现它的价值。

我不禁想到，走在斯坦福大学外的小街上看到的情形：路两旁一个接一个的咖啡馆全都敞开着大门和窗户，座无虚席。我们在马克·扎克伯格成名前常来的“大学咖啡馆”坐下。一位正在创业的年轻人告诉我，这儿你随处都能看到，一两个年轻人正在向一个年长的投资人“喷”他们的点子。我能感受到，这些休闲的夏日装和自在的年轻表情下，散发着激情的温度。那种无拘束的放松状态，能让想象力尽情驰骋。

光荣与梦想

谢青在校期间做的第一个公司，4年，没成大器，组织松散，风险投资也没看上，“但解决了房子和安家问题”。而且，硅谷是个“对

失败很宽容的地方，风险投资最看中人的能力，觉得你有过失败，就有更好的经验，反而会投钱给你”。这次创业，谢青发现，软件防火墙存在致命缺陷。“用软件做，做不快，它永远受两个条件的限定，第一是PC机（个人电脑）的性能，第二是操作系统的限制。”他想用硬件来做防火墙，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想法。但谢青说，当时就是想实现财务独立而已。初期没资金进来，三个创始人每人出资5万美元，后来有了第一笔台湾人的天使投资，100万美元。半年后，第一笔风险投资——红点资本的350万美元也进来了，到后来大约总共6000万美元的投资。不久，公司有了第一个顾客，叫VSMedia，是个色情网站。

斯坦福和硅谷的人有一种不安分的野心，出类拔萃之辈很少会想，在一个大公司往上爬，然后终老。创业是种使命的召唤。初创NetScreen，邓锋和柯严分别从英特尔和思科辞职；NetScreen被瞻博网络收购不久，他俩再次辞职，出来创建风险投资。从NetScreen走出了一代创业工程师：Palo Alto Networks（一家网络安全公司）的毛宇明、艾诺微科技（Aerohive）的刘长明、杰华科技（Sigma Resources）的谭廷、山石网科（Hillstone）的童健，还有Weaver Mobile（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等等。创业型企业会把它的创业基因植入它的员工体内，无穷地遗传繁殖下去。谢青的公司有十来个斯坦福毕业的雇员，“但都是做法律方面的，工程院毕业生很少不自己去创业，在公司待不住”。谢青曾在1999年离开了NetScreen，那天，CEO罗伯特·托马斯铁青着脸，陪他收拾好个人物品；员工们有些突然地收到邮件，说谢青已经离开。

面对谢青，我不禁想，他谦和的外表下，到底有多大的抱负？人们爱用鸭子来形容斯坦福的学生，那平静的水面下，鸭掌在不停地奋力划水。遥想1999年，初具雏形的NetScreen引入巨额风投，强势资本要行使对公司的掌控权。谢青轻描淡写地说：“当时风险投资任命擅常销售的CEO罗伯特，关心的是华尔街资本的短期利润，不愿投钱做长期研发，所以和我有矛盾。他们想把公司卖掉。所以我想去做另一个

公司，想实现很多想法，而不是卖掉它。第三个公司的天使投资人还是原来那些。”直到今天，他虽已是若干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人，却仍对财大气粗的风险资本投资人咄咄逼人的控制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抗，“风险投资追逐的是短期利益，随时可以变现走掉的”。他现在还是100多个公司的天使投资人，他对“天使”这个词明显有更多好感。“投资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天使投资人拿的是自己做生意的钱给你，钱有温度、有耐心、有远见，作为策略投资人，还会介绍很多关系给你，对我的销售渠道和市场帮助很大。风险投资拿的是别人的钱，急功近利，想的就是套现。”第三个公司拿到了100个天使投资人1亿多美元的投资，没有风险投资再一家独大，耀武扬威了。

谢青显然是憋着一口气离开NetScreen的。他做了些投资，没成功；再战，重新创办Fortinet（飞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年终于磨成一剑。2009年11月，谢青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敲响Fortinet上市的钟声，他由此被写入历史。金融风暴后的21个月里，Fortinet是硅谷上市的第一家公司。也许有件轶事，可以佐证他离开NetScreen再次创业的心态。那一年，有一天，斯坦福毕业的金海平找到他，跟他谈一个想法。金海平在斯坦福读书时就梦想，要做基于手机的个人定位服务，也就是手机上的导航软件。他和谢青一起吃了午饭。谢青鼓励他说：“憋不住了，就跳出来干，别总犹豫。”据说，这句话决定性地促成了金海平离开劳伦斯公司，同年在硅谷Sunnyvale（森尼韦尔）成立TeleNav（泰为）。记得一位曾在甲骨文、微软和通用公司工作过的印度高管曾说过：在别的地方，你很有才，大公司会给你份工作，想方设法把你留住，免得你自立门户。但在硅谷，你有很才，公司的人会对你说：“哪天你若自立门户，能带我一起干吗？”世界上大概只有硅谷这个地方，“人们都坚信，伟大的想法必会产生伟大的价值”。

谢青指向俱乐部餐厅落地窗外的景色，缓缓起伏的山丘上撒落着密密匝匝的红瓦房。“从地理上说，硅谷就是圣鲁克兹山脉和旧金山

湾所夹的这片谷地。”这小小地带聚集了全美40%的风险投资资本，高强密度下，资本相互挤压、碰撞、变热，像喷吐的蒸汽一样有活力。平均每个月，硅谷上空都游荡着7亿美元的资本幽灵，在寻找机会与聪明绝顶的头脑相结合。资本聚集的原因，有一种解释是，风投有个“20分钟法则”，即所投公司距风险投资办公室车程不超过20分钟，这样才能随时开碰头会。谢青说：“新开的公司能拿到风险投资的比例大概是一半，而其中大部分风险投资是不赚钱的，能做到上市的概率更小，只有1%或者2%，但这1%到2%的回报率极高，足以让风险投资赚钱。”由于硅谷资本密度惊人，概率似乎都被巨大的磁场所扭曲，传奇频频发生，资本的冒险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在此相得益彰。很大程度上，创新资本塑造了斯坦福与硅谷人的气质，也塑造了谢青。

此岸，彼岸

2012年，谢青是“华源会”的会长。这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大陆企业家和工程师协会，很多熟悉的名字曾与它相连：陈宏、邓锋、邵亦波、李彦宏、朱敏、张朝阳、丁磊、杨元庆、吴鹰、杨致远，等等。如果没有意外，“李彦宏、李东升和吴鹰会来主讲”。20世纪90年代，华人圈里都是“我们坐台下，听台湾人和香港人讲话”，“美国资本最初也看不上我们”，要组织起来，相互帮忙，才更有力量。

20年前，那代留学生在硅谷创业，10年前，他们有很多人归国投资。时代在变。硅谷最牛的风险投资——红杉资本，也来北京开设了办公室。根据“20分钟法则”，如果你想找投资，又不在硅谷，那就来北京，而不是去波士顿。但那批归国时年近40岁的中年人，青春岁月所接受的精神洗礼和思维准则，却无时无刻不与现实发生着冲突。斯坦福校友、大器晚成的著名投资人朱敏就曾感慨：“中国的土地种美国的庄稼，也能种出来，但是累啊。”邓锋也曾感慨，为重新学习商业文化，他交了高昂的学费。当时Instagram以10亿美元的价格被脸

谱网收购，他对外界说：“这要在中国，估计卖1000万美元就不错了。因为中国互联网大佬可能就说：我就这么多钱，你要不卖，我整死你。”在一次华源会晚宴上，在美国生活了将近30年的思科安全技术总监曾毅敏，与一位从中国飞去参会的客人聊天，后者说到了一个词：“国进民退”。曾毅敏犹豫了一下，歉意地问道：“抱歉，你刚才说的那个词是什么意思？”重新学习商业与政治的边界，熟悉潜规则，明白销售客户比技术更重要，他们有时力不从心。2010年3月，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财务造假问题被曝光，所有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股价全都下来了，中国公司的诚信和契约精神受到了重大质疑。

谢青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回来过。在他的宝马跑车穿过茂密的林荫路下山那段时间里，我问他，他拿的中国和美国的政府合同多不多，他有些感慨。在北美、欧洲和日本，谢青的产品都拿到了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但最终，涉及网络安全，还是会有个身份问题，“美国政府觉得你是华裔办的公司，中国政府又觉得你是美国公司，都不放心。即使我是美国国籍，但政府骨子里对你的那种不信任，很微妙。华裔在美国，政治上的影响力还不够，在加州这边还不及拉美裔。政府合同还是更认白人公司，这就是所谓主流吧。不过，美国80%的订单来自市场，政府订单不大。”“但整个中国市场，只占了我们销售收入的3%。中国市场一大半客户和政府有关，有像启明星辰这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中国市场的竞争对手很多是做软件防火墙的，技术没我们的好，但政府关系我们搞不过，他们有些人自己就是政协委员。”我问谢青，有没有想过像邓锋他们那样把重心移到国内？他说：“我的公司是生存在硅谷文化里的公司，已经美国化了。它有全球性的业务，但它的心脏在硅谷。”

离开帕罗阿托的前一天，谢青开车带我们去斯坦福校园拍照。我们穿过宽阔的棕榈树大道，驶向斯坦福校园的正门。那儿没有校门和牌匾，没有疆界，是一片由建筑师弗里德里克·奥尔姆斯特德设计的开放的四角广场。站在广场上，斯坦福最负盛名的电子工程学院一目

了然。谢青对它再熟悉不过了。正是这个学院，孕育了硅谷的雏形，走出了大批工程师实业家。当年，惠普创始人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就是在他们的工程院院长的鼓励下创业的。



斯坦福夫人为怀念斯坦福先生而建造的纪念教堂。乔布斯的追悼会曾在这里举行

紧邻的，是以斯坦福校友、雅虎创始人杨致远和他的妻子山崎明子命名的能源与环境研究院。问谢青，你也打算捐赠一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楼吗？谢青说，他更关注的是人——一些涉及斯坦福中美学者的交流项目，他都慷慨捐助。他特意带我们去了广场内侧的纪念教堂。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照进19世纪西班牙建筑风格的穹隆，静谧庄重，仿若要在这科技与资本结合最紧密的现代时空里，召唤起对古老精神源头的追思。这个教堂对谢青来说，有特殊的意义。“排队想在这里办婚礼的斯坦福校友特别多，我和我太太等了两年，才最终在这儿成婚。”他比画着当年车队驶进校园的路线，踏着《婚礼进行曲》的节奏走过教堂的场景历历在目，那也是一场将其一生与斯坦福构建起精神纽带的仪式。2011年，也正是在这里，人们为苹果公司创始人

乔布斯——一个从未在斯坦福拿过任何学位的人——举办了纪念仪式。2005年，斯坦福邀请乔布斯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讲。

第四章
麻省理工：一个让想象飞翔的地方

麻省理工学院的魔力

麻省理工学院的魔力在于为学生提供最集中、先进和有效的教育，天资聪慧、富于创新的年轻人同住同学，又有乐于奉献的教师朝夕相伴，由此产生的魔力是机器无法取代的。



2005年6月，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乔安娜在毕业典礼上和未婚夫拥抱庆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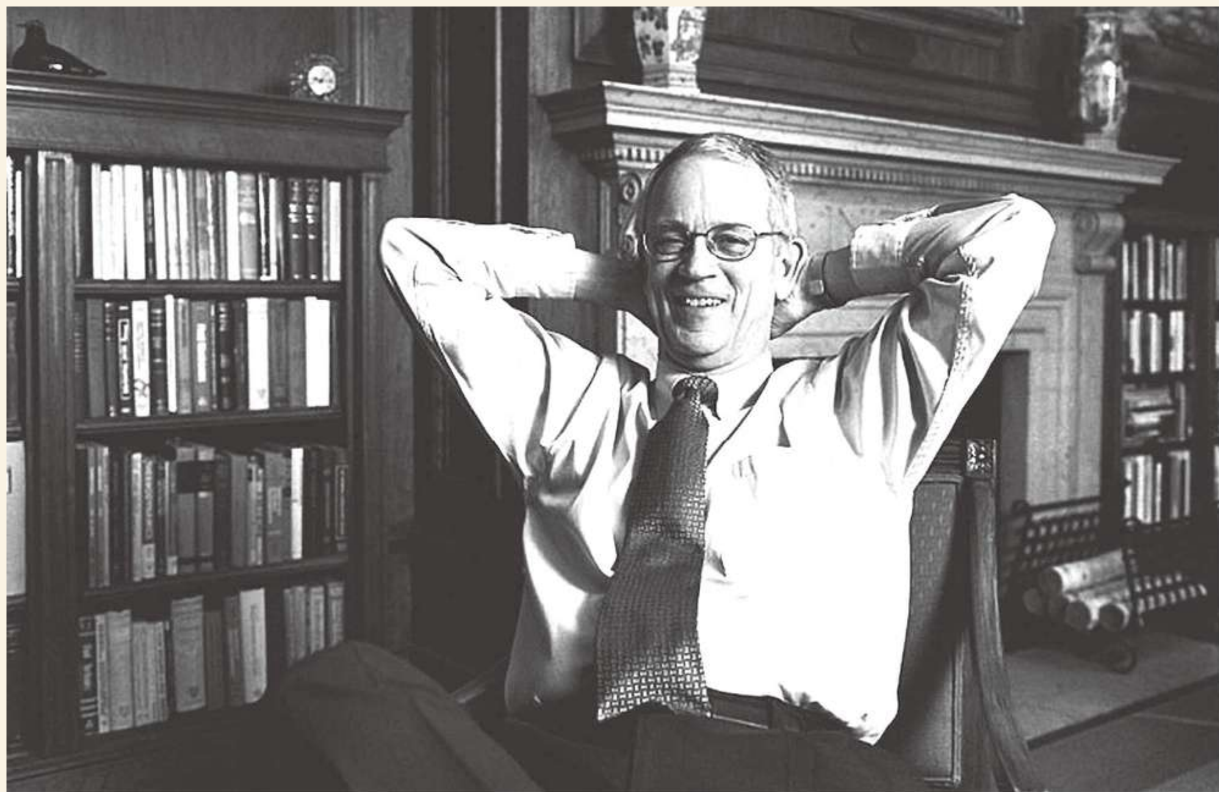


麻省理工学院校园一角

只要你的电脑连接上网络，你可以很快找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各种课程——生物学、物理学、电磁学、遗传学、历史、文学，在这些基础学科之外，还有一些更吸引人的题目——“哥德尔、埃舍尔、巴赫：一次心灵太空漫游”，或者“艺术、科学和技术中的情感和想象”，你可以找到课堂讲座的视频，也能找到学习笔记，甚至可以参与讨论、完成作业。

2001年4月，麻省理工宣布，将把2000余门课程陆续放上互联网，这项开放课程计划（Open Course Ware）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一些大学希望以远程教育牟利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宣称，所有课程免费是对社会的回馈。《连线》杂志称之为“开放源代码式的高等教育”，他们随后的统计显示，哲学、电子工程及计算机、数学、物理是最受欢迎的课程。2010年9月，麻省理工的开放课程已经有多种语言版本和多种镜像，但有心人做出统计，51%的访问者只贡献了一个page

view（访问页次），也就是说只看了一页，29%的访问者看到了5页以上，只有6%的访问者浏览内容超过25页。70%的访问者只来一次，那些只看一页的访问量忽略不计，开放课程网页上的学习者平均只逗留了11分钟。分析者称，绝大多数访问者把开放课程当作维基百科来使用，到这里只为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才不会跟着电脑完成基础物理的学习。当年，开放课程被认为是“教育民主化”的尝试，甚至是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理念，世界上最好的理工科大学将他们的课程免费提供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年轻人，但此后的评估显示，开放课程资源的访问者最主要的来源是教师，而非自学者。麻省理工学院的优势学科——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数学、管理、物理、经济和机械工程，是最受欢迎的项目。



麻省理工学院第15任校长查尔斯·维斯特

麻省理工学院的第15任校长查尔斯·维斯特是开放课程最重要的推动者，他认为，把2000门课程提供上网，让世界上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任意使用，这将促进知识的构思、成形和组织过程。“计算

机产业从封闭性软件系统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这种以独占知识为基础的系统并不适合它们自己创造的世界。开放式软件和开放式系统构成的有机世界才是真正的未来趋势。”他断言，开放课程的资源并不是一种教学模式，而是院校之间的资源共享，是一种学术发表方式，其精神如Linux自由软件一样。他说：“我们将生活在不断发展的电子学习社区中，各种了不起的新技术将帮助我们学习。我们一生的学习方式都将受到数字媒体、互联网以及尚在开发中的设备和系统的深刻影响。对此，我深信不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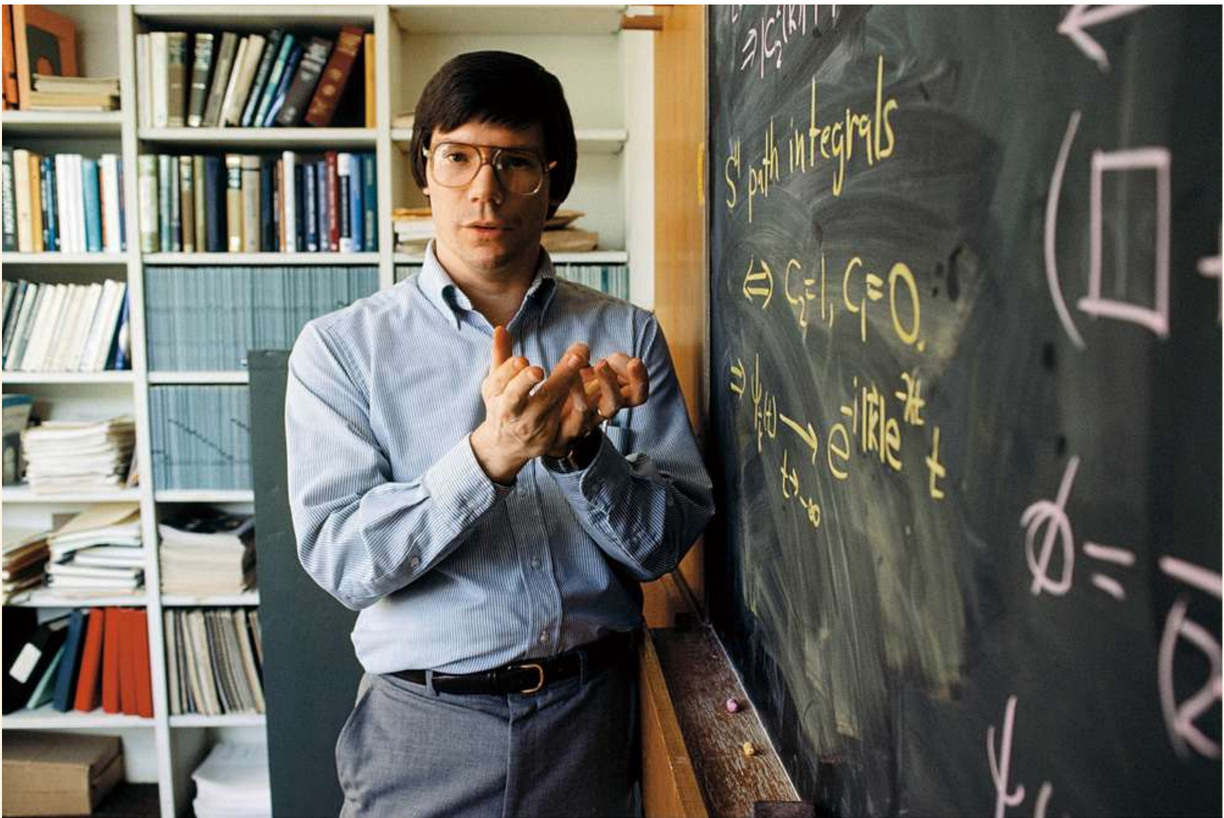
1969年，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内的学生

“但是，我更加深信不疑的是，住宿制大学仍然是我们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我们提供最集中、先进和有效的教育，天资聪

慧、富于创新的年轻人同住同学，又有乐于奉献的教师朝夕相伴，由此产生的魔力是机器无法取代的。”维斯特校长还说。

理查德·费曼，这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在普林斯顿、康奈尔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著名学府闯荡多年，在他那本著名的《别闹了，费曼先生》中，他这样谈论麻省理工学院——“我从不同的学校，学到的东西各有千秋。麻省理工学院是个很好的学校，有它独特的精神，学校里每个人都认为它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相信它是全世界——至少是全美国——科技发展的中心，就好像纽约客看纽约市的情形一样。你会有一种和他共生的奇妙的参与感，很想继续参与下去——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得天独厚的一群，运气好才能待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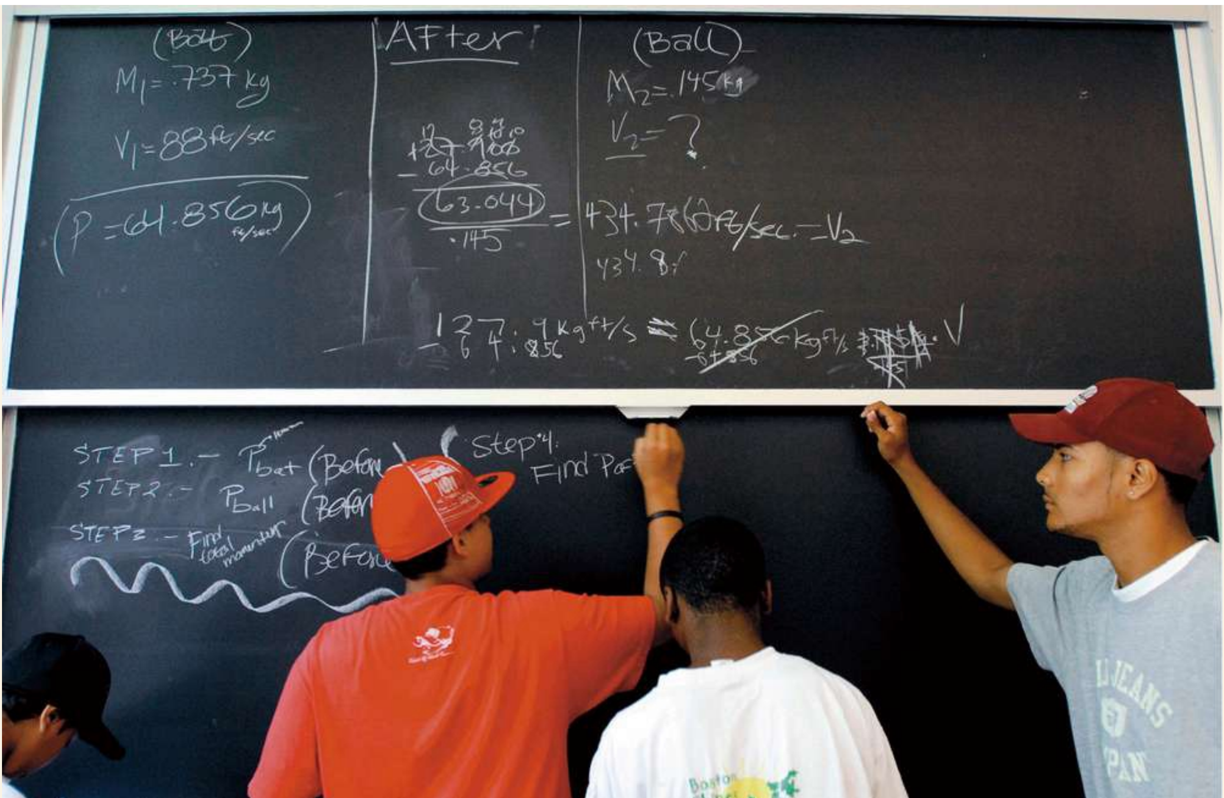
艾伦·古思17岁进入麻省，拿到硕士学位后，麻省理工学院给他的奖学金是每年4000美元，这在1970年可以过很富足的生活。古思从一个博士后转到另一个博士后，直到1980年在斯坦福研究所发表一篇论文，详细阐明“大一统理论”的含义，再回到麻省物理系任教。他说，他对真正的科学有所体验，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回旋加速实验室里实习的时候。这里的回旋加速器与别处的不同在于，它可以安装在一个房间里，由一个人操作，“当你是一个刚刚开始学习的本科生的时候，你的感觉就是一个学生，不是科学家，那时我第一次有一种科学家的感觉。”他喜欢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像水龙头一样谈论物理，直到一位不懂物理的听众也要点头称是。



艾伦·古思17岁就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摄于1983年）

1957年，埃德温·兰德在麻省理工发表演讲，其题目是“科学时代的大学理念”，他的主旨是每个人生来就有无限的潜能，大学要大力激发年轻人的创造力。兰德的建议被麻省理工学院归纳为“本科生研究机会计划”，年轻人有机会和教授一起从事科学研究，而不只是坐在课堂上记笔记。每年，全世界的聪明学生来到麻省理工，他们享受到的氛围是无法复制的——

“嗨，我从小的偶像就是霍金，我想成为一名生物学家，所以我到麻省来简直太正常了。但真到了这里，在大学一年级时和各种人接触，我才发现，每个人到这里的道路都不寻常，他们心里都一个了不起的想法，互相激发。”



2007年7月，麻省理工学院与当地高中组织的夏令营，棒球手教高中生们通过棒球学习数学和科学

“嗨，我是个受虐狂，我读的是物理和计算机科学的双学位，我已经修了如下30门课（省略），我喜欢演戏，我演过《阴道独白》和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我是女子冰球队的成员，我还参加过乐队演出，一个了不起的物理学家在乐队里拉大提琴。”

“嗨，我是苹果的销售代表，在我们学校里很多人都用苹果，我课余时间的一个任务就是琢磨用苹果电脑还能干什么，我玩《吉他英雄》，这个游戏是我们的校友做出来，我想的是怎么把MIDI（音乐设备数字接口）的键盘和游戏连接上，我不是要卖电脑，而是和朋友讨论电脑有什么新鲜的玩法，苹果公司会为此给我付钱吗？”



施塔特中心





麻省理工学院施塔特中心内景

“嗨，你可能听说过麻省的课业繁重，我们一周上48小时课，但一周有168个小时，课余时间有数以百计的活动小组可以参加。我们喜欢体育和艺术，如果你能管理好你的时间，你就能保证充足的睡眠，但有时候睡觉是很没意思的，要是夜里两点，宿舍里忽然有一帮人谈论起政治或基因，你也许乐于参与。”

麻省理工学院的确把课程免费提供给了全世界，但同时他们也把全世界都带到了校园里。这所学院一向以变化教学方法、应对现实问题著称，在数字时代，来到这里的孩子们早已习惯通过互联网学习，他们在校园又会体验到什么样的魔力？

杰苏尔·阿拉莫教授创办了一种可用于微电子设备的网络实验室，学生可以24小时在任何地方使用。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学生，可以

将他们的设计提交给世界上最著名的设计师进行评判，一个班级可以有多名专家进行在线的团队教学。电磁学的课程将完全在工作室进行，没有讲座，学生们要动手做实验，这个项目叫“技术促进主动学习”。维斯特承认，现在的环境是以多种不同形式呈现、接受和传递信息，学习者借助各种技术和自己的五种感官在学习，许多新的教学方法只是皮毛，但麻省必须参与到这个试验当中。怎样在一个信息时代学习和创新，是一所伟大学校应该探讨的课题。

麻省理工学院的人物

创意以一种最纯粹的形式发生

——探访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

以前我们想到技术，总是在谈人工智能，怎么让机器变得更聪明，让他们像人一样思考，具有深刻的感受力。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未来我们应该做的是，怎么利用技术让人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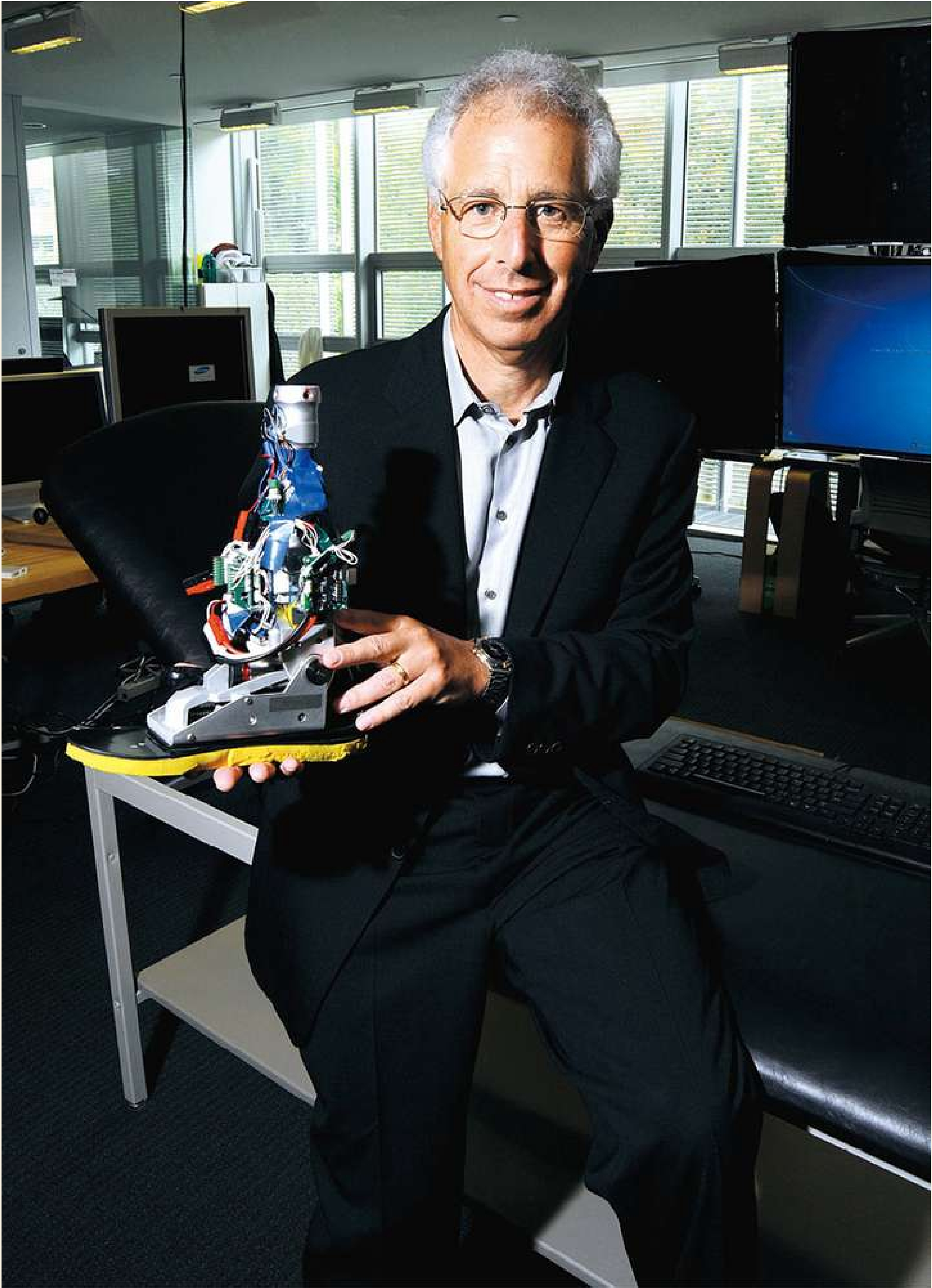
——弗兰克·莫斯

关于媒体实验室的故事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是：他们发明了一个会跑的闹钟，闹钟一响就满地跑，横冲直撞，你必须与它斗智斗勇，才能抓住它，把它关掉。后来这个发明被改造成了一个流行商品，叫Clocky。有人看不过，批评说，一群科学家聚在一起，就为了发明这么个玩意儿？但是，媒体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不以为忤，反而洋洋自得，认为发明也要有娱乐精神，我们不怕犯傻。即使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地方。

麻省理工学院的低调平实，反映在校园风景上，这儿简直像一个大工厂，所有的楼都是用数字代码。我眼前的这个建筑也一样，编码E15，事实上，对科学家来说，它未免太精致了一点。从外面看，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盒子。楼里的一切东西几乎都是白色的。当阳光穿过半透明的玻璃墙，大厅里空荡荡的，你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巨大的雪花球。这是媒体实验室的新楼，才刚刚落成不久，耗资1亿美元，是日本建筑师槙文彦的作品。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内有一种奇异的透明度，在楼里任何位置都能看到每个角落的人在做什么



媒体实验室主任弗兰克·莫斯



媒体实验室的中国留学生，左起：沈大嵬、萧潇、潘巍、王静

这里有一种奇异的透明度。你在楼里的任何一个位置，都能轻易看到每个角落的人在做什么。“视觉上的透明，代表了一种智力上的透明。”弗兰克·莫斯，媒体实验室的主任这样告诉我。弗兰克·莫斯一头白发，精力过人，他的热情有一种强烈的传染力。这大概是他作为一位企业家，却能领导媒体实验室的原因之一。他也曾经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拿到航空航天工程的博士学位，毕业后却转向IT（信息产业）行业。在加盟媒体实验室之前，他经营着好几家IT企业和生物科技公司。

因为刚刚搬进新楼不久，很多人的案头还摆满着杂乱的书本、器械和实验材料。上上下下走一圈，很快就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机器的气场。机械腿散落在沙发上，可以折叠的摩托车蹲在角落里，机器人从

架子上冷眼看着你。这并不奇怪，媒体实验室在成立之初，就是为了研究人与机器的关系。但是逛久了，也会发现许多轻盈可爱、充满人情味的发明，让你觉得活在21世纪也许没什么不好。

比如，在一个叫Tangible Media（可触知媒体小组）的小组，我看到几个设计得非常雅致的玻璃瓶，揭开瓶盖，就有音乐冒出来。如果外面天气晴朗，玻璃瓶会发出鸟鸣的声音；如果下雨，瓶子则发出下雨的声音。原来玻璃瓶也可以作为一种信息的容器，而且处理得如此诗意。这个小组的导师是个日本人，叫石井裕。“音乐瓶”就是他为自己的母亲设计的。此人似乎很低调，媒体上基本看不到对他的报道。

约翰·昂德科夫勒是从这个小组走出去的名人，《少数派报告》中汤姆·克鲁斯戴着手套用手势捕捉屏幕的镜头，就是他设计的。这人在麻省理工学院得到从本科到博士的全部学位，还是个文艺青年，喜欢在树下读歌德。他在媒体实验室待了十几年，后来开了自己的公司，试图把电影里那种手势界面系统推广到真实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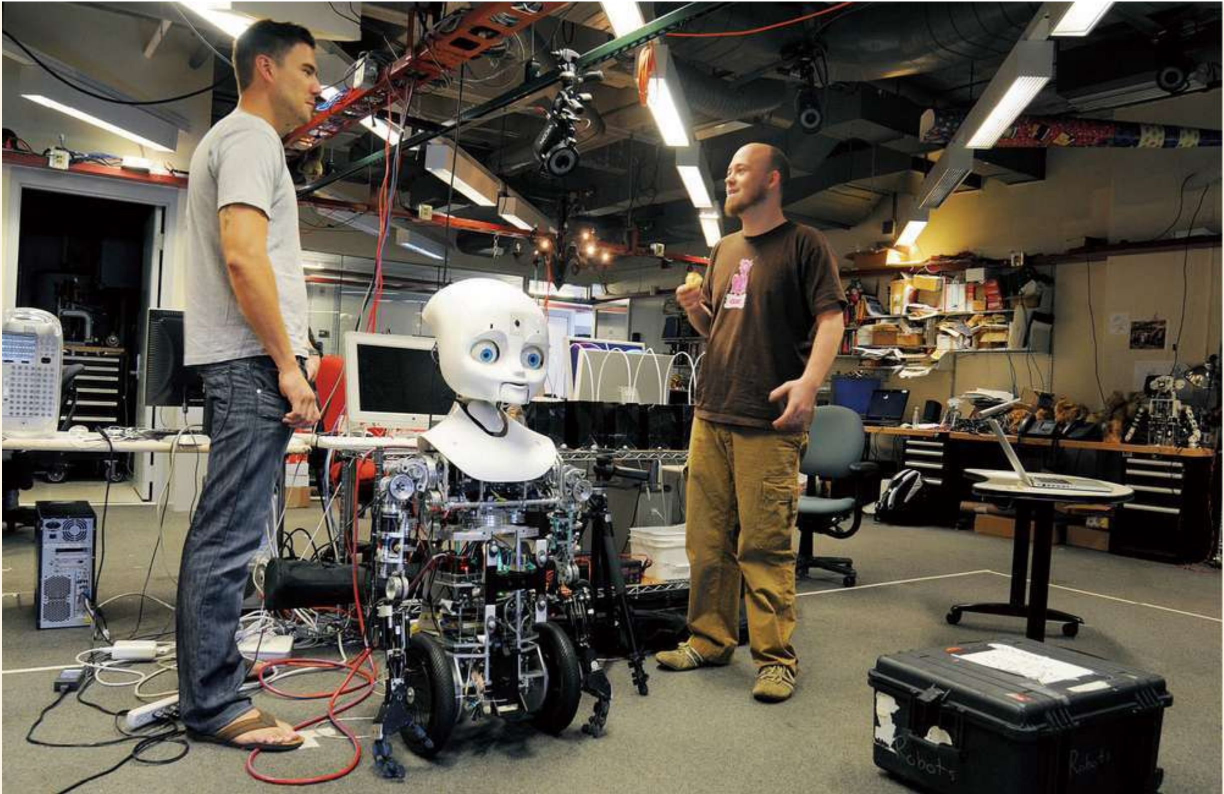
还有一个小组叫“流动界面”，由美丽的比利时女教授帕蒂·梅斯（Pattie Maes）领导。她不喜欢一切手持设备，包括苹果手机，认为这些都是不自然的界面。她的目标是消灭这些设备，把它们的功能释放到日常生活的材质里。与其让我们“移民”到数字世界，为什么不让数字技术融入我们的真实世界？

我很快就被他们发明的一种叫siftables的电子积木给迷住了。每一块积木都有屏幕和无线装置，彼此之间能互相感应。你可以把它们挪来挪去，这会产生许多不可思议的效果。比如，如果两块积木上分别显示两个不同的人像，把他们放在一起，积木里的人像会对彼此产生兴趣。如果被包围起来的话，他们会立刻察觉到，还显得有点慌张，就像哈利·波特里那些会说话的肖像。它还可以用来做数学题，玩拼字游戏，编辑照片，玩DJ（电台主持人），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

的小玩具。不过，这到底算是虚拟融入真实，还是真实嵌入虚拟呢？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终身幼儿园”小组也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实验室布置得像个幼儿园，到处都是玩具，颜色鲜艳，窗户上趴着一只乐高玩具做成的大蜘蛛。这个小组的负责人米歇尔·雷斯尼克教授有一个信仰，认为孩子们应该通过建造东西来学习，培养创造力。人们不仅应该在儿童期间玩更多像乐高积木这样的玩具，而且这种爱好应该陪伴他们一生。所以，他利用乐高玩具的原理，为小朋友开发了一个开源的编程语言平台叫Scratch，孩子们可以用这套软件学习编程，并创造自己的故事、游戏和视频。如今，全世界有100多万儿童在用这个软件学习编程。

在三层的休息区有一个乒乓球台，两个学生正在玩乒乓球。如果打开旁边的一个投影仪，这张乒乓球桌就变成了一个屏幕，上面有小鱼在游动，乒乓球击打桌面的方向和力度会改变小鱼的游向，于是一场乒乓球赛就变成了一场游戏，这是一个中国女孩萧潇的作品。她在北京出生，15年前来美国，汉语已经不大利落了。她在麻省理工学院学计算机科学，辅修建筑学。她从本科开始就在媒体实验室实习，现在正在这里攻读硕士学位。她是一名钢琴手，所以她发明的界面与音乐有点关系。



个人机器人小组研究的下一代情感机器人“NEXI”，它的身体、手势和脸都能显示人类情感

从15年前起，“媒体”这个词早已不再适用于这个实验室。他们的研究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概念的“媒体”：智能车、人工腿、改造大脑、拓展记忆、情感机器人……这些五花八门的研究，如果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拓展人类”。

“以前我们想到技术，总是在谈人工智能，怎么让机器变得更聪明，让他们像人一样思考，具有深刻的感受力。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未来我们应该做的是，怎么利用技术让人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独立。”莫斯教授告诉我。

但是，在这里，有一些东西始终没有变。25年前，媒体实验室刚成立的时候，作为创始人，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杰罗姆·韦斯纳（Jerome Weisner）和尼葛洛庞帝教授就认为，科学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在于交叉领域。所以，除了科学家之外，他们当时还邀请了许多艺

术家一起加盟实验室。从此，“多学科”被作为一种传统在媒体实验室保留了下来。

媒体实验室一共有25个教授，带领着25个小组，每个小组6个研究员，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和博士生。这些教授和学生很多都是“博学者”，你随便在这里遇到一个人，他很可能精通5个领域的研究。到最后你会发现，这里根本没有学科的概念。

莫斯告诉我，无论世界上哪一所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普林斯顿、耶鲁，或者亚洲的大学，在过去的数百年，甚至更远的年代里，一直都是划分不同学科的。比如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社会科学、生物学、物理学、数学……总体来说，每个领域的研究者都会固守自己的领域，只有非常偶尔的，才会与别人相关联。但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挑战无法再在单独的领域里面解决，而是必须由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艺术家、生物学家，彼此互相关联，在一种开放互动的环境中共同解决。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比如健康。很多让我们照顾自己健康的方法，必须结合对生物学、计算机、思维与行为科学、化学的理解才有可能实现。

媒体实验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们的研究是没有方向的（undirected）。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研究型实验室、学院派实验室、工业界实验室或者政府研究所，都要求你所得到的项目资金必须与你的研究方向一致，比如治疗某种癌症，保证某种计算机网络的隐私安全，这些都是有方向的问题，但他们没有。

之所以能在科研上有这种自由度，是因为这个实验室独特的筹款模式。他们每年3000多万美元的资助来自60多家知名的大企业，包括谷歌、微软、Hasbro（孩之宝）、时代华纳、LG、三星等。这些企业掏钱，但并不干涉实验室的研究。作为回报，企业可以派人观察实验室怎么创造，怎么创新，如果他们从某种发明中看到商机，必须向媒体实验室申请授权。



感知城市实验室2009年研发的“哥本哈根之轮”能回收利用刹车时的能量

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故事是，20世纪80年代末，在为马友友设计“超级大提琴”时，托德·曼库弗教授发现了一种技术，能测量身体在环境中的位置和姿势，后来一家日本公司看到这个发明，把它应用在汽车的儿童座位上，用来测量孩子的坐姿对不对，是不是在动，以保护儿童在车内的安全。现在，几乎全世界每辆车里都使用了这样的技术。

“这个时代，技术更新太快，世界变化太快，每个公司、政府、组织，都意识到创新对于未来成功的重要性。你必须创新，才能跟得上时代的脚步。我们为他们提供的，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东西。这是一个由激情驱动的地方。”莫斯教授说。

是的，在这里，你的激情和兴趣决定了你的研究方向。休·赫尔教授的激情是消灭残疾，他自己17岁的时候失去了双腿；威廉·米切

尔教授（已经去世）的激情是让城市和建筑变得更加智能化；雷斯尼克教授的激情是让每个人的一生都保持孩子在幼儿园时代的好奇心，通过创造和建造事物的方式来学习，从而创造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托德·曼库弗教授的激情是让每个人都能创作音乐，从音乐中获得意义。至于莫斯本人的激情，则是让每个人能在余生保持独立生活的能力。当你变老，你需要帮助，但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这些老人获得独立生活，但技术可以做到。

“我的母亲老了，她的背不好，所以总是坐着。每次我扶着她走路时就想，为什么我母亲不能继续走路？我想，总有一种技术可以让她重新走路。她也许不能再跑步，做她三四十岁时候能做的事情，但至少可以舒服地走路。我希望能看到我母亲重新开始走路、逛街、做饭，这是我的激情。”他本人在媒体实验室主持一个叫“新媒体医学”的小组，算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解答方式。他的目标是改变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弊端，使病人能够平等参与到治疗中，对自己的健康和信息有更多的控制权。

“一直以来，麻省理工学院解决的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人的问题。但是，仅仅为既有的问题找到答案是不够的。媒体实验室更看重的是提问，提出一些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时代的挑战在于，要提出新的、不同以往的问题。”

“时代进步了，我们更健康，经济更发达了，但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在提出新问题上是失败的。你看今天的世界，技术给了我们许多信息，你能搜索任何问题，但你不觉得自己对这些信息有控制感。尽管有这么多的信息，它并不能减少你对自己的健康、财务的忧虑。所以，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大问题是，我们怎么利用这些飞速发展的技术——传播技术、信息技术，帮助人们控制自己的健康、财富和幸福？”



未来的公交车站

爱德华·博伊登：大脑工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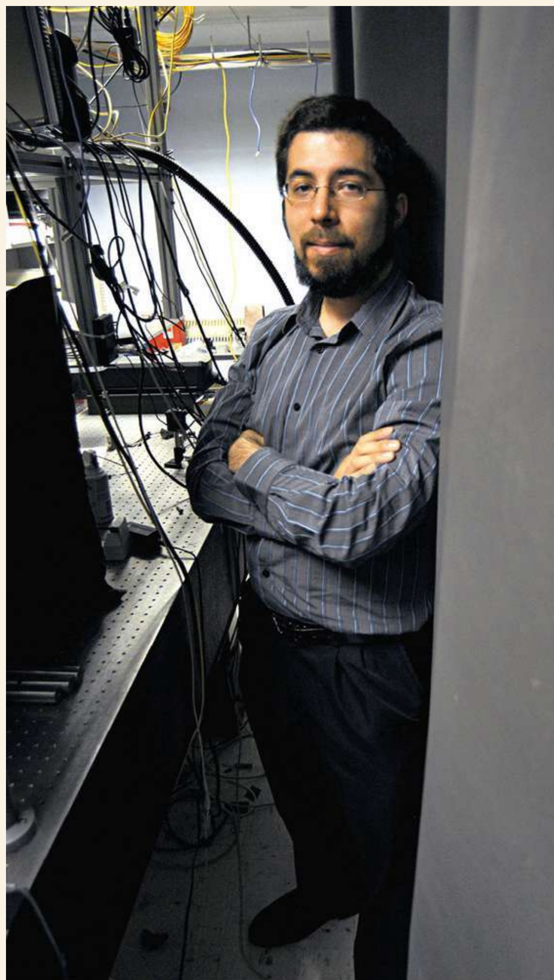
我想理解宇宙，并以一种精确的方式改变它。但是，数学和物理学的问题在于，能够影响世界的大问题，要么已经被解决了，要么就是必须和成百上千的人一起工作，你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选择大脑，是因为我们对它的了解还那么少，很容易探索，并且产生影响力。

当他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本科生时，爱德华·博伊登的梦想是制造一个机器人科学家，比任何人都更快地发明新东西。

这位《生活大爆炸》式的天才科学家出生于一个“麻省理工学院世家”：母亲学生物化学，父亲学政治学，姐姐也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他自己16岁上麻省理工学院，19岁拿到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双硕士学位，32岁时已经是媒体实验室的教授，为脑科学领域发明了不少工具，其中最著名的是Optogenetics，一种光学基因仪器，就像《星球大战》中的光剑一样，能利用不同颜色的光线，随时打开和关闭某些特定的大脑神经细胞。2007年，这个发明刚出来的时候，曾经被“科学探索”频道评为“5个最好的科学瞬间”，他自己则被评为美国20位最聪明的科学家之一。

他的语速极快。对我来说，跟上他的思维速度简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的外表并不张扬，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几乎是沉静的，

但聪明和野心都在轻描淡写的言语之中。“小时候我迷恋数学，后来又学物理、电子工程、计算机，我想理解宇宙，并以一种精确的方式改变它。但是，数学和物理学的问题在于，能够影响世界的大问题，要么已经被解决了，要么就是必须和成百上千的人一起工作，你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选择大脑，是因为我们对它的了解还那么少，很容易探索，并且产生影响力。”



爱德华·博伊登教授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麻省理工学院思维：寻找世界上最难的难题，然后攻克它。宇宙、深海、大脑，都是人类所剩不多的未知领域，于是你会看到很多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扎堆进去。

从14岁开始，博伊登就是从一个学科领域跳到另一个学科领域，不断寻找新鲜的智力挑战。本科毕业那年，他本来打算去贝尔实验室学习激光，结果本来要跟他一起合作的人回德国了，他只好与那人的邻居一起工作。那位邻居正在分析鸟的大脑是怎么产生歌声的，他立刻对大脑着了迷。然后，他去了斯坦福大学，做了著名的脑神经学家卡尔·戴瑟罗斯的学生。在那里，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控制大脑细胞的方式——用光线控制大脑。

这种技术利用了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光导纤维和激光，但关键在于两种神奇的基因：Arch和Mac。Arch在受到黄光刺激时，会关闭神经细胞；Mac在受到绿光刺激时，则会激活神经细胞。这两种基因是

在两种非常古老的细菌和真菌中找到的，它们都是非常简单的无核单细胞生命，但与人类仍有亲缘关系。我们使用相同的基因蛋白，并以相同的细胞机制来读取和执行蛋白。因此，理论上，只要将这些基因通过病毒注射到人类的某个大脑部位，使特定的神经细胞表达这两种基因，科学家就得到了一种神奇的开关：开蓝光，细胞打开；开黄光，细胞关闭。不过，为了将基因输入细胞，涉及大脑手术，把光导纤维埋入大脑，因此短期内很难在人体身上做实验，更何况“控制大脑”永远会牵涉太多的伦理忧虑，但这种技术已经在动物实验上取得了成功。

戴瑟罗斯博士的实验室已经利用这种工具成功扰乱老鼠大脑中特定的神经，影响它的行为变化，比如用绿光照在大脑左侧的运动皮层，小老鼠就会往右转圈；绿光照在大脑的快感中心，小老鼠就会莫名其妙地待在一个地方不愿意离去。博伊登的实验室则利用黄光成功地控制了老鼠的癫痫症，他还用黄光重新激活一只瞎老鼠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使它重见光明。

“神经生物学一直在寻找这么一个工具。”麻省理工学院童嘉瓦记忆与学习研究室的一位中国博士后刘旭告诉我，他正利用这种工具研究记忆的分子机制。

“以前，在低等动物里，我们可以用温度调节神经；在高等生物里，可以用药物来调节神经，但速度都比较慢。光的速度是最快的，可以精确到毫秒，这是神经细胞之间信号传递的实际速度。这个工具的强大之处在于，不仅时间上可以精确到毫秒，空间上也可以具体到某个单个细胞。这样你就真的可以研究各种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现在，全世界一共有300多家实验室在使用这种工具，包括爱德华·博伊登自己的实验室，他想利用这个工具理解情绪、感觉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已经在大脑中找到两个部位，一旦启动或者关闭它们，就会改变人的情绪状态，比如你可以关闭焦虑、恐惧。”

关于大脑，他认为最难的问题包括以下两方面。

第一，我们有意识，能感知自己。我是我，你是你，这是自我的意识。计算机做不到这一点。到底是什么给了大脑这种能力，让你知道你是自己？

第二，洞见的能力。比如你思考一个问题，想了三天而不得，有一天你回到家，突然就想到了答案。大脑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在解答这两个问题之前，他必须制造出足够好的工具。“大脑是一门迷人的科学。人是怎么做决定的？我们如何思考，如何感觉？情绪是什么？现在这些都是很神秘的过程。但利用现有的工具，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很多时候只能将其归入哲学或者推测的范畴。”

他喜欢把自己称为“大脑工程师”——既然人的心智是通过大脑中的电路来执行的，那么通过修理这些电路，就能修理大脑。现在全世界有15亿人患有各种各样的脑神经障碍，癫痫、帕金森综合征、老年性痴呆等等，都是大脑电路出了问题，但对于这些疾病，目前医学上基本没有治疗的手段，更别提治愈了。即使有治疗的方法，也往往伴随着严重的副作用。

“现在，我们已经能利用光线来开启和关闭大脑，但你还要把它的活动记录下来，这是很难的。以后，我们还要能模拟或者模仿这部分细胞所产生的计算回路。”

“大脑就像一台终极计算机。”他说，“如果你有一台计算机，你想理解它，你要做的只是输入信息，然后阅读这些信息。计算机有

屏幕，有键盘。大脑也一样，如果你能给大脑输入信息，也要能从中输出信息。”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昆虫大小的电子元件，像一把小梳子。他说这是他最新的发明，一个微型无线光导纤维，能插入大脑，记录信息，然后拔出来。

通过他的研究和发明，他希望能把“神经工程学”变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再没有一个地方比麻省理工学院更适合做这件事情了。在这里，人们喜欢解决复杂的问题，越复杂越好。

“在未来5到10年，我们将拥有更多的技术，新的大脑扫描仪、新的大脑探测器、新的开关大脑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分析大脑。我在未来10年内想做的，就是发明这些大脑分析器。然后未来20年，我能看到科学家们利用这些仪器来理解智慧、恐惧、幸福、记忆……”

有趣的是，这么一个发明狂人，却喜欢《希区柯克的银河系导游》中一个叫“马文”的机器人，拥有超级智慧，却终日无所事事，没有任何远大目标。因为在他看来，一个真正高级的智能生命，必须能意识到世界的非永恒性，能计算到太阳会在几十亿年间燃烧殆尽，发明更聪明的机器毫无意义。

托德·曼库弗：音乐的解放者

曼库弗教授是一个天才的发明者。在媒体实验室的25年里，他发明了许许多多的乐器和软件，“超级乐器”“头脑歌剧”“超级乐谱”“音乐玩具”等等，都是为了找到一种方法，让每个人都对音乐感兴趣，让他们更迅速地到达音乐的核心。

托德·曼库弗教授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住在波士顿附近一个18世纪的农场里，寂静如森林，他是作曲家，需要独处，需要静思。但是每天早上，他都要开车20分钟到媒体实验室，世界上最未来派的一个地方，一个疯狂科学家扎堆的地方。



托德·曼库弗教授

在这里，他是一个发明家。他的实验室里摆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乐器，大提琴、小提琴、钢琴、椅子、编钟，还有好多机器人，一个6条腿的机器人据说是工作台，还有一个看上去像巨型吊灯的机器人。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些机器人本身就是一个个乐器，大吊灯48根长长的钢琴弦，每根都由小型机器人部件所控制。这些都是他的新音乐剧《死亡与鲍威尔一家》中的角色。

《死亡与鲍威尔一家》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一个发明家希望自己死后能被这个世界记住。于是，他创造了一个“系统”，把自己的记忆和个性下载到系统里。当他进入系统，舞台上的“物”就变成了他的延伸。

曼库弗教授是一个很亲和的人，头发尤其很有特点，好像随时都在与空气中的静电交互。他说，他对音乐和技术的双重迷恋，很大程度上来自父母的基因。他母亲是茱莉亚学院毕业的钢琴家，父亲则是计算机图形领域的先驱。对他来说，两个世界同样复杂，同样迷人，

而且彼此互通。因为他在音乐上的想象力，往往需要技术上的突破来实现。

20世纪60年代，甲壳虫乐队有一首歌叫《孤独的心俱乐部》。当时曼库弗才13岁，正是最敏感的年纪，这首曲子对他的一生影响巨大。“一层叠一层的音乐，从来没有人创作出那么丰富的音乐，但这样的音乐必须在多轨录制的录音棚才能完成。事实上，‘甲壳虫’在1967年之后的很多音乐都无法现场演出。”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想象一种音乐表演模式，能结合大提琴独奏的亲密和录音棚的创造力。这种想象力最终引导他在十几年后发明了“超级大提琴”——利用传感器及通信系统，在大提琴演奏过程中撷取演奏者演奏技巧的最细节部分，并将其转为数字数据，传输到计算机中，为后端合成系统提供输入数据。

他的第一把“超级大提琴”是为马友友设计的。用这么一把乐器，马友友一个人就可以演奏整个交响乐团的协奏。每次手腕抖动，就会制造和弦。当他拉得越来越激情迸发的时候，音乐会变成人声，甚至变成我们从未听过的“天籁之音”。

曼库弗教授是一个天才的发明者。在媒体实验室的25年里，他发明了许许多多的乐器和软件，“超级乐器”“头脑歌剧”“超级乐谱”“音乐玩具”等等，都是为了找到一种方法，让每个人都对音乐感兴趣，让他们更迅速地到达音乐的核心。

“音乐很重要。”他说，“即使你完全不懂音乐，你仍然会钟爱某种音乐。没有人知道音乐为什么存在。在进化中，很容易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眼睛，视觉艺术的出现可能是为了记住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东西，甚至可能是一种视觉训练，让你学会辨别危险。但音乐为什么重要呢，为什么它在每个社会每种文化中都存在？一个可能的理论是，音乐的存在是为了刺激和连接你的大脑的几乎每个部位。越来越

多的研究显示，音乐占用了大脑最多的区域。你听一首音乐，追随它的音调和弦，它会带你进入一段旅程，而你大脑中的每个部分都必须合作。我们知道音乐刺激情绪，但每个人对同一首音乐的感受都不一样，每个人必须创造自己的故事和理解。所以，音乐同时关涉心智和身体。所以，当你制造一个乐器，或者写一段音乐，它要求你解决许多深层次的人和技术的问题。”

在为马友友设计“超级大提琴”之后，他开始思考，我们能否也为普通人制造这样的乐器呢？能不能让一个从来没有接受过音乐训练的人，利用肢体动作来控制声音，表达音乐呢？如果一个人不是作为一名听众，而是作为一名创作者参与到音乐中，音乐对他的影响力会高出许多倍。

在“超级大提琴”之后，他发明了一个音乐椅子。椅子上安装了传感器，你坐在椅子上，只要身体一动，传感器就立刻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这样每个人只要手舞足蹈就能创造音乐了。当时跟他一起做这个项目的学生后来设计了风靡全球的游戏《吉他英雄》。

迄今为止，他已经发明了100多件不同的“超级乐器”，都是按平常人的自然演奏方式设计的，有的是通过骑车来表演音乐，有的通过触摸来产生音乐，或者用声音来营造氛围。每次一件乐器发明出来以后，他们都会邀请公众前来体验，并和他们一起举办演奏音乐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曼库弗教授是音乐的解放者。一直以来，音乐都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只有具备特殊才华的人才能进入，你必须有天赋，懂得乐谱，通晓经典，才能演奏甚至创作音乐。曼库弗教授本人是专业的大提琴手，在所有乐器中，他最热爱的是大提琴。他喜欢一个与你的身体差不多大小的乐器抱在怀里的物理感觉，哪怕一个空弦，也能感觉到震动。你的整个身体都能感受到它。

但是，大提琴是一种非常难学的乐器，很多时候，老师教你动作和姿势，就好像你不是在学音乐，而只是在学某种物理姿势。长年累月的苦练，犹如置身囚笼。对专业的演奏者而言，这种苦练固然是有益的，但也有很多人在这种禁锢中迷失，与音乐断裂，与情感断裂，与音乐更重要的东西断裂。

“我母亲出生于音乐世家，她在去朱莉娅学院之前从未听过一首流行音乐；我父亲出生在美国中部，他的家庭喜欢流行音乐，对古典音乐一窍不通，从不涉足博物馆。从母亲的一面，我相信音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它有灵魂，它的存在是为了深化我们的灵魂，它是严肃的。从父亲的一面，我认为音乐应该是每个人的，不是给特殊人的，它的表达方式应该让每个人感觉舒服。我是一个很好的音乐家。但我学得非常辛苦才能走到今天。我希望这个过程对普通人可以不必那么艰难。尤其是小孩子，我希望他们先爱上音乐，创作音乐，然后再在小提琴上花20年的苦功。”

“玩具交响乐”是曼库弗教授专门为小孩子发明的一系列乐器，充满了童趣和想象力，很像从机器猫口袋拿出来的礼物。“音乐塑形者”是一种可以捏的乐器，捏的动作会改变音乐的节奏；“节拍虫子”是用于敲击节奏的，你可以用它来收集节奏，然后把这个节奏像丢烫土豆似的传给别人；“超级乐谱”是一种作曲软件，小孩子可以通过线条和色彩“画”出复杂的音乐。一旦上手，一个小孩子也能创作出非常复杂优雅的曲子。

怎样才能充分发掘音乐的潜力，让它对人类心智和健康产生最积极的影响？这是曼库弗教授最关心的问题。

今天的音乐人都试图找到最简单的方式，使一首音乐具有最普遍的吸引力。但他认为，音乐的发展方向恰恰相反——创作在某个特定时刻对某个特定的人起作用的音乐才是未来。“对我来说，关于音乐最前沿的问题是，音乐是怎样对人产生影响的？为什么一段音乐让你

产生某种特殊的情感？为什么你今天对一段音乐的感觉和明天不一样？很多人都知道，音乐是老年痴呆症晚期患者最后能回应的东西。即使他们认不出自己、认不得家人，但你仍然能找到一段音乐，唤起他们的记忆和自我意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音乐有这样的效果。但随着对大脑理解的深入，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测量一个人的想法和情绪，他向音乐中寻求什么？音乐会变成一种药物，医生可以给他写一段音乐，就像开一张药方，或者给他一段未完成的音乐，一段材料，让他自己改编，从而达到治疗的效果。《吉他英雄》现在的技术还是很原始的，它只能测量你的动作，改变音乐的方式也很简单粗糙，但50年以后，它也许能观察你的姿势表情，测量你的情绪感觉，了解你真正的心理需求，然后根据这些数据改变音乐。”

休·赫尔：人人都是钢铁侠

> 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我的腿会和正常的人腿有完全相同的功能。然后我的腿会有更多的升级和拓展，到时候，它会比你的腿更好。我走路所耗费的能量会比你小，我的速度会更快，我可以用更短的时间跑马拉松。10年内，我想做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尽管非常微妙，但你还是能觉察出休·赫尔教授走路的姿势有点怪。

在媒体实验室，这位教授是一位传奇人物。他7岁开始攀岩，17岁那年遭遇登山事故，双腿被截肢。之前，他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青年登山运动员之一；之后，医生给了他一副假肢，然后告诉他，你永远不能再爬山了。

3个月后，他扔掉了那个假肢，然后自己造了一副假肢，可以根据山的地形自由伸缩。很快，他就攀上了比事故前更高水平的岩壁。他的登山同伴们一开始对他充满同情，但很快，他们开始喊不公平，因为他的“超级腿”给了他超越常人的优势。



休·赫尔教授

那场事故后，这个以登山为人生全部梦想的少年迷上了物理学，因为这是设计假肢的知识基础。本来对读书毫无兴趣的他上了大学，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电子工程学位，在哈佛获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重返麻省理工学院继续博士后研究。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因为他的手患了重复性压力障碍，他在眼镜框上装了一支铅笔，用脑袋打字。

27年来，为了给自己一双更好的腿，他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假肢：登山专用的、走路专用的、跑步专用的……既然现在他的一部分身体是人工的，那么他可以尽情地发挥想象力。

“当我还在跟自己的新身体打交道时，我把自己的腿看成是一个巨大的鞋。一个人的鞋柜里可以有很多鞋子，一个人也可以设计很多不同功能的假肢。”

按照文明社会的规则，如果一个人坐着轮椅，你不应该盯着轮椅看；如果一个人的走路姿势怪异，你不应该盯着他的腿看。赫尔教授大概觉得这种文化潜意识很可笑。为什么你看不到他的假肢有多酷、多强大呢？

他发明的PowerFoot One智能腿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最佳发明。它用电动机、弹簧、传感器和一个精密控制系统，模拟脚和踝关节每一动作环节的能量传送机理，可以适应不同的地面坡度和步伐，还可以区分使用者是在上楼还是下楼，并且提高了行走速度和稳定性。它甚至可以让人自如地跷起二郎腿。

赫尔教授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回答问题也极为简洁，但他展示自己双腿的方式里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得意之情。他坐在媒体实验室的一张椅子上，交叉着双腿，似笑非笑的眼神里似乎带着对一个肢体健全者的嘲弄。

他甚至把他的假肢设计得很美很时尚，这对他很重要。

“什么是美？美在你眼中与在我眼中是不同的。”他指着桌上摆着的一个机械腿，淡淡地说，“你可能认为它很丑陋，世界上很多人会认为它很丑，但我认为它很美。”

“有人不愿意触摸一个人工腿，或者不愿意跟一个有人工腿的人在一起，他们认为它们很丑。因为它们是机器，却企图模仿人的身体。大部分人是这样的，很多很多人……”

在他的实验室里，这些人大概会昏厥过去——这里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各种各样的机械腿、脚踝、膝盖、人工骨骼。

这里是一门新兴科学的最前沿。生物机械工程，融合了生物学、机械学、电子学等多个学科，目的是发明能植入或者接入身体的机器，让机器帮助原本残缺的身体或大脑执行正常的生理功能。



休·赫尔教授的实验室

赫尔教授相信，在今天的时代，机器和人体的混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不是一件坏事。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深受身体残疾之苦，截肢、瘫痪、肌肉萎缩……即使你不遭遇这种悲剧，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步履蹒跚，身体失去平衡。这么多的人类苦难，是可以通过技术弥补的。”

他对技术的迷恋，就在于它治愈的能力。虽然他的技术现在还很昂贵，一副智能腿要三五万美元，不是谁都能消费得起的。

在媒体实验室，他的工作重心已经渐渐从假肢的设计拓展到如何使正常的身体更强、更快、更有效。他们发明的外骨骼，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能模拟自然步态的辅助系统，可以完全自然地行走，与军事用途的外骨骼系统不同，它更小、更轻，需要很少的能量。他希望这种技术能使普通人走得更远，跑得更久，或者提起更重的东西。“现在

已经有可以让人跳得更高的外骨骼，但那种技术并不难实现。让一个人以最小的能量从A走到B，这才是更难的。”

在他的设想中，这种外骨骼系统在未来50年内会演变成一种“移动平台”。就像人的第二层皮肤，人们可以穿上它，以最小的能量进行最快的运动。到时候人们会跑着上班，而不是开车上班。到了办公室以后，他们可以把这套平台脱下来，挂在衣架上。

“我想它会很有意思，比车更有意思。”赫尔教授略带神秘地笑着。不过，我实在想象不出那会是什么样的东西。人人都是钢铁侠吗？

或许这就是赫尔教授的目标——有一天，机器不仅能完全代替人体的功能，甚至超越人体的设计。

就目前的系统来看，假肢已经在速度、步态、平衡等方面部分甚至完全模拟真实的人腿。但是，机械与神经系统的连接仍然是一个难题。人工腿感觉不到冷热，当它走过一片草地，无法感觉到草的柔软。不过，包括媒体实验室在内的很多地方都已经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了。

“你以为人的身体是进化的终极吗？”他说，“不，进化从未停止。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我的腿会和正常的人腿有完全相同的功能。然后我的腿会有更多的升级和拓展，到时候，它会比你的腿更好。我走路所耗费的能量会比你小，我的速度会更快，我可以用更短的时间跑马拉松。10年内，我想做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下一站，火星

“阿波罗”是麻省理工学院所做事情的一个经典范例。发现的智力飞跃，是由人类定义困难、设计解决方案、重新定义“不可能”之意义的能力驱动的。今天的学生们在挑战世界面临的种种难题时所需的勇气，部分来自“阿波罗”计划让我们相信天空不再是限制。

——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在纪念登月40周年研讨会上的讲话

月亮背面



1968年的圣诞节，“阿波罗8号”绕到月亮背面，拍摄了一张照片（左图），是宇航员比尔·安德森看到的，蓝色的地球从月表缓缓升起的景象。很多人认为，正是这张照片拯救了1968年，那个动荡不安的一年——学生暴乱，越南战争。因为那是人类第一次看见地球，不是一个牢固的、不可摧毁的地方，而是一个很小，看上去很脆弱的星球，悬挂在一片漆黑的宇宙空间之中。但与此同时，人类对宇宙的视角也变了，那些遥远的光点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地方，而是一个你可以去拜访的地方。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航天学院见到的每个人，几乎都提到了这张照片，还有那种从太空凝视人间的视角所带来的震撼感。在麻省理工学院，亲身体验过这种震撼感的人不少，毕竟这个学校出过34名宇航员，其中包括4位登月宇航员。

巴斯·艾德林是“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也是第二个在月球上行走的人，《玩具总动员》中的巴斯光年。1963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航空航天系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载人太空飞船的汇合点技术，至今仍是太空飞行的标准程序。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时候，巴斯·艾德林上过航空动力学的课，当时他的老师是理查德·巴丁，是导航系统的专家，为阿波罗计划的导航系统设计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老先生今年90多岁了，偶尔还会在学校讲课。



1969年，“阿波罗11号”宇航员迈克·柯林斯（左）、尼尔·阿姆斯特朗（中）和巴斯·艾德林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合影

巴丁教授的学生中还有“阿波罗14号”登月舱驾驶员爱德·米切尔，“阿波罗15号”的指挥官大卫·斯科特。爱德·米切尔从月球返回地球的途中，自称与宇宙中的智能生命产生了心灵接触。回到地球后迷上了玄学，开始研究人类思维的超能力和各种超自然事件，在加利福尼亚州成立了一个ESP（超感觉）研究所。大卫·斯科特则去了好莱坞。登月30年后，他做了《阿波罗13》的技术顾问。

对宇航员来说，在回到地球的种种挑战中，如何描述太空的体验，是最艰难的。在纪录片《月亮的阴影》中，查尔斯·杜克不无委屈地说，是因为他们大都是军队飞行员，不是诗人。如果当年NASA派诗人上太空的话，也许情况会很不一样。杜克是“阿波罗16号”的宇航员，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离开月球前留下了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有他和他的妻子、两个孩子以及家里的小狗，照片背后是家人签名，还写了一句话：“为人类和平登月”。

麻省理工学院与太空探索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莱特兄弟的飞机上天之前。1896年这里已经有学生在研究空气动力学了。1914年，麻省理工学院开设了美国第一个航空工程课程。当时的系主任亨塞克（Hunsaker）和助手唐纳德·道格拉斯在Vassar（瓦萨）街上建了一个大型风洞，这是麻省理工学院搬到剑桥校区之后的第一个建筑。现在，这个风洞被改造成了学生的实验室，里面横七竖八地搁着飞机动力引擎，还有一辆有翅膀的汽车。风洞平常并不轻易开启，因为每次开启，整个波士顿的电力都供应不上。但在“二战”期间，这个风洞几乎24小时不停。

美国太空探索的许多基础技术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包括飞机和宇宙飞船的设计、内燃机、空气弹性变形等，导航控制系统更是这个学校的强项。20世纪50年代中期，麻省理工学院的仪器实验室为美国军方设计了导弹的导航系统。1957年，苏联发射Sputnik（“伴侣号”）之后，这个实验室立刻设计了一个自己的太空飞行器，取名“火星探测器”，计划飞往火星，然后返回地球。“火星探测器”从来没有起飞过，但它的计算机研发工作后来成了阿波罗导航系统的基础。

但是，教育始终是麻省理工学院为美国太空探索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超过任何机器或技术。除了宇航员之外，麻省理工学院还培养了太空探索领域的许多领导者，比如鲍勃·西曼（Bob Seman）是60年代NASA的副总指挥，阿波罗计划的高级工程师；菲利普·莫里森（Philip Morrison）教授是搜寻外星生命计划SETI的发起人之一。今天，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彼得·迪曼蒂斯设立了X大奖，是私人太空探索领域的先驱；布拉德利·C.爱德华兹（Bradley Carl Edwards）正在设计一个长达6.2万英里的太空梯，可以直接把人送到太空，计划在15年内建成。



麻省理工学院航空航天系教授大卫·明道尔

“在麻省理工学院，人们总是被鼓励去思考那些大图景，什么是根本性的问题，而不只是解决单个的问题，这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基本特点。”大卫·明道尔教授告诉我。

明道尔是麻省理工学院航空航天系的教授，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尤其对太空探索的历史感兴趣。他写过一本书叫《数字阿波罗》，就是谈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是怎么发明出阿波罗导航系统的。

麻省理工学院与阿波罗的关系始于1961年4月9日，Western Union给当时麻省理工学院航空航天系主任查尔斯·德雷珀（Charles Draper）发电报，宣布麻省理工学院被选中作为阿波罗小组成员，给了他们400万美元开发阿波罗的导航系统。

当年阿波罗导航系统的内存和速度也许还不如今天的一个低端手机，但它指挥飞船穿越50万英里的太空旅程，并实现在月球表面的第一次准确登陆。飞船登陆时要克服巨石、弹坑、悬崖，如果导航系统出了任何问题，宇宙飞船不可能重返地球。今天的计算机速度虽快，但在稳定性上却远远无法与40多年前的那台计算机相比。“问问你自己，你敢把自己的生命赌在你桌面上的那台计算机上吗？”明道尔教授问。

在明道尔教授看来，六七十年代是太空探索的黄金时代。自从“阿波罗17号”之后，人类太空飞行基本上就停滞了。此后的航天飞机、国际空间站，无论从探索的气魄，还是技术难度而言，都无法与阿波罗计划相比。“40年前我们能去月球，现在却不能。这说明‘技术永远前进’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这也是我对登月计划感兴趣的原因。”

人类为什么非得上太空不可

在美国，关于太空探索一个争论很激烈的问题是：为什么要送人类上太空？如果仅仅是为了拓展体验，值得吗？

2008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几位教授为NASA撰写《人类太空飞行的未来》白皮书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政府要投资那么多钱送人去太空，尤其是在一个经济危机的时代？

作为那份白皮书的撰写人之一，明道尔教授告诉我，如果纯粹从科学立场出发，人类在太空能做的，机器都能以1%的成本做到。对科学家而言，最令人兴奋的地方，比如土星、木星，以及这些星球的卫星，人类的足迹可能永远无法到达，但却是最有可能找到生命的地方。事实上，当人类在太空的脚步停滞不前时，机器人却已经探索到太阳系之外。它们在火星上发现了液态冰，从土星的卫星上发现了有机物，并开始探索太阳系之外的“系外行星”。

“太空探索是‘冷战’的产物，它首先是关于国家力量、国家意志，而不是为了科学或者好奇心。可是人们始终有一种奇怪的思维误区，认为载人太空飞行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符号。我相信，Sputnik上天对美国人的刺激，更甚于阿波罗登月，因为美国人意识到苏联能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他们对世界立刻有了不同的感受。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和文化的问题。这种想法其实很可笑，毫无道理。苏联在太空探索中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同时它的社会却在崩塌。”

“人类太空飞行的重要性在于另外的原因。因为它很难。作为人类，人性的测试之一就是开拓自己的极限，我们永远好奇什么是未知的领域，什么是最难的问题，太空只是其中之一。就像我们应该探索海洋的深底，我们应该探索原子的架构，我们应该寻找治愈癌症的方法，所有这些很难很难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去做。地球在太阳系，甚至在整个宇宙的位置是什么？我们的家园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对于我们这些有能力去探寻这个问题的人，更是一种责任。”

玛丽亚·祖柏教授是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大气与行星学院的院长，NASA火星探测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她从未去过太空，但她参与设计的飞船去过月球、火星、水星，它测量过月球上的弹坑，火星上雪的深度。

祖柏教授的办公室在54楼，麻省理工学院最高的楼，属于70年代的典型实用风格。楼顶的巨大雷达圆顶，成了学生们恶作剧的对象。她的办公室恰好面向整个麻省理工学院最好的风景，窗外是缓缓流过的查尔斯河，夕阳余晖下的河面帆船点点，整个波士顿都在她的眼底。



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大气与行星学院院长玛丽亚·祖柏教授

祖柏教授告诉我："有人邀请过我，要不要去太空看看，我说要等我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今年我的小儿子开始上大学了，也许我可以开始考虑这个事情了。"

作为一名女科学家，她身上有一种让人折服的自信和爽朗。当她谈到太空时，脸上的表情却是温柔的，几乎带着叹息："从那么小的时候，我就绝望地爱着太空。我在宾夕法尼亚山脉的一个小镇里长大，整个小镇只有2000多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但是有极其清澈的天空。我喜欢看着天空，觉得那里应该是一个我能理解，能去探访的地方。"

她说，8岁的时候，她造了一个望远镜，自学光学物理，10岁开始自己打磨镜片，造了很多不一样的望远镜。读高中的时候，她在宾夕

法尼亚的一个天文馆打工，为游客讲解天文望远镜。



麻省理工学院航空航天系教授杰夫·霍夫曼

祖柏教授成长的年代，恰好是阿波罗计划如火如荼的时候。曾经有人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计算过阿波罗计划的性价比，结果显示，在阿波罗计划上每花1美元，就给美国经济带回了14美元。而它在激励方面，在工程学成就方面，在鼓舞年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方面，收益比投资高出14倍。

“在过去，当你探索宇宙时，你会用一个望远镜，你会观察一个星体，它只是一个光点，但现在，那些行星变成了地方，你可以拜访的地方。”

1979年，当她还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时，她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旅行者”宇宙飞船飞越木星和土星时发回的照片，她被震惊了，“如果你去观察人们从未见过的东西，那么你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是一种发现。”

她对这种“发现”所带来的愉悦感上了瘾。她一直在埋头挖掘这些数据，以新的方式观察太阳系的行星与卫星。她发明了Laser Rangefinder（激光测距机），以前所未有的准确度对行星表面进行绘制，是这个领域的先驱者之一。她还参与了许多其他工具的开发，比如重力传感器，可以探测行星与卫星的地表深处。

这些项目都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试图理解行星是怎么运转的。它们是如何形成，如何进化的？什么样的过程影响了大气的变

化，山脉和火山的形成与毁灭，海洋的出现与消失，峡谷与山谷的雕刻，奇异气候的变化。这些问题，并非只是为了满足一个科学家的求知欲，而是与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休戚相关，牵涉气候变化、能源供应、地球资源耗损等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地球的亚表面，才能知道怎么安全地处理核肥料，解决能源和燃料效率问题，将二氧化碳储存在地底而非释放在空气中的风险。



1963年，发明家玛利亚·泰尔克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她参与了阿波罗计划和北极星导弹计划

你知道火星上会下雪吗

对于她这样的科学家来说，最让人兴奋的问题是，理解地球之外生命发展的可能性。

“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火星的环境条件，它有水、二氧化碳、空气，距离太阳足够近，这是生命形成的甜蜜点（sweet spot），也许生命形成了，也许没有。即使没有形成生命，它仍然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没有？或者这里曾经出现生命，但气候变化使得它不再适合生命居住，那么它们去了哪里？也许你会觉得这些问题太遥远了。但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而且我们有能力来回答。”

在麻省理工学院，她正在跟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和学生们一起合作，用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答这个问题。他们发射DNA探测器到火星，寻找类似DNA的东西。这就是她热爱麻省理工学院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是工程师。如果你整天跟科学家打交道，探讨宇宙的起源，那

太难理解了。但如果你跟工程师打交道，每个问题都有一个解决方案。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想法，一定有人会帮助你把它变成现实。从来不会有人说：不不不，我们可做不了这个。

“我们在寻找双螺旋的碳基础的生命形式，也许与地球生命的序列和方向不一样，但我们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么。”

经过30年的科学生涯，她觉得现在才是真正激动人心的时刻。2008年，她被NASA选拔为GRAIL（引力恢复和内部实验室）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这项计划明年才会启动，计划发射两个远程遥控的宇宙飞行器进入月球轨道，研究月球的重力，寻找月球的起源。这是一个纯粹科学目的的计划，但如果他们的研究帮助人类再次登上月球，那将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她还有一艘宇宙飞船要去火星，另外还有一艘飞船要前往最大的两个小行星——Ceres（谷神星）和Vesta（灶神星）。

现在，她正在研究的是火星上的重力场。她站起来，在巨大的苹果电脑上打开一个文件，指给我们看火星北极的雪。你知道火星上会下雪吗？二氧化碳雪。我们看着火星的季节变迁，雪从南半球转移到北半球，这些是我们的数据，我们是第一个测量这些数据的人。

“当你在一个领域工作，不断推进知识的前沿，你会意识到什么是可能的。所以，别告诉我，我们不能清理地球的环境，别告诉我们不能给地球上每个人提供干净的饮水，别告诉我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不能得到疫苗。因为更难的事情都做过了。”

与很多院长不同，祖柏教授仍然带着大批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一起做研究项目。“来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他们不想被告知说，你们不能做什么事情，他们想知道，最难的问题是什么？登月，很难，去火星，更难，好的，我想做这件事情。聪明的学生应该被挑战来应对这样的难题。他们必须思考那些能够照亮社会

的事情。他们必须懂得挑战知识的极限，改善地球人类的生活，而不是整天想着怎么赚钱。”

经常会有学生坐在她面前说：“教授，我可以把这个东西的计算速度提高一倍。”

她会跷起腿，身体往后倾，问：“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需要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一个有用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一个能够实际执行的解决方案。如果要耗费掉整个城市的电力才能让你的机器动起来，这种方案是没用的。你得先让他们跳出自己的智力舒适地带，停下来想一想，然后简化问题，比如宇宙的起源，你不可能解决全部的问题，那就从这个大问题中挑出一小块，但又足够让你学到东西，允许你提出更好的问题，获得新的洞见。这是我们试图教给学生的思考方式，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说，麻烦再告诉我一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看着那些学生在这边晃荡、读书、吃饭，有一天，他们会突然跑去指挥航天飞机了。你知道自己在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第五章
牛津大学：现代绅士的摇篮

牛津的时间

牛津人的时间观，是现世短暂与精神永恒的混合；闲暇与平凡的生活是如此值得珍惜，正如永恒的荣誉是如此值得追求，“就像你们会永远活下去一样学习，就像你们明天就会死去一样生活。”

来到古老的牛津，便跌入一条漫长的时间河流，说不清身处什么时代。13世纪的古书静静躺在图书馆里，15世纪“如梦似幻”的钟塔敲击着600年前富于变幻的钟声，16世纪的礼拜堂唱着赞美歌，17世纪的苍天梧桐树低吟着爱情，18世纪的人物肖像油画在墙壁上沉默不语地审视，19世纪的殖民风格圆顶和柱式阳台，20世纪的战争亡灵纪念碑，21世纪在地理边缘不断生长的现代建筑……还有，每个学院静谧的花园与庭院里，那些古老的或年轻的动植物的生命，悄无声息地指向繁荣、死亡与轮回，时间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英国的下午”。



1954年6月26日，英国玛格丽特公主（前左）接见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女子学院院长克莉丝汀·巴斯罗，并对她为学院修缮工程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

在800多年的牛津大学历史上，它曾是高级教士钻研学问的地方，是国王的避难地，是王公贵族和世袭贵族子弟读书的场所。14世纪，这里是欧洲的天文学和神学中心，自命为“墨顿计算者”的哲学家试着用数学量化万物，包括人的情感；17世纪，牛津的学院是俱乐部和绅士官邸的混合体，王政复辟后，上层社会的富家子弟以酗酒、赌博和嫖妓补充了牛津的考试大纲；18世纪，给贵族子弟当仆人来资助个人学业的贫穷学生与那些俱乐部的特权者构成了小型阶级社会；19世纪，美国人被牛津出身的人腰缠万贯、牛气冲天的虚荣和浮华吓坏，牛津被视为大英帝国的动力资源；20世纪，牛津的知识分子在唯美主

义与共产主义之间逡巡，抱着泰迪熊的贵族消失于基督教堂学院方庭的阴影里。然后，“二战”打断了牛津的时间，新世界诞生了。英国的世界秩序随着贵族阶级蒸发在挽歌的旧梦中，牛津在不动声色的古老建筑里，变得平等与多元——来自普通甚至贫穷家庭的牛津学生，在被贵族气息与显赫身世冲击与震慑，惧怕不被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体系所接纳之后，却发现其内里开放与自由的氛围。18、19世纪，牛津比剑桥更转向了人文主义，成为抗拒粗糙的进步主义的精神领地，成为文学与诗性的国度；20世纪60年代，牛津决定以它的姿态与节奏重获科学创造的生命力，在传统的堡垒学院之外，院系与研究生院成为牛津时间向前推进的发展阵地。时间在那些中世纪苍老而斑驳的建筑上消失了，在石墙的内里，现代性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阅览楼

贵族的等级秩序与英国的世界秩序已然失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袭贵族的子弟与公立学校禀赋过人的子弟一起接受本科教育；研究生的人数在老学院缓慢地增长，在院系则激进扩张；牛津大学的管理者开始来自英国之外，甚至牛津体系之外；梦想扩张英帝国版图的种族主义者的遗产，在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隐退的历史曙光里，成为服务世界的慈善基金。贵族从物质意义上已经隐退，但贵族的精神却统治着牛津。王室、公侯、伯爵的慈善捐赠，是过去的财富，通过历史传承，向牛津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资金支持；企业家仍然可以通过向牛津捐赠，跻身牛津的贵族阶层；学问家则可以通过卓越的智识创造与贡献，获得贵族的荣誉；那些融入牛津历史体系里去的普通家庭的学生，在感谢历史馈赠的机遇的同时，更感到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在牛津，你通过伟大的创造与利他主义的贡献而获得荣誉。在那些老学院里，本科生的教育仍然是贵族式的：学院用过去的财富和绅士的捐赠与回馈，确保本科生的数量维持着很小的规模，确保成本昂贵的一对一辅导课仍然能因材施教，培养独立和与众不同的个体——贵族教育的本质，就是教育一个高贵的人，教育这个人，就是教育全



牛津大学第一任校长罗伯特·格罗斯特

人类。你可以说它是一种特权，一种获得巨大财富与资源倾斜的特权，不同的只是，你若有过人的天赋与品格，你就有机会获得这种特权。牛津的学问，追求一种品位，这种品位，就如同一件充满细节的艺术品，在时间缓慢的流逝中，精雕细琢，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特质性，不在意转瞬即逝的名气，而在乎在悠远的时间里愈久弥香。牛津的学问因此要博闻强识，甚至有文艺复兴式的渊博，它推崇来自直觉的灵光乍现，认为它好于一切的工具理性——本质上，好的创造，是艺术。在牛津，时间要缓缓流逝。正如T. R. R.托尔金所说，大树之所以是高贵的植物，就因它“生长的缓慢与长成后的精彩，为它罩上了一层神圣感”。没有哪个地方像牛津这样，花园与园林在其精神世界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宗教虽然在牛津不再有曾经的权势，但一种宗教精神仍然感召着牛津人：基督教堂学院傲慢又高调的阔绰方庭，仅仅是世俗世界向精神世界的过渡地带，最终要在方庭的出口处，隐退到内心神秘的幽静中去。牛津人的时间观，是现世短暂与精神永恒的混合；闲暇与平凡的生活是如此值得珍惜，正如永恒的荣誉是如此值得追求，“就像你们会永远活下去一样学习，就像你们明天就会死去一样生活。”你若天赋卓越，渴望成为一个高贵的人，来牛津吧！

莫德林学院的时空

在牛津，静谧而缓慢流动的时间，有历史的荣光。

到达牛津的第一个夜晚，住在莫德林学院的宿舍楼里。从高街下车，走几步路，就是学院的门房。门房拿出一本手写的日历，翻了若干页，找到名字，名字后面用铅笔画了一道跨了5天日历方格的横线，

标识我在这里住的日期。“古旧做派”，我想。他递给我两把钥匙，分别开楼门和房间门。沿着小径，在幽微的路灯下，经过古老的礼拜堂与哥特式钟塔，穿过莫德林桥，宿舍就在查威尔河畔了，恍然感觉穿梭进另一条时间的河流，一时说不清它的古老年代。

宿舍楼走廊两侧是若干单人房，一层楼共用盥洗间和浴室。十几平方米的单人间，有一张窄床，书桌、衣柜、茶几、沙发虽小，一应俱全。做清洁的阿姨每天打扫，换上新的床单，再给茶几上的茶盘里换上新的咖啡包和茶包，搁上一袋饼干。这对大学生来说已够奢侈了，却远不及当年更奢侈的牛津宿舍。20世纪30年代留学牛津的翻译家杨宪益曾写道：“我住在楼厅上的一个套间，有一间很大的书房、一间卧室，还有一间餐具室，供仆人居住及做盥洗之用，但是没有浴室。每天早晨我得穿过四边形的院子跑到公共浴室去洗澡。每个大学生都有一名仆人，被称作他的‘侍从’。我的侍从是一位个头矮矮的中年男子，名叫霍华德。他对我非常好，我非常喜欢他。他把我的衣服及时地拿出去浆洗，每天早晨，我还没起床时，他就把我的皮靴擦亮了，把我该穿的衣服备齐、烫平，给我送来热水，供我洗脸、剃须。如果我要在住处招待朋友吃早饭、午饭或晚饭，他就替我订菜。”现在大部分学生都没有侍从了。

半夜醒来，窗外，河对岸的莫德林学院钟楼敲响了钟声。钟楼高耸入黑夜里，影影绰绰。楼下传来两个宿醉的年轻人的夜半高歌声，不知在哪家牛津小酒馆喝多了。待到清晨，目光可以在晨曦的泽被下跨过窗前的查威尔河和绿得要流出水彩来的浸水草甸，与那15世纪的大钟塔再次交汇。中世纪精神栖息在哥特式的精雕细琢里，它不仅如奥斯卡·王尔德所描述的那样金光闪闪，而且还因为一代代牛津人迷醉在它的梦幻尖塔里的诗吟，具有了灵性的神韵。窗边，郁郁葱葱的树叶正铺天盖地繁茂着，有几只富态的鸟儿在枝头歇脚，颤悠悠的，真担心它们一不留神踩滑摔下树去。

一个有点阴郁的下午，我们穿过那扇狭窄的哥特式拱门，进入到莫德林学院的内部世界。莫德林是牛津占地规模最大的学院，有超过100英亩土地，包括几片浸水草甸、大花园、沿河漫长蜿蜒的小径，甚至还有一个鹿园。牛津一直将学院视为其引以为傲的传统，非常珍视。这些学院曾是不同时期在牛津落脚的学术机构，与我们古代的书院有点像，后来就构成了牛津“联邦王国”的一个个自治领地。比如，莫德林学院是15世纪由温彻斯特主教兼英格兰大法官威廉·温弗利特创办的，更老的墨顿学院12世纪就有了，崭新如婴儿的沃尔夫森学院则建于20世纪。对一个过于时髦的牛津局外人来讲，学院倒显得更像个起居社交之地，在学术上却与院系的功能有诸多重合（牛津学生既在系里学习专业课，也在学院里接受此专业的辅导），让大学组织显得复杂臃肿，财政上也是多余的负担。崇古的牛津人则将其视为漫长历史自然繁衍出来的复杂而精妙的生态系统，高于人的智慧与理解，必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哪怕财政上有丰俭交替，也要守护传统。

穿过拱门，迎面而来的首先是圣约翰方庭。左右两边哥特式的石头建筑都在漫长的时间中变得有些斑驳。石墙的缝隙与坑坑洼洼里，盛放着15世纪和19世纪至今几百年的时光所留下的印渍。角落里有一座17世纪的文法会馆，经历了1828年火灾的劫难生存下来；正前方是院长寓所。从右侧的宫门进入方庭，奠基者之塔就在这里。这是一个仍然弥散着浓厚宗教气息的地方，耶稣基督与圣女玛丽·玛德琳的雕像就立在方庭前。奥斯卡·王尔德曾在这里的宿舍里住过，据说，这个文艺气质浓厚、家世卓越的美男子曾用丝绸铺满了他卧室的墙壁。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贵族约翰·拉斯金，并受到他审美观念的影响，成为一个惹眼的唯美主义者。19世纪的英国在王尔德的眼里是一个“阴沟里”的时代——理性主义、资本主义、机械主义、工业化正席卷欧洲，而牛津仍是个他能“仰望星空”的地方。他所推崇的拉斐尔前派艺术反对机械论风格主义，崇尚拉斐尔时代以前的古典美，主

张复古到15世纪，这也是那个进步时代在牛津留下印记最多的艺术派别，不少学院里都收藏着他们的绘画与壁画。

从奠基者之塔下方的门廊进入回廊，便来到小礼拜堂的门厅，装帧精美的拱形天花板上嵌有各式的百合浮雕。进入礼拜堂，左侧窗户嵌着中世纪制造的玻璃，描绘的是学院奠基者温弗利特。穿过沉重的橡木门进入礼拜堂的前庭，有一个19世纪蜡制的墓冢微型仿品和温弗利特父亲的石棺。牛津不少老学院的礼拜堂里都盛放着石棺（诗人雪莱的棺材就放在墨顿学院的礼拜堂里），还有一些埋葬着牛津名人的墓地（比如霍利维尔公墓），这些墓地很容易让人感到牛津城上空徘徊着拥挤的亡灵。这里还悬挂着一幅16世纪意大利画家蒋皮耶特利诺对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经典描摹，这幅帆布油画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随时间流逝不断提高，是学院的宝贵财富。这里也是唱诗班咏唱宗教合唱的地方，他们每周都会有日常的练声与听讲。



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英国作家托尔金（摄于1955年）。代表作《霍比特人》《魔戒》和《精灵宝钻》等

出小礼拜堂右转，经过一排“一战”阵亡学院成员的纪念碑，进入一条15世纪所建的回廊，沿过道前行，来到一处石砌的阶梯。拾阶而上，便进入学院食堂。食堂可以用古典堂皇来形容，比起哈佛大学富丽又势利的本科生食堂，它的规模虽小很多，但毕竟服务的只是牛津众多学院中的一个学院。食堂四壁挂着伊丽莎白一世和托马斯·沃尔西红衣主教的肖像画，遥想16世纪，学院接待英王詹姆斯一世时，他就是在这里用膳的。食堂中央两侧的墙上则面对面摆放着两位莫德林校友——丹宁勋爵和奥斯卡·王尔德的半身像。想到牛津学生的日常餐饮和学习常常都得在这些人沉默不语的注视下进行，不产生点对历史和传统的敬畏感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食堂里有几十张厚重的木桌，每张上面摆放着数个复古的台灯。位于食堂最里面的高桌是院长、教职员工和他们的宾客就餐的席位，就像在讲台上吃饭一样，是牛津老学院科层秩序的体现。每逢正餐，学生们穿着西装，打着黑领带赴宴，导师们站在高桌前用拉丁文做祷告，工作人员依次端上前餐主菜甜点，在酒杯中倒上葡萄酒，将贵族与精英意识熨烫进每个牛津学生日常意识最细微的肌理里，哪怕你可能根本就听不懂拉丁语。

离开食堂，沿着回廊往前走，便来到新馆。18世纪初的建筑对牛津来讲，真是青春年少。这座建筑与许多熠熠发光的名字有着亲密的联系：大学问家约瑟夫·艾迪生，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诗人约翰·本杰明，C. S.刘易斯……都曾在此居住过。沿着这里的任意一条小径走，想到在不同时间里，竟无论如何都会与大作家J. R. R.托尔金和C. S.刘易斯产生空间上的交集，跨国的怀古幽思油然而生。

穿过新学院的一道铁门，沿着环绕着浸水草甸的艾迪生小道走，便看见一片小园林里，鹿群正以骄傲的姿态游走，冷眼围观着路过的游客。继续走，是一片广阔的草甸。莫德林学院的指南里说，这些草甸上生长的白紫相间的花儿，是一种叫伊贝姆的植物，全英国难得一见，是牛津郡的郡花。这条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漫长小径渐渐将我们带到了一座桥前，这座桥通向学院教职员工的专属花园，把我们引入了

一片世外桃源般的仙境。在这片围合的花园里，右侧生长着成片的老法国梧桐树，左侧盛开着遍野的鸢尾花，鸟语花香。向左拐，一条椭圆形的围合小径环绕着坡地与草甸之间的小花园。这些梧桐树枝繁叶茂，枝杈纵横，像地下交织生长的菌类。也许正是那些参天古树的树梢上栖居的精灵，启迪了牛津奇幻文学传统的灵感，也许正是它们，不仅在奥斯卡·王尔德耳边低吟过爱情，而且还向托尔金传授了高贵的精灵族婉转、克制而细腻的“昆雅语”，矮人族的“克度祖语”，还有树人的“恩提什语”和骠骑国的“洛汉语”。

在近现代历史上，英国曾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但在更漫长的时间里，英国人对自然与田园有一种挚爱。在牛津，自然与花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他学院都与莫德林学院一样，有各自的花园与园林。牛津最富有的圣约翰学院，有一片奇妙的花园。在茂密的树林里，美国鹅掌楸、南欧紫荆、天堂树、珙桐、桉树、罕见的弯橡树、奇怪弯曲的魔栗树热闹地生长，据说，那儿光冬青树就有250种，共有2500种左右的树木。这是一代代业余植物学家努力的结果。1856年，美国作家威廉·霍索恩站在牛津新学院的树木下，曾写道：“它们几个世纪以来过着一种恬淡的生活，得到细致的抚养、关怀和保护，不受狂风的侵扰，它们必定是最幸福的树。好像它们是牛津大学永远的大学生似的。”“别处再也找不到这种隐秘、宁静、神圣、庄严的隐居地了。”英裔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在短篇小说《一位虔诚的朝圣者》里，也曾描写一位病膏肓的美国人再次回到他的母校牛津的情景。这位美国人对陪伴他参观牛津的朋友说：“我相信，欧洲没有别的地方能令我们野蛮的心灵如此深感钦佩的。”学院的园林是“英国最美丽的”，是“英国制度最成熟最甜蜜的果实……在那里，你可以永远躺在草地上，并幸福地相信，整个生活就是一座古老的英国大花园，时间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英国的下午”。可这田园诗般的画面是不是一个假象呢？这位美国人在牛津去世前也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是一个幸福的谎言吗？”也许我此时所能见到的宁静，的确只是一个短暂的宁静的幻象。1879年，年轻的诗人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曾

为牛津被伐倒的树木写了一首义愤填膺的挽歌：“我亲爱的白杨，你们稀疏的枝条被屠戮了/闪耀的阳光也被屠戮或扑灭，埋入落叶/ 全被伐倒了，伐倒了，全被伐倒了。”那也是英国最动荡的年代，最好与最坏、天堂与地狱共存的年代。

从小花园出来，再沿着艾迪生小道走上将近半小时，便绕行一圈，回到莫德林桥下。钟塔之间的繁枝，布谷的鸣唱，变换的钟声，迷人的云雀，环绕的河流……在这段静谧的旅途上，时间缓慢得几乎停止了流动，只有那些植物的生命悄然无息地指向繁荣、死亡与轮回。在这里，终其一生不疾不徐地追问生命的意义和精深的学问，好像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到了桥下，许多小舟正停靠在那里，随时准备在波光滟影里漫溯。日出时经过莫德林桥，桥下的露天餐厅与酒吧热闹非凡，足以把人拉回尘世。



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

初到牛津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去牛津剧院看了一场戏剧《翻译》。这是一部非常艰深的话剧，讲的是说威尔士方言的偏远地区的威尔士人，在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中，与英语的相遇和碰撞，剧中充满了方言和古英语。剧场座无虚席，不时爆发出笑声与掌声。牛津是一座文字化的城市，人们钟情于语言。英国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认为，这种语言的重要性，使得英语被首选为当代英国划分并界定社会阶级地位的标志。她写道："我们已经解密的语言密码表明，英国的阶级划分与钱无关，与职业的关系也不大，语言是最重要的。一位操上层口音，用上层用语的人，会被认为是上层阶级，即使他挣的工资仅够维持生计，即使他做着卑贱的工作，住着破旧的公寓，甚至即使他失业了，贫困潦倒了，无家可归了，他还是上层阶级。"牛津推崇人文学科，即便工业革命确立了新的知识和社会秩序，但在牛津漫长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段近现代新生命的骚动。牛津大学最盛产的、自认为最高贵的人，大概不是企业家和工程师，而是文学家、诗人、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也许正因为如此，牛津才被打上了"贵族阶级大学"的标签，"牛津腔"也与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

牛津历史上，它的确是高级教士、王公贵族和富裕世家子弟读书和钻研学问的地方，它的气质里难免杂糅着一些虚荣与浮华、冷漠与势利——17世纪，牛津的学院是俱乐部和绅士官邸的混合体；王政复辟后，上层社会的富家子弟以酗酒、赌博和嫖妓补充了牛津的考试大纲；18世纪，著名的词典学家塞缪尔·约翰逊因贫穷所迫，不得不离开牛津；那些给贵族子弟当仆人来资助个人学业的贫穷学生，与那些俱乐部的特权者构成了小型阶级社会；还有牛津城里被边缘化的工人阶级市民，他们生活在被忽视的冷漠中——你无法对牛津的阶级性装作视而不见。但这些贵族在牛津所留下的能存续的精神，并不在于那些早已被时间湮没的浮华财富或世俗权力，而在于对智识的热爱，以及对品行、审美以及一个高贵的人的不懈追求——我们爱称它为"英国绅士"精神。这一切，都凝结在语言中。也许正因为如此，即使见证了日不落帝国的崛起与衰落，已经成为世界级大学的牛津仍可以坦

然回归到它宁静的田园牧歌中。没有人比英国作家简·莫里斯更精辟地描述牛津。他说："令牛津区别于其他大学的一切最非凡之处，源自它已然失落的英国秩序——本质上是一个贵族社会，坚定、宽容，充满业余爱好，足够自信到可以在一个僵硬的框架下拥抱一种无穷无尽的多样化。英国绅士主宰着牛津，不是以肉体形式（因为他几乎已经从舞台上消失），而是作为徘徊不去的此地精神。"

基督教堂学院：消失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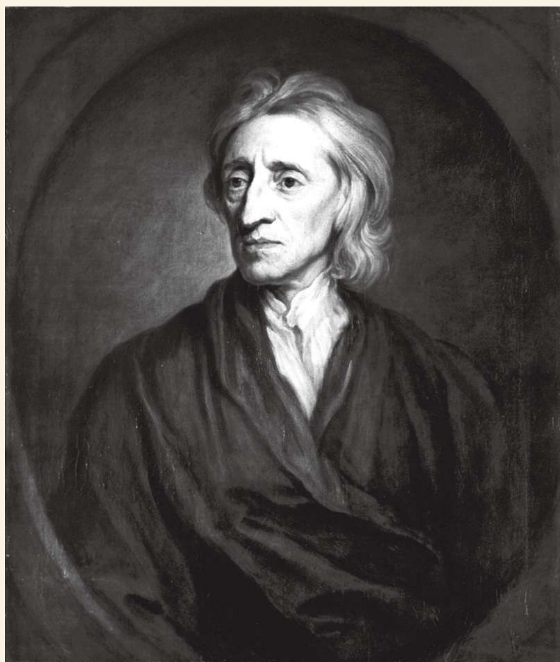
但在牛津最有贵族传统的基督教堂学院，提到高贵与特权却是顺乎自然的，因为贵族的堡垒已失去了时间，只留下精神。

来到基督教堂学院的大门前，门房依旧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身穿黑色西服，头戴圆礼帽。基督教堂学院的地位很特殊，不叫"学院"（college），而叫"院"（house），因为它同时也是主教座堂，是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和国王亨利八世建立的。与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一样，它被视为英国最贵族化的学院，出过13位英国首相和11位印度总督，当然还有大主教。掂掂那些举足轻重的名字：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文·威廉姆斯，哲学家约翰·洛克，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索尔兹伯里侯爵，英国外交家乔治·坎宁，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



英国外交家乔治·坎宁。18世纪就读于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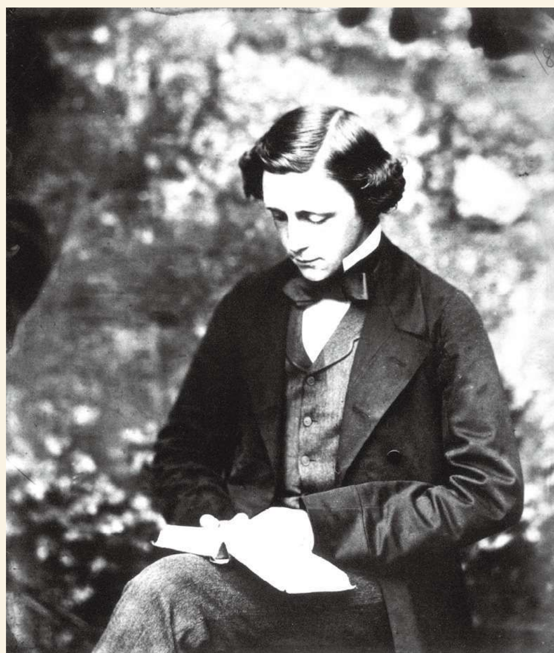
分量重得都够收名人税了。它的大教堂建筑、肖像画廊和古董宝藏使它成为牛津最富裕的学院之一。这些收藏品在坎特伯雷方庭的一个专用画廊，得益于校友约翰·吉斯和校友外交官威廉·福克纳·斯特兰韦的捐赠，有大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藏品，包括卡拉奇、廷托雷托、韦罗内塞、多梅尼基诺和伯纳多·斯特罗齐、安东尼·范戴克等画家的作品。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7世纪50年代就读于牛津基督教堂学院

门房给我们指了去院长克里斯托弗·路易斯（Christopher Lewis）办公室的路。穿过铁门，便是汤姆方庭了。这座长、宽80米的方庭气势恢宏，中央立着佛罗伦萨来的天使墨丘利雕塑，一侧矗立着巴洛克—哥特式的汤姆钟双塔。但路易斯院长的办公室不在这片方庭里。在基督教堂学院的建筑语言里，这片傲慢又高调的阔绰方庭仅仅是世俗世界向精神世界的过渡地带，最终要在方庭出口处隐退到内心神秘的幽静中去——路易斯院长就安静地隐居在方庭之后一片小得多的院子里。按照传统，路易斯院长也是主教堂的教长，由英国王室任命。满头银发的院长风度翩翩地从办公室的大落地窗前走过来迎接我们。跟随他过来迎接我们的还有他的猫。它原本正在漫无目的地闲逛，看到有客人来，就踱步过来迎客，步伐迈得比路易斯院长小了点，直到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它才终于赶到，在腿边蹭了蹭，“喵”地打了一声招呼，便翘着尾巴踱开了。1856年，就是在基督教堂学院的院长花园里，学院的数学讲师刘易斯·卡罗尔遇到了他的爱丽丝原型——院长的女儿，他给她讲的故事就成了奇幻小说《爱丽丝梦游仙境》。刘易斯·卡洛尔在基督教堂学院森严的等级制度里一直

担任教职工共用室执事，相当于后勤，保证同事们在那里有足够的报刊、写字用的纸张、茶和葡萄酒。“这么古老的地方真的有精灵吗？”我问。院长用他不动声色的温和回答把我拉出了奇幻世界：“至少我相信没有。”



刘易斯·卡洛尔。19世纪50年代任基督教堂学院数学讲师

卡洛尔是一个学者型的教士。中学毕业后，他曾在英国皇家海军待了5年，然后开始了他漫长的宗教研究生涯，直到博士毕业后来到牛津的神学院任教。宗教与王权一样，曾是牛津最有影响力的权势，但那些精雕细琢的巴洛克和哥特式教堂又并不像它们看起来的那么保守。卡洛尔说，如果说宗教在今天的牛津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更加多元”——从基督教的世界，变成了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多种宗教的共同存在。基督教堂学院的财富很大部分来自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宗教基金，每年大概有3.5亿英镑，仅次于牛津的首富圣约翰学院，除了维持教学研究外，维修历史性建筑也是很大一笔开销。除此以外，“旅游——门票费、会议费，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牛津老学院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与这种财政独立有关，而这些财富，又是“过去的历史”的赠予。学院也向校友筹款，在牛津，“学生的身份首先是学院，然后才是大学。他们变化最大、最戏剧性的青春期大多在学院度过，所以他们对学院更加忠诚”。但这些财富“比起财大气粗的美国大学，也只是适度而已”，卡罗尔说。

院长从他三面大白墙都是书的架子上取下两本册子给我们。其中一本介绍基督教堂学院册子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他的“院长日记”，

写的就是财务的事。他写道：“对筹款的罪恶的讨论，促使我对过往调查一番。结果发现，筹款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对我来讲，‘发展’作为一项职业是新近才有的事，但对学院和学校来讲，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发展。过去，基督教堂学院的院长、教士和辅导教师都要筹款，他们自己首先带头捐款，同时要求自己的学生捐款。……过去的捐赠人像如今的捐赠人一样慷慨。沃尔希主教和亨利八世赠送的建筑和田产足够学院每年产生3000英镑回报，然后还有封爵。内战期间，基督教堂学院曾经给查尔斯一世提供过庇护、会议室和金钱资助，查尔斯二世回报了学院。当时的院长约翰·费尔获得了1000英镑的领地特许权，作为查尔斯二世对修建汤姆钟的资助。学院通过出售这项特许权也获得了收益。不知道这项特许权最终卖给了谁，但汤姆钟是顺利地建成了。1760年，约翰·盖斯将军向学院捐赠了一批画作；安东尼·拉德克里夫捐赠了北边的佩克沃特方庭；学院的学生，后来成为大主教的理查德·罗宾逊捐赠了坎特伯雷方庭。一本精装的红色羊皮书上记录着他捐献的每一笔钱，最初是5英镑、10英镑，突然在1785年一笔给了6295.15英镑。还有一些神秘的捐赠者。1664年，与牛津没有直接联系的神秘人物威廉·舍尔斯顿向“国王的学院”捐赠了800英镑，最后这笔钱给了基督教堂学院，所以1665年，学院招收的学生名单中神秘地增加了一位，100个招生名额‘扩招’到101位。每晚9点零5分，汤姆塔上的钟都要敲100下，纪念建院时的100位成员，但那一年，敲钟数增加到了101下。此外，还有一些有用的小物件：W. H.奥登给高级活动室捐赠了冰箱，主要目的是冰冻他的马提尼酒；在成为布里斯托的议员之前，克里斯·斯基德摩尔向学院捐赠了一只海龟。”



1934年9月，牛津大学划艇队的队员在泰晤士河畔亨利镇进行训练

路易斯院长说：“学院的建筑看起来好像很老，一成不变，但建筑里发生的人与事却不断地在改变，内在是非常现代的。天文学、物理学、药学等院士，研究的都是当代问题，学院人的价值观、性格、研究、习俗等都在不断改变中，学院的传统只保留在一些传统的仪式中，内部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这是一个时刻发生着变化，灵魂非常现代，却又看不出变化的地方。昨天中午我与院里的一位天文物理学科学家聊天，他正在瑞士的CERN（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做粒子的前沿研究。昨晚我则与一位研究帕金森病的院友在一起。”对于一个现当代心灵来讲，建筑就应如现代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所讲的那样，是卓越的、有生命的机械。然而，基督教堂学院的古典风格里包裹着的是不断变化的、自由的精神，这种对传统的固守和与时俱进，让牛津人的气质有一种无所不在的悖论和异常固执的怪异。一个例子

是：直到今天，汤姆钟每晚9点零5分还会敲101下。这是因为1546年建院的时候，院规规定100名学生必须赶在晚上9点回来。那为什么是在晚上9点零5分呢？因为学院位于格林尼治以西1度的地方，所以当伦敦的钟显示9点零5分时，牛津实际上才9点，学院连时间的算法都要体现出自治精神，即“这里不是英国，而是基督教堂学院”。为什么直到今天汤姆钟还这样不厌其烦、一成不变地敲呢？牛津人的回答一定是：因为如此，所以如此。他们不假思索地这样做，就像与生俱来的基因密码一样。



1938年，英国女化学家多萝西·霍奇金（右）和朋友们在牛津大学。多萝西曾就读于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于196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今天，学院的本科生总数仍是420人。500年来，学院固执地维持着“一小撮”的数量，不扩招，“确保学院制一对一的高质量辅导，由每个领域最顶尖的人因材施教、面对面地授课，而绝不是一堂课几百人的讲座”。这种固守，使得基督教堂学院的本科生入学选拔非常严格。“它非常精英主义，也很贵族主义。”说到这两个词的时候，路易斯非常坦然。他说：“入学考核非常关键，分数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面试。我们所寻找的人，最看重的品质，是独立的、原创性的思想，对他自己所学的、所做的事有清晰的自知。在牛津大学的辅导式教学体系内，你必须学会辩论和驳斥，这是最重要的技巧。牛津的教育，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不同意，相互辩论，甚至是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相互不同意之上的。在牛津，必须得会说‘不，我不同意’。这样的对话才会让人兴奋，才会势均力敌有意义，这也是非常个人化的互动。在其他地方，当你学业

上有困惑时，你可以听讲座，可以上网、去图书馆查资料，但在牛津，你讨论这种困惑，并且辩论它。在牛津，你学的不仅是知识，而是真正的思考，是对信息的辨别力和鉴赏力。你如果学的是医学，你需要知道为什么学习这些知识，自己在做什么，能做什么，处在什么位置，能往哪里去。”路易斯说：“基督教堂学院的确是个有特权的地方。无论是从它的财力，还是从它投入到每个学生个体的教育资源上讲，它都是个特权机构。我谈的是本科生。传统上，本科生教育一直是牛津和剑桥的重中之重，学院制的本科教学是非常昂贵的，它很耗费人力。”

大概只有英国人才会这样毫不避讳地谈及“特权”。路易斯说：“这种特权的感觉不需要刻意去培植。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每天所接触的人，所用的食堂、图书馆，还有所居住的建筑与场所，潜移默化地熏陶着这种精英和贵族意识。他们来到这里，会立即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当父母或朋友来这里拜访他们的时候，这种意识会更加强烈，在这种氛围里，他们自然而然地会形成精英主义的自我意识。”而牛津的学院制还给了这些本科生一种与众不同的友谊，“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在规模严格限制的小学院里共同生活，共同进餐，参加社交活动、体育竞赛、舞会等，都让他们形成了非常紧密的个人联系。包括辅导课，目的也在于形成个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如果说美国大学注重的是个人主义，那么牛津大学更注重集体主义和同学之间的充分信任感”。



英国上议院议员迈克尔·道布斯勋爵是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1968级毕业生

要基督教堂学院挥去它的贵族气质，无疑是对过往自欺欺人的否定。英国作家伊夫琳·沃挽歌式的小说《重返布莱兹赫德庄园》（1945年），将基督教堂学院在我脑海里的形象长久地定格在大英帝国荣耀伤逝的背影里。在这部小说里，贵族塞巴斯蒂安就居住在基督教堂学院，那是个烟笼碧绿的牛津，流光溢彩、盛世却正抽身离去的基督教堂学院。“在她空阔、安静的街上，人们像在亨利·纽曼时代那样走路和说话……钟声清晰地高高飘过山墙和圆屋顶，散发出几个世纪青春的柔和气息。”在学院里，“喧闹声响遍每个角落……我们开舞会。在我居住的四方院子的前排楼房下已经铺起地板，支起帐篷，在门房周围摆满了棕榈和杜鹃花”。贵族大学生塞巴斯蒂安是这样出场的：“他穿条浅灰色法兰绒裤子，白绸上衣，打了一条时髦的领带，上面印着邮票图案。”他有一辆敞篷双座摩托车，就停在冬季的花园外，玩具熊放在车上。贾斯珀是这样向新入学的堂弟查尔斯传授牛津经验的：“……你是学历史的吗？一门相当不错的学科。最坏

的是‘英国文学’这一科，其次要数‘现代伟人传’。你或是争取第一名或是第四名。任何中间的名次都没有价值。……你得去听最好的讲演——比如说，听阿克赖特论述德摩斯梯尼讲演，衣服嘛，就像你在乡间那样的穿着。千万不要穿花呢上衣配法兰绒裤，永远要穿成套的衣服。到伦敦裁缝店去做，那里剪裁好，赊欠的期限也长……现在参加卡尔顿俱乐部，二年级一开始，就参加格里德俱乐部。如果你要参加大学生俱乐部的竞选，首先在坎宁或查塔姆俱乐部把你的名声扬出去，然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学院学生的宿舍混合着骚动与恬静：“房间窗下种了紫罗兰，在夏天的夜晚，房间充满了花香。”学生们在宿舍间串门，讨一杯酒喝，或高谈阔论，“喝香甜的热葡萄酒，炉火熊熊，由于净谈抽象理论，房间里充满烟味和香味”。



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哥特式建筑

那个旧世界，随着塞巴斯蒂安在酒精火焰里沉沦，随着“二战”的硝烟，已成为过往。路易斯教授说，今天的基督教堂学院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研究生的数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不断增加，到现在已经有200人。这个数目虽小，但考虑到对任何变化都要深思熟虑，传统上又如此有贵族传统的基督教堂学院来讲，已经很戏剧化了。”而即使是本科招生，“来源也比过去更多元。一些公立学校毕业的学生，如果天资禀异，也有机会进入基督教堂学院”。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英国经历了在全世界都在发生着的平等化。基督教堂学院在它那不动声色的古老建筑的外表下，也出现了变化。


基督教堂学院院长克里斯托弗·路易斯

我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上议院拜访了一位基督教堂学院的毕业生，上议员迈克尔·道布斯勋爵（Lord Michael Dobbs）。他是1968年进入基督教堂学院读的本科，专业是政治、哲学与经济。穿过贵族院充满繁复建筑细节和复杂隐喻的历史感的大厅，道布斯迎接我们，然后，他带领我们穿过威斯敏斯特前的街道，去他的议员办公楼。道布斯说，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我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我的爸爸15岁就辍学了，妈妈上学只上到14岁，我没有任何背景。”在申请牛津的时候，“我对它真是一无所知”。能被基督教堂学院录取，坦率地讲，真有点光耀门楣的感觉。但踏入那个连空气都弥漫着贵族气息的地方，道布斯最

初“不知所措，强烈地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无法被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体系所接纳”。

他回忆刚进入牛津时的生活：“崇高感的教堂，满是珍贵古籍的图书馆，总是散发着地板蜡和汗水味道、富丽堂皇的餐厅——那儿可曾经是内战时查尔斯一世的议会所在地。我最初完全被吓住了——正餐上满是优雅的拉丁语，我什么都听不懂，只觉得充满了神秘感，有时也会沮丧万分。同学里不少来自公爵、侯爵、伯爵家庭，更有不计其数的勋爵后代，但像我这样的人也不少。”他说，他很快适应了新环境。“与这种表面的历史性、贵族气非常相悖的，是人与人之间私下里非常开放、轻松和平等的关系。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那些显赫的背景，不可避免地会对我这样普通家庭出身的人冲击巨大，但它的内在却没有让我感到任何压迫感。我结交了很多同龄的青年，并被他们选为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最终，我在那里如鱼得水，生活刺激又兴奋。我还能在学院宽敞的宿舍里一住就是三年，享受一个客厅。每天早晨侍从会敲门送来一杯咖啡，整理床铺等等，从来不需要自己做饭，在查尔斯一世待过的学院餐厅吃饭就行了。牛津学院内的宿舍实行的是轮换制，一般一年就要换一次，很多人‘大二’就得搬到学院外面去，自己租房子。”

道布斯的大学生活贯穿了社交活动。“学术上仅仅是过得去，我从与人交往中学到了更多。40多年前结下的友谊，对我来说终身受用。牛津的学院制让这种个人友谊和关系非常紧密，这些校友在这么多年来给我许多建议，许多指导，许多帮助，真是这样。今天晚上我就会去见我的一位校友，我们是在牛津的第一周结识的，现在我们在制定外交政策上有许多合作。我慢慢开始喜欢那些历史和传统——它们给你一种根的感觉，给你一个系统，让你更知道往哪里去，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并成为这个传统的一部分。”



在牛津大学校园享受闲暇的学生情侣

但在牛津这样的地方，“考试是必须要通过的，必须要证明自己是个聪明人”。所以，道布斯的记忆里充满了与小伙伴在宿舍里通宵奋战，分工读完厚厚几本书，再相互复述概括书本的内容，第二天清晨蓬头垢面，穿着睡裤直接去见辅导老师的趣事。在牛津气氛的熏陶下，道布斯说，他最大的收获也许是：“我感到自己也要有所成就——那些首相、大主教、伟大的思想家与艺术家，也曾在这里，与我一样的地方，开始自己的人生。在餐厅里，亨利八世的全身雕像就在那儿，约翰·洛克、约翰·威斯利、威廉·格莱斯顿、W. H.奥登的画像就挂在墙上。他们是历史，但历史还在前进着，我能创造我自己的历史。这时我会感到，在牛津你得到了最好的机会，也必须履行自己的历史义务。”大学毕业后，道布斯进入了英国政界。做过约翰·梅杰首相的保守党副主席，然后又成为他的牛津校友撒切尔夫人的助手。他融入牛津的传统里，同时也成为一位作家，以他的一系列政治小说和历史小说（有一本是关于丘吉尔的）闻名英国，其中那本《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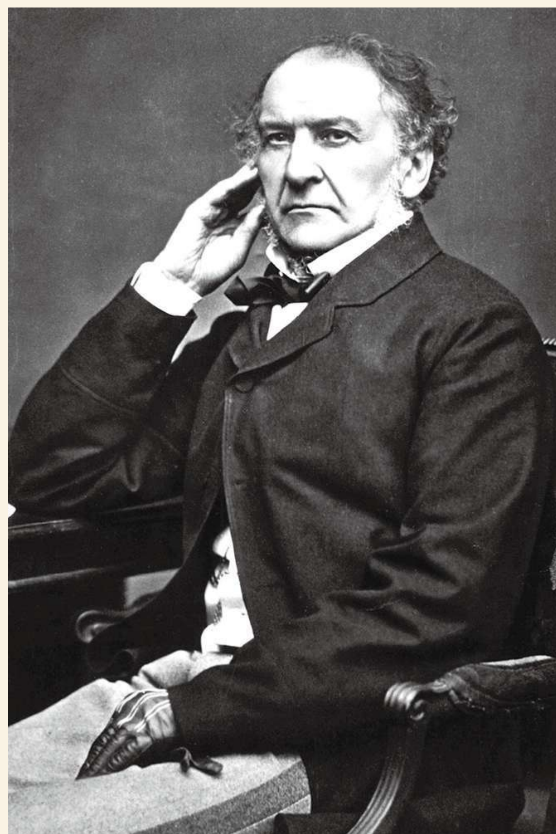
牌屋》让他名扬世界。不久前，他回过基督教堂学院，参加同学聚会。“毕业十年相聚时，大家年轻气盛，总想比比自己都成就了些什么。现在这个岁数，聚在一起，就能心平气和地回忆些往事了。”他也是母院的积极捐赠者，正因为如此，他在伦敦罗斯柴尔德勋爵府邸的演讲还被刊登在基督教堂学院的院刊上。



牛津大学王后学院的餐厅

路易斯院长说，牛津式的学问，就是：“当你成为一个医生的时候，你不只是一个机械意义上的、技术性的医生，而是清晰地知道，自己置身于什么样的医学传统中，将来还能做出什么创造，让自己也成为这传统的一部分。一个牛津毕业生，毕业后与其他学校的人一样成为一名律师，但他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个处理现实具体案件的律师，他还熟悉罗马法，他知道什么是法，以及为什么选择这种法，他具有那种深厚的方法论——如何学习的能力。正因为如此，一个牛津历史系的毕业生，如果毕业后成为一名银行总裁，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问：“你也可以期待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牛津历史系

毕业生，毕业后成为一名银行总裁吗？就像你可以期待学习古典学的鲍利斯·约翰逊成为伦敦市长这样的例子，在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牛津毕业生身上发生吗？”路易斯说：“在这里，在牛津，这绝对是可能的。‘二战’后的牛津本科生，来自很多元的家庭背景。他们来到这里，因为他们有杰出的学术成就和潜力。他们都有足够的天赋和禀赋成为银行总裁和伦敦市长，无论学习什么专业。牛津已经是个现代的牛津。牛津人的学习与判断能力，将让他们可以适应任何时代的变化。”



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19世纪就读于牛津基督教堂学院

结束采访时，他带我们参观他院长办公室的花园。一推开落地窗，满园草地的绿色扑面而来，那只猫也踱步出来，如影随形。路易斯带我们跨过草地，在一个角落里，他养了一窝鸡，这样每天早晨就能吃到新鲜的鸡蛋。在花园一侧的石拱形通道里，停着他的自行车。他每天骑车来这里，再骑车回家。在美国，当使用“高贵的”（noble）这个词，会冒着立即被人蔑视的风险，因为它带有势利的阶级含义。但在牛津最有贵族传统的基督教堂学院，提到高贵与特权却是顺乎自然的，因为贵族的堡垒已失去了时间，只留下精神。

墨顿学院：关于创造力

牛津是一个热爱知识与精神成就的地方。

沿着基督圣体学院旁一条狭窄的石板路，找到墨顿学院的院长楼。杰西卡·罗森女爵（Dame Jessica Rawson）的办公室就在那里。走在“牛津的最后一条石路”上，脚下仿佛流淌着中世纪鹅卵石硌脚的触觉。墨顿学院创建于1264年，是牛津“学院制”的始祖，被称为“学院之母”。它开创了学院的财产捐赠和学院自治的传统，充分自治的学院就像是拥有私产的联邦州郡，是牛津松散的组织构架的核心。在墨顿学院，你能看到古老的中世纪图书馆，嗅到木头和皮革的气味。那里有1300年的图书目录分类：赞美诗、《约伯记》，亚里士多德、托马斯·冯·阿奎恩、奥古斯丁等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著作。20世纪30年代，学院对新生管得还很严。翻译家杨宪益曾这样回忆道：“院章规定，每天晚上9点以后，男生不得在学院范围内接待女生；外出的学生在晚上10点以前必须返回校园，过了10点校门就锁上了。……还设置了一些名为学监的管理人员，负责把学生赶出小酒店。”如果晚归，“就得爬墙而入，或者从运煤通道滑落下去。墨顿街上有一条通向墨顿学院的煤溜子。你只要拉开人行道上的一块盖板，从洞里钻进去，就能从煤溜子上滑进学院内的储煤室”。如今，这些纪律松懈多了。

来到院长楼，沿着铺着红地毯的螺旋形旋转扶梯，在墙上王公贵族威严的油画沉默不语地注视下，到了二楼杰西卡·罗森的房间。这位英国的考古学泰斗从剑桥赶过来，正在等候。她迎面施展了她英国式的尖刻。“你搞错了我的头衔。”她批评道。在见面之前的邮件往来中，我把她的头衔叫成了“教授博士”。

我还没有来得及提问，罗森爵士首先反问我，为什么英国大学更有创造力？她由此开始了对牛津大学的讲述。“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制后，国王大力资助科学家，推动了创新的竞争。剑桥和牛津人开始仰望星空，追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这种纯粹的智识

的好奇才会孕育出‘宇宙大爆炸’这样的伟大理论。苏格兰是英国自然条件最艰苦、最穷的地方，却有英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正是因为穷，他们潜心思索探求学问，追求智识上的成功。荷兰、葡萄牙曾是欧洲的边缘，也正是它们最早进行世界航海冒险。创造的动力，往往来自贫穷和匮乏，而不是财富。”墨顿学院初建时，它的院规就已定下：“只接受那些品行端正、有礼貌、温和、谦逊、贫困、学习能力强、渴望进步的人。”它是一个仰望星空的学院。早在14世纪，这里就是欧洲的天文学中心和神学中心。当时，该学院的一群哲学家自命为“墨顿计算者”，因为他们用数学的方法分析一切，甚至想精确地计算像罪过和恩惠这样无法量化的事物。这与20世纪30年代有关牛津的各种回忆录里所呈现的贵族子弟的浮华与脂粉气是多么不同啊。然而，那些瑰丽风雅的世俗贵族传说虽让牛津更加迷人，甚至为它笼罩上难以接近的神秘魅力，却不是得以永续的牛津精神。罗森教授说，她自己就出生在普通家庭，考上剑桥时，她对中文产生了兴趣，“喜欢中国字、中国书法，也喜欢研究物品，物品里有很多的故事”。这种纯粹的兴趣让她选择了考古学，“那时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对一个学习中文的考古学者来说，这真是一个冒险的选择”。从剑桥毕业时，她的父亲去世了。她必须立即赚钱养家，就在政府里谋了一个职位，工作了两年。但她始终还是想去从事自己喜欢的考古学，所以当她有机会去大英博物馆工作时，“虽然薪水比政府部门的还低，也更加没


墨顿学院时任院长杰西卡·罗森女爵

有权势，但还是去了。那不是一个什么富裕又有闲暇的生活，仅仅是因为热爱。而且我认定，中国很重要，对世界也很重要”。



牛津大学数学系的一堂工程应用数学课

在大英博物馆与各种古物相处的平静岁月里，她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慢慢孕育出果实。她特别喜欢青铜器，通过青铜器，她窥见商周的礼仪程序；她也很喜欢上古玉器，她发现商代妇好的墓中有许多被重新使用过的上古玉器，就开始研究上古玉器在后期的保存和重新使用；她也喜欢研究墓葬，古代墓葬就是墓主与建造者的小宇宙和世界观；她在伦敦筹办了康雍乾盛世的艺术精品展，向英国与西方重现了中国的三朝盛世及其艺术内涵。她的“女爵”头衔（相当于骑士）与出身和财富完全无关（头衔也不意味着任何物质性资源的给予和倾斜，是一个纯粹的荣誉称号），是为了表彰她对中国研究的突出贡献。难怪，她对头衔有一种顽童似的骄傲情绪。



1922年6月，英国律师、保守政治家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左）和美国前总统威廉·塔夫脱（右）等政要前往牛津大学接受荣誉学位

“贡献”，这是个比英国人张口即来的虚伪还容易流于虚伪的词。罗森说：“去牛津的医学院看看。牛津的维康医学基金会（Wellcome Trust）正在那里资助全球性健康的研究。我们研究疟疾，但这种疾病在英国早已绝迹，为什么还要研究它？我们在越南、马来西亚和全世界很多国家开设医院，研究英国并不存在的地区性疾病，为什么？盘尼西林难道不是造福全人类的吗？”“我谈的正是利他主义。”罗森说，“我研究中国考古，从小处讲，是为了我的国家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从更大处讲，是为了全世界能更好地理解中国。”“难道那些伟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没有给创造者带来财富吗？难道工业文明不是利益和财富驱动的吗？难道殖民主义可以被冠以利他主义的动机来解释吗？”我充满怀疑。罗森说：“如果只有

殖民和财富的梦想，那些财富与名字就会随着历史的曙光消失和被人遗忘。而我们是在用过去几百年累积下来的财富，创造未来。”



2003年7月2日，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左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左）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一同出席牛津大学曼德拉—罗德基金会成立仪式

牛津的时间与历史是一直连续的吗？罗森说：“不是。不要被窗外那古老的建筑所蒙蔽。那些建筑一直保存下来，仅仅是因为它们最初就是石头所造而已。在石头围墙的深处，发生了很多次历史的变革，有时甚至是激进的——牛津是一座思想家和探索者、怀疑者和改革家的城市，发生过宗教改革、政治改革、牛津运动等等。不久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英国历史重大的断裂。英国人尊重传统，但在牛津，你必须学会挑战权威，反抗权威，就像你必须学会与教授辩论，挑战他，甚至驳斥他一样。而新大陆的美国，本质上是牛津与剑桥精神的延续，虽然英国的秩序已然消逝。”

800年的岁月沉淀和贵族的慷慨捐赠（学院最大的方庭就是博学多才的亨利·萨维尔男爵出资修建的，向学院捐赠是财富精英进入牛津贵族阶层的最直接途径），让墨顿学院非常富有——古老的藏书与艺术品、庭院、花园与地产，都是墨顿的财富。正因为富有，墨顿能慷慨地资助贫困生。800年过去了，墨顿仍然遵循着古老的院规，接受那些贫困、学习能力强、渴望进步的人——罗森教授说，今天墨顿学院60%的学生都来自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他们毕业于公立学校；而在过去50年里，“英国社会的流动性有增强的趋势，体育、演艺、媒体等领域产生了很多才华横溢的人，他们突破了阶级”。

一个阳光充足的下午，我们游览了墨顿学院的花园。在路边花坛里，桂竹香、半篷草、白色的紫露草、红色的火百合花拥挤在一起。那棵1705年栽种的穗花槭树，是J. R. R.托尔金当年最喜欢的树，他也曾是墨顿学院的院士。他热爱古英语，曾在墨顿教英语文学，创造出奇幻的霍比特语和魔戒传说。他爱这里的花园与树林，就像他爱他的家庭与故乡一样。他曾说，壮丽的《魔戒》之所以结束在一个哈比人的家里，就因为所有的战争、英雄和无所畏惧的行动，并不比每天的平凡生活更具价值和值得称颂；而占据他思想的，却又是“死后的冥思”，“进入超越一切的永恒荣光”。托尔金因他的文学成就而获颁英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大英帝国司令勋章。牛津是一个热爱智识与精神成就的地方，就如曾被牛津封为圣人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德蒙德曾说的那样：“就像你们会永远活下去一样学习，就像你们明天就会死去一样生活。”

财富的精神：牛津与世界

国家与世界在变化，知识在爆炸，复杂的牛津机体也在不断变化、演进，以适应周遭的世界。

牛津在全世界最负盛名的基金会，毫无疑问当属罗德（又称“罗氏奖学金”）。基金会在大学机构的影响力和权势，最初是在费孝通的《留英记》里无意间读到的。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一直是罗氏（这里大概应是罗斯柴尔德）基金培养的人物。那时在讨论课上还听不大懂课、躲在墙角里抽烟的费孝通，突然被马林诺夫斯基那双高度近视的眼睛看上了，马氏主动提出要当他的导师。费孝通分析，这是因为马林诺夫斯基在哈佛遇到了怀揣司徒雷登给罗德基金会介绍信的吴文藻。罗氏基金会正资助马氏的学生们在非洲进行人类学调查，吴文藻则怀揣一个在中国开展“社区研究”的计划。这个计划深得罗德基金的赞许。马林诺夫斯基非常敏锐地决定，要培养一个自己的学生在东方为他的学派开拓一个新领域，这就选定了费孝通。看，一个学术基金会可以是一条联结世界的隐形纽带。



罗德基金会创始人塞西尔·罗德

牛津的罗德基金会有“全球本科生的诺贝尔奖”之称。这条线索可以拎起一串全球精英的名字：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加拿大总理约翰·特纳，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和托尼·阿博特……还有30多位德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著名将军和军事家，70多位跨国企业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50多位教育家和一流大学的校长，上百位发明家和科学家，20多位奥运会金牌得主，以及世界知名的音乐家、艺术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和平主义知识分子，可谓群星璀璨。拜访罗德基金会所在地——位于牛津大学公园南路的罗氏基金会宅邸，也就是题中之意了。

罗德基金会主席、前任牛津大学校长约翰·胡德（John Hood）定下的采访时间是我到达牛津的第一个中午。初来乍到，唯恐迷路误了时间，就提前出发，结果早到了一小时，在那有着小型罗马风格圆顶和柱式阳台、帝国姿态缱绻的罗氏宅邸前徘徊。大概是可疑的行径引起了门房的注意，他就安排我进门去，在一楼的会客厅等候。穿过一条简洁的长廊，经过那座小型圆顶，穹隆上刻着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罗德奖学金获得者的名字，相当于一座纪念碑，碑尖上端坐着一只津巴布韦（旧名罗德西亚）传说中的神鸟。地面上嵌着一块采自马托波山的花岗岩石板，罗德就埋葬在马托波山里，石板上刻着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前厅门上方写着贺拉斯的豪言壮语：“我不会完全死去。”这座20世纪初诞生的建筑在牛津的历史语境里显得很质朴，是殖民地风格和传统英国乡村别墅的结合。

罗德基金会的创始人塞西尔·罗德（Cecil John Rhodes）曾是牛津的学生。他的人生是以大英帝国的殖民历史为背景的。这位牧师之子的童年在南非纳塔尔的种植园度过，青年时代去往金伯利钻石场，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援下，收购当地的小型钻石矿场，通过与伦敦的辛迪加结成伙伴关系，建立了他在世界钻石行业的垄断地位，后来创立了德比尔斯钻石公司。19世纪80年代，他又买下了开普敦的葡萄园，建立了罗德水果农场。1873年，罗德入读牛津的奥利尔学院，深受约翰·拉斯金大英帝国观念的影响，积极扩张英帝国殖民版图，梦想在开普敦与开罗之间连起一条红线。他在48岁去世时，立下遗愿，在牛津设立罗德奖学金。那时，地球上四分之一的陆地都在大英帝国的治下，罗德则是世界首富。他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想依靠一群遍布全世界的牛津大学统治精英，使历史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他在其设立基金的遗嘱附录里将德国和美国也包括了进去，希望“教育作为最强大的纽带”，能使“三个最强大国家之间共同谅解，避免战争的发生”。要是塞西尔·罗德只有他的钻石矿和带着殖民时代局限的帝国扩张梦的话，他的名字也许早就随着殖民史的终结而被世人遗忘了。然而，他最终以罗德基金这一伟大的行为，使自己“没有完全死

去”——一个世纪以后，罗德基金的帝国时间已慢慢消失，基金会的一代代托管者不断纠正着人种主义、帝国主义的谬误。就如今天，总资产超过3亿欧元的罗德基金会，是由约翰·胡德，一位新西兰绅士来管理的；而在拥有40多万册图书的罗德宅邸里，你可以查到反奴隶制联合会、反种族隔离运动和殖民地历史的许多文献。



牛津“天使与儿童”酒馆。文学家C. S.刘易斯和托尔金常来的地方

穿过穹顶和前厅，经过一条狭长的走廊，便是会客厅。我正定神过一遍问题，约翰·胡德听说有人等，推门大步走了进来，直接在沙发上坐下，开始采访。约翰·胡德是位非常成功的新西兰工程师和商人。他所涉足的领域从矿业、建筑、建材、石油、甲醇、林业到水资源，不一而足。很惊讶于他怎么能同时涉足这么多行业，他解释说，这得益于新西兰是个很小的国家，所以新西兰的公立联合企业会同时涉足很多商业领域，而且有着全球的商业网络。那段从商的经历让他对世界的巨变有很清晰的感悟。“早些年的时候和许多国家取得联系。但世界正在发生令人兴奋的变化。”他说，“我并未考虑过商业

上的成功是否得益于新西兰是英联邦国家，所以才有这些全球机会，但我的确生长在一个有着英国传统的国家。”1976年，胡德申请了罗氏奖学金，经过在奥克兰和惠灵顿的面试后，他获得了奖学金，来到牛津，学习经济学和工业社会学。罗德宅邸是他们这些奖学金生的活动场所之一。“除了在我所在的沃尔夫森学院学习，我们也在这里上课，也有正餐、社交活动和体育运动，所以奖学金生之间有各种机会相互认识结交。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一旦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永远知道你可以找谁去谈。大家的关系充满了私密的、非正式的轻松。”

在牛津的那两年，胡德回味无穷。他说：“对于一个远道而来的小国留学生来说，那段经历是变革性的。充满智慧的课堂——我仍然记得德里克·马尔斯爵士和唐纳德·海伊德的经济学课，俱乐部的社交活动，四季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离伦敦如此之近，与有声望的学者、政治家、律师交谈，从不缺少的音乐会，还有过多的酒。”回到新西兰，他担任过奥克兰大学的校长。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了来自牛津的招募电话：“按照牛津的传统，下一任校长需提前15个月指定。当时，英国政府通过了法案，要求大学从校外遴选校长。我想我是很多备选人中的一个。我来到牛津，参加了一场长达三天的面试。面试结束后，我成为牛津历史上第一个从牛津大学体系之外来的校长。”他与牛津和罗德基金会的渊源，使他在辞去校长职务后不久，又再度回到牛津，成为罗德基金会的主席。

一个世纪后，罗德基金会已经超越了种族主义者罗德的生命与他的时代。来会客厅的时候，走廊里挂着一幅曼德拉的画像，印着“曼德拉—罗德基金”。胡德向我解释，1993年，罗德基金会与曼德拉合作，一起建立了这个基金会，让南非的学生能够在南非大学里完成4~5年的学习，将罗德的价值观与曼德拉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这是对源自南非的罗德遗产的一种认可，因为正是在南非，罗德创造了他的财富。”1993年，那正是一个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年份。在那个

历史进程中，英国人再次正确地站到了时间的一边。胡德带我们参观罗德宅邸。一楼会议厅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国际法庭的模拟辩论会，席间有很多来自中东、戴着头巾的女学生。厅内墙上的两张照片特别引人注目，一张是年轻的曼德拉，一张是比尔·克林顿。穿过会议厅，有一间偌大的肖像画室，墙上陈列着历任罗德奖学金管理者的画像。出了画室，穿过一扇厚重的橡木门，我们来到宅邸的大花园里。胡德说，天气暖和的时候，基金会的校友们就在草坪上举办酒会，在葡萄藤架隔出来的那片空地上，时常会有戏剧上演。胡德说，精心打理这片花园的，是一位牛津大学的硕士毕业生。对一位英国绅士来说，成为一位显赫的慈善基金会的花匠，是一件非常得体和惬意的工作。

一位新西兰人管理着牛津大学和它最重要的罗德基金，对牛津所发生的变化和它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隐喻了。胡德说，他出身于新西兰的一个教师家庭，他的父亲当过学校的校长，在大学短暂地教授过教育培训方面的课。他并不是来自什么世家。他在牛津时，是在沃尔夫森学院读书（“二战”后新生的研究生院），他没有加入英国国籍。他告诉我，当他面试牛津大学校长时，他是这样陈述治校理念的：“大学是关乎人的非凡的无限潜能得以发掘与施展的地方。这些潜能存在于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中——每一位学生和每一位学者，并与他们的梦想和欲望共存。大学的作用，就是让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实现他们的激情和愿景，并通过有效的和隐形无名的服务来实现。”“国家与世界在变化，知识在爆炸，复杂的牛津机体也在不断变化、演进，以适应周遭的世界。”英国绅士的哲学与精神依旧治理着牛津、掌管着牛津的财富，尽管英国的秩序已失落，世界的秩序却正在悄然形成。



牛津宽街上的阿什莫利博物馆展室

另一个代表着牛津举世无双财富的地方是宽街上的阿什莫利博物馆。它的规模仅次于大英博物馆，有无数珍宝，是英国最古老的艺术、考古学和博物学的公共博物馆。它的历史始于园丁。约翰·特莱德斯坎特是斯图亚特时代的宫廷园丁，花园、葡萄和桑蚕的护理人，是一位植物学家和植物狩猎者。他在考察旅行时，尽其所能地收集世界上的奇珍异物，包括自然物品、艺术品、具有异国情调的和奇特的东西。人们称这一收藏为“特莱德斯坎特方舟”。他的儿子在伦敦的兰贝司城区将它们公开展出，供人参观。“特莱德斯坎特方舟”能够停泊到牛津大学，则是伊莱亚斯·阿什莫利的功劳。他是一位衣着华丽、面色苍白的绅士。他接收了约翰·特莱德斯坎特的珍品陈列室，将它连同他自己以硬币为主的收藏捐赠给了牛津大学。19世纪，博物馆又增添了很多牛津大学的雕像、画作、绘图和古董收藏。

博物馆的藏品全部来自私人捐赠。馆方安排我们参观中国现当代艺术馆，这是一个永久的馆藏，捐赠者叫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他出生于加拿大，幼年随父母移居英国，是一位骨子里的英国绅士，也是英国艺术史家、汉学家，牛津大学荣休院士。他曾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的现代美术。1939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随国际红十字会来到成都，在成都的博物馆里教学和工作，参与过王建墓（永陵）的挖掘，也在考古学家郑德坤那里工作过。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一批后来成为大师级人物的画家：齐白石、张大千、吴冠中、庞薰琹等；20世纪80年代再次回到中国，又结识了黄永玉、朱德群、吴作人等。1984年，他结束了在斯坦福大学的任期后，回到牛津，在牛津终老。这个小型的中国现当代艺术馆就是在他的支持下建的。

在朴素清雅的展厅里，摆放着苏立文牛津家中的小桌子和挂在他们家门楣上的牌匾。给我们讲解展厅作品的女孩毕业于墨顿学院，是杰西卡·罗森教授的学生。她说，这种摆设是为了怀念苏立文家中那种氛围："他的家是我们很多人的回忆。世界各地的学生、学者、朋友都来他家做客，随时都有一种很坦诚的学术交流气氛，永远洋溢着欢乐。"这些展品，讲述着一位英国绅士与中国画家高山流水的友谊：所有的画，都是中国画家赠给迈克尔的，而迈克尔最终又把所有画捐给了阿什莫利博物馆。在这些展品里，有岭南派画家关山月所画的《青海市集》，女学生介绍说："迈克尔当初看到的时候就很喜欢这幅画，画家觉得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就重新画了一幅送给他。在重庆时候，关山月与迈克尔结下了友谊。画家教迈克尔怎么写中国字、画中国画，迈克尔教他英文，迈克尔重庆住所的走廊上就挂着它。"这些收藏里，很多张大千的画也都是他本人送给迈克尔的。"他们的友谊一直从40年代持续到张大千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有大量的张大千作品，是他生命中不同时期画的，反映他的不同风格。比如，这一幅是他用泼墨方法所作，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他当时的创新。但你看这边这幅，1930年所作，则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人像画法。"

这位英国绅士与中国画家的友谊，在一个动荡无常的年代，尤为感人。“这封是庞薰琹写的。他们的联系在‘文革’时中断了。迈克尔曾几次回到中国，做一些考古研究，但这些艺术家都不知道他来中国，就中断了联系。直到1979年，庞薰琹才重新收到迈克尔的来信，他就回信给迈克尔说，之前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今天收到他的来信非常高兴。迈克尔访问中国时一定要见面，是时隔34年又重聚的一种心情。这幅张大千的《荷花》，先送给了英国文化处的赫德利。赫德利知道迈克尔研究这个，又把它送给了迈克尔。张大千20世纪70年代去美国定居时，看到迈克尔的这幅画，感慨万千，说，‘我又看到30年前自己的作品。有一句话叫聚乱不常，聚散不定，但是我又在故人手上看到了我30几年前的画’。”女孩说，迈克尔保存着所有的东西，包括他20世纪80年代回到中国，与画家们重聚时的那张菜单，上面有画家们的签名。这位英国绅士在2013年去世前，为这400余幅无价的画作找了一个最终的归宿，全部捐赠给阿什莫利博物馆，以供中国现当代艺术研究。

走向开放的大学精神：寻找以赛亚·伯林

在那些居于中心的古老学院之外，牛津的地理边缘，像沃尔夫森学院这样的新学院充满隐喻地呈现出牛津历史向未来演进的轨迹。

沃尔夫森学院是20世纪60年代由牛津人以赛亚·伯林主持建立的研究生院，以研究为主要目的。这位牛津万灵学院毕业的犹太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史研究者，一位“二战”期间穿梭于华盛顿、纽约和莫斯科外交圈的政界名流。沃尔夫森学院是按照他对牛津与人类未

来的愿景建立起来的：一个科层与特权消解，更加平等与自由多元的新时代。

在牛津的第一顿晚餐是在沃尔夫森学院吃的。这是一座现代风格的建筑。学院化学系博士生刘一帆带着我穿过中庭边的长廊，来到餐厅。简约风格的餐厅一角摆着一架钢琴，四面墙上挂着些阿富汗来的波斯挂毯。简约的长条餐桌，都在一个水平面上，没有老学院餐厅象征着学院教员与学生之间科层地位的高桌，从后面端菜出来，随处找个想搭话的院友落座的地方坐下即可。古老的成熟与繁复在这里隐退了。那天坐一桌的是沃尔夫森学院不同专业的中国学生。大家聊完乌克兰形势和正在进行的联合国表决后，又聊了一会儿品酒会。牛津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葡萄酒窖，还会有一笔经费让葡萄酒买手定期购入新酒，供学院成员享用。一年一度的牛津－剑桥盲品赛，常常在赛艇前举办，参赛选手要经过多次专门训练和实战演练才能取得好成绩。吃完晚饭，上楼，是一个有几张沙发的活动室，泡一杯咖啡或茶，学生们聚在一起聊近况，聊点八卦，聊近期的活动，还有假期的旅行。

几天后在沃尔夫森学院，我们见到了马克·波特尔（Mark Pottle），一位沃尔夫森学院的成员，牛津历史系毕业的学生。联系他，是想寻找到以赛亚·伯林的痕迹。伯林一生浩瀚的书信和各种文件，都是由一位叫亨利·哈代（Henry Hardy）的牛津人搜集编纂的，他住在利物浦。动身前往利物浦之前，协助他工作的马克·波特尔先带我们转了转。波特尔展示的第一个地方是沃尔夫森学院的现代报告厅，学院没有教堂和礼拜堂，这座报告厅就是宣讲的地方。从餐厅上楼，穿过活动室，就是教职员工的共用室，在老学院，共用室要比别的房间略高，但在这里没有这种讲究。穿过中庭长廊，下楼，是一片湖泊镶嵌其间的草坪，白色的玉兰树开得格外一尘不染。波特尔说，当初以赛亚·伯林本来有机会成为另一个小学院的院长，但他不甘心，就决定自己建一个新院。他拉到了英国沃尔夫森家族和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赞助，这件事就做成了。

波特尔说：“‘二战’中，伯林看到美国在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认为美国充满活力，希望牛津能够学习它。更重要的是，时代变化了。过去牛津是个基本上只有公学毕业的学生才能来的地方，英国社会也被认为是阶级社会。但事实上，在英国，突破阶级并不是不可能的，阶级界限一直在慢慢消失——19世纪，很多白手起家的英国人获得了商业或工业上的成功，他们通过慈善捐赠获得了贵族地位。沃尔夫森家族就是如此。而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够来到牛津，并为它工作。”

周末，我们搭上了去利物浦的火车。亨利·哈代来火车站接我们。他答应带我们逛一逛利物浦，然后去他家坐坐。哈代之前一直住在牛津，直到前几年他追随生命中的第二段婚姻来到利物浦。他穿着很随意，休闲棉夹克有一些未熨平的褶皱，他看上去正处在中年，但实际上已经60岁了，即将成为牛津“高龄的养老金领取者”。他引用奥斯卡·王尔德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告诉我们：“从前有一个人，和魔鬼做了个交易。只有肖像画中的他会慢慢老去，而他自己却永远年轻。他长年不变的年轻终于引起了人们的种种非议和怀疑，画像中的他因为纵欲而显现出加速的时间进程，最后他愤怒地用一把刀刺进了藏在阁楼里的肖像画中的自己。”

哈代的家在一栋郊区别墅里，有一片打理得细致的花园，养着两只兔子。来到他的书房，房间里挂满了与伯林相关的照片：从伯林的出生地拉托维亚的里加，到摄影师戴维·列文（David Levine）、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伯恩·施瓦尔茨（Bern Schwartz）所拍摄的伯林肖像，其中的一些是伦敦国际肖像美术馆的复制品。“我最喜欢伯林的这一张。”哈代指着一张伯林悠闲地坐在万灵学院前的照片告诉我，“这是娶了王后姐姐的斯诺登爵士偷拍的，伯林的状态很自然。”还有一幅俄罗斯19世纪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的肖像画，“伯林很喜欢他，这位社会主义思想家对苏联的影响也很大”。他的书房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身处的不是哈代的书房，

而是伯林的——童年的回忆，自我的记录与呈现，乃至喜好，都是伯林的，仿佛伯林附体。唯有一侧墙上有一张哈代父亲的照片，一张脸陷在大胡子中——他的父亲也是牛津大学毕业生，学的是医学。后来他带我们上楼进入他的卧室，我们才看到了哈代祖父的肖像油画，透着老派英国绅士温和又威严的风度——他的祖父是牛津古典学系的毕业生，多所英国中学的校长。而在书房，让人感到哈代存在的，是那架钢琴。哈代也是牛津古典学系的毕业生，年轻时他作过一些古典曲子，出版过一本曲谱。他说，牛津的学院有一个传统，会为每个牛津的作曲家举办一场音乐会；基督教堂学院就曾为他举办过一场音乐会，专门演奏他的曲目。他为我们播放了一段专业管风琴师演奏的他最短的作品《管风琴的宣言》，一段不断升高的音阶，层层叠叠，有哥特式的雄浑，终结于回旋的高音里，充满宗教气息。哈代曾是学院合唱团的指挥，每个星期指挥一次排练。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沃尔夫森学院遇到伯林以后，就决定为他工作，这一工作，就是一辈子，像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所做的那样。为了搜集伯林的书信，他多方追寻线索，有时甚至因为过于穷追不舍，到了惹人厌烦的地步，虽然已有的书信已经浩如烟海，但他还是为一些没有留下线索的信件或尚未被人发现的信件孜孜以求。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20世纪毕业于牛津大学万灵学院

我忍不住问他，这样一辈子整理伯林的资料，会不会有些奇怪？他说：“我的古怪倒是人尽皆知。伯林也是个古怪的人。他有很多天才的洞见，但他只是表达出来，总是没有条理，也不收拾，很需要有个人来帮助他。牛津历史上像我这样的人的确不是很多。我能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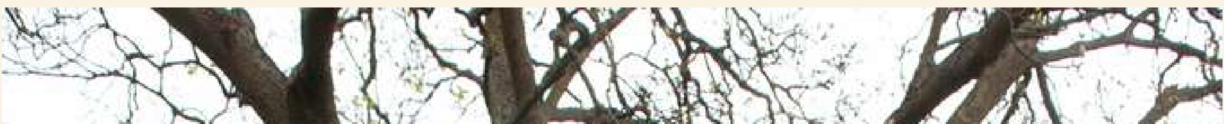
的例子是莫德林学院的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和编辑他作品的包斯威尔，还有花了很多年工夫编辑C. S.刘易斯作品的沃尔特·库珀（Walter Cooper）。听起来我就像只寄生虫。”他自嘲地笑了笑，随即反问：“你为什么觉得古怪？”我说，用一生这么长的时间生活在别人的人生里，是不是有些可惜。哈代回答说：“我很满足。这有点像神学家，他们也花一辈子的生命研究耶稣基督。”

哈代的牛津岁月充满着晚餐后去咖啡馆的谈话。“有时一谈就谈到天亮。我们讨论那些终极问题，讨论道德情操和生命的意义，讨论宗教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所有这些抽象的和终极的问题。牛津在我的记忆里，就是与朋友们在深夜的咖啡厅中接连几个小时的谈话。难以相信那样的场景会在今天的牛津重现。”他曾经是一个基督教徒，在牛津，他加入了一个跨学院的基督教联盟。“非常福音教派的运动，坚持上帝即全部，如果宗教是真实的，那所有人都该将一生献给上帝。在那里，我渐渐失去了宗教信仰，接受不了这种非此即彼的观念。”大学时代，哈代是几本牛津校刊的编辑，有时也发表些文章。有人告诉他，伯林是真的需要人帮助，因为他很有思想，却总是把自己的文章发表在一些不知名的外国杂志上。“我去找他谈，他说很多人都给过他这个建议，但他都不同意。直到我建议，如果出一本书，书的版税可以用于支持沃尔夫森学院的基金，他才答应了。虽然最后这些书并没有赚到什么大钱，但对他来说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

“伯林是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牛津的。作为一个母语不是英语的俄国犹太人，很长时间里，他都是牛津体系的局外人。但他慢慢变成了一个英式绅士，一个英国文化的造物——他总是穿着三件套的西装，比一个典型的英国人穿的层次还要多。他所在的圣灵学院出了几位重要人物，比如《时代》周刊的主编，当时英国的外交部部长，还有政府中的一些要员，他们周末会来学院，与学生们交谈，伯林在那里熟悉了英国上层阶级的谈话方式。‘二战’中，他在纽约、华盛顿结识了更多外交圈的英国人。到最后，他成了一个谁都认识的人：外

交圈、艺术圈、政界、学术界的所有人，他都认识，从美国、英国、俄罗斯到以色列。他是一位全球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在牛津终其一生的牛津人物。伯林在牛津最亲密的社交圈里，有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在圣灵学院第三年认识的年轻哲学家斯图尔特·汉普夏尔（Stewart Hampshire），后来成为他一生的朋友；还有那个时代牛津优秀的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艺术史学家本·尼科尔松（Ben Nicholson），后来进入政界的杰拉米·哈钦森（Jeremy Hatchison）等等。他与年轻的女人也有亲密关系。他有一种成熟男人的气质，很多女人喜欢找他谈心，他与她们保持着柏拉图式的关系，其中就包括新学院院长的女儿玛丽·费舍尔（Mary Fisher）。这些人后来在他的社交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当伯林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是年轻的朋友，彼此无所求。伯林不断地写信，那时候的牛津人都非常钟爱手写的信件。这种交流的方式已经在今天的牛津绝迹了，伯林是牛津最后一位传统的书信写作者。”

“伯林曾明确洞察到，牛津大学在‘二战’前和‘二战’后的变化。‘二战’后，牛津的许多传统和礼仪都蒸发掉了，随着过去的地位和阶级意识一起蒸发掉了。‘二战’是牛津重大的历史断层，这也是牛津新的开始。”“当我在1968年来到牛津时，我的本科生班上就有公立学校来的学生，已经多元化了。‘二战’前的牛津，本质上是个贵族化的本科生教育机构，但沃尔夫森没有遵循这个传统。沃尔夫森学院是一个纯粹的研究生院，并且以自然科学为重。伯林在美国的经历，在哈佛、普林斯顿访学的经历，让他认识到，科学研究是多么重要，而牛津已经落后于美国的大学了。那时的圣灵学院是个非常保守、拒绝改变的地方，这也促使他去建立一个新学院。沃尔夫森就像是牛津的新大陆，在那里，你不受任何传统期待的约束，在你与你想成为的人之间，不存在任何障碍；一切都是开放的，一切都是可能的。”





中国留学生在萨默维尔学院的草坪上合影

哈代对那些为古典语言辩护的理由持保留态度，“正如伯林所说的那样，20世纪有两股最重要的力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俄国革命及其之后的世界。如果仅仅只学习人文学科，更不用说以希腊语和拉丁语为代表的古典人文学科了，你的思维会与自然科学产生鸿沟。这是一种损失。从事高等教育的人必须还得对一门自然科学有深入的研究，才能让他的思维能够适应自然科学的时代。你可以举例说，古典学系毕业的鲍里斯·约翰逊成了伦敦市长，但他的前任，肯·利维斯通，出身工人阶级，一个拉丁词也不会。也许拉丁语与你所能成就的事业之间，不再有那么必然的联系。”

伯林最终并未成为约翰·罗尔斯、诺姆·乔姆斯基那样成系统的哲学家和理论家。“我也并不赞同伯林的全部观点，但他有一种洞悉人性的天赋，他所结识的人从‘左翼’、社会主义者到保守主义、‘右翼’都有，他总能抓住各色不同人的本性。他从未见过马克思，但他可以准确地揣摩马克思对一个问题会怎么回答，会采取什么态度应对。我想他对思想史最大的贡献，恰恰在于他的多元主义。”哈代说。

哈代说：“当我整理伯林的书信和思想时，有时我会觉得，他还在那里，还在和我对话。有时我也会疑惑，一百年后，伯林的名字会湮没在历史里，被世人遗忘，成为只有历史研究者才会偶尔翻阅的资料吗？”有时他会在话语间无意流露些伤逝的感怀：“过去BBC（英国广播公司）有个名人访谈节目，请学者谈论他们的思想。现在这个节目已经从1小时压缩到了每人20分钟。”“我本来想读自然科学，但父亲坚信希腊语与拉丁语是对大脑最好的培训，他千方百计说服我去读了古典系。但我想，他这种古旧的观念在今天已经过时了。”哈代说，他的儿子现在在牛津读音乐学，但在博士期间，他决定辍学去当园丁，去了英国国家基金会的花园，“他发现自己已不愿意整天待在房间里，而是要待在户外的花园里”。

牛津式的学问

与众不同的是，牛津总有自己的节奏。

一个晴朗的周五下午，我们与三位牛津的博士生去划船：沃尔夫森学院化学系的刘一帆，贝里奥学院经济系的陈思和圣十字学院物理系的王一雄。细长的小舟慢慢驶离河岸，驶向滟影波光里。刘一帆握着那支长篙轻轻地、缓缓地向柔波的更青处探去，又轻轻地、缓缓地提起来，在小岛处灵巧地停靠或避让，很娴熟。澄蓝的天空倒映在水中，船儿就如浮游在白云中，在静谧的柳林榆荫里缓缓前行，野鸭、白鹅三两成群，腾云驾雾地在船舷边飞过，如梦似幻。

在这梦幻里，谈谈爱情与学问，真是件再好不过的事了。陈思与王一雄就是一对眷侣。陈思在康纳尔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后来到牛津。“牛津做学问的方式跟美国大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更要求直觉思维。”她说，“美国大学强调科学方法论，强调量化分析和统计，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得出某种结论。但在牛津，即使你学的是数理经济学，你也得是个会讲故事的人，而这种讲故事的能力，要求你必须有很渊博的学识。比如，我是研究行为经济学的。有一个理论认为，富人比穷人在经济上更有风险偏好。但你可以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因为富人怕失去已有的财富，而穷人一无所有，也就不怕失去更多，反而更愿意冒险。你可以引经据典地来讲历史上可以证明这一观点的例子，然后，你再用量化分析的方法，搜集数据，建立数学模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陈思说，她将她在美国与欧洲的同学一对比发现，“欧洲学生的知识基础还是要比美国学生扎实，他们不仅有很好的人文素养，而且就连数学基础也比美国学生好”。

陈思在牛津遇到了王一雄。同在异乡，王一雄在生活上给陈思很多照顾，两人慢慢走近。但更让他们相互吸引的，是那些充满了智慧

碰撞的对话。王一雄学的是大气物理，“研究宇宙中环绕行星的大气云层的运动，分析是否会有地外生命诞生”。王一雄说，这种还没有办法实证的研究，“有点玄思异想的感觉。那些科学家分了几派观点，相互间争得不可开交”。不过，在这样一条梦幻的河上，不讨论玄思异想，又该讨论什么呢？陈思与王一雄就会经常讨论自己领域的研究，相互也都能听得津津有味。“发现物理学和经济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均衡’这个概念，就是经济学从物理学那里借鉴来的。经济学还从物理学那里借来了很多的理论和概念，比如，‘熵’。”这种互相理解和启发，让他们的爱情进展得很顺利。

在萨默维尔学院的大草坪上讨论一下哲思也很好。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毕业的袁幼林在牛津读本科，他不厌其烦地向我们再次讲述了一遍他已经向无数亲朋好友讲过的故事：牛津的电话面试考的是什么题目？因为他报考的是政治、哲学和经济专业，所以依次有三个教授打电话来。他记忆最深刻的是其中两个问题：“6个海盗，抢了60个金币。现在他们要分这些金币。他们规定，由6个海盗依次提出分金币的方案，只要有一个海盗不同意，就把提方案的这个海盗杀掉。那么第一个海盗该如何提出方案，才能保证自己不被杀呢？”袁幼林说，当时他其实没能给出确切的答案，而是一个面试官带着他一步步推论，目的在于看看他有没有“慧根”。另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在楼道里大声喧哗，打扰了邻居，和一个人在战争中杀死了敌人，哪个行为更不正义？”这也是个袁幼林没能解答的问题。他说，直到他在牛津学了3年经济学，回过头再看，才觉得这个问题实际非常高深。“是一个康德的道德哲学才能解答的问题，关涉到道德的普遍原则和名义上的道德问题。面试时的那道考题，要分成好多种具体情况，才能一一加以分析。”传统的牛津式的学问总是需要你有点古典式的博闻强识，有点文艺复兴式的渊博与全面。



牛津大学数学、物理和工程学部部长埃里克斯·哈利德

在科学领域，牛津发生着可谓“激进”的、向实用方向进展的变革。牛津有4个大部，分别是人文学部，社会科学部，数学、物理和工程科学部，以及医学部。数学、物理和工程学部的部长埃里克斯·哈利德（Alex Halleday）是位地质学家，从有着最顶尖实验室的苏黎世理工学院来到牛津。他告诉我们，他以前也认为牛津是个培养首相的文学大学，“18、19世纪，牛津转向了人文学科，剑桥转向了科学。直到20世纪初，牛津才开始感到改变的必要性”。但自从他接手了数学、物理和工程学部后，他发现，牛津的科学是非常强的。“非常强大的政府资金支持，与剑桥不相上下，近年来以每年7%的速度在增长，哪怕是经济衰退期。”“在应用科学领域，我们落后于麻省理工，正在奋起直追。物理学系将他们的研究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应用物理，比如能源研究。工程学科也在不断扩大，我们还希望它成长得更激进一些。科研与产业的结合也在加快。不久前，诞生了一个5亿美元的公司，叫‘自然动态’，是一个从动物学系诞生的软件公司，专门

模拟动物的行为和运动，像《星际迷航》这样的电影就会很需要这种软件。”一些公司的资金一直在背后支持，“一个叫IP集团，是专门投资高校专利的英国专利集团；还有一个公司叫Lansdowne（兰斯道恩），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公司，历史上一直都是牛津重要的投资者”。

“牛津的科学新发现充满了生命力，我们的物理学家亨利·斯奈思（Henry Snaith）最近发现了一种新材料，能够以比硅谷更便宜的成本转化太阳能。硅谷目前的太阳能技术很有效，但是成本过高。这种技术一旦投入产业，将改变全世界的能源依存度。”在基础科学领域，牛津在希格斯粒子的发现过程中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那位写信申请科研资金来建立粒子碰撞机的物理学家，就在牛津。牛津的商业公司国际策略与投资集团（ISI）也在牛津大学的边缘地带兴起，主要负责将研究成果成功转化为知识产权。哈利德说：“20世纪70年代，牛津发明了锂电池，却将这项发明一次性给了索尼公司。如果我们当时知道如何将这些成功的科研知识产权化，这项锂电池发明将会给牛津带来完全不同的影响。我们需要战略，来防止这种失误再发生，而且让这些发明能够给学校提供资金流入。”

在牛津的科学领域所发生的事情，与在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所发生的事情，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学科的交叉。“我们这里有位化学工程师，他研究的是水，但他现在研究的是人类细胞；我们有一位电子工程师，曾为劳斯莱斯制造飞机引擎，他正在用飞机引擎的遥感探测器来做生物医学工程的研究，用遥感器来检测人的状态，比如心跳、体温、血压。有一位叫迈克尔·布雷迪（Michael Brady）的教授，他原来是做机器人研究的，但从1994年起，他开始转向医学图像分析，研究乳腺癌和肝癌。因为他去医院探望亲属时发现，获取医学图像的技术还有可以大大改进的空间。我现在做的研究是同位素的地球化学研究，但我现在也开始跨学科研究生物医学。”作为一位科学家，哈利德也感慨，科学院系和实验室要扩张，要买地，没有那么

多钱，“而那些学院真是有广阔的土地，而且是很肥沃的土地”。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系里，而不是学院里，“在科学领域，最重要的教学和决策都发生在系里，而不是学院里”。联邦制的牛津是在悄悄发生变化的。2000年，牛津第一次有了数学、物理和工程学部，哈利德也成了这个大系的第一位主任。这意味着，“系”开始在牛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与众不同的是，牛津总有自己的节奏。在牛津非常现代的医学园区，免疫学教授陈峥鸣正在研究中国的遗传疾病。牛津医学系可称为世界的翘楚，这与它几百年的学术传统密不可分。陈峥鸣说，一项药品要发布，“要验证它的疗效，得在全球有很强大的科研网及医院，这是牛津很强大的资源。牛津的网络在几十个国家有上千家医院，这些长期的科研合作都是资源，给几十年跨度的大规模临床试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比如阿司匹林，我们已经做了二十几年，我在其中领导过一个全球最大的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研究。分两部分，欧洲这边有2万人，我负责中国这部分，和阜外医院合作，涉及全国500家医院，2万多人。这个研究重新验证了阿司匹林的重要性，比如现在的临床指南中，如果发生脑梗死，首先要使用阿司匹林。它本是一个百年老药，但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让它重焕青春。我们现在的治疗方式，很多都是20年甚至30年前的研究成果，经过了漫长和大规模的临床研究，才敢拿来用”。

陈峥鸣现在正在做中国肿瘤疾病的统计研究。“5年时间投资了1500万到2000万英镑，但一篇文章都还没出，是嘉道理基金会、英国医学委员会出的钱。对这种研究，必须得耐得住寂寞，出成果是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前面的研究是打基础的，是创建的过程。我们花了5年的时间，选择了全国10个地方，现在这个研究已经做了快10年了，结果快出来了。”

总体来讲，牛津比美国大学要更不疾不徐。“很多牛津大学毕业的人，在研究团队一干10多年，就算去制药公司钱更多也不愿意去，更愿意从事有创造性的、闲适的工作。牛津的氛围也能静得下来，没有那么急功近利，更注重研究成果本身的价值，几年的时间不必考虑发多少篇文章，没有美国那种‘不发就走’的硬性压力。美国曾经有一项研究，做了5000人的临床研究，和我们一模一样，他们在三四十年中发表了5000多篇论文，垃圾不少，而我们发得很少，要出就出实实在在的精品。”“牛津确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非常安静，有时候会感到寂寞。但是对做学问的人来说，寂寞是必要的，享受寂寞，这样的人才可以静下心来，思考东西。”



牛津大学免疫学教授陈峥鸣

与陈峥鸣共事的，有许多牛津的医学大师和泰斗。他说，像泰斗理查德·道尔（Richard Doll）爵士这样的人，80多岁了还天天来办公室工作。“他们很平易近人，接触没有负担，学术的自由是非常核心的，你可以在非常放松的状态下来思考问题。我是‘文化大革命’后才去复旦读书的，英语也是后来学的，初到这边面临的挑战很大。他们创造了很多机会帮助我，有的东西是手把手地教，从中受益匪浅，包括写的文章，做报告的幻灯片，逐字逐句地帮我改。他们既有战略性眼光，高瞻远瞩，看问题在全球的视野下很宏观，但也非常注重细节。这可能有文化熏陶方面的因素，他们很多只是追求学术带

来的快乐，追求科学的真理。人在放松状态下的创造力才是最强的。”

刘继龙是牛津遗传基因生理学、解剖学、遗传学部的博士，也是功能基因组项目负责人。他研究的是果蝇。在他的实验室里，他取出一只有很多果蝇的试管，在试管口放开一个很小的口子，插入一根装有气体的管子，给果蝇催眠。待果蝇睡着后，他把果蝇拿出来，在显微镜下观察。这小小的果蝇，就是刘继龙的世界。他为研究它准备了漫长的时间——来牛津前，他在美国拿了两个博士后学位。为了果蝇的遗传基因研究，牛津也为他准备了漫长的时间，还有资金——“英国医学理事会每5年给我们一次优厚的资助，并不急着让我们出成果。我至今还没有在顶级刊物发表过文章，而是在不知名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我自己非常满意的论文。”“每次去美国，都感到美国同行的压力非常大。有一次，一位同行一次性申请了12个项目；还有一些同行，有很大的压力必须发文章。而在牛津，你会觉得很安静。我想在牛津做学问，是有一种品位的，这种品位，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得非常精致。就像在做一件充满细节的艺术品一样，在缓慢的节奏里，精雕细琢，使得它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特质。它追求的不是突如其来的名气，而是在悠远的时间里愈久弥香。”

刘继龙在牛津租了一片很大的花园，种着各种各样的花。他每天在牛津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跨过那片大花园，喂养鸡棚里的鸡，如果下了蛋，就拣出来，然后到办公室处理工作，下午有时间就在学院外的那片花园里散步。他的办公室挂着两幅中国字画：“知足常乐”和“宁静致远”。这种境界也正是牛津的绅士们所追求的。

第六章
剑桥大学：一个完美的读书地方

剑桥神话

剑桥不是一个古板的大学，他对未来与创新有充沛的热情。



每年6月，各学院组织的毕业舞会是剑桥最重要的节日

国王街上，基督圣体学院的一角，行人们走到这里都会被一座镀金的钟表所吸引，驻足观看，这座钟最夺人眼球的是顶端一个怪异的蚂蚱，它在一秒一秒地吞噬时间。2008年秋天，斯蒂芬·霍金——《时间简史》的作者，为这座名为“时间吞噬者”的钟举行了揭幕仪式。这座钟的设计者约翰·泰勒于20世纪50年代就读于剑桥的基督圣体学院，他把这座钟当作送给学院的礼物，他说：“时间是毁灭者，一分钟过去之后就永不会再回来，我不知道这座钟能否和大本钟一样成为一个地标，我很怀疑。”这座耗资100万英镑的镀金钟表如今被当成剑桥800年校庆收到的一份礼物，那个怪异的蚂蚱看起来总让人有点儿不舒服。

1209年被当作剑桥大学的开端，那一年，一些师生从牛津分裂出来，在剑桥开始了学院生活。剑桥的第一所学院是彼得豪斯

（Peterhouse），建立于1280年，原名为“伊利大教堂主教学者学院”。从剑桥开车出去30分钟，就到达伊利，那座雄伟的教堂依旧是市内最辉煌的建筑，当年的伊利主教想让学生们在一个偏僻的沼泽地带安静地念书，将他们安排在30英里之外那个叫“剑桥”的地方。几百年来，彼得豪斯的功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给学生们提供食宿，而剑桥的学生起先是学习神学、哲学、数学，慢慢地，他们学习的领域逐渐扩展，生物、商业、计算机。剑桥的数十座教堂演绎着英国宗教的争端与变化，众多国王的塑像和旗帜也是权力更迭的历史痕迹，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求学的精神从没有过变化。17世纪的一位《圣经》学者，其职业生涯是这样被描述的：“他用日常讲座为学生打好了人文、逻辑和哲学基础，通过交谈明白了他们的天资各自更适合何种特定的学习后，提出自己的建议。一旦他们能够独自学习，便给每一个学生布置日课，但绝不把自己和学生禁锢在时间精确的讲座里。”在18世纪的前10年中，三一学院的一个学生要学习《人类理解论》《上帝创世智慧》《读史方略》等等，还要学习几何学。



时间吞噬者，这座镀金的钟表由斯蒂芬·霍金揭幕



2008年，英国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与女儿露西·霍金在剑桥大学合影

如果以现代学术规范来衡量，那么剑桥荣誉学位的确立表明这一门学问的地位得到了肯定，1748年，数学作为剑桥的第一个荣誉学位考试被确立，1824年经典研究首设，1851年道德哲学首设，随后是法学和历史学、语言学、经济学（1905）、英语（1919）、地理、人类学、考古。1900年，英国大约有2万名大学生，其中1/3在牛津和剑桥，这说明这两所大学在英国历史上的垄断地位。1980年底，英国有25万大学生，其中8%就读于牛津和剑桥。从数字上看，这两所大学不再是英国大学教育供应量的主要部分。但它们依旧是英国最著名的学府。2008年，牛津大学45%的本科生来自英国7%的最富裕家庭，剑桥的比例也差不多，他们从国王那里得到的权力已经不再重要，但那抹精

英的色彩从未消除。1977年以来，菲利普亲王一直担任剑桥大学的校长。



剑桥大学名义校长菲利普亲王（第二人）出席剑桥荣誉博士学位颁奖活动

剑桥，这所保持着中世纪风貌的城市，这所具有800年历史的大学，留给世人最深的印象还是牛顿、培根、罗素，是黑色的学袍，但是，剑桥西区的科技园是英国的第一座科技创业园，这里的教授提醒我们："剑桥不是一个古板的大学，他对未来与创新有充沛的热情。"用三言两语来概括剑桥并不容易，数百年来这样的评语层出不穷，19世纪三一学院的一位院长这样说："作为一个学习的地方，剑桥难逃沉沦的命运；作为一个三流的水上运动场，它的未来不可估量。"一位勋爵这样说："一所学院除了好教授之外，还需要一个好的花园。"一本小说里这样说："这座城市里的石头、彩色玻璃、溪

流、草地、树木和花朵被安排得如此错落有致，以便于更好地学习。面对这么一座城市，你怎么能无动于衷？”



数学桥，相传由牛顿设计

纽曼的《大学的理念》是以牛津为模型写成的，如今英国人想到大学体制时最能引起他们共鸣的还是纽曼的文本，“存在两种教育模式，一种方式的目的是哲学的，一种方式的目的是机械的”。马修·阿诺德将绅士的培养转化为世俗生活的准宗教，他希望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都充分浸润在思想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聪明智慧、富有活力。然而，当你来到剑桥，那些有关大学理念的讨论都显得太过抽象，当你在克莱尔学院或国王学院的后花园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看着这个精英辈出的地方，你可能会想起阿诺德的那句名言，这句话可能是精英主义的真谛——让每个人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读书求知，这个自我提升的过程也许并不依赖于外部环境，不在于你在哪里读大学，而在于这种智识生活的愿望是否能长久存在于你的内心。

“启蒙之所，智识之源”，这句拉丁语是剑桥校训，但在纪念品商店里难寻踪迹，相比之下，那句玩笑话倒被印在了马克杯上：“我学得越多就忘得越多，那我为什么还要学习？”事实上，每个醉心于自我提升的人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自己的答案。在赫弗书店的文具柜台，有大大小小的各种笔记本售卖，其中一款，封面是吉本的语录：“未曾在学习上准备好，还没有思考的习惯，艺术与创作上也未经训练，我就打算写一本书。”这位牛津大学的学生写出了传世名作《罗马帝国衰亡史》。在10月份新学期开始之后，必定会有剑桥的学生带着这款笔记本去听讲座，去参加讨论课，去图书馆，开始自己的基础学习，培养思考的习惯。

剑桥大学副校长理查德·艾利森说：“我们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些特定的地理和历史的因素：剑桥，英格兰东部，英国。”她在多次演讲中不断强调剑桥的特色——本科生教育、学院制，强调剑桥大学的价值观：“一个杰出的大学，其宏大而明确的抱负，是在知识的所有主要领域达至卓越”。



集市街，剑桥的市中心，这里在20世纪60年代还由各种杂货铺构成，现在则有了两个大型购物中心

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的大学排行榜上，剑桥名列全球第二，在诺贝尔奖名单上，剑桥一位学者又为这所大学增添了一个获奖者。然而，对于一个大学的神话来说，他最令人着迷的地方还是小说家福斯特描述的最为恰当：“精神和肉体，理智和情感，工作和玩乐，建筑和风景，欢笑和严肃，生活和艺术，这些对应物在别处是对立的，在这里却融为一体。人与书籍互相支持，智慧与情感携手并行，思索成为一种热情，辩论因痴迷而意味深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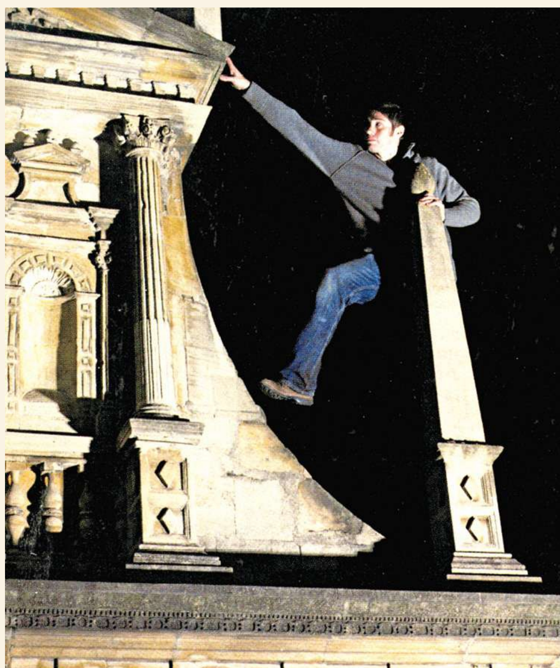
800年造就的精神地图

毕业典礼



剑桥的服装为浅蓝，牛津的服装为深蓝，两校间的划船比赛有悠久的传统

2002年的一天，丁理在一间黑暗的教室里看见国王学院礼拜堂的尖顶，那是一堂电影课，放映《火的战车》，新生哈罗德正乘坐出租车驶过1919年剑桥的街道，而丁理的兜里正揣着一份去剑桥读书的申请表，想着在这堂电影课之后请外教老师写一封推荐信。《火的战车》讲的是剑桥学生参加奥运会的故事，哈罗德到了学校后，就打破了庭院赛跑的纪录。庭院中的赛跑是三一学院的传统，相传要在盛宴之后，穿着全套的礼服，在正午钟声24响之内沿庭院跑完一周，也就是43秒之内跑完375米。奥运会选手、伦敦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塞巴斯蒂安·科曾经参加过这个比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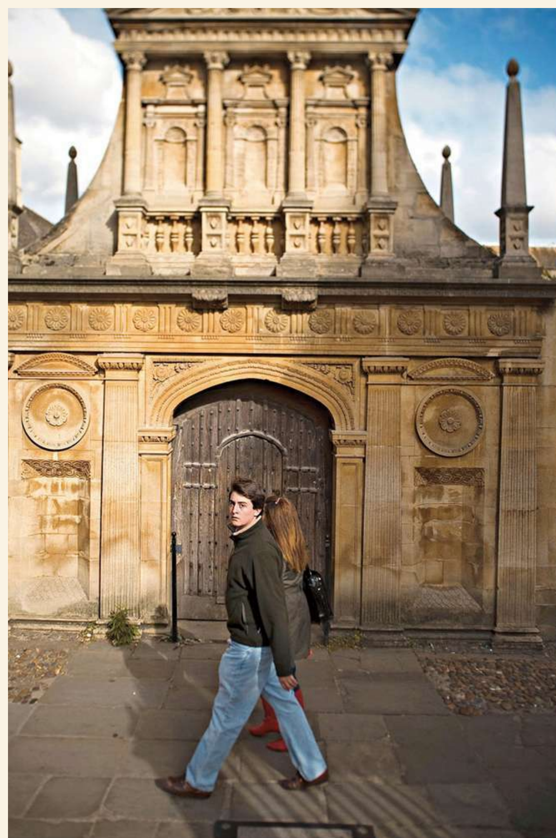
夜间攀爬者登上大学图书馆的钟楼

剑桥大学的许多传说都与学习无关，三一学院的正门口上方有亨利八世的塑像，他左手拿着一只金色圆球，右手本来是执着权杖，但被调皮的学生换成了一条桌子腿。对于有夜间攀爬癖好的学生们来说，换掉国王手中的权杖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夜间攀爬者》一书在剑桥随处可见，这本书详细指导了剑桥每一座标志性建筑该怎么爬上去，记录了多年来在夜间攀爬中留下传奇的学生。1978年6月13日凌晨4点30分，两名学生爬上了剑桥大学图书馆的钟楼——剑桥目前的最高点，5年后，其中一人——皇后学院的博士杰弗逊，在秘鲁攀登阿特森拉杰峰时遇难。1958年的某一天，学校的评议堂，楼顶上摆着一辆奥斯丁牌小货车，校行政人员和消防队员商量着怎么把这辆车挪下来——肯定是工程系的学生，将这辆车拆成零件，爬上屋顶又组装起来，50年后剑桥还有人专门纪念

了这次绝妙的攀爬。

更负盛名的一项运动是划船，徐志摩的诗：“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还有充满仪式感的晚餐。还有May Ball（五月舞会），每年6月的毕业舞会——男生穿燕尾服，女生穿礼服，彻夜狂欢，坚持到凌晨6点的人直接坐火车到伦敦，从伦敦坐火车穿越海底隧道抵达巴黎，在巴黎吃一顿醒酒的早餐——这顿巴黎早餐因太过奢侈而广遭批评，现在已经少见。“但舞会的票价还是很贵，要100多英镑，所以，能免费进入舞会现场又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情，真有人里面穿着燕尾服、外面套着潜水服在剑河里待上好几个小时，就为了混进舞会现场向别人吹嘘他没买票。”达尔文学院的一位学生说。

丁理如今已经在北京的一家外企工作，她说，每年6月底，剑桥接连3天举行的盛大毕业典礼，堪称整个城市的节日。“我所在的圣埃德蒙学院（St Edmund’s College）管理严格，首先要毕业生持所在系所开具的学业证明向学院提出正式申请，得到批准后自动获得3张毕业典礼入场券，可邀请亲友前往。其后不久学院负责礼仪的教师会发来信函，讲解参加典礼的着装要求。此后教导室还会发信，三令五申典礼当日各项程序的重要性。”



荣誉之门：每年毕业典礼时，冈维尔与凯斯学院这座门才会打开

典礼当天，丁理的妈妈花了半天时间帮她打理。毕业生统一先在学院礼拜堂集合，按照预先排好的队形，在主持老师的带领下，向评

议堂出发。当这一群群学生穿过剑桥的街道时，行人纷纷让开道路，忙碌的工作者也会停下手上的活计，大家目送着他们经过。丁理说：“当我穿上黑色长袍，背脊就情不自禁挺直了，神情举止也端庄起来，我也成了剑桥历史中的一分子，分享着牛顿、达尔文、拜伦的荣耀。”

那看上去清一色的黑色学袍大有讲头，袍子的长度、袖子、丝带、帽兜、扣子等部件都会因学院、专业、年龄和学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其烦琐程度即便是穿上的人也难以说清楚。如果有人穿着一件极其破旧的学袍去参加典礼，那便是他祖辈当年在剑桥读书时留下的遗物。这个典礼也自有其论资排辈的一面，第一天上午参加典礼的是三一学院、国王学院这样历史悠久的大学院，等到第三天，评议堂的草坪已经被践踏得有些苍凉之时，丘吉尔学院、菲茨威廉学院这些新晋学院的学生们才开始典礼。这样的“不平等”也是一项“剑桥传统”，每年发放考试成绩也是在评议堂，各系学生都会在公告栏里看见自己的成绩，唯独数学系，成绩单是从二楼扔下来的，为什么他们这么特殊？不知道，也许因为他们有牛顿。

在丁理的记忆中，毕业典礼是庄重、肃穆的，手执权杖、头戴方巾的院士们依次从右首的一扇门进入大殿，簇拥着一位身着红袍、外裹羊毛毡披的老者，那就是主持毕业典礼的副校长。站在校长左方的礼仪官手持名册，念学生的名字。整个典礼用拉丁文进行，许多学生除了自己的名字外，一个字也听不懂。学生们4人一组，被念到名字时与主持老师缓步上前，主持老师摘下帽子，向校长深施一礼，把帽子扣在胸前，朗声念出一段拉丁文，大意为：尊敬的校长及大学，这几位学生的才能和品德都值得授予学士（或硕士或博士）学位，在此我可以向您和整个大学发誓。丁理回忆说：“主持老师宣告完毕，便退到一旁。礼仪官叫到我的名字，我趋步上前，跪在校长面前，双手合十，由她握在手里。校长注视着我，用拉丁文为我祝福：我以我所拥有的权力，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授予你哲学硕士学位。”

赵凤仪（Fonyee Walker）毕业的时候穿的是别人的鞋。“我差一点没能毕业，因为穿着不合规范。剑桥的穿着要求非常严格。毕业那天，我带错了鞋子。我进评议堂的时候，有人阻止我，说不让进。我问，为什么不可以，我今天要毕业，父母都从加拿大来了。他说，不行，你的鞋子是塑料底。规定是这样的，鞋子必须是皮质的，必须是黑白色的。然后他问我穿几号的鞋，就帮我借了一个男生的鞋。结果，我毕业的时候，穿的是另一个人的鞋。因为这个，我所在的皇后学院还被罚款，他们要送给学校的行政人员12瓶葡萄酒——是的，不要钱，就要酒。”

赵凤仪是英籍加拿大人，在马来西亚出生，之后搬到香港地区，接着再搬到加拿大，然后又搬回英国。1999年，她从澳大利亚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去剑桥读博士。“剑桥有很多奇怪的传统风俗，毕业典礼就非常奇怪。毕业生都要握着校长的手指，每人一个，没人去握校长的大拇指。可能是没有人喜欢去握人家的大拇指，所以，一次只能毕业4个学生。这个场景非常滑稽，你穿着拖到地上的长袍子，还得握着另一个人的手指，并持续很长的时间。”

学院制

到达剑桥的旅游大巴大多会在皇后街停下，游客们沿银街走上3分钟就能看见剑河，以及剑桥的标志性建筑——皇后学院的数学桥，传说这座桥是牛顿设计的，没有一颗铆钉，但后来有一位学生不服气，将这座木桥拆掉，重新搭建的时候不得不使用了铆钉。每年6月，会有很多参加完考试的学生从这座桥上跳入剑河游泳。剑河中来来往往的都是乘船的游客，右手边可以看到国王学院，左手边便是国王学院的“后花园”，经过克莱尔学院桥，左手边的克莱尔学院花园幽静迷人，然后是圣约翰学院的叹息桥，到达耶稣绿地旁的水坝折返。由这道水坝再往前，才是剑桥大学各个学院的划船队训练的水域。



圣约翰学院的“叹息桥”。据称是根据威尼斯的叹息桥建造

如果没时间乘船，那就沿银街向前，到国王街（King’s Parade），马上就看到了剑桥另一个标志性建筑——国王学院的礼拜堂，亨利六世建造这所学院之初，是为了接受伊顿公学的毕业生，直至1865年才有第一位非伊顿公学的学生入读。学院建筑显示出王室的气派，但那座礼拜堂刚开始修建，玫瑰战争就打响了，王室资金紧张，直到亨利八世时，礼拜堂才修建完毕。如今，让这所礼拜堂闻名天下的是国王学院唱诗班，每年圣诞夜，BBC都会转播国王学院唱诗班在礼拜堂中的演出。如果时间凑巧，游客们有机会听到唱诗班的晚课。

走进国王学院的庭院，穿过剑河，来到后花园，就能看到徐志摩的诗碑，一块岩石上刻着他那句“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徐志摩当年到国王学院听课，但并没有在这里拿到任何学位。

这所学院最受推崇的毕业生是经济学家凯恩斯，学院旁有一过道名为“凯恩斯过道”。小说家E. M.福斯特终老于国王学院。

沿国王街继续向前，就是举行毕业典礼的评议堂，然后是冈维尔与凯斯学院，这所学院中最著名的院士是剑桥大学一个智力的象征——斯蒂芬·霍金，学院中的斯蒂芬·霍金楼，是剑桥标准最高的学生宿舍，从2006年10月起为本科生提供住宿。学院的三道门分别叫作“美德”、“谦逊”和“荣耀”，“荣耀之门”正对着评议堂，只有毕业典礼或哪一位院士去世，这座门才会打开。

所谓“学院”，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学生宿舍、食堂、教堂和图书馆。国王学院由亨利六世创建，冈维尔与凯斯学院1348年由冈维尔牧师创立，约翰·凯斯医生在1557年至1559年担任学院的院长，他为学院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并扩建了学院的建筑。这所学院有良好的医学传统，因为第一个详细论述血液循环的威廉·哈维就是这所学院的院士。这些古老学院构成剑桥绝对的“市中心”，老学院的大多数宿舍都提供给本科生和院士居住，申请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的人同时要向某一个学院提出申请，学院可以接收各个专业的学生，这样不同专业的学生住在一起，旁边就住着院士，以形成一种“复杂的生态”。只有3所英国大学采用这样的“学院制”，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学院是一种私有制，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财产，比如三一学院就是英国的大地产商，他们计划买下伦敦的“千年穹顶”，出租场地举办音乐会，他们在法国有自己的酒庄，是剑桥最富裕的学院。冈维尔与凯斯学院是剑桥大学历史上第四古老的学院，也是目前第三富有的学院。而大学是一种公有制，大学由各个系构成，各系的建筑散落在剑桥市的周边地区。一位剑桥博士这样说：“在这里拿个博士没什么特别的，但如果你是从伊顿公学、拉格比公学毕业，在剑桥或牛津读了本科，那就很特别了。这说明你在人生最关键的成长期接受了最好的教育。至今英国还有‘剑桥帮’‘牛津帮’‘伊顿帮’的说法，可见一所中学也会很了不起，奥威尔怎么样？伊顿公学毕业，没上过

大学，也没拿过博士学位。”剑桥的学院的确把老宿舍留给了本科生，三一学院、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和圣约翰学院感到研究生人数过多带来的压力，在1964年联合出资创立了只招收研究生的达尔文学院，名字是为了纪念达尔文家族，而达尔文本人毕业于剑桥的基督学院。

剑桥1869年建立了只招收女生的格腾学院，距市中心4公里，之所以这么远就是为了让女生躲避剑桥男生的骚扰。格腾学院直到1977年才接收了第一个男院士，1979年才开始招收男生，学院院长史翠珊女士（Marilyn Strathern）这样向我们解释“学院制”的特色：“大学的各个系，主要是以讲课的方式介入学生的生活，而对许多学生来说，学院的老师才起到督学的作用，各系图书馆是学生们的专业需要，各学院的图书馆是学生们自学的需要，学院对学生起到‘看不见的教育作用’，不同专业的学生住在一起，分享各自的兴趣，划船队、晚餐、戏剧社都是由学院来组织的，生活从来不应该是统一步调和统一框架下的，学院制就是要让学生们生活在一种‘复杂性’之中，要让学生们有一种在不同场合转换自己的能力，一个人有许多侧面，但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学生们必须在一种‘复杂性’中生活，才能认识一个超越大学的世界。”

1871年建立的纽纳姆学院是目前剑桥大学唯一只招收女生的学院，学院的导师（senior tutor，除院长之外最有权力的人）阿普特女士（Terri Apter）说：“培养绅士和淑女，这种说法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剑桥的学生们的确还愿意谈论绅士和淑女这个话题，纽纳姆学院现在还只招收女生，我们会把这个传统保持下去。不过要说学院更偏重本科生教育，我可不同意，剑桥的研究生也受到了很好的生活上的照顾。剑桥本科教育的特别之处是，除了系里面的讲课之外，学院会安排‘督学’，也就是由富有经验的老师组织上讨论课，在其他一些大学，有经验的老师给学生讲课，小组讨论则由研究生代课。剑桥不是这样，剑桥各学院的老师会起到‘身教’的作用，但这不是给学生树立一个‘道德模范’，教师应该向学生展现如何思考，

如何提问，如何开展研究，如何寻找证据，如何辩论，辩论是为了让学生对自己写下的论文更有信心，想得更远。”

三一学院

国王街终止处，就是三一街的起点。在评议堂对面，是剑桥大学出版社书店，或者说是剑桥大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在这个书店转上几分钟，最令人震撼的一个书架是“剑桥历史”，我们都已经很熟悉那套《剑桥中国史》，从秦汉一直到《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皇皇10余册，但只是书架的一排。《剑桥中世纪史》《剑桥伊朗史》《剑桥东南亚史》《剑桥俄罗斯史》等同系列史书排在一起，俨然是一个历史方阵，如果二十四史需要一个专门的书柜来陈列，那么剑桥品牌的世界历史也需要一个专门的书柜。

走到三一街上，就能看到剑桥更著名的一个书店——1876年威廉·赫弗创办的赫弗书店，现在属于布莱克韦尔（Blackwell）书店，但还保留着赫弗书店的原名，书店橱窗里陈列的图书都和剑桥有牢固的关系——霍金的《时间简史》，世界上每一个追求智力生活的人大概都买了这本书；现任三一学院院长马丁·里斯的《六个数字：塑造宇宙的深层力量》，这位天体物理学家的这本著作1999年在全球以26种语言同步出版；泰德·休斯的《生日书简》，这位诗人当年在彭布罗克学院的宿舍里经常留宿女生，并且将她们洗完的内衣晾在窗外。橱窗里没有小说——伊夫林·沃的小说《旧地重游》在英国许多书店里都有数个版本，那是一本和牛津大学有关的小说，作者毕业于牛津大学，小说也描述了牛津的大学生活。《独立报》一位记者曾经撰文讨论，为什么剑桥没有一本能和《旧地重游》相媲美的“剑桥小说”——剑桥有小说家福斯特、纳博科夫、拉什迪。福斯特说过，“剑桥对一个作家来说不是什么好地方”。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里谈论过剑桥的生活，他从来没有去过大学图书馆，连打听图书馆在哪里

都没有。“我不清楚，有没有人前来剑桥大学，寻找我的足球鞋钉在黑色泥地里留下的痕迹，或调查我穿过庭院前往我的导师的楼梯时留下的影子，但我走过那些令人敬仰的墙壁时，我比游客更饶有兴趣地想到了弥尔顿。”

在赫弗书店转上半小时，出门之后，走上几步就看到了三一学院。剑桥有时候会骄傲一下，告诉游客，这所大学出的诺贝尔奖得主比整个法国或者整个德国都要多。在牛津和剑桥的诸多学院里，三一学院的诺贝尔奖得主最多，至今共有32位，这所学院无疑是剑桥最富有、声名最显赫的学院，门口右侧的草坪上种着一棵苹果树，那就是“牛顿的苹果树”，牛顿是在家乡的苹果树下被掉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然后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三一学院门前的这棵苹果树是1954年从牛顿家乡林肯郡移植过来的，几乎不结果。

牛顿当年居住在三一学院大庭院的E单元，每周都有人提出要进入那个房间拍摄，但那里依旧作为院士的宿舍在使用。牛顿的塑像是第一个被搬进学院礼拜堂的，随后有培根、拜伦等人的塑像被送入礼拜堂或图书馆。剑桥大学计算机教授罗斯·安德森（Ross Anderson）说：“正如火灾使森林获得新生，一个杰出的大学也使人类文化获得新生——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理解都发生了改变。剑桥大学一直是最热的喷火器，牛顿、达尔文、DNA，都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剑桥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最富有创造性的破坏性机构，那些最具有深远意义的创新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出现在17世纪的培根、牛顿及其同时代人之中。”

三一学院雷恩图书馆的屋顶上伫立着4座石像，代表的是4门最古老的学科：神学、法学、物理学和数学。图书馆中有5万多本1820年前出版的图书，这里保存着弥尔顿的手稿，也保存着《小熊维尼》的手稿，该书作者米尔恩是三一学院的学生，维特根斯坦的遗作和手稿也保存于此。福斯特在一篇小说中这样谈论三一学院——人们既无法忽

视他骄傲的光彩，也不能否认他的优势，虽然这里几乎没人费心思去强调他。我们来强调一下，《金枝》一书的作者詹姆斯·弗雷泽是这里毕业的，“科学家”这个词是1840年由三一学院的院长创造出来的，麦克斯韦尔是这里毕业的，哲学家怀特海、罗素、维特根斯坦也属于三一学院。

除拜伦之外，三一学院还有一位伟大诗人，丁尼生1838年写过这样一首诗：“我走过长长的酸橙树甬道/去看看他住过的房间/门上是别人的名字/我徘徊不前，里面一片嘈杂声/男孩们拍掌、干杯、跺着楼板/我们曾在那里辩论过/一群年轻的朋友/争辩思想、艺术/工作和改变了的集市/还有国家的整个体制。”如今，丁尼生的塑像也伫立在雷恩图书馆内，注视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在这里学习和思辨。

罗素在自传中描述过自己初到三一学院的经历，他不知道厕所在哪里，也不好意思向别人询问，他经常因为性冲动而在深夜跑步，他说在剑桥的最大收获是“一种智力上的真诚”。然而，就是因为某种真诚，罗素曾被三一学院开除——他反对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发表了过多的和平主义言论。

罗斯·安德森教授认为，三一学院开除罗素是干涉“知识自由”，他说：“我们该如何让剑桥保持名列前茅？从历史中获得的重要教训是，学术的自治和知识自由是很重要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教会或者国家都曾试图对我们进行干预，要控制我们。这些措施从未取得过预期的效果，但往往在一段时间内令我们停滞不前。最糟糕的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我们不被允许承认不信奉国教的新教教徒。剑桥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学者的自治社会，而不是像诸如博洛尼亚大学那样起源于那种学生联合起来聘请教师的社团。时间已经证明我们的模式是最好的。”

暑假之中，大门上贴着一则告示：只对本学院院士和学生开放。这就把游客及其他学院的学生挡在了门外，这所学院的院长还要由王

室任命，新院长到任之时，要在门口把委任状交给门房，门房将委任状送到院士集聚的会议室，然后院士们排队去打开大门，将新院长迎接进来。如果你被这样的礼仪传说所震慑，很可能就错过了参观三一学院，事实上，直接推门进去也未必受到什么阻拦。拜伦在这里上学的时候，学院规定学生不得养猫、狗之类的宠物，于是他就养了一头熊。牛顿在庭院里测量声音的速度，他在这里生活过35年。爱德华三世塔楼上的钟声每半个小时就敲响一次，好像在提醒你几百年来时间都是以固定的步调流逝，而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如此密集地会聚着如此多的精英。

老鹰酒吧

从皇后学院到三一学院，专心走路的话，也就用5分钟的时间。如果走得快一些，能走到圣约翰学院门口。这是剑桥最为核心的一条路。在每年发放给新生的“剑桥小词典”上，是这样解释“长距离”的——在剑桥走路超过5分钟的，就算是长距离了。这个小词典是这样解释“剑桥”的——这是个形容词，用来形容那些特别有个性的学生的生活，他们总做出某些极端的事情。NARG——指那些刻苦读书、长相难看、穿着差、社交有点儿障碍的男生。“辛蒂”——这不是人名，而是指剑桥唯一的一家夜总会，经常带有贬义。“国王路跑



已有500多年历史的老鹰酒吧

步”（King Street Run）——这不是真的跑步，国王路比国王街（King’s Parade）长，这项运动是指在这条街道上的每一家酒吧都喝上一杯啤酒。

剑桥的土地几乎都为各个学院所拥有，学院自然不愿把自己的产业出租给夜总会，更不要说色情场所。但这座10万人的小城拥有200余个酒吧，剑桥学生曾经手绘“剑桥酒吧地图”，标明各个酒吧的位置，号称要在大学期间喝完所有的酒吧，但并没有记载哪一个学生曾经完成这个壮举。事实上，各个学院的酒吧就是喝酒的好去处，外面的酒吧一杯啤酒2英镑，那学院里的酒吧里啤酒只卖1英镑，让学生喝到便宜的啤酒是一项学生福利。当然，到各个学院的食堂去吃饭，看看哪个学院的伙食最好，更是学生们乐此不疲的事情。

剑桥最著名的酒吧可能是“老鹰酒吧”，暑假期间，这里到晚上依旧座无虚席，而旁边的另一家“巴斯酒吧”则门可罗雀。“老鹰酒吧”的传奇之处在于，20世纪50年代，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经常在本尼特街上的这家酒吧吃午餐，他们以卡文迪什实验室为基地，建立了DNA结构的模型。在《双螺旋》一书中，沃森提到，1953年的一天，克里克冲进“老鹰酒吧”，大声宣布“我们已经发现了生命的秘密”，沃森觉得，这样说为时尚早。但克里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他不记得自己曾这么冲动。不论当事人如何记忆，这座酒吧的一张桌子背后的墙上已经镶嵌了一块铜牌——克里克和沃森在这里宣布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在这张桌子前抬头望去，天花板上是“二战”遗迹，英国和美国飞行员用打火机和蜡烛在天花板上烧出自己的名字和部队番号，他们从剑桥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出发去轰炸德国。

从“老鹰酒吧”走上200米，就是老卡文迪什实验室，一块铭牌这样记录：“1897年，J. J.汤姆逊在这里的老卡文迪什实验室发现了电子，后来它被确认为物理学的基本粒子，这是电子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基础。”卡文迪什实验室1874年由麦克斯韦尔创建，并担任卡文迪什

实验室物理学教授，1974年，实验室搬迁至剑桥西部的“科学园区”。

在“老鹰酒吧”里，一位物理系博士生这样告诉我们：“这次搬迁改变了卡文迪什的风水，这里一共产生过28个诺贝尔奖得主，但搬到西边之后，地方是大了，但好像只拿过一个物理奖。约瑟夫森教授是1973年拿的诺贝尔奖，他是三一学院的学生，计算出超导结的隧道效应时还是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现在我每次在草坪上怀疑人生的时候，老能碰见约瑟夫森，老头儿也在那儿怀疑人生，他现在发表的论文是《超自然证据及其对意识的含义》，就是说，他主要研究人间有没有鬼，特异功能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银街之上，有一家名叫“Anchor”的酒吧，入口处也挂着一副铜牌——60年代，这里经常举办爵士音乐会，当时席德·巴雷特经常来这里听音乐。席德·巴雷特生于剑桥，但他没能在这里读大学，他是伦敦一家工艺学校的学生，搬到伦敦后，他创立了平克·弗洛伊德乐队。2006年，席德在剑桥的家中去世。那位物理系博士转战Anchor酒吧，继续讲述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八卦：“剑桥物理系最大的失误是放走了玻尔，玻尔当年想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做研究，但不知怎么，剑桥没有收留他，他在剑桥踢了几个月的足球，就转到曼彻斯特去了。”从Anchor酒吧转战Granta酒吧，物理系博士只能听另一位文科学生讲典故了：“Granta本是剑河的一条支流，这也是剑桥一本文学杂志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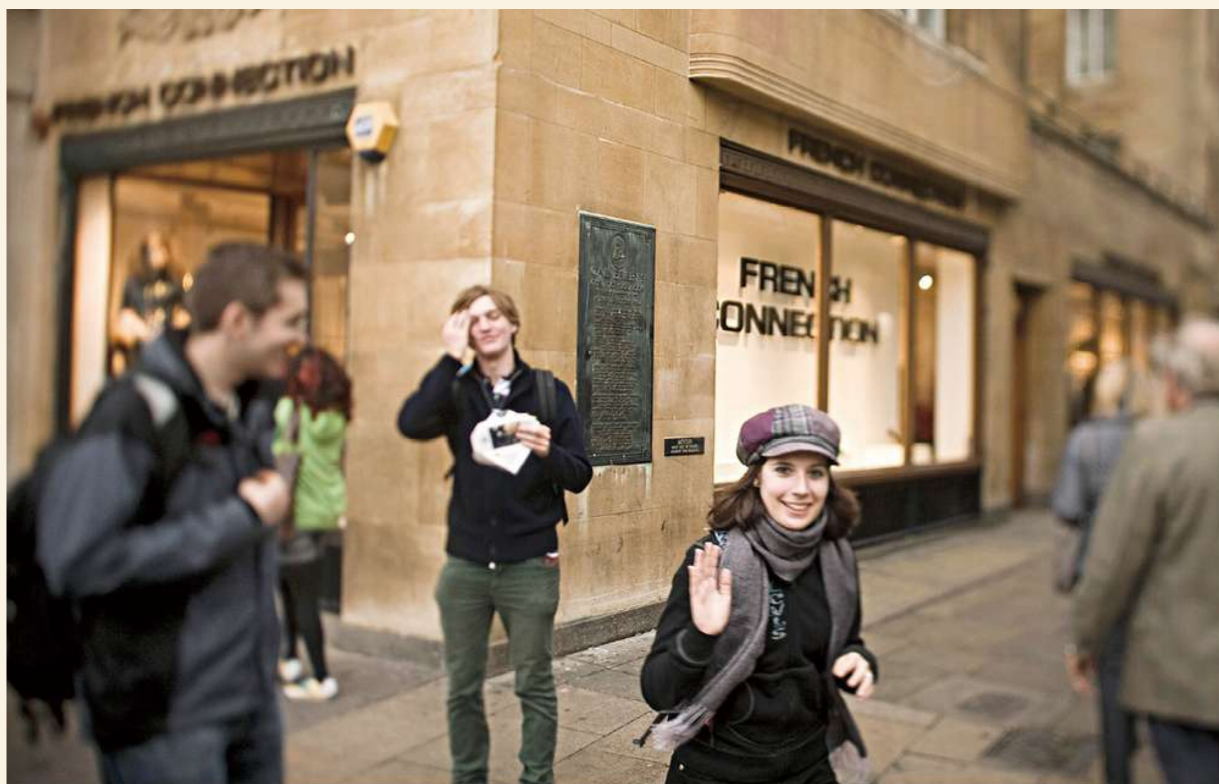
豪饮之风也是学院间的传说，莫德林学院的划船队，入队仪式就是连干3品脱啤酒，第三杯中掺入威士忌。走在剑桥的街上，也经常能看见酒铺，售卖各种葡萄酒，许多酒瓶子上贴着学院的标签，表明这是某某学院特制的酒。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陆建德，1983年从复旦毕业后去剑桥读博士，他对剑桥的酒文化印象颇深——许多老教授的书柜后面就放着一排一排的空酒瓶。有些老师的酒量很

大，一个没有多少人参加的讨论会开完，可能10瓶葡萄酒就没有了。

赵凤仪在剑桥期间曾经担任“剑桥品酒队”的队长。“每个星期我们会开一个盲品会，打开12款酒，大家一起品，然后讨论酒的品种、年份、葡萄种类、地区等等。每年的春天，我们跟牛津有一个盲品比赛。赢得比赛的人可以去法国旅游。盲品所用的酒来自赞助商。据我所知，没有几个大学有这种盲品比赛。这个比赛从1952年开始，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在剑桥，这个比赛太现代、太时髦了。”



“五月舞会”，莫德林学院的学生在享受香槟与雪茄



《烟草颂》的铜牌：我有五六兄弟，抽烟无妨友谊

尽管是暑假，沿剑河划船，岸边酒吧上年轻人豪饮的场面还是会让人遐想，等1.6万多年轻学生都开学了，酒风该多么浩荡。相比之下，抽烟好像已经out了，在Rose Crescent（玫瑰花街）街角的Fcuk（英国时装品牌）商店外的墙壁上，还有一块铜牌，上面是剑桥学生1862年作的一首诗，名为《烟草颂——献给烟草行》，有中国访问学者试译全诗，其中有这样几句："你使晨曦增媚，你使午餐填味，黄昏之乐尤最"；"我有五六兄弟，抽烟无妨友谊"。100年前，身着学袍抽烟是违反校规的，如今，学院里全面禁烟，即便花园里也不能抽，据说，剑桥学生大多遵循此规定，最过火的行为也就是在宿舍里偷着抽两根大麻。

大学城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田莉女士是剑桥土地经济系博士，在她看来，剑桥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大学和学院对城市的建筑、景观和社会生活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牛津虽然历史更为悠久，但由于周边汽车工业的发展，牛津的人文氛围遭到侵蚀。她说："Mini（迷你）车产自牛津，这就带来很多蓝领就业岗位，相比之下，剑桥周边的企业大多是学校的科技创业型企业，基督学院对面的那家大购物中心，4万平方米的面积，当年兴建之时也反复论证过多次。"

田莉介绍说，多年来，剑桥大学的学生以及大学雇员的总数一直占剑桥市总人口的30%左右，20世纪上半叶，剑桥人口从1900年的6.25万增加到1950年的10.4万。1950年的剑桥规划认为，应该控制人口规模保持剑桥舒适宜人的生活环境，同时要让大学相关人口占据固定的比例，避免出现牛津汽车产业从业人口暴涨的现象。2002年全英人口普查表明，剑桥总人口约10.88万，其中28%为剑桥学生和大学雇员。这显示出，50年前剑桥城市规划的长远战略眼光和此后50多年城市管

理的有效贯彻。“当然，这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剑桥的房价很贵，几乎与伦敦不相上下。”

福肖（Alec Forshaw）20世纪50年代在剑桥长大，2003年母亲去世，他在收拾老房子的过程中翻出了家庭相册、剪报本，然后动笔撰写了一本自己的剑桥回忆录。他说，有关剑桥的历史书有太多了，但这一本是关于在这个城市里度过童年时代的书，它会让读者发现，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直到1958年，剑桥的牛奶还是靠马车运输，每天早上7点之前送到每家每户的门口。那个时候，市中心的两家大型超市还没有开张，集市街附近是一家一家的小商铺，你要花几个小时排队买奶酪，再排队买肉，再排队买咖啡。1969年，福肖进入剑桥的耶稣学院读地理，他说：“在自己家门口上大学是什么感觉？街道的确很熟悉，但还是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地方。上大学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我的父母都不为大学工作，所以我对剑桥大学并没有家庭的亲近感，我的确在好多学院的花园里玩耍，但从来没有进入过学院的建筑物，在被耶稣学院接收之前，我只去过那里一次。”

耶稣学院在集市街之东，守着市中心的一个角落，以庭院中陈列的艺术品为特色，在安静的午后步入耶稣学院，能立刻发现它与国王学院、三一学院截然不同的气质。这里原本是一家修道院，15世纪时被改造为剑桥的一所学院，但还带着一丝静修的气氛，因为仲夏绿地和耶稣绿地这两大块草坪就在学院旁边。学院操场两倍于校舍面积，依次有足球场地、网球场地、板球场地、橄榄球场地、射箭场地和体育馆，剑桥许多学院的体育场都在城外，能在宿舍之外拥有这几片球场是难得的奢侈。庭院中有两三名妇女对着学院收藏的雕塑临摹。出资收藏雕塑的主意是20世纪80年代担任耶稣学院院长的一位考古学家提出的，他认为，考古和艺术是相互平行的。

福肖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丘吉尔到访剑桥，为新创建的丘吉尔学院栽种了一棵树，这所新学院的建立是为了比肩麻省理工学院，为英

国培养更多的理工人才。新学院的出资者也并不全是丘吉尔这样的大人物，1981年，英国女王为鲁滨孙学院主持创建仪式，鲁滨孙原来在剑桥父母所开的自行车商店工作，尽管在剑桥自行车是主要交通工具，但并不可能让他赚太多钱，他后来成为赛马场老板，发财之后创建了以自己家族命名的新学院。这些新学院大多在城市的西郊，而与耶稣学院在城东比邻的是悉尼·苏塞克斯学院和基督学院。

这两所学院各有两位出名的校友，基督学院的庭院之中有一棵“弥尔顿桑树”，有一条“弥尔顿小巷”，这自然表明弥尔顿在基督学院的地位，另一位校友的身影在剑桥随处可见，那就是达尔文。2009年适逢《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所以菲茨威廉博物馆等地方都在举办有关达尔文的展览。悉尼·苏塞克斯学院的两位著名校友是克伦威尔和福尔摩斯，学院门房中出售两本小册子，讲述这两人与学院的关系。据说，悉尼·苏塞克斯学院经常闹鬼，学生们相信，是克伦威尔的幽灵总要回来看看，这位革命者在学校里并不认真学习，父亲病故后他就辍学在家。克伦威尔死后，保皇党将他的尸体从西敏寺挖出，斩首，1661年，将他的首级悬挂于西敏寺上方示众。这番死后不得安宁的折腾也许是闹鬼说的起源，奇妙的是，人人都相信。1960年，悉尼·苏塞克斯学院找到了克伦威尔的首级，经过一系列科学验证，证明那的确是300年前的那个革命家的头颅，头颅被埋葬在学院礼拜堂附近，只有院长和财务主任知道确切的地点。这则故事多少还有些影子，克伦威尔的肖像画的确挂在学院食堂里，每逢有皇室成员到访，总用帘子再把他遮起来。但福尔摩斯就读于该学院的考证则完全是创作，不过，这位虚拟人物能在伦敦的贝克街上拥有一处“故居”，自然也不介意被当作悉尼·苏塞克斯学院的校友，在这里研读过生物学和解剖学。考证福尔摩斯是剑桥而非牛津毕业的一大证据是，当年牛津的校规是，学生必须住在校区的宿舍中，剑桥则规定学生可以住在圣玛丽教堂方圆3英里之内，而小说中曾提到，福尔摩斯没有住在大学宿舍里。

学习

莎拉·埃尔森（Sarah Ellson）如今在伦敦的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1990年至1993年在基督学院攻读社会学，随后又拿到一个法律学位。她说，剑桥、牛津的本科学位并不总能在就业市场上畅通无阻，所以她需要另一个学位。“我觉得，剑桥的教育观念更多是培养学生的思考方法和精神生活习惯，而不是实际技能培训。剑桥的许多老师的确拥有世间最聪慧的头脑，如果我现在回到剑桥读书，收获肯定比我19岁时去更大。”

莎拉在音乐会上演奏大提琴，参加过话剧演出，但在剑桥最骄傲的事情是1993年作为学校女子轻量级划船队的一员击败了牛津队，这是6年来唯一一次胜利，她和她的丈夫就相识于基督学院的划船俱乐部。“我们生活在那么美丽的地方，有很多美丽的记忆，我们从船屋骑车去听课，一起逛酒吧，在花园散步，在重新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个真实的世界之前能有那么一段时光真是幸运。”

剑桥大学博士朱莉娅·洛弗尔（Julia Lovell）如今也生活在伦敦，担任伦敦大学历史系教授，校舍位于伦敦布卢姆茨伯里，紧邻大英博物馆和大不列颠图书馆。她说：“我离开剑桥的原因很简单，剑桥大学不能给我提供一个终身教席，剑桥的传统是每个领域只有一个教授，尽管这些年来教授的席位在增加，但在那里获得一个终身教席还是不容易。在我博士毕业之后，我在剑桥度过了4年愉快的教学生涯，我喜欢那里，我的丈夫还在剑桥大学的英语系工作，所以我能同时享受剑桥宁静的生活和伦敦的生活。”

朱莉娅·洛弗尔在剑桥读中文，她说，做这个选择不是因为李约瑟或者哪位汉学家的影响，而是她在某一年的圣诞假期看了一部“007”电影，影片中邦德有这样的台词——我在剑桥学东方学。“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和詹姆斯·邦德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从历史系转

到东方学系。系里的老师很好，剑桥在学习外国文化方面有很好的传统，特别是印度和古希腊研究，可我是个笨学生，前3个月我记不住任何一个中国字。我的老师花费了太多时间帮助我，我有时会觉得，能有机会在剑桥读书是一种特权。如今，剑桥生活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自由的感觉，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干——学习、戏剧、音乐、体育——我是个很差的足球选手。”



阿兰·德波顿，著名作家。生于1969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现住伦敦。著有小说《爱情笔记》《爱上浪漫》《亲吻与诉说》及散文作品《拥抱逝水年华》《哲学的慰藉》《旅行的艺术》《身份的焦虑》。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几种文字

在9月暑期到访剑桥实在有不合时宜的感觉——每年暑假，会有一家剧团在各学院的草坪之上轮番上演莎士比亚的话剧，但他们已经演完开拔了。剑桥电影节还没有开幕，免费音乐会也屈指可数，倒是各类体育俱乐部已经把招收新会员的广告打了出来——板球、橄榄球、马术、自行车、划船，在后两个体育项目中，剑桥出过不少奥运会冠军选手，自然是这里的热门。但乒乓球也有俱乐部，土地经济系另一位中国博士邓亚萍只在乒乓球俱乐部出现过一次，打败了剑桥排名第一的男选手之后就再也没有露面。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这样回答我们的提问：“剑桥的老建筑的确让人兴奋，但我在剑桥关注的两点是女孩和创作。在本科毕业之后，我的确有机会在那里读博士，或者到哈佛大学去念历史学博士，但我对现在的教育体制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没有接着读学位。”德波顿目前经营着他2008年创办的“生命学院”（The School of

Life），这所学院设在伦敦的市中心，更类似一个能举办沙龙的小书店，他说，他创办这家“生命学院”是为了教授人们“赖以生存的观念”，以激励人们通过阅读和学习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希望能挑战传统的大学，重新组织知识的架构，远离教化的知识。尽量给予人们本该是大学所给予的：通过文化的帮助获得生活的方向和生命的智慧。

年轻的莉娅（Liya）本科时以欧盟学生身份就读于基督学院，即将前往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是一位德国籍的华人，之所以选择在剑桥而不是在德国上大学，她说：“剑桥的本科生教育采用导师制度，这是它最好的地方。相比之下，德国的大学教育过于自由化，没有人进行管理，学生和教授之间也没有太多联系，不像剑桥那样，学生每周会和导师面对面地讨论自己的作业。”

这个年轻姑娘对于大学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剑桥的最大缺陷是过于实用主义（pragmatism），剑桥从来不会启发学生去问自己：我在大学学习的内容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还是社会，还是文化？这和英国的实用主义教育传统是有关的。而我在德国得到的体验是，教育的目标是人本主义的（humanistic），一个人进入大学后要经历一个成熟的过程，要和社会建立起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他才会真正变成一个公民。实用主义的好处在于它的宽容，它可以包容很多不同的观点。但过于宽容的危险在于，学生不再去思考学习的意义，大学成了就业培训所。在剑桥学考古的学生，第一年都会去伦敦的投资银行找实习。而理论上，大学的本意应该是培养研究者。如果进入大学只是为了提升个人的职业空间，那么大学是无法尽到它对社会的责任的。但是很可惜，很多大学都屈服于一种经济理性。比如，剑桥原本有一个梵语系，但是后来被裁撤了，理由是缺乏经济效益。剑桥把很多的资金都给了商学院，而许多的文科系所包括我们政治系，都有财务问题。”

年轻的莉娅在接受采访之前就提醒我们，“我对剑桥可是有一大堆批评的”。她说她本以为剑桥是一个思想的天堂，可能在街上交谈的两个人都会在讨论一些深刻的话题。但实际并非如此，于是她就联合几个同学创建了一个思想者联盟（Thinking Society），每个月都会挑选一个大的话题进行讨论，比如：何谓思考？何谓生活？知识分子的位置在哪里？我们的大学是不是一个自由思考之地？他们请教授来就这些问题进行演讲。“一开始我以为，学院越老越好，但后来才发现那些新一点的学院可能更为开放。比如克莱尔霍学院（Clare Hall），他们的研究生和教授是在一起吃饭的。而剑桥的传统是就餐时学生坐低桌（low table），教授坐高桌（high table）。这些传统有时候徒有其表，比如在正式晚宴（formal dinner）上，就餐前院长会念一段拉丁文，而剑桥学生至少80%都不懂拉丁文。因为英国的高中教育进行改革后，已经不再要求学生学习拉丁文了。剑桥的传统和社会的发展没有发生联系，大部分人并不理解这些传统，喜欢它们也只是因为神秘感。我认为，剑桥不能仅仅保留传统的形式，而应当去思考其中的意义。”

考试

“在哈代的小说《无名的裘德》里，裘德会用拉丁文背诵赞美诗，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有资格进入基督学堂，也就是牛津大学，那是100多年前了，那时候拉丁语和希腊语是牛津和剑桥入学的必考科目，想拿到学位也要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而这些经典课程本就是大学当时能教给学生的少数几门课程之一，如今，掌握拉丁语对进入剑桥学习依然很有用——它表明你有严谨的思维，而且能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本源。”剑桥大学古典系教授玛丽·比尔德女士对我们说，“拉丁语在剑桥还经常被使用，餐厅祷告、毕业典礼，许多学院的塑像上

也是拉丁文。我们古典学系有100多位本科生，有些人在高中时就学习过拉丁语，但许多中学的确取消了拉丁语课程。”

剑桥博士殷海洁（Heather Inwood），高中毕业时考的是法语，他说：“初中毕业考试（GCSE），高中毕业考试（A-levels），还有剑桥大学的考试，我都记忆犹新。至于哪次压力最大，很难判断，这3次考试经历一直到现在还时不时重复出现在我的噩梦里。英国的高中毕业考试跟中国的高考不同，这时候学生一般都申请好大学了，有的参加过面试，已经知道哪些大学想要录取你。唯一条件就是要满足这所大学对你考试成绩的要求。剑桥大学的门槛要偏高一点，通常要求学生考3个A，成绩出来的前一夜，我做了无数次关于考试成绩的梦，从B级到根本就不存在的Z级，几乎全部英文字母都在梦里出现过，出了一晚的汗，就是没有梦见那3个该死的A。醒来后，该拿的成绩都拿了。到了剑桥后，发现大学的考试制度是另一种情景。虽然英国的高中倾向于训练学生的独立思想和写作能力，但学生通常能够想到一些技巧应付考试。比方说，为了准备高中的法国知识考试，我将11篇事前写好的法语文章全都背下来了，考试那天只要看一眼文章的题目，语言和内容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滔滔不绝地流出来。可惜，这样的技巧到了大学以后就不管用了。剑桥的年末考试考的并不仅仅是学生所积累的知识，也没有多项选择的问答题，考的是思辨能力。课程作业所占的比例也很小，每年的成绩主要取决于考场上的表现。剑桥的考场是个什么样子呢？学生整齐地坐成几排，每两个人之间都隔一个空位，以免学生作弊。监考老师们都穿着一身黑色的袍子，外面还有人陪学生去上洗手间，考试时限往往为3个钟头。每个人的成绩出来后，都会先贴在大学评议堂外面的公告栏上，这样做会给学生施加很大的压力，因为谁都能知道你考得怎么样。”

玛丽·比尔德说，她还是会经常做有关考试的噩梦。30多年来她只是监考，但在梦里总会坐到课桌前，准备拉丁语或希腊语考试，却

发现考卷上的字她一个也不认识。“我相信，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剑桥的考试都是一个噩梦！”

剑桥政治系讲师刘瑜，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完硕士之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随后在剑桥谋得一个教席，她说：“要我看，剑桥本科生在入学的时候，其潜质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新生差不多，但经过3年的本科教育之后就大不一样了。剑桥一年3个学期，10月开学，圣诞放假，然后再开学，复活节又放假，6月份考试完又放暑假，每个学期上课的时间也就是8周。这里上课，老师是不许点名的，没有点名的权力，但学生们读书的气氛很浓。在剑桥的食堂里，你能听到两个学生在讨论苏丹的问题，或者最近有关伊朗的新闻多了，那么来听伊朗政治课程的学生就会多起来，这会让我想起《白人男子的责任》这本书，有公共意识的基础和氛围，在剑桥学政治就不是那么让人费解的一个选择了。”

刘瑜教现代中国政治，给学生的考试题包括这样的题目：“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中起的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她说：“考试一般会给学生6到8个问题，你选择3个来论述，这个题目大吗？你不妨看看政治理论课的题目——‘西方还有未来吗？’‘人们为什么要投票？’每道题目学生可能都要用1500个单词来回答，会考验你掌握材料、事实和分析的能力，而评分的一条准则是，学生除了论述自己的观点外，必须给出一个反面的观点。这样的题目，相对来说就是鼓励胡说八道，但只有大题目，才能形成一种和先人对话的机制，这是让学生有一个大的思想框架，而不是过早陷入细节中。”

2000年秋天，何进到剑桥大学读硕士，他说:“负责我们课程的老师是约翰·克利维尔博士，他要给每一个学生单独辅导。我们班10个人，来自欧、亚、非三大洲8个不同的国家。原计划每周每个学生辅导一小时，实际上每个人都远远超过一小时。他曾用两个小时给我讲一道题，那是一道我非常有把握的题目。先读懂题面，抓取重要数据，

再根据情况挑选正确的公式，把数字代进公式，算出最终答案了事。我那道题的答案就是1页A4的纸，大半页都是数字、公式和计算，还有几行文字说明。他看看这张答题纸问我，这一大堆数字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有点懵，这东西你知我知，那还用说。然后他又问，这几个公式是从哪里来的。他告诉我，我们研究的是物理而不是数字，一个物理老师拿到一份物理题的答案，想看的不是数字，而是学生对物理的理解。不但数字不重要，而且公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基本物理概念的理解和对物理学原理本质的把握。理性的思路应该从最基本的物理假定入手，首先罗列半导体理论的所有假定，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每一个假定、每一种情况、每一次选择、每一层因素都要完整地展开讨论，从而最终导出正确的物理公式用于计算。原来1页A4的纸，后来密密麻麻地用了整整5页，添加了大量的说明、讨论和图示。一道题贯穿了半导体物理学的整条脉络，看到老师陪我一起做出的新答案，我第一次如此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原来物理该这么学。虽然我题答得不好，但是他没有任何批评或者不悦，而是和颜悦色地跟我说：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会这样去做（As a reasonable person, I will.），一步一步引导我进行理性思维。”

“硕士课程从10月开课到来年9月论文答辩，整整一年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前半年一共13门课，在2001年4月底，13门课分为两场综合考试。这就是我学生时代的最后两场考试，读博士以后就没有正式的笔试了。”何进总结剑桥考试的特点：“天马行空，有重点，但没有范围。考题选择空间大，一般一套考卷10道题甚至更多，任选四五道题做就可以。考试题目的难度不是以能不能做出来作为衡量的标准，而是以能不能下手作为衡量的标准。考试没有标准答案，看重分析和思辨，各种想法和观点，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还有一条，考试没有第二次机会，几百年来，这一规则一直被严格地执行着。剑桥的想法很简单，学生来学校是学习的，那么就有义务学好。”

利维斯博士

英语系老师帕特森（Lan Patterson）的博客名叫“Curiously Strong”（强烈的好奇心），这曾是20世纪60年代剑桥学生出版的一本诗刊的名字，他在博客上抱怨，要花太多的时间批改考卷，没工夫写作。这位老师写诗，喜欢亨德尔和摇滚，在英语系的试卷中，会出现这样的题目：请比较埃米·瓦恩豪斯（Amy Winehouse）的歌曲*Love is a Losing Game*和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的诗 *As You Came from the Holy Land*。前者是英国流行歌手，后者是16世纪的诗人。帕特森对我们说：“这道题目是让学生阐述诗歌与流行歌曲的关系，语言中的节奏感。现在的文学理论越来越学术化、抽象化，而大众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强，文学理论应该是开放的。”

英语系教授斯蒂芬·柯利尼（Stefan Collini）说：“是的，我们的考试范围是‘从古至今’的，‘剑桥英语’这个词和‘芝加哥经济学’‘牛津哲学’一样有其特定的内涵，那就是‘批评、比较、当下’。”英语系讲师斯蒂芬·洛根（Stephen Logan）对我们说，他认为大学的功能并不只是一个“研究工厂”，不能只凭借论文发表的数量来评定大学的学术水平：“为什么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才算是我的成绩，而我在报纸或杂志上写一篇文章就忽略不计呢？大学的一个功能就是‘时代的文化标尺’，一个教师完全可以用他的‘观念’来教育学生。”洛根博士和柯利尼教授都提到英语系的标志性人物F. R.利维斯。

这位利维斯教授讲的是什么呢？有人这样总结：“他是艺术的加尔文，教育年轻人热爱文学之前，先教他们去讨厌其中的90%。”利维斯生于剑桥，求学于剑桥，终身在剑桥担任教职，他和妻子主办的《细察》杂志在文学批评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看不上弥尔顿，对狄更斯也评价不高，他说哈代是个笨拙的匠人，弄出来的小说不过“偶有所得”。他的女学生西尔维亚·普拉斯说他是个秃顶、刻薄的

妖精。他的文学观念在早期著作《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中开宗明义——“在任何一个时代，明察秋毫的艺术和文学鉴赏常常只能依靠很少的一部分人。除了一目了然和人所周知的案例，只有少数人能够给出不是人云亦云的第一手的判断。他们今天依然是少数人，流行的价值观念就像某种纸币，它的基础是很小数量的黄金。”20世纪40年代，利维斯发表了《英文学院概要》，他强调，英文学院的核心学科是文学及其批评，它在同时培养智性和情感方面为其他学科所不及。英文学院的学生除了学习文学经典之外，还必须学习外语、比较文学、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史等课程。在利维斯看来，精神成人远比专业成材来得重要。利维斯毕生事业的首要原则就是确信：在一个人对艺术的反应能力和他在人类生存的总的适应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对艺术的反应能力可以由批评家来唤醒并使之丰富。

陆建德在剑桥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利维斯的。“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课讨论广告、电影这些大众文化。在他看来，文学批评要指出‘套话’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利维斯把文化转换为语言问题，文化的精粹就是辨别优劣的语言，但他给人的印象是在进行一场无望取胜的战争，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正在消解批评的标准，利维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为什么总要去电影院看一部美国西部片才能放松。”

清华大学教授、剑桥博士曹莉介绍：“与剑桥800年的历史相比，成立于1917年的英文系堪称年轻，当时的一份报告说，文学所能提供的精神价值足以取代宗教的主导地位，将文学与普通人的道德修养和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利维斯看来，大学就是要提高社会的精神格调，培养公众的智慧，纯洁国民的趣味，大学和文学批评的使命就是抵抗社会对“少数人文化”的围追堵截。

1959年5月，C. P.斯诺在剑桥大学的评议堂发表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斯诺曾是一名科学家，还是一名小说家，后来

“又成了一名身份难以确定的公众人物，有资格对无论什么问题发表他的见解”。这次的演讲他提出了问题：知识分子是两极的，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他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一个文学知识分子根本不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什么，但科学革命将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的变化，能让那些贫穷的地方逐渐富裕起来。

斯蒂芬·柯利尼教授为50年前的这场演讲做了一个长篇导言，在《两种文化》中文版中即可看到，他说，斯诺提出来的问题，任何一个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他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利维斯教授的回应是在1962年，他退休之前所做的《里士满演讲》，他对斯诺的蔑视是全方位的。“他在智力上并不出类拔萃”，他的演讲“所展示的恰恰是智力特色的全然缺乏和令人窘迫的粗俗风格”；“作为小说家他并不存在，他还没有开始存在，他不能被认为懂得小说是什么。他写下的每一页都等于白纸，空洞无物”。这份演讲发表后，众多知识分子参与讨论，利维斯的腔调被认为过于刻薄，但这也符合他文学批评的一贯作风。

柯利尼教授说，凡是利维斯认为浅薄、机械化和仅仅风行一时的东西，他都恨不得扔进垃圾桶里，斯诺可以凭借小说沽名钓誉，但他却闯进了20世纪英国文化一个最敏感的区域：对工业革命给人类造成的后果做出评价。利维斯把斯诺的名声看成一种“不祥之兆”，“它说明现代社会多么严重地丧失了谈论能赋予生活以有意义的价值的能力，于是‘繁荣’‘提升生活标准’这类套话就被用来填补空当”。

9月底，剑桥大学的唐宁学院，恰好有一个“重估利维斯”的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持人是利兹大学教授C.乔伊斯，他对我们说：“利维斯对工业革命对文化的破坏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也不愿意人们将生活的手段和生活的目的混为一谈，他教学中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理解‘生活’的复杂意味，生活只是个人的，而无法抽象化，难以用工业和科学的数据来证明生活的幸福。”

乔伊斯教授说，利维斯教授去世时，《泰晤士报》发表的讣告中特意描述了唐宁学院的建筑特点："这所学院是希腊风格，用大量的空地取代了封闭的庭院，廊柱高大，在这所学院里人们可以像希腊的智者那样静思，但看到那些建筑，也会让我们明白，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古典主义。"1962年，当利维斯从唐宁学院退休时，丘吉尔学院的英语教授乔治·斯坦纳写了一篇文章：'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作为一位大学教师，他讲话不多，身材瘦小，他离开讲台，以一种特有的轻松、灵活又旁若无人的步伐走出了房门。'可是，当利维斯博士最后一次离开米尔巷时，英国情感历史中的一个时代便结束了。"

格兰切斯特草地

离老卡文迪什实验室两分钟的路程，就是伍玻科学历史博物馆，严格说，这只是科学历史系的一间陈列室而已，楼梯拐角处张贴着学生的考试成绩，博物馆里陈列着约1000件古老的科学仪器。伍玻曾担任剑桥科学仪器公司的董事长，在退休之后将自己的收藏捐献给学校，这些望远镜、显微镜、太阳系仪只能展现科学历史的某一个片断，相比之下，西德维克地质博物馆则试图用无数的石头来涵盖整个地球的历史。在这间博物馆里可以找到剑桥早期建筑所使用的石材——剑桥本地所产的石灰石质量欠佳，克莱尔学院和国王学院之间的墙就是用本地石灰石构建的，从15世纪开始，学院能够负担从英国其他地方运来更好的石材，唐宁学院是用鱼卵石构建，评议堂是用波特兰石灰石构建。在地质博物馆对面，是人类学系和考古系拥有的"人类学博物馆"。

剑桥植物园在城外占据一大片土地，那里曾经是三一学院的麦田，学校对这座植物园的规划是："不仅要鼓励人们对植物学的兴趣，也要使花园成为一个令人愉快的所在。"植物学教授约翰·史蒂文·亨斯洛在1831年开始建设这个植物园，他在那一年还把他的学生

达尔文送上了“猎犬号”，而达尔文带回来的鱼类标本及昆虫标本则陈列在“动物学博物馆”里。穿过唐宁学院的空地，兰斯菲尔德路上的“斯科特极地探险博物馆”正在进行维修，这里展示英国人对南极和北极的探险，而剑桥大学也早在1920年就建立起冰河研究机构。这座城市中最为著名的博物馆当然是建立于1816年的菲茨威廉博物馆，这里收藏了世界范围内的众多艺术品，会有各种主题的当代艺术展、画廊讲座和演奏会。

每一个博物馆都会激发起你对某一门类学问的兴趣，但流连于博物馆的人数永远不会比漫步在格兰切斯特草地上的人多，这一大片草地上有一条3公里长的路径，从市区徒步、骑自行车，或者划船沿剑河抵达格兰切斯特村，在“果园”里喝上一杯茶，是剑桥最为经典的一条休闲路线。果园中也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纪念的是青年诗人罗伯特·布鲁克。100年前，他租住果园的一间农舍写论文，享受着英国乡村生活的甜美，事实上，他躲到这个安静地方来也没能好好看书，不断有朋友来拜访，享受着坐在苹果树下看着落日的悠闲，这些朋友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罗素、维特根斯坦、凯恩斯、福斯特。在某些月色撩人的夜晚，布鲁克和伍尔夫会到拜伦潭去裸泳，那里离果园不远，横渡达达尼尔海峡的拜伦就在那片池塘里练就了自己的游泳功夫。1821年，拜伦在自己的日记中回想起在剑河游泳的场景，“那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格兰切斯特草地上的一对母女。从剑桥到果园，要经过这片草地。800多年来，剑桥的学生，或步行或骑马、划船，到这里郊游

1909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布鲁克在这里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他说：“我不假装能理解自然，不过我和她相处愉快。我看我的书，她料理母鸡和风雨，我们都很有耐心。一位老妇人为我准备蜂蜜、鸡蛋和牛奶，她整天坐在玫瑰花园里干活。”他写下诗句：“池塘上方，河水是否甜蜜，和缓？”“教堂的钟还停在差10分3点吗？还有蜂蜜用来泡茶吗？”1915年，这位27岁的诗人死在地中海的英国海军的船上，被埋葬在爱琴海一个小岛的橄榄树林中，他的诗里这样说过：“如果我死去，请为我想想此事——外国的田野上有一些角落，它永远属于英国。”

在拜伦、布鲁克这两位浪漫的年轻诗人客死异乡之后，这片草地又迎来了新的诗人。1956年2月25日，在剑桥大学的一个聚会上，西尔维亚·普拉斯与她慕名的泰德·休斯第一次见面，当休斯的嘴唇移到她脖子上的时候，她在他脸颊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咬出了血。4个月后，休斯和普拉斯结了婚，这年秋天，他们搬到了格兰切斯特附近居住。尽管后世许多的孩子都会背诵普拉斯那句“我披着红发从灰烬中升起，我吞噬男人如呼吸空气”，但更多的人会惋惜她的自杀，“死去是一种艺术，我要做得精彩”。

在普拉斯的日记和她写给母亲的信里，经常能看到这片草地。“记得罗伯特·布鲁克的诗吗？我们在果园里喝杯茶？”“昨天我们走了15英里，穿过森林、田野、沼泽，月光下的格兰切斯特草地上沉睡的牛群。”“泰德和我在河上撑船，在格兰切斯特的苹果树下喝茶，吃蜂蜜还有三明治。”“这天早上4点半起床，我们去草地上散步，我给一群牛朗诵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我读了20分钟，我从未有过如此智慧、专注的听众。”“开始时天空发出蓝色的光芒，大颗的星星还悬在空中，之后转为粉红色，延伸至天际线时慢慢变得半透明。”当时，普拉斯在准备学位考试，泰德在附近的一所中学里教书，她负责把两个人的诗作打印出来，去参加诗歌比赛。他25岁，她23岁，还没有为家务琐事和别的女人发生矛盾，1957年春天他们离

开格兰切斯特，这片草地只记取了这对年轻诗人最美好的时光。多年后，休斯在诗里回首：“你的声音穿过草地朝向格兰切斯特，声音渐沉，牛群入迷地观看。”

如今，每天都有人穿过丁香花、栗子树，走过草地，在果园的苹果树下喝茶，默诵布鲁克的诗：“看看在格兰切斯特的月光下，渐渐苏醒的枝条，闻着令人兴奋的芬芳，永远记得，永远记得，河水的气味，倾听微风吹拂小树发出的叹息。”拜伦、布鲁克、泰德·休斯和西尔维亚·普拉斯赋予这片草地永远的青春气息，浪漫与激越的青年时代，对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情怀，刻骨铭心的爱情。他们的事迹与诗歌绵长悠远，其力量比之平克·弗洛伊德的那首名为《格兰切斯特草地》的歌曲要浑厚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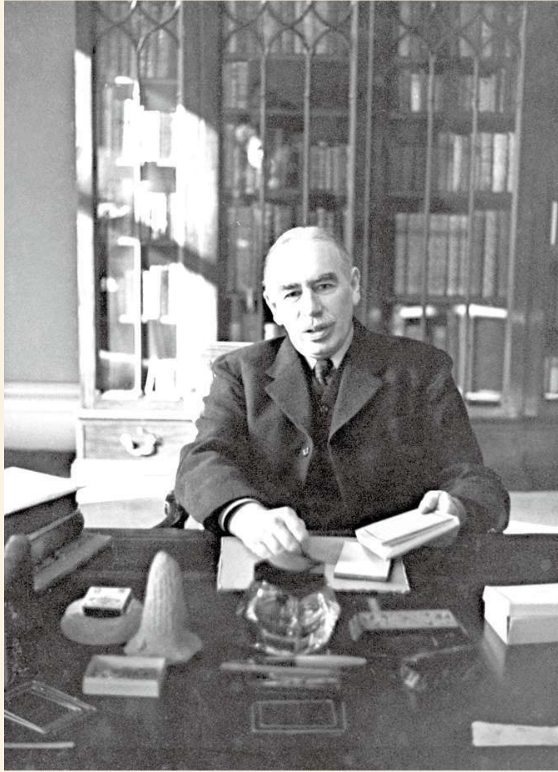
1924年，伍尔夫的一封信中这样写，你对剑桥感觉好吗？这里让人“发热”——准备考试的年轻人，后花园里的树和花，平底船，院士的花园，美丽到不那么真实的池塘，智慧头脑之间的辩论。伍尔夫说她尊重那种辩论的气氛，但她置身事外感觉会更好，她当时到剑桥是做一个讲座，她并没有在这里学习，但对更多的年轻人来说，花园、树、河水、草地、图书馆、博物馆、教堂，看见这些还不够，他们还需要有一个智慧的头脑，不是为了一场辩论，而是为了配得上这方水土这方历史，配得上自己明明白白的青春。

（本文部分采访由何潇、余力莎完成。）

剑桥人物

凯恩斯

1883年出生于剑桥，1897年考入伊顿公学，1902年因数学和古典文学成绩优秀被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录取。他的父亲是剑桥教授，他的


凯恩斯

奶奶很早就写信给他，“我希望你聪明健康，一辈子都生活在剑桥”。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用30年的时间写就的《凯恩斯传》对他在剑桥的生活有非常细致的描绘，他关于凯恩斯的新书《凯恩斯：大师归来》于2009年9月3日在英国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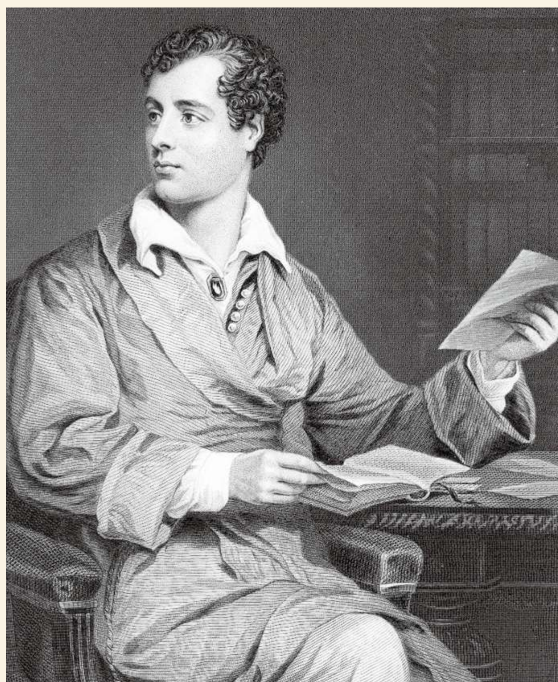
凯恩斯热爱文学艺术，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的主要成员。他对英国公共文化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剑桥经济系首任教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有一句名言：“经济学家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必须关心人的最终目标。”凯恩斯的研究始终在这种道德氛围中成长，在凯恩斯心目中，艺术家的地位高于科学家，因为后者研究的仍然超不出手段的范畴。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讲了这样一则轶闻，这件趣事在斯基德尔斯基在传记中未见提及。1945年，凯恩斯从已担任33年的《经济学杂志》主编一职卸任，顾问委员会为他举行宴会，他在致谢时有意字斟句酌地来了个修辞上的反高潮。他要为皇家经济学会和经济学家干杯，并说在座诸位都是受托人，此时他略作停顿，大家以为他要说的是文明的受托人，不料他竟故意让众人失望：“诸位并非……受托人。”原来他要说的是：“为经济学家、为并非创造文明之受托人，而是创作文明之可能性的受托人诸位，干杯。”这个故事是凯恩斯另一本传记的作者哈罗德讲述的。哈罗德深感这种表述是对经济学家“最公平的评价”。真正受托创造文明的，是凯恩斯的艺术家、作家朋友们，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的弗吉尼亚·伍尔夫、邓肯

·格兰特。哈罗德接下去说，“经济学家发挥着次等的但是不可缺少的作用”，也就是说，他们要为直接创造文明的人提供有利于创造的环境和条件。

拜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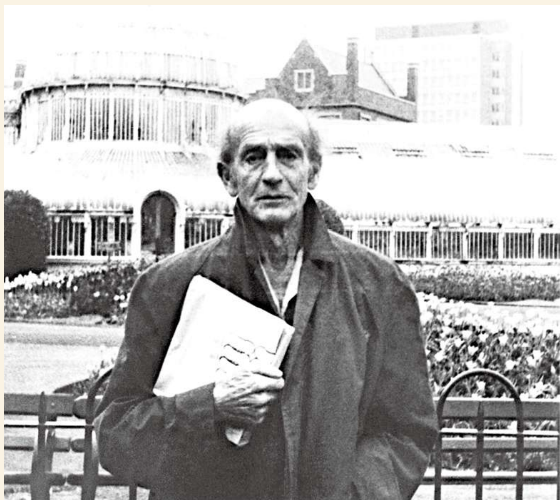
青春与诗歌从来不可分割，在牛津和剑桥的历史上，都可以排出一支诗人代表队。而剑桥诗人的领军人物无疑就是拜伦，剑桥有关拜伦的遗迹就是“拜伦池塘”，这个地方偏僻，远离市区，水塘看起来混沌，但周围幽静的森林非常适合一个疯癫的诗人。他在哈罗公学上学时就显示出足够的天赋，以至于在剑桥以游手好闲著称，他基本上不上课，但博览群书。他后来回忆说：“人们从未看到我读书，老是懒洋洋的，恶作剧或做游戏，事实上我在吃饭时读，在床上读，在没有人读书时读，自我5岁以来，就读了所有的读物。”



拜伦

这位没落贵族毕业之后就游历希腊、西班牙，最终如他所梦想的那样，成为一支军队的司令，为希腊独立而战死，他用他的诗歌和人生创造了“拜伦式英雄”——那些渴望自由、热血沸腾、孤独、狂傲的年轻人，也定义了何为浪漫主义者——我没有爱过这世界，它对我也一样；我没有阿谀过它腐臭的呼吸，也不曾忍从地屈膝，膜拜它的各种偶像；我没有爱过这世界，它对我也一样——但是，尽管彼此敌视，让我们方方便便地分手吧。

利维斯



利维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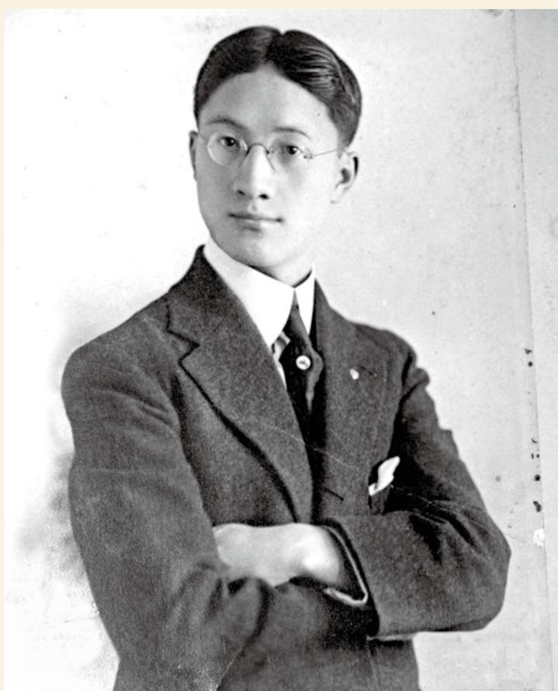
清华大学教授曹莉，对剑桥大学的“通识教育”感受颇深，“这个词字面的意思就是自由教育，即自由人应该受到的教育”。从剑桥归国后，曹莉负责清华本科生的通识教育，相比剑桥，她感叹：“国内大学里最缺乏读书的气氛。”她是这样介绍利维斯教授的。

利维斯对“大众文明”的忧虑，开启了一个传统，这就是大众文化批判中的利维斯主义。利维斯主义的文化批判思想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3部著作。这3本书是F. R.利维斯1930年的《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利维斯的夫人Q. D.利维斯1932年的《小说和阅读公众》，以及之后利维斯和丹尼斯·汤普生合著的《文化与环境》。英国批评家弗朗西斯·穆勒恩（F.Mulhern）在他《〈细绎〉的契机》一书中，曾将利维斯主义概括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反抗一个它无以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或者替代的文化秩序。因此，它是既定文化内部的一种道德主义的反抗，不是标举另一种秩序，而是坚持现存的秩序应当遵守它的诺言”。他认为恰恰就是利维斯主义的这一“小资产阶级”性质，正合既不满现实又畏惧彻底革命的英国知识阶级口味，这个温和的明显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利维斯主义，统治英国文学批评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如果说少数人文化在阿诺德那里是代表了“所思所言的最好的东西”，在利维斯这里是特别体现在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上面，那么对于利维斯的妻子、英国女批评家Q. D.利维斯而言，则更多体现了一种传统文学的危机感。在她1932年出版的《小说和阅读公众》一书中

说，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文学的前景已经变得非常渺茫。诗歌和文学批评一般读者不屑光顾，戏剧就它同文学重叠的那一块来说已经死了，独有小说在苟延残喘，但是小说看来同样已时日无多。文学的传统读者们现在在电影院里消磨时光，要不翻翻报纸和流行杂志，或者就听爵士音乐。Q. D.利维斯说阅读公众不再接触过去和它那个时代最好的文学，究其原委，是因为大众传媒成功地传播了固定化了的、标准化了的思想和情感模式。

徐志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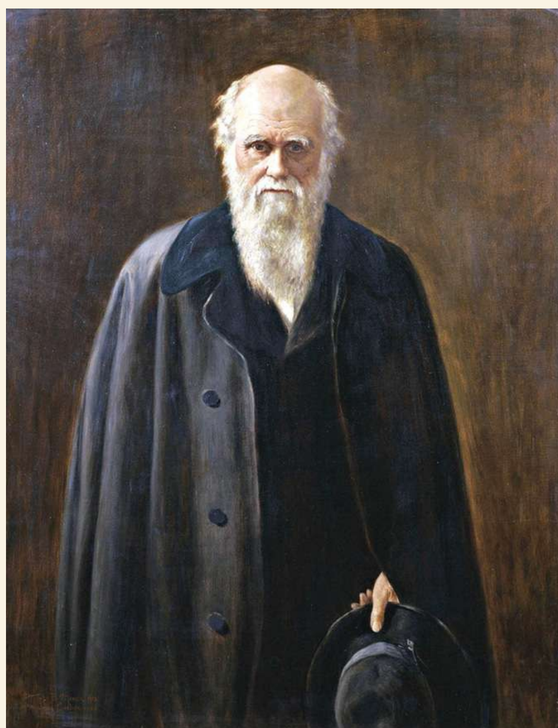
徐志摩

这位中国诗人和剑桥的姻缘可以从他的一些诗文和通信中发现脉络，他在剑桥滞留一年半，没写过论文，也没拿到学位，但参加了“邪学社”的一系列演讲，那是剑桥一个秘密俱乐部，他和狄更斯、罗素等大学者有过来往，但从心底，他留在剑桥留在英国而后又回到中国，都是为了追随林徽因。“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他对剑桥最充满情感的自白应该是《再会吧，康桥》一诗：“在你妩媚河身的两岸，此后/清风明月夜，当照见我情热/狂溢的旧痕，尚留草底桥边/明年燕子归来，当记我幽叹/音节，歌吟声息，缦烂的云纹/霞彩，应反映我的思想情感/此日向天空的恋意诗心/赞颂穆静腾辉的晚景，清晨/富丽的温柔；听！那和缓的钟声/解释了新秋凉绪，旅人别意/我精魂腾跃，满想化人音波/震天彻地，弥盖我爱的康桥/如慈母之于睡儿，缓抱软吻/康桥！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

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刘洪涛先生说："徐志摩是一位出色的文化交流使者，他把英国知识界最新的潮流带到中国，把英国知识精英的注意力吸引到中国，同时，徐志摩也给英国知识界见证了新文学在异国土壤萌芽的过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新一代作家身上的延伸与发展。"从徐志摩开始到燕卜荪在中国讲学，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人士与英国一流的精英学者之间还能有所互动和传承，而后这种层面的文化交流就隔绝了。

达尔文

1860年，剑桥大学正式取消了禁止院士结婚的规定。各学院有权自主决定此事，1880年之后，院士们的结婚愿望才取得了成功。从此，院士和学生同居一室的共栖现象渐渐消除，中世纪的生活色彩完结了。从遗传学来看，取消结婚禁令神奇地提高了"牛桥因子"。一些院士家庭相互联姻，他们的孩子成了牛津和剑桥的教师、伊顿公学的校长。属于"牛桥"这个大学王朝的有阿尔诺德家族、阿德里安家族、赫胥黎家族、达尔文家族，他们反过来又和凯恩斯家族联姻。"牛桥"的近亲婚配也有它不好的一面：在社会上排斥外人。



达尔文

达尔文家族最为著名的成员是提出进化论的查尔斯·达尔文。此外家族中至少有10人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达尔文的两个儿子，F.达尔文（Sir Francis Darwin，1848—1925），在兄弟5人中排行老大，植物学家，其父亲传记的作者，他也是基督学院的院士。H.达尔尔

文（Sir Horace Darwin，1851—1928）是老达尔文5个儿子中最小的，他毕业于剑桥的三一学院，后来，主要从事科学仪器的制造，建立了剑桥科学仪器公司。那位将名字与剑桥的科学史博物馆连在一起的科学仪器收藏家伍玻，就曾是他的私人助手。

牛顿



牛顿

1661年，19岁的牛顿以减费生的身份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靠为学院做杂务的收入支付学费，1665年获学士学位。17世纪中叶，剑桥大学的教育制度还渗透着浓厚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气味，当牛顿进入剑桥时，那里还以传授一些经院式课程为主，例如逻辑、古文、语法、古代史、神学等等。两年后三一学院出现了新气象，卢卡斯创设了一个独辟蹊径的讲座，讲授自然科学知识，例如地理、物理、天文和数学课程。牛顿在30岁之前完成了他的3项伟大成就：微积分学、万有引力和光学分析。人们一度认为，他已经解决了所有的科学问题。

牛顿遗留下许多手稿在1888年辗转回到了剑桥大学图书馆，经济学家凯恩斯读过其中的一部分，1942年，在人们纪念牛顿300周年诞辰的集会上，凯恩斯给牛顿做出了最为精确的评价：“在18世纪以后，牛顿开始被认为是现代第一个和最伟大的科学家，一个唯理主义者，他教导我们沿着冷静的没有色彩的理性思路去思考。我并不这样看待他。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魔术师中的最后一个，巴比伦

和苏美尔人中的最后一个，他是和那些不到1万年前开始创造我们的智力遗产的人们用同样的眼睛观察这个可见智力世界的最后一个伟大人物。是被贤人们顶礼膜拜的最后一个神童。”

李光耀

剑桥历史上著名人物的书信很多，但给李光耀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学监，也就是宿舍管理者写给他的一封信。当时李光耀在菲茨威廉学院攻读法学学位，他的未婚妻柯玉芝在格腾学院，李光耀的宿舍在剑桥以南3英里，格腾学院在剑桥以北3英里，李光耀写信给学监撒切尔，希望调换一个宿舍，方便他看望未婚妻。这位学监曾告诫李光耀：“你到剑桥来，是参加一支特别的军队，就像是近卫军，你要出人头地。”面对李光耀的要求，这位学监如此回信——



1965年，李光耀和夫人柯玉芝在高尔夫球场上

亲爱的李：

你申诉说要去看未婚妻路途遥远，实际上路途不像你说的那么远，尤其是在爱情提供了动力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是否读过伟大的神话，但你会记得，有位先生天天晚上游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为的是见他心爱的妻子。与此相比，到格腾是小事。不幸的是，一天晚上那位先生游过海峡时淹死了，但你是否非得在路上疲乏而死，我很怀疑。

……

顺便说说，格腾学院会不会赏识你那么快就跟这个少女结婚，我没把握，因为他们很自然而且恰当地假定，在爱情最初的光芒下，人们只会花很少时间读书。但我太老了，不能对一个男士和他心爱的人提什么忠告。

——W. S.撒切尔

李光耀就读剑桥之时，菲茨威廉还不是一个学院，只是给不属于任何学院的学生安排食宿，李光耀最终拿到法学一等荣誉学位。他的儿子李显龙在剑桥大学拿到数学一等荣誉学位，李显龙就读于皇后学院。

学监撒切尔给李光耀的这封信显示出了一个宿舍管理者的修养与幽默感，这个“英国范儿”的老头答应，如果李光耀找到合适的宿舍，他会安排他尽快住过去。

剑桥大学东亚系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说，甘地在伦敦大学读书，李光耀在剑桥大学读书，这两位亚洲政治家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深刻认识都萌生于他们的大学生涯。

维特根斯坦

剑桥的公共墓地中埋葬着翁美玲，一代中国人的青春偶像。在万灵巷的“升天墓地”，埋葬着维特根斯坦。这块小墓地名人甚多，安葬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位荣誉勋位（The Order of Merit）获得者，8位剑桥大学学院的院长，15位英国的爵士。

尽管少有人阅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著作，但可以通过罗素的记述来了解这位将一生奉献于智力生活的智者，罗素一认识他就说“他是自摩尔以来我所认识的最最具有使命感和聪明才智的人”，“他常在

半夜到我的房间里，几个钟头内来回踱步不停。一进门他就声明，在离开我的房间后他就自杀。因此，尽管我很困，也不愿撵他走。某个晚上，经过一两个小时死一般沉寂之后，我对他说：维特根斯坦，你是在思考逻辑呢，还是想着你的罪孽呢？他答道：都有。于是又重新陷入了沉默。”

维特根斯坦于1951年4月29日死于剑桥。这位传奇的哲学家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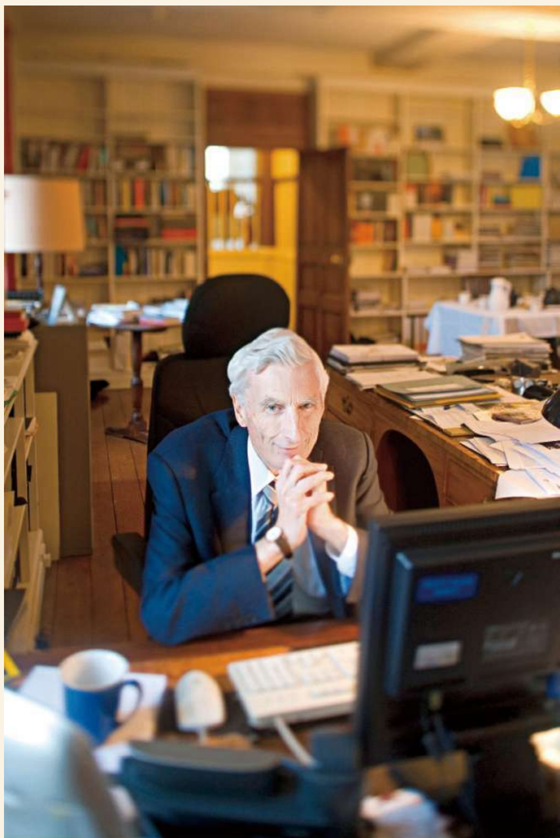


维特根斯坦

理解一只蝴蝶的智力挑战甚于宇宙

马丁·里斯：生于1942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并获得博士学位。英国著名的天文物理学家、宇宙学家，拥有“英国皇家天文学家”头衔，2004年任三一学院院长，2005年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同年被选为英国上议院议员。他的著作包括：《宇宙的一致性：暗物质、人类和人类宇宙学》《重力的致命吸引力：宇宙中的黑洞》《开始之前：我们的宇宙与其他》《六个数字：塑造宇宙的深层力量》《我们的宇宙居所》《最后一个世纪》。

——专访三一学院院长马丁·里斯



马丁·里斯

正对着三一学院的大门，穿过一片巨大的草坪，伊丽莎白时代的墙上爬满了绿色植物。正是黄昏时分，深秋的阳光懒洋洋地洒下来，四周一片静谧，时光好像被锁在这个过分庄严的庭院里。古老的木门吱呀打开，主人出现在门口。马丁·里斯穿一套深蓝色的西装，整个人纤瘦、苍白得厉害，尤其一张脸极富立体感，宛如古希腊雕塑，鼻子极高、窄。他的背比我想象中的驼得更厉害一些，一头耀眼的银发打理得一丝不苟。他看上去像个外星人。

马丁·里斯是三一学院第37任院长。这大概是英国学术界最尊贵的一个职位。数百年来，一直由首相亲自提名，女王直接任命。他们可以在任上待到70岁。

陪我们前来的剑桥大学外事部的蒂姆毕恭毕敬地尊称他为爵士。如果不知道他的经历，你会以为他有贵族血统。事实上，他1942年出生在约克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父母都是老师，经营一家寄宿学校，并自己教书。马丁·里斯就是在这所寄宿学校里读完小学的，他的童年受父亲影响甚大，父亲毕业于剑桥，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画画、作曲、写作，而且热心政治。

一个在这里留学的中国学生告诉我，在剑桥，三一学院的院长是神一样的人物。曾经有学生写讽刺诗：“在整个世界和无穷的宇宙中，没有什么有三一学院的院长伟大。”

有趣的是，马丁·里斯正是一位宇宙学家、天文学家。他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这样形容自己：“如果你随机挑出1万人，9999人都有一个相似之处：他们关心地球表面，至少是附近的事情，剩下的那个人是天文学家，我就属于那样一个怪异的族类。”

当然，他是那个族类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1995年，他被授予皇家天文学家的头衔，虽然是一个纯粹的荣誉头衔，但400多年来，只授予过15个人，包括哈雷彗星的命名者埃德蒙·哈雷。

里斯爵士的学术声誉主要建立在高能天文物理学方面的研究上，大爆炸、黑洞的形成，恒星与银河系早期的生成。总之，他研究宇宙的起源和终极，但他最关心的，却是人类在其中的命运。他曾经说过，天文学是一种简单的科学，真正复杂的是生命，理解一只蝴蝶的智力挑战甚于整个宇宙。而科学最大的谜题是：人类，我们，到底是怎么来的?

很多人以为他是那种整天抱着望远镜观察天象的人，但他的工作是解释，从一大堆数据中理出头绪，发现模式，解读宇宙大图景。这是他最擅长的。40多年前，当他还在剑桥读书的时候，已经认识到自己长于综合性的思维，而不是链条式的推论，所以才从纯数学转到天文物理学。他唯一拥有的望远镜是一个16世纪的古董。

以他的身份，里斯爵士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友好、谦逊，身上没有半点倨傲之气，眼中的善意和慈祥是长辈式的，让人觉着温暖。我忍不住问他，是否听过那首讽刺诗，他笑而不答，脸上带着一种好玩的神情，好像我就是那个写诗的家伙。

我们沿着古老华丽的旋转木梯上去，他坚持在我们身后带路。穿过几扇巨大明亮的窗户，脚下的地毯柔软得让人不忍踩下去。途中，我们经过一个如宫殿般的客厅，黄金浮雕的天花板，东方式的窗户悬

挂着红色天鹅绒窗帘，蒂姆悄悄告诉我，那个房间保留了亨利八世时代的样子，从不对外开放，他也从未进去过。

里斯爵士领我们进入他的书房。与客厅比，这个书房相对较小，而且朴素得多，四壁都是书架。这里的空气感觉自然多了，墙上悬挂着几幅巨幅油画，年代久远，但保存如新。画中人我一个也不认识，里斯爵士告诉我，这些都是三一学院历代院长的肖像。有一天，他的肖像也会挂在这个地方。

壁炉前一张宽大的红木桌子上，摆着一套精致的英式茶具，几个白瓷杯里还有冷咖啡剩着，大概一批客人刚走不久。不远的角落里有一架华丽的棕色钢琴，我问他是否弹琴，他笑着说，我弹得不好，但我妻子弹得非常好。他的妻子卡洛琳是剑桥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研究后苏联社会。

我们在沙发上入座。下午的光线相当优美，映照得整个书房很生动。从窗口望出去，巨大的草坪绿意盈盈，王冠造型的喷泉亭子汩汩地冒着水柱。四下里不知什么花开得火红，给稍嫌阴冷的建筑添加了暖色调。偌大的庭院只有寥寥几个人。这几天是开学日，三一学院大门紧闭，只有本院的学生可以出入。根据传统，每年新生入学，第一顿正式晚餐后，都会被邀请到院长的府邸做客，不知到时会是怎样的光景。

三一学院是剑桥最大的，但不是最老的学院。除了辉煌的历史，以及非常非常有钱之外，今天的三一学院在剑桥已经不再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入住三一学院古老的宿舍，分享三一故人的荣耀，仍然是许多剑桥学生的梦想，但就教学而言，不同学院之间已经没有区别，因为教学由大学各系所统一分配，三一学院的院士同样要给其他学院的学生上课。马丁·里斯本人在3年前还在给本科生上课。

不过，“随着年纪越大，我对教书的兴趣越来越淡了”，他说，“但我仍然在做研究，主要是理论方面的，比如黑洞的形成、引力波、伽马射线。”

此外，他还大量地写作。作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长，他一个很重要的兴趣和工作就在于向大众解释科学的复杂性。他是一流的科普作家，在英国的报章上写了很多文章，表达对科技滥用的忧虑，尤其是核竞备。在2003年出版的《最后一个世纪》一书中，副标题几乎是绝望的，“人类能活过21世纪吗？”

他的答案是，50%的概率。核战争、生化恐怖主义、生态灾难、小行星碰撞，有可能使得人类在100年之内灭绝。他甚至与人打赌，赌注1000英镑——到2020年之前，会有一次大型的生物灾难，可能是因为失误，或者恐怖主义，上百万人会因此丧生。他最担心的，似乎是如今制造计算机病毒的神经病，有一天会制造起生物病毒来。

他承认自己的基调是悲观了一点。但是，正如他所说，这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世纪：世界正在从更多的维度，以更快的速度改变。最重要的是，人类的本质不再是一个变量——药物植入、基因技术很可能深刻地改变人类，几百年后，人类也许就是另外一副样子。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说，科学家最好的生命在45岁之前。对你来说，变老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吗？

里斯：我想引用瑞利爵士（Lord Reyleigh，氩的发现者），剑桥一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的话来回答你的问题。在他60多岁的时候，有人问他：“科学家过了60岁以后，对世界的危害是否大于贡献？”他说：“不，只要他们继续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不批评年轻人。”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建议。在剑桥，很多科学家90多岁了在学术上还很活跃。

对我来说，让一切更难的，并不是我变老了，而是我有更多的事务缠身。等我从这些职位退下来之后，我也会回到研究岗位上去。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否更愿意远离这些俗务，而专心于做研究？

里斯：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贡献是有用的，虽然方式不同。

三联生活周刊：三一学院出过那么多的科学家，你觉得谁跟你最像？

里斯：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崇拜他们中的很多人。我认为剑桥出过的最伟大的科学家是牛顿，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但他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人。年轻的时候，他孤独、情绪不稳，晚年虚荣、报复心重。如果非要举一个的话，爱丁顿（Arthur Stanley Eddington）教授。他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在剑桥教书，是研究爱因斯坦相对论最早的先驱。他当时担任的Plumian（普鲁密安天文学与实验学）教授席位，也是我后来担任的。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名天文学家，你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宇宙、黑洞这样的大问题，它会不会让你深觉人类的渺小？

里斯：一件事物的迷人之处，不在于它有多大，而是它有多复杂。地球虽小，就复杂度而言，却是宇宙的中心。恒星不过是一些化学物质，并不复杂，但生物，哪怕只是一只昆虫，都有非常复杂的结构。地球上最小的一只昆虫都比宇宙中的一颗行星更复杂，更迷人，更何况人？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学术背景会不会给你一种不同于常人的看待生活的视角？

里斯：哦，不，我同样担心明天会发生什么，下周会发生什么，一点都不比你少，可能更多。但是，作为一个天文学家，我

思考的是几十亿年的问题，它的确给我一个更广阔的时空视角。在这个视角下，不仅剑桥800年的时间不算长，中国6000多年的历史也不算长。最重要的是，它让你意识到，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未来。

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有一段很长的历史。达尔文的理论追溯到三四十亿年前，单细胞生物如何进化成人类今天的样子。很多人都以为，人类是进化的终结，是顶点，但天文学家很清楚，太阳还不过一半的寿命，还有50亿或者60亿年的时间继续燃烧。如果把太阳100亿年的寿命换算成一年，则人类一切有记录的历史不超过1分钟，而20世纪不过三分之一秒。至于宇宙，宇宙可能会持续到永远。所以，未来远比过去要长远，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去思考。

在我眼中，人类只是进化中的一个步骤，未来地球上会出现更加复杂、更加智能的生物，他们可能与我们很相似，也可能是智能机器人，但我们绝对不是终点。如果你再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智能生命可以传播到地球以外，那么我们更应该视自己为一个更加漫长的进化链条上的一环，后面的链条将超出人类的理解力。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担忧21世纪人类的种种行为。21世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世纪。假如我们真的制造了无可挽回的灾难，毁灭的不仅是人类的文明，还有未来新的进化的可能性——那些更高级的生物是从我们进化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说，如果没有人类，地球会更好，你认为呢？

里斯：身为人类的一员，我当然不同意这种观点。但对地球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单独的物种——人类的决定，可能影响整个星球的存亡。在过去的45亿年里，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已经失控，你认为呢？

里斯：我不认为它已经失控，但我们确实应该认真思考科学黑暗的一面，它可能造成的风险和伦理问题，并加以规制，比如，利用基因技术改造动物或人类时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限度？

在今天这个时代，科技所造成的后果，无论好坏，对整个世界的影响都比以往更大。一个无聊的黑客制造病毒，可能累及全世界的电脑。因此，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引导科学的方向。对此，科学家的责任尤其重大，我们必须参与到政治的过程中，努力与公众建立对话，以保证这些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利益最大化，并处理好危险和伦理困境。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多年来，通过写作和演讲，你已经非常努力地试图在科学与公众之间建立对话。

里斯：是的。公众的科学教育非常重要。一个原因是，科学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唯一真正的全球性文化。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但无论对英国人还是中国人来说，质子、蛋白质、毕达哥拉斯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应该理解和欣赏科学的美妙发现。

我们现在开始理解，140亿年前，由于某种至今仍然神秘的起源，宇宙诞生了，原子、恒星、行星、生物圈都在进化，然后至少在一颗恒星的一颗行星上，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导致了一个物种的出现，并开始追问自己的起源。不了解达尔文进化论的人，在文化上是贫乏的。同样，对一个科学家来说，如果只能与极少数的几个专家谈论他的发现，他的满足感会少很多。

第二个原因是，人类文明的未来取决于今天我们如何使用科学，但决定科学如何使用的，往往不是科学家，而是政客，是公众。为了做出正确的决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应该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他们不必成为专家，但至少要了解这个世界正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寻找新的能源和食物，环境变化、基因技术的危险。这样，他们才能通过投票保证政府做出明智的决定，保证科学的发展是可持续的，有利于人类的，并且不伤害环境。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研究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吗？

里斯：这很有趣——人们最感兴趣的科学问题往往是与日常生活距离最遥远的。就像他们喜欢恐龙，他们对宇宙也一样兴趣浓厚。因为人们总是对起源之类的根本问题感兴趣，宇宙正是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而且，现在是一个特殊时期。宇宙学第一次成为主流科学的一部分，我们能探讨一些很大的问题，比如一切是否有一个开始？宇宙是无限的吗？它会永远存在下去吗？别的星球上有生命吗？等等。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正想问，别的星球上有生命吗？

里斯：我不知道，但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10年，天文学家已经发现，绝大部分恒星都有行星围绕它的轨道运行，就像太阳有自己的行星，包括地球，10年前人们还不知道这一点。但我们不知道这些行星上是否有生命。如果有人非要跟我打赌，我会下注说，至少，很有可能，简单的生命是广泛存在的。

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我想，在50年或者更少的时间内，我们应该有一个清楚的答案，我们也许会在太阳系之内找到证据。而且，它会帮助我们揭开自身的谜底——地球上的生命是怎样开始的。达尔文的理论解释了简单的生命如何进化到更复杂的生命，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地球上的生命是怎样开始的。一旦知道了地球上的生命是怎样开始的，我们就能理解生命可能如何在别的星球开始，知道该到哪里去找他们。这是21世纪最有趣、最重要的科研领域。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更关心智能生命。

里斯：当然，这是两个问题。刚才我们谈的是简单生命的起源：在别的行星上，是否有简单生命的存在？如果有，它有可能进化成智能生命吗？

其实，我们不知道智能生命是不是必然的结果，或者只是地球进化的一个偶然事件。有科学家认为，如果地球上的生命从头开始再进化一次，得到的可能只是一个昆虫的星球。

至于寻找智能生命，已经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比如SETI（搜寻地外文明）的科学实验计划，我不能打赌说他们一定能发现什么，但我很高兴有人在尝试。

如果外星人不存在，虽说令人失望，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有积极的结果。它会让我们意识到，地球是多么特殊，多么重要。虽然如此渺小，但如果它是整个银河系生命进化的唯一场所，那么它就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可以不那么谦虚。同时，我们会有更大的责任感——地球很可能是生命散播到银河系的起点。

总之，如果搜寻失败了，地球更加特别；如果搜寻成功了，则宇宙更加有趣。

三联生活周刊：你不害怕生命的短暂吗?很多科学家在晚年相信上帝，你呢？

里斯：与很多科学家一样，我去教堂，我喜欢教堂的音乐和仪式，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但我不相信来生。我不觉得事物需要用永恒来证明自己的重要性。一段优美的音乐不需要持续到永远，花开只有短暂的瞬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为此感到不安。

几年前，美国加州有一个组织试图把人冷冻起来，200年后再让他们复活。他们采访我，问我的观点，我说我宁愿自己的生命结束在英国的墓地，而不是加州的冰箱里。他们很不高兴，觉得我是个悲观主义者。

如果身体合理健康，活得久一些当然好。通过基因改造，有一天我们也许真能延长人类的寿命。但你是个年轻人，你不会觉得老人永远活着是件好事。我们必须接受，生有时，死有时，正如《圣经》上所说的。我们唯一可以希望的是，在我们死后，我们的影响、创造或者回忆能延续更长的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像你这样的科学家，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超出你的理解范围的吗？

里斯：很多很多。不过我觉得，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有什么事情是人类永远无法理解的吗？我正在写的一本书，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人类的大脑进化到今天的地步，是非常神奇的。几千年前在非洲捕猎为生的大脑，今天能理解宇宙学、原子物理学。但是，没有理由就此认定，人类的大脑能理解一切事情。也许这个世界存在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相，是超出人类的理解范畴的，比如，我们通过望远镜所能观察到的宇宙，可能并非全部的物理事实。很可能有另外的完全不同的空间维度，被完全不同的法则所规定，但我们无法感知或理解，就像一只猴子不可能理解量子物理学一样，只能留待后人类，或者超人类，他们也许会拥有更加高级的智慧，能理解这些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一生中，有什么事情是你一直想做，但没有机会做的吗？

里斯：太多了。走更多的路，学更多的东西，这是一个美妙的世界，人生太短暂了。

真正理解任何一种现象都是很难的

艾莉森·理查德，剑桥大学第344届副校长（校长职位由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担任，纯属挂名，实际主管学术与行政工作的是副校长），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纽罕学院，在伦敦国王学院得到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前往美国，在耶鲁大学任教多年，并担任耶鲁大学教务长一职。作为人类学家，她的专业是人类学、灵长生物学，并以研究灵长类动物复杂的社会体系发展而闻名。

——专访剑桥大学副校长艾莉森·理查德

在剑桥大学，艾莉森·理查德仍然被人称为“教授”。她也喜欢人们这么叫她。她说自己的内心一直是一个人类学者，尽管没有多少

时间留给她的学术，但每年总有两三个星期，通常是夏天，或者新年，她会带上一些学生去做野外调查。马达加斯加的丛林里仍然保留着她的一个小小考察站。那段时间，她会忘记自己是剑桥大学的校长，她变成一个纯粹的学者，不再是制度化地思考问题，而是思考事物本身。



艾莉森·理查德

“那里没有电话，没有水，没有电，但我热爱那样的时光。”她的眼睛流露出一种欢快的光芒。

艾莉森教授研究的是马达加斯加的一种狐猴，这种狐猴的特点是，雌性在社群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与她的身份倒是一种幽默的巧合——剑桥大学800年的历史中，750年是纯粹男性的历史，她是第一位女校长，而且以作风强硬闻名。

这几年，英国政府一直要求大学广开通道，让贫穷家庭的子女有机会进入剑桥、牛津这样的精英大学读书。这位女校长的回应是：“剑桥大学的入学资格完全建立在学生的智力基础上，我们为最优秀的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无论他们的社会背景如何。大学关心社会正义，也促进社会正义，但它不是社会正义的引擎，也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它有自己的目的。”

在与她的对话中，“剑桥的价值”这个词不断被提起。

她穿一条宝蓝色短款连衣裙，外罩一件深蓝色薄外套，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深绿色的眼睛中有风霜之色，皮肤也不是很好，大

概是年轻时在马达加斯加之类的丛林里待得太久的缘故。个头出乎意料地小，但举手投足间，仿佛有一种活力要从身体里爆发出来。

她的办公室就挺像《哈利·波特》电影里的某个布景，圆屋顶结构，是“老学堂”最高的一间阁楼改造的。剑桥有不少地方给人这种不真实的、电影一样的感觉。比如“老学堂”，剑桥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差不多600多年了，原属于国王学院，后来被剑桥大学买下，作为学校的行政和管理中心，但庭院深深，巨大的石壁呈深褐色，尤其给人一种岁月斑驳的感觉。

其实，见识过了一些老学院的奢华，这间校长办公室相对狭小得多，也朴素得多，但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一是因为天花板极高，密密的几排橡木书架也高得厉害，从地板直接天花板，营造了一种奇特的庄严感；二是因为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给人一种古旧、厚重的感觉，尽管是现代化的沙发、书桌、地毯、红木会议桌，但岁月幽深之感挥之不去。

“老学堂”的凸出式窗户据说是全剑桥最美的。从它的窗口看出去，剑桥大学的核心格局历历在目——东向是议事堂，一幢漂亮的古罗马式建筑，学校的重大典礼，包括毕业典礼、颁授学位，都在这里举行；南面是国王学院的大教堂；往西是三一礼堂和克莱尔学院；北面则是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再远处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尖顶隐约可见，那里有着全世界无可匹敌的藏书，800多万册，据说英国每出版1本新书，都会送1册到这里收藏。

像剑桥这样一所大学，无论建设，还是维持起来，都是非常昂贵的。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拨款，一方面使它经常性地陷入赤字运转，另一方面过于受制于政府。为了扩大资金来源，也为了保护大学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艾莉森教授在剑桥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一种美国式的捐赠系统。她上任第二年开始筹划剑桥建校800周年的筹款活动，目标是到2012年筹到10亿英镑，主要筹款对象是剑桥校友。这本

来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任务。剑桥的31个学院都是私人产业，各自为政，校友捐赠是主要收入来源，因此每个学院都死死护着自己的校友资源。但艾莉森教授成功说服了31个学院资源共享，共同合作，短短5年内就筹集了8亿英镑。她曾说过："对我来说，剑桥大学不是管理的问题，而是找到有效协作的方式。"有人说她是天生的外交家。

40年前作为学生，40年后作为校长，艾莉森教授的一生与剑桥渊源深厚。2003年10月，在她的就职演讲中，她曾经说："作为副校长，我的首要任务，是剑桥大学价值的守护者。剑桥大学代表了什么？什么是应该被珍惜的？"

对她来说，这恐怕是一个贯穿一生的问题。就像她自己所说："真正理解任何一种现象都是很难的。"

真正理解剑桥也是困难的。

三联生活周刊：耶鲁法学院的教授安东尼·克龙曼写过一本书叫《教育的终结》，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放弃了最重要的一门课程——人生的意义。在中国，这种缺失也非常明显。剑桥大学的情况呢？我读《凯恩斯传》，那时候的剑桥学生谈论的核心问题是何为人性的善、生活的目的与手段，今天的剑桥还有这样的气氛吗？

艾莉森：剑桥的学生必须为自己的学习承担责任，我们从不给他们灌输什么。他们要自己思考，而且要思考得很深，这样才能不断接近学习的本质。

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东西。但我想，凯恩斯探讨问题的方式，正是剑桥式深度思考的体验。理解是困难的，真正理解任何一种现象都是很难的，所以他们必须挖得很深很深。在剑桥，学习不仅在于获取已知的知识，更在于理解，培

养批判性、分析性、刨根究底的思维方式。与凯恩斯的时代一样，今天我们仍然鼓励学生理解意义的复杂性。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年在剑桥读书的时候，最关心什么？

艾莉森：我是学人类学的，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复杂的社会系统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进化的？为什么过社会化的生活？为什么不独自生活？你知道，很多动物是不以社群方式生活的。这是思考人生意义吗？我不知道。但我的理解是，往深处思考，打破常规，超越知识的边界，这是剑桥最为鼓励的一种思考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剑桥毕业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艾莉森：首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剑桥毕业生应该是懂得如何自己思考，独立的、严谨的、深入的，而不是别人告诉他怎么思考。

其次，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剑桥毕业生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不过，一个事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界，太多的冗余或错误信息，无论网络、报纸、电视还是书本，因此，他要学会如何迅速筛选，训练强大的分析能力，能敏锐地捕捉各方观点，直达问题的核心。

再次，他应该交游广泛，拥有灵活的、跨学科的视角。剑桥是一个学院制的大学，同一学院的学生读的是完全不同的学科，这种跨学科的交往与气氛，会激发他们身上最好的东西。我和很多本科生聊天，发现他们最为看重的事情之一，就是与一个完全不同专业的同学坐下来，互相学习和探讨，以突破传统的学科限制。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剑桥如此重视学生的社交生活？

艾莉森：因为社交带来友谊。学院制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体验，学院给他们足够的个人关注度，又不乏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学生们以一种有趣而严肃的方式互相交往。对他们来说，这

是特别有张力的一段人生，他们一起工作，一起思考，一起吃饭，一起玩乐，智力生活与社交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你可以花半个夜晚在酒吧里喝酒玩飞镖，另外半个夜晚与朋友严肃地交流学术问题。在剑桥这种环境里，友谊会发展出不同的面向。我一直好奇，这些年轻人到底哪来的时间睡觉？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学院制之外，剑桥的本科教育还有什么独到之处？

艾莉森：第一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式，第二是学院制，这些我们刚才都谈到了。第三是教学与研究的结合。在剑桥，即使诺贝尔奖的得主，也要给本科生上课。我们的学生是在向学术前沿的一流学者学习，他们不仅传递给学生对一门学科的兴趣和热情，而且因为他们本人就是这个领域最好的学者，他们能真正带领学生超越知识的边界。第四，剑桥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学校之一，无论做学生，还是校长，我都有这种感觉，这里的美会渗透到你的灵魂里，变成你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是的，这里太美了，与外面的世界很不一样，感觉有点不真实。

艾莉森：但是，剑桥的另外一面，我同样非常喜欢的一面是，这不是一个有围墙的大学，它是内嵌在整个城市里的。当我离开办公室时，我不是走过某条校园小径，而是走在公路上，有商店，有公园，有咖啡馆，有百货公司，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剑桥现象”（集聚在剑桥大学和剑桥市镇内外众多的高技术公司，号称“欧洲硅谷”）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吸引整个欧洲8%的风险投资，而且继续成长。学校的师生有很多机会参与到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也有机会进入到校园的环境。这些都让剑桥更加有趣和激动人心。但是，我们不会把自己当成产业界，产业界和大公司是他们自己，剑桥是一所大学，我们有自己的位置，珍视自己的智力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对剑桥大学抱着一种罗曼蒂克的印象，这是一个象牙塔，一个读书和学习的好地方，它有自己的节奏和逻辑，与外面的世界保持距离。与美国的大学相比，剑桥与外面世界的距离是否更远？你认为大学应该与外面的世界保持一种什么样的距离？

艾莉森：我从来没兴趣在一个象牙塔里生活，剑桥大学的使命一直是，通过世界一流的教育和研究，为社会做出贡献。

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而动荡的世界里。人口持续增长，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不断消耗，人类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这些全球性的、社会性的变革，不仅威胁着整个星球的健康，毫无疑问也会影响剑桥大学，驱动它在教学、研究上的变革，改变学生与教师的群体构成。

对一所大学来说，在象牙塔与社会参与的角色之间，原则上可以是一个问题，实践中也确实有一种张力。但我有信心，只要大学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目的，并且愿意制定政策来保护这种核心价值，我并不担心它与外面世界的距离如何。

一所大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它是教育者，是研究者，它通过教育和研究，改变世界思考的方式，改变世界运行的方式。

其余的，都是具体操作问题。比如，你要求你的教授必须教书，还是只做研究就行了？如果你的教授要去创业，他可不可以不做研究？剑桥会说，如果你想创业，请申请休假一段时间，离开学校，专心开你的公司，然后决定你到底想做一个学者，还是一个企业家。

剑桥的很多教授出去创业，创业初期固然很兴奋、很有趣，但绝大部分人在创业之后往往将公司交给别人来运营，自己仍然回到学校。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最爱的仍然是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100年前，剑桥和牛津是中国人所知道的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中国诗人徐志摩放弃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甘愿在这里做一个访问学生。但是今天，美国的大学，哈佛、耶

鲁、斯坦福是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时的第一选择，我想这与英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影响力的削弱有关。你对此感到遗憾吗？

艾莉森：就吸引国际学生而言，英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国家，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英国很小，而美国很大。我在中国的时候，每个人都听说过剑桥，每个人都崇拜剑桥，但很显然，你们对剑桥的今天所知不多。我们希望吸引全世界最有才华的学生来剑桥读书，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更加积极地向中国的学生解释和强调：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的国家，但中国活在现在，眼光放在未来。剑桥也一样。剑桥有800年的历史，我们对此非常骄傲，但是剑桥同样是年轻的，它活在当下，当下的剑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

但是，你必须了解，英国人的处事风格一向低调。我在美国生活了30年，我很了解美国人。我无法想象剑桥会像美国的大学那样振臂高呼，说我们是最好的，你们必须来这里！不，我们不会这么做。

另外，我想应该纠正你的印象：剑桥有非常了不起的中国学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最好的学生，当他思考未来留学的去向时，会非常严肃地把剑桥与哈佛、斯坦福排在一起。

三联生活周刊：我想请你谈一谈一所大学与国家的关系。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直接造就了美国的繁荣和强大。剑桥与英国的关系是怎样的？中国是一个正在急剧变革的社会，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我们急需来自大学的智力支持，但同时又困惑于大学的定位和目的。你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学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

艾莉森：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我能回答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作为剑桥的校长，在这6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观察彼岸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巨大演变，我想中国教育的领导者还是很有远见的。你们的第一个努力势必是扩张。

其实，英国也在试图扩展它的高等教育系统。就高等教育而言，每个社会都需要更多的机会。对中国来说，这个挑战更加严峻，因为中国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

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扩张之后，下一步必然是对质量的追求。这是你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不仅是提高教育的质量，还有如何发展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的问题。

不过，中国的问题在于，你打算在多大程度上让你的大学服务于短期的经济利益。在美国和英国，这个问题同样存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就来自于日益增长的对大学实际效益的需求，但实际效益的概念往往是狭隘的。

如果大学的目的是帮助一个国家走出经济衰退，或者在未来几年创造经济财富，这是一回事，但这并不是大学的目的。大学的目的是，教育公民，培养社会的领导者，在创造经济财富的同时，也创造文化财富，提升人们的精神。为了这些目的，你不仅需要科学和技术，也需要艺术和人文，因为这样才能为社会创造长期的价值。

在剑桥，我们有艺术与人文学院，有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生物科学、物理、医学……一所伟大的大学，就在于它的广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互。

当然，当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有着当下巨大的经济需求和野心时，讨论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

剑桥的女孩、女士、女教授

玛丽·比尔德，生于1955年。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教拉丁文与希腊文，研究古罗马文化与艺术，她被称为英国当代最著名

的古典学者。著有《从希腊到罗马的艺术》《罗马的胜利》《庞贝：罗马小镇的生活》《简·哈里森的发明》等。

——玛丽·比尔德



玛丽·比尔德

玛丽·比尔德教授在《泰晤士报》的网络版上写博客，名字就叫《一个教授的生活》，从剑桥的生活写到贝克汉姆的文身，从恺撒的性事写到美国政治，嬉笑怒骂，妙趣横生。我喜欢她的文字风格：聪明、活泼，想到什么说什么，思维跳跃很快，毫不相干的东西，能给她串出特别好玩的逻辑，用她自己的评语是“邪恶的颠覆”。

周一的午后，她穿过纽罕学院鲜绿的草地迎接我们，身材高大，披一件红色的棉外套，灰白的长发披散，简直像一个刚从床上爬起来的女巨人。她边走边说，自己刚从伯克利讲学回来，“那个地方太可爱了，很像剑桥”。

是的，她的剑桥也很可爱。她的办公室简直是一个学者的梦想——书架塞得满满的，一点多余的空隙都没有；波斯地毯、圆木小书桌，泛黄的古董钟，茶几上摆着咖啡机、杯子，壁炉大概许久不用了，胡乱搁着几个空酒瓶子，陶瓷大碗里放着一串貌似古老的钥匙……我暗想，这个房间如果有性格，与它的主人简直一模一样。

这时，她已经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茶，自己则捧了一杯热咖啡，随意往长沙发上一躺，笑着问：“好吧，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她说自己是在一个很自由的家庭里长大的：父亲是建筑师，聪明、快活，爱喝酒，一个“充满魅力的废物”；母亲是小学校长，周日下午她会躺在床上，上面铺满了报纸的评论版和一堆图书馆的借书卡。

“我一直觉得我母亲很怪，但到了这里，才发现有很多像我母亲一样的女人。她们告诉我，如果你聪明，一定要善用你的聪明，这既是特权，也是责任。你必须记住，为了你今天能在这里受高等教育，有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35年前，玛丽·比尔德在纽罕学院读本科，学的是拉丁文和希腊文。按她的说法，那时的古典学是一门纯男性的学科，精英主义，被一群乖戾小气的老头子把控着。即便如此，这里仍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

“作为一名女性，你会有一种先驱的感觉。”她说，“我的老师们大都是女性，她们非常急切地希望你做好，做好不仅意味着考试考得好，还意味着旅行、电影、话剧……她们不断告诉你，你能做研究，你能读博士，还有，你一定要去投票。我母亲也是这样对我说的，作为一个女人，你一定要投票，因为100多年前，有人为了你今天的权利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你必须去。”

“在你18岁的时候，这些经验对你是有震撼力的。”她呷了一口咖啡，“所以，当我回来这里任教时，我为自己的房间选了一幅特别的肖像，简·哈里森的肖像。她是纽罕学院历史上最具魅力的学生和学者，一个奇女子，很聪明，很善于激怒别人，但她认定，女性可以在大学中扮演专业的角色，无论教学，还是研究。从这个角度，她是所有女学者的精神榜样。”

“你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在剑桥这样一个英国学院，它可以碾碎你，也可能给你不一样的机会。一个聪明、有野心的女人可以充

分利用它。至少，女人的身份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帮助了我的事业，让我更加引人注目，人们更愿意听我说话，就像简·哈里森一样。”

纽罕学院有许多了不起的女学者。当年她的老师帕特·伊斯特玲是剑桥第一位希腊文女教授，她教给她怎么跟这里的男人打交道；凯斯·霍普金斯则让她知道，古罗马是一个多么有趣的时代；乔伊斯·雷纳德兹，她今年91岁了还在利比亚做考古挖掘。

今天，剑桥是一个公平的地方。学校里有一半的学生是女孩子，再也看不到针对女性的歧视。但是，一个女孩子来到剑桥，仍然容易产生一种类似强迫症的倾向——“她们勤奋、顺从，急切地要把事情做好，忍不住想取悦老师。”

“所以，我总想把她们教得淘气一点，不顺从、强硬、别扭、好辩……”她说，“总之，我喜欢坏女孩。好女孩不合我的口味。”

“现在，英国的高中教育越来越倾向于顺从式的教学，读标准的书，答标准答案，拿标准学分。既然到了剑桥，我必须不断刺激她们，挑战她们，把她们从原来的思维状态中释放出来。这必然会让她们难受，毕竟改变的是思维习惯。每隔两三个星期，我会让她们到我家里来，通常是星期天，下午六七点钟，我给她们准备了酒、咖啡、甜品，我们无所不谈，我要让她们意识到，必须辩论，大胆地辩论，不要害怕冒犯别人。人的智力生活的关键就在于辩论。你必须投身其中，变得有趣，变得充满想象力，绝不轻易放弃。”

从19世纪开始，古典学就是一种划分社会、政治、智力精英的手段。穷人的孩子从来不学拉丁文，不是他们不肯学，而是学校根本不教，只有私立学校才教。直到现在，英国的公立学校也极少教拉丁文。从某种角度来说，拉丁文和希腊文就是‘无用的知识’，但如果人们不再学习拉丁文、希腊文，不再学习希腊文化、罗马文化，西方文化会失去理解自身的一种关键途径。

“你只要在剑桥绕一圈，就能看到古罗马的遗迹。为什么？因为2000多年前，罗马征服过这里。我们的历史、文学、建筑、音乐、绘画，都与古代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不理解英国与古希腊、古罗马之间的联系，你如何理解英国文化？如何理解18世纪的英国诗歌？要知道，18世纪的英国诗人都在阅读维吉尔。你去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比如意大利，你需要理解什么才能理解意大利文化。也许你会说，读但丁吧。是啊，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但是，但丁跟谁说话呢？但丁也在与维吉尔对话。从某种程度而言，西方文化总是在与古希腊和古罗马对话。”

“其实，今天在剑桥学习古典学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多。为什么？因为它迷人啊，还有什么比阅读维吉尔、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更让人愉快的呢？如果你没学过，你无法理解，语言为你打开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学拉丁文和希腊文，那太疯狂了。但我们应该做的是，确保来读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不只是富人的孩子。我们改变了剑桥的课程设置，这样，高中没有学过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还有机会在大学里从头学起。”

最后，我们谈到剑桥。我问她，剑桥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这里是我的家。我在这里读了6年书，又教了25年的书，大半生是在这里度过，我无法想象还能对别的任何地方产生这样的感情。它很漂亮，智力上非常有趣，还有一个这么好的图书馆。我也可以去牛津，图书馆一样好，但这个世界上，我绝对找不到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只要骑上3分钟自行车，就能到达一个图书馆，可以看到全世界任何一本我想看的书。”



国王大街，剑桥大学最繁华的一段街道，街上有许多书店、文具店，还有专为学生做传统学袍的服装店

这时，古董钟清脆地敲了几下，比尔德教授好像从钟声中得到启发，“你知道，剑桥是一所24小时的大学。它不像有些朝九晚五的大学，到了下午5点，灯灭了，人散了，所有人都回家了。剑桥不是这样。晚上10点，你可能还在某个研讨会上。半夜了只要你的房间灯还亮着，就会有学生来拜访你。或者你约了同事在酒吧喝酒聊天”。

“不过，剑桥最可爱的是人。我走在国王大街上，就会遇到许多相识的人，我们会互相打招呼。他们是可以跟我在智力上交往的人，他们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我正在做一个关于19世纪历史的学术项目，我可以遇到研究达尔文、研究19世纪科学史的人，或者研究19世纪英国人民族身份的人，我可以跟他们在咖啡馆里坐坐，很舒适地喝杯咖啡，聊一聊。你不用预约，你在街上就可以遇到他们，这很

可爱。我不觉得这是智力优越感，这是幸运。我很幸运，剑桥很幸运。这听起来可能太煽情，但生活在这里，的确是一种特权。”

第七章
海德堡大学：一个思辨之地

寻找马克斯·韦伯

各种不同的教科书上为这个生于1864年的德国学者赋予众多头衔——“现代社会学奠基人”“德国经济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组织管理理论之父”……然而，于我而言，这些林林总总的头衔毫无意义。马克斯·韦伯之于我，是在成长的迷惘痛苦中，生活日积月累的压力下，一个个精疲力竭却辗转难眠的夜里，读到的那些令人恍然有所感悟，让你的心境因为感受到共鸣而得以平静的文字。

挑战任何一种预设判断之路

火车在德国西南部丰饶秀美的平原上快速行进，一片片规整平齐犹如尺子量过的农田从车窗外掠过，渐渐地，视野中开始有了汹涌起

伏的苍翠群山。站起身向外看，铁轨在前方融入一条狭窄山谷的入口处，于是，我知道，海德堡到了。

海德堡，旅游手册里德国最具诗意的城市，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一个让人把心遗忘于斯的美好所在。她拥有欧洲最雄伟的中世纪古堡废墟，也拥有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更重要的是，她还是德国唯一一个经历“二战”依然“完整”的城市。在她的老街上，生活依然保持着100年前的样貌和节奏。



海德堡大学

我到海德堡来，最主要的目的，要寻找一个10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

他的名字，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77年的韦伯（左）1878年的韦伯与弟弟们合影

各种不同的教科书上为这个生于1864年的德国学者赋予众多头衔——“现代社会学奠基人”“德国经济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组织管理理论之父”……然而，于我而言，这些林林总总的头衔毫无意义。马克斯·韦伯之于我，是在成长的迷惘痛苦中，生活日积月累的压力下，一个个精疲力竭却辗转难眠的夜里，读到的那些令人恍然有所感悟，让你的心境因为感受到共鸣而得以平静的文字。

他说，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

他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尤其是将巫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社会生活中隐没。



马克斯·韦伯

他说，在这个祛魅的时代里，鼓荡心灵的诗和宗教化为虚空，但科学又不足以解决生命的根本问题，许多人在无法调试精神以应对现代世界的变迁之余，变得毫无生气而对生命无所担当。

他说，我们处在众多不同的生命秩序之中，这些秩序各自遵循独特的规则，面对不同价值之间业已存在的冲突，人们应当考虑如何在对所有人造成最小的外在内在伤害的情况下，在理解和中立的基础上解决冲突。

他还说，那些深信自己已经获知真理、强迫他们其实在心底深处鄙视的人也接受这“真理”的“信仰的斗士”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他们缺乏反省的能力，经验和理解对他们已经不再有影响。

……

1930年，韦伯去世10年后，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被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译成英文，在那之后，他的影响力开始超出德国的疆界，在英语世界中不断扩大。20世纪60年代后，对韦伯著作及其思想的兴趣从美国又传回德国及欧洲大陆，并在亚洲各国蔓延开来，成为社会学和人文学科最大的热点之一。学术界里，专门有一个名词形容这一现象——“韦伯复兴”。学者的影响力通常在身后呈削减之势，但这一规律却并不适用于韦伯。随着现代性的矛盾逐渐清晰地展现开来，人们惊讶地发现，早在一个世纪之前，现代化、理性化和效率化依然被玫瑰色的理想主义的迷雾所笼罩

之时，韦伯就已经清醒意识到了朝着这一方向的单向度运动对人类社会丰富多样、参差包容的侵蚀和损害。

这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生活在怎样的一个时代？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

当我试图追寻这位哲人的生命轨迹时，很快发现，这是一条交错往复，朝向多种可能，挑战任何一种预设判断的路。

韦伯生命中至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1897年。这年夏天，他站在母亲的立场上与父亲发生了一次激烈冲突，一个月后，父亲便在旅行中猝然离世。这一事件触发了家族遗传性的精神疾病。在那之前一年，马克斯·韦伯刚刚以32岁之盛年成为海德堡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前途光明似锦。但在随后的6年半中，他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崩溃，无法应付教学，无法阅读、写作甚至与人正常交谈。他在树林中散步时也会失去控制放声大哭。狂躁发作时，连家里小猫基蒂的喵喵叫声都能让他神志错乱，而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这个曾经对妻子宣称“一个晚上1点钟之前上床睡觉的教授不配被称为学者”的工作狂，只能整日茫茫然地坐在窗前，摆弄自己的指甲，眺望外面的树梢。

这样的情形似曾相识，让人想起克莱斯特、舒曼、荷尔德林、尼采……但是，与那些同样与大脑中的魔鬼做斗争但最终败下阵来，或自戕或终老于疯人院中的德国天才们不同，经历了长达7年的自我放逐后，马克斯·韦伯又恢复了他的创造力。尽管终身仍受精神疾病的困扰，但韦伯如今流传于世的最著名的作品，几乎全部完成于他自精神崩溃中恢复过来后的那16年。事实上，如果他在精神崩溃的7年里的任何一天，选择像与他几乎同时发病并曾与韦伯夫妇结伴旅游休养的表弟奥托那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不过是海德堡大学625年历史中一个昙花一现的普通大学教授而已。身后之名或许充满各种偶然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当1920年6月14日，马克斯·韦伯因肺炎在慕尼黑溘然而

逝时，他是一个清醒、自主、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都有所担当、实现了自己所珍视的价值的人。

他是如何克服那些不分昼夜撕扯啮噬心灵的痛苦，最后走上一条通往清明朗润的道路的？我想知道更多。

约阿西姆·拉德考（Joachim Radkau）在他撰写的《韦伯传》中讲述了一个源自《伊索寓言》的故事：狮子生病了，一只狐狸前去探望。狮子在山洞里问："你为什么不进来呢？"机智的狐狸回答说："如果不是发现有很多进洞的足迹但却没有一个出来的脚印的话，我或许真的会进去的。"

病狮的这个形象，对于成年后一直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身材魁梧而又满腮凌乱胡须的韦伯来说，真是再贴切不过的比喻了。而对于试图了解试图接近他的人来说，韦伯也和狮子一样，充满危险——一种如黝黑洞穴般深不可知的危险。

我只能通过他的文章、信件、传记和别人的评述来认识他。对于这样一个著述极丰的学者而言，这意味着庞大的阅读量。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沃尔夫冈·施吕特（Wolfgang Schluchter）后来告诉我，由他担任主编的《韦伯大全集》的出版整理工作，如今已经进行到了第43卷，仍未完成。光是韦伯和别人的书信往来，就有10卷之多——每本都至少有一寸多厚。关于韦伯的传记堆起来一人多高，单就其中最经典的几本——韦伯遗孀玛丽安妮的《马克斯·韦伯传》，雅斯贝尔斯、拉德考、本迪克斯、密茨曼等人撰写的回忆和传记——就已经有三四千页，更不用说成千上万篇的相关论文。那些交错的日期、地点、人物、数字、事件和观点，犹如蛛网迷宫，穷尽了许多学识远比我渊博、时间远比我充裕的学者毕生的精力——如果我一开始便知道是这样一条艰难崎岖的道路，是否还会兴高采烈地迈出那第一步？

但我不愿也不能回头。荷尔德林说："某一种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样也对我们内心的幸福感产生强大的影响。"尽管韦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业已祛魅的世界，但他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在我眼中，依然如舞台上被高光照亮的场景，带有某种古典仪式的庄严的美感。我想让自己走进这种生活，用我的脚步将所有那些被时间风干的单调事实连缀起来，让我自己的回忆与那些流传下来的别人的回忆相结合。

于是，我来到这个他曾经生活过的、未曾被战火摧毁、据说一切还保留着100年前样貌的优雅浪漫的大学城。我要，我也只能，在我的讲述中一点一滴地完成对他的理解。

山顶墓地：海德堡的传奇

山林间寂静似太古，明媚的阳光披洒下来，一座座历经岁月侵蚀但却洁净得不沾半点尘埃的墓碑上摇动着柔美婆娑的树影。这里是海德堡城南郊的山顶墓地（Bergfriedhof），市区交通图最下方小到几乎看不清的一个小灰点。即使是一些已经在海德堡住了几十年的人，也从未来过这里。马克斯·韦伯和他的妻子玛丽安妮·韦伯（Marianne Weber）就长眠于此。



海德堡山顶墓园中的马克斯·韦伯夫妇墓

海德堡全城一共有17处墓地，建成于1844年9月18日的山顶墓地是最大的一处，也是第一个由海德堡市政当局出面管理的公墓。“如果你想要了解海德堡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文化、政治、经济背景，山顶墓地是一个极好的出发点。”施鲁赫特教授后来对我说，“这里埋葬着那个时代海德堡最有名望的一群人，实业家、政治家、艺术家，但绝大多数，还是与海德堡大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学者。”

墓地的管理者十分细心，在入口处提供了地图，上面列有安息在这里的历史名人的墓址所在，以及4条推荐的寻访路线。每个人的名字后面有简短的身份介绍，诸如“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德国总统”“罗伯特·威廉·本森，化学家，海德堡荣誉公民”“卡尔·博世，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唯独到韦伯这里，介绍变为“马克斯·韦伯，国民经济学家，无所不知的通才（Universalgelehrter）、海德堡精神的象征”（Heidelberger Geist），简直仿佛出自一位崇拜者之手。

韦伯的墓地在半山腰，道路曲折盘桓，走起来颇有吃力之感。不过，一想到他走到这里，远远花了比我更大的力气，随即释然。

将马克斯·韦伯称为“海德堡传奇”（Legend of Heidelberg）的说法，最早见于保罗·霍尼希施海姆（Paul Honigsheim）的《论韦伯》（ *On Max Weber*）。这位1938年逃离纳粹德国、远赴重洋前往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书的德国学者，在临终前一年几乎是以一种与死神赛跑的架势，写下了他1910年前后在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与韦伯的密切交往和他对韦伯学术思想的理解。回忆录在霍尼希施海姆去世后才得以正式出版，只有150多页，篇幅上完全无法同其他几本大部头的韦伯传记相提并论。但他作为治学极其严谨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身份，加之作为后学者在“韦伯圈”（Weber’s circle）中与韦伯既亲近又保持一定中立观察距离的角度，使得这本书在帮助理解韦伯为人治学的风范上有着极其重要、不可取替的价值。

便是在这本书的起首，霍尼希施海姆写道：“任何一个人想要绘制一幅马克斯·韦伯的画像，无论像中人是作为学者的韦伯，还是作为一个人的韦伯，都必须以他那个时代的海德堡为背景。”

的确，那是德意志帝国最意气风发的时代。19世纪后叶，统一后的德国经济、科技、文化空前迅速地发展扩张，有一种瓦格纳歌剧般的辉煌明亮的金属质感。那个时代的海德堡大学，自然科学和医学领

域风云际会，一时间大师无数，使得这个小城俨然有欧洲科学中心的气势。依托于大学的科学研究结果，一批后来对德国工商业格局影响巨大的企业纷纷在海德堡周边建立，令城市笼罩在富庶充裕的气氛中。与此同时，宽松的政治环境也使这里成为当时德国几乎最自由、最国际化的城市，她不仅是德国本土知识分子向往的学术中心，来自奥地利、匈牙利、俄罗斯以及巴尔干半岛其他国家的文化精英也蜂拥而至。对于当时的海德堡，马克斯·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后来曾有一段精彩贴切的描述："这座小城并无小市民、狭隘或自我满足的气氛，而是彻底吸纳并弥漫着世纪交替后，在德国以一种奇特方式开始发展的新鲜事物。这座城市富有智性，令人振奋，而且彻底开放。"

除此之外，对于韦伯兄弟而言，这个城市还有另外一重更为私密的符号意义。

在以海德堡为吟咏对象的诗歌中，荷尔德林的《海德堡》是最出名的一首。诗里写道：

我爱了你很久，为自己的乐趣

愿称你作母亲，献上朴素的诗

你，祖国的城市中

我所见最美的一个

（选自杨业治译本）



马克斯·韦伯的故居，坐落于内卡河畔。现在这里是海德堡大学为国际学生培训德语的地方

事实上，这的确是马克斯·韦伯不折不扣的“母亲城”。坐落于内卡河边、如今被称为“韦伯屋”的那栋大宅，原本的主人是他的外祖父格奥尔格·法伦斯坦（Georg Fallenstein）。1847年，从柏林搬到海德堡后，法伦斯坦亲自设计建造了这栋带假山、花园和喷泉的大宅。他最小的女儿，生于1844年的海伦妮——马克斯·韦伯的母亲，在这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嫁给老马克斯·韦伯之后，她随丈夫住到了埃尔福特，后来又搬到柏林附近的夏洛滕堡，但仍经常带

着孩子们回海德堡的娘家度假。直到1910年4月，大宅的继承人、海伦妮的姐夫阿道夫·豪斯拉特（Adolf Hausrath）去世后，马克斯·韦伯才和与他同龄的好友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一家共同以租客的身份入住此处。

然而，回望马克斯·韦伯56年的人生，他与海德堡城及海德堡大学的关系，却充斥着一种复杂的、若即若离的张力，远远没有他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那样来得简单。比韦伯小4岁的阿尔弗雷德高中毕业后选择的是柏林大学，之后又在布拉格大学谋得教职。但当1908年他接受了海德堡大学的教席之后，到1958年以90岁高龄去世，阿尔弗雷德一直没有离开海德堡，勤勤恳恳地为海德堡大学服务了半个世纪。今天的海德堡大学经济学研究所，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马克斯·韦伯的情形却截然不同。从1882年作为一名大学新生第一次与海德堡发生密切而长期的联系开始，到1920年在慕尼黑去世，38年中，韦伯与海德堡几经离合。如果按停留的时间计算，他不在海德堡的时间比他在这里的时间长得多。他喜欢柏林作为政治中心舞台的热闹，喜欢罗马温暖明亮的阳光，喜欢瑞士和奥地利湖边的恬静，也喜欢美国新大陆的激情与活力。他一次又一次地离去，不止一次考虑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只有到了1919年9月，马克斯·韦伯去世半年前，在海德堡的老朋友们为他召开的饯行酒会上，一席话方才透露了他内心深处对海德堡的不舍与眷恋。他说，海德堡的温柔与和善在他饱受疾病折磨的时刻帮助他从黑暗中慢慢苏醒，让他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如今，他感觉自己仿佛正在告别家乡，去到陌生的地方，那儿虽然美丽，但却冷若冰霜。

这令人联想起韦伯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1910年，韦伯夫妇搬进韦伯屋后不久，海伦妮惊讶地发现，作为新房客的韦伯居然表现得比自己更加依恋这栋充满她的童年回忆的房子。韦伯回答说：“对我而言，更多的不是忠诚，而是被那种生动的美所强烈感染，我把这种美

赋予了生命，它则将它的甜蜜浸透了我的血脉。与您比起来，我在更大程度上只是被尘世攫住了。您对所有现象都比较一视同仁，我却爱它们，需要它们，而您却能免于它们的诱惑。”



一个在历史中不断被诗化和浪漫化的城市——海德堡古城全景

马克斯·韦伯是少有的几个愿意坦承自己容易被尘世诱惑的哲人。这让他拥有一种活生生的肉体的温度。尽管出于不同目的，在他身故后，他的遗孀玛丽安妮和追随者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试图将他神化为一个圣徒式的天才，出自他笔下的书信和同代人的叙述却还原了那个有着人的欲望和喜好，并将其作为人生旅程理所应当的一部分承担下来的复杂而丰满的韦伯。也正因如此，这个生活在一个世纪前的人才会与今天的我们产生某种联系。当他诉说痛苦时，那是一个人的痛苦，当他在不同的选择之间挣扎时，那是一个人的迷惑。宝相庄严的神祇无法帮助我们，软弱自有软弱的力量。



著名哲学家、精神病学家雅斯贝尔斯

在施鲁赫特看来，韦伯对海德堡的每一次告别，都有复杂的原因。譬如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慕尼黑之旅，客观背景是“一战”后期，德国马克大幅度贬值，之前十几年靠着继承的遗产过着充裕生活的韦伯夫妇现在需要新的收入来源，而慕尼黑大学正好提供了韦伯感兴趣的教授职位。而主观上，也有当时住在慕尼黑城外的韦伯后半生中的红颜知己埃尔泽·贾菲（Else Jaffe）的因素——“这个奇妙而熟悉的城市和住在附近的朋友发出了召唤。”事实上，韦伯去世时，守在身边的除了妻子玛丽安妮，另外一个人便是埃尔泽。

如果韦伯知道，这将是他与海德堡的最后一面，他还会走得那么决然吗？没有人能够给出解答。正如他所说的，所谓历史，本就是人们创造自己所不知道的一段历史的过程。人们根据后来的发展推导此前事件的种种因果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充满主观的阐释。如果换一个角度，一次次离开后的归来，会不会，反而也印证了无法割断的因缘？

长途跋涉，我终于站在韦伯的墓前。1921年，韦伯在海德堡的老朋友、哲学家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儿子阿诺德·李凯尔特应玛丽安妮的请求，设计了面前这座希腊柱式墓碑。墓地里埋葬的是韦伯的骨灰。1920年的时候，火葬在德国还是十分罕见的事，只有不足1%的人选择这种方式——但这是让他回到老海德堡、回到自己所熟悉的朋友圈中最好的方式。他的妻子玛丽安妮在他去世后又在海德

堡生活了34年。她住在内卡河畔的老宅中，将马克斯·韦伯的书桌当成她的祭坛，用余下的时间整理出版韦伯生前的作品，并继续主持原来“韦伯圈”中人的沙龙聚会。1954年，同她的丈夫一样，玛丽安妮在埃尔泽·贾菲的怀中去世，随后与韦伯合葬于此地。

墓碑上，玛丽安妮为韦伯选择的铭文出自歌德的《浮士德》：

> 我们将再也见不到他的同类，
>
> 尘世的一切莫不如此。

第一眼看上去，这更像是对试图讲述韦伯的故事的我的一个警告。我真的有能力叙述这个故事吗？我对他的了解越多，就越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甚至没有听过他的声音，没有见过他笑的样子——而在众人的回忆中，他是那么喜欢开怀大笑的一个人。我需要更多的感觉与触摸——他走过的石头小路，见过的街景，读过的书，住过的房子，吃过的食物……那些答案，或许在山下，或许在海德堡的老城中。但，只是或许。

当我掉头下山，某个转角处，缓缓流过的内卡河和河边那栋粉白色老宅猝不及防地展现于眼前时，我突然释然了。因为我知道，不管怎样，我没有白来。只有在这一刻，在这个角度，站在这里，俯瞰这样的静好美景，才能领悟到玛丽安妮选择这段话作为韦伯的墓志铭所未曾明白道出的另一层含义——而这是从文字和纸张中永远都无法读到的。那是生命走到尽头的浮士德对尘世的最后呼唤——是否，也是马克斯·韦伯和玛丽安妮对海德堡的心声：

逗留一下吧，你是那样美！

抬头望去，一只头戴王冠、高擎宝剑的雄狮仿佛正在仰天愤怒嘶吼，耳边传来的却是轻柔的淙淙水声。这是海德堡老城，大学广场（Universitaets platz）正中著名的狮子泉（Lowen brunnen）。老城的各种游览观光活动多数以此为召集点，但在更久远的时代里，它是海德堡大学学生每日各项活动都会从旁经过的地理中心。

站在狮子泉下，我在读一封1882年韦伯写给家里的信。

> 上午7点的逻辑课迫使我一大早就要起床。每天早晨还要围着击剑厅跑1个小时，然后诚心诚意地一直挨到听完我的课。11点半到隔壁花1马克吃午餐，有时还要喝上四分之一升葡萄酒或啤酒。然后我和奥托、小旅馆老板伊克拉特先生常常一起去滑旱冰，玩到14点，我们就返回各自的住处。我温习听课笔记，读施特劳斯的《旧信仰和新信仰》。下午我们有时去爬爬山。晚上我们又在伊克拉特那里聚会，花上80分尼吃一顿精美的晚餐，接着照旧去读洛策的《人类社会》，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最热烈的争论。

我环首四顾，试图回想130多年前，那个刚刚通过大学入学考试（Abitur），来海德堡修习法律的18岁少年眼中的景物。

我的正前方，是始建于1728年的巴洛克风格的老大学楼，它既是海德堡大学校长的办公地，也是大学博物馆。1886年，海德堡大学500年校庆，楼内的老礼堂被修葺一新，那之后，遇有庆典及重大仪式，照例必在这个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行，不过当时，韦伯已经离开海德堡，转到哥廷根大学继续学业，没能赶上这场盛事。

我的右手边，是1930年美国驻德国大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Jacob Gould Schurman）出面筹资50万美元修建的新大学楼。他比马克斯·韦伯大10岁，先韦伯两年到海德堡大学读书，后来回到美

国，在康奈尔大学当了20多年的校长，其间参照德国大学体制，创造了美国现代州政府资助研究型大学的模式。

老大学楼和新大学楼之间的空地上，1518年4月26日，马丁·路德曾在此发表演说，宣扬他关于正义、原罪、自由意志和信念的看法，德国宗教改革由此愈演愈烈。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多篇文章中讨论的“天职”（beruf）的概念，便肇源于马丁·路德，而马丁·路德的名言也曾被韦伯在文章中反复引用。也是在这里，1933年5月17日，狂热的海德堡大学教授和学生们将成千上万本“非德意志精神”的书籍投入熊熊烈火中，付之一炬，而在背后主导这一遍及德国的焚书事件的，正是毕业于海德堡大学的纳粹宣传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据说，戈培尔是韦伯的崇拜者，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韦伯的著作。



海德堡大学老楼的礼堂，学校举办庆典以及重大仪式的场所

在我身后，是海德堡大学图书馆的方庭。尽管海德堡大学图书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但事实上，直到1873—1902年，卡尔·查格敏斯特（Karl Zangemeister）出任第一位全职馆长，这里才真正变成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藏书迅速增加至40多万本，并进而于1938年以115万本藏书成为全德国馆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亦是在查格敏斯特的主持下，1901年，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建筑师约瑟夫·杜尔姆（Joseph Durm）用与山顶古堡同样材质的红砂岩建造了气势恢宏的文艺复兴风格的新图书馆大楼，并于1905年正式开放。之前采访图书馆执行馆长莱克·鲍茨怀特（Rike Balzuweit）女士时，她对我说，马克斯·韦伯1910年前后曾是这里的常客，不过，他可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模范读者——在许多书的页边行间，都留下了他的评注。

视线最后落到左手边，人流熙熙攘攘的主街。鳞次栉比的小餐厅和咖啡馆门外已经撑出太阳伞，排好桌椅，烤香肠和现磨咖啡的香气远远飘散过来，伴着玻璃酒杯叮咚碰撞和人们欢笑谈论的声音。前一天，海德堡市旅游局的导游已向我介绍过街角那家据说只要往橱窗里面看一眼体重就会增加的甜品店，假若韦伯再世，有过一小时内连吞8块小蛋糕纪录——那可是德国尺寸的“小”蛋糕！好吃的他想必会喜欢上那里。然后，素来不掩饰对杯中之物的贪好的他想来也不会拒绝顺着主街走上一段，到正对着老桥的斯坦街上的费特尔酒坊（Brauhaus Vetter），喝一杯号称是全世界最烈、酒精含量高达33%的啤酒。

……

这样做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与当年韦伯经历的不一样。即便没有外力强加的破坏和毁灭，作为生命体的城市自有其新陈代谢的规律。韦伯站在狮子泉下的时候，天空上不会有飞机掠过的白色尾迹，远处不会传来跑车急速刹车的声响，我眼前绝大多数的建筑都不存在，店铺里没有今天这么明亮，街上的行人

没有这么多，他们穿的衣服虽然质地粗糙但比现在正式庄重，他们关心和谈论的事情，和我在报纸和书本里读到的也许完全不同。

但最大的差异还在于，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在1882年之后的岁月里，等待着少年韦伯的将是些什么，而他却对此一无所知。我试图在这个他生活过多年的城市追寻他的脚步，但大脑奔跑的速度远比双脚快得多，忍不住一直向前穿越。

当一个头顶兄弟会标志性彩色小帽、斜佩绶带的老者与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的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那个到海德堡没多久便兴致勃勃地加入"阿勒曼人"（Alemannia）兄弟会的韦伯的样子。他的头上戴着"阿勒曼人"标志的红色小帽，穿着现在看来隆重得有点夸张的制服。他每周参加两次兄弟会的拼酒大会，一群人比赛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喝下最多的啤酒。他热心于兄弟会之间的决斗，脸上因此留下了一道长长的伤疤。他和朋友们大吃大喝，结果是开支远远超过父亲每月给的津贴，只好到处赊账借钱。

我知道，在海德堡只不过短短1年时间，刚来时那个又高又瘦、"像个候补肺结核病人"似的文弱少年便迅速发胖，变成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并终生保持这一魁伟的体形。我还知道，当他的母亲海伦妮·韦伯第一次见到变化如此巨大的儿子时，吃惊地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但我也知道，36年后，经历了惨痛的"一战"和德国"十一月革命"后，韦伯发表宣言脱离兄弟会，并谴责这种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从而认为自己属于某种特殊团体，崇尚武力和好勇斗狠之风的传统。他宣称，在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中，兄弟会已然过时，必须加以反对和批判。

后来那个哲人和学者的形象为少年韦伯的脸上增加了不属于那个年龄的深思熟虑，并似乎赋予年少轻狂以某种正当性。他那时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我不知道，很可能不是。

文学作品中欧洲古典大学的学生生活总是呈现一幅鸡飞狗跳的荒唐景象。视频网站上可以很容易找到一部以海德堡大学为背景的名为《学生王子》（ *The Student Prince*）的美国电影。光看电影里的描述，你会以为海德堡大学学生的全部生活只是饮酒狂欢、唱歌跳舞、牵猫逗狗、日夜游荡，这群衣着华丽的纨绔子弟把心思都花在和城里的姑娘谈情说爱上，要不然，便是在兄弟会的公共大厅里为一点鸡毛蒜皮的破事挥剑决斗，然后在酒馆里彼此炫耀脸上血淋淋的伤口。

就在老大学楼后面的奥古斯丁巷里，一个小小的入口通向海德堡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学生监狱”（Karzer）。由于历史上欧洲大学拥有治外法权，如果学生触犯了市政管理规定，只能由学校加以惩治。在海德堡，从1712年到1914年，违纪学生会在这里被关上数天到几个星期的禁闭——但他们可以外出上课，外面的朋友也能送饭进来。学生监狱的墙壁上满是各种涂鸦、打油诗和签名，显然，对于关在里面的学生，这种惩罚并无伤荣誉，甚至是可以夸耀的事。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到大学广场上的小书店里花9欧元买一本马克·吐温的《海外浪游记》（ *A Tramp Abroad*），里面有大段关于学监面对违规学生时无可奈何场景的戏谑描写。



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的讨论课。哲学最核心的训练是在这样的讨论课上以文本精读的形式完成

可是，就是这些荒唐游荡的学生，一旦从大学毕业，便好像被施了魔法一般，立即变身为浮士德博士式的勤勉、睿智、严谨的学者。在当时的主流叙述里，教授和学者是一群一生正直尽责，“只会在节假日里才生病，连死都不死在工作日里”的学术圣徒。如此强烈的反差，令人怀疑，两者的不可信程度几乎不分轩轾。

毫无疑问，一所成立于600年前的大学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大学是两回事。1878年，马克·吐温来到海德堡那年，海德堡大学总共只有750名学生，70名教授。时至今日，海德堡大学的学生总数已超3万人，而且以每年3%的速度迅速增长。“事实上，在马克斯·韦伯的那个年代，甚至一直到‘二战’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德国大学所奉行的是精英主义教育传统，适龄人群中只有5.6%的人选择到大学学习，这些人绝非来自劳动阶级。而今天，德国适龄人群中进入大学学习的人超过40%，其他国家的比例可能还要高。大学已经变成大众教育。”

施鲁赫特教授在接受采访时对我说。他特意强调，这种大众和精英的划分并不是以金钱来衡量的，更重要的是家庭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素养。



学生监狱，始建于1712年，1914年关闭。专用于惩治捣蛋学生，如酗酒闹事或无故在巷子里追赶邻家的猪，打碎路灯等行为。被关学生经常聚在牢房里聊天涂鸦，做做小诗，相处得甚好。读书期间没蹲过一次监狱反而是没面子的事情

以韦伯为例，他的父亲，老马克斯·韦伯当时是柏林政治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在他家中举行的日常社交聚会中，汇集着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外交家、建筑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艺术家。他们所谈论的各种话题，对孩子们的启迪作用不亚于学校里的课程——虽然德国9年制中学的严格和全面教育举世闻名。

9岁的时候，马克斯·韦伯就已经可以用拉丁语阅读、写作和会话；中学时他的阅读书目是斯宾诺莎、叔本华和康德；14岁生日还没过，他已经完成了历史论文《与皇帝和教皇的地位特别有关的德国历

史的进程》和《从君士坦丁到民族大迁徙时期的罗马帝国》；进入大学之前，他已熟读荷马、希罗多德、维吉尔、西塞罗、萨卢特斯等经典作家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写就的名著。

施鲁赫特指出，虽然马克斯·韦伯属于少数天才之列，但这种情形在那一代大学学生中却十分普遍。“韦伯大学时代的好友恩斯特·特勒尔奇，当时活跃在海德堡的其他学者如齐美尔和耶里尼克，他们的博学与高产程度都与韦伯不相上下，甚至还要超过韦伯。这是那个时代大学生和学者的一个共同特征。”正如马克·吐温写到的：“（德国）学生预科毕业时不但受到全面的教育，而且学问扎实。这种教育不是似是而非含混朦胧的，它是烙上的，不会掉……外国学生都绕开这种预科，它的规矩太苛酷了。他们上大学是为了在他们整个普通教育上加个尖屋顶。可是德国学生已经有尖屋顶了，所以他们上大学是为了加个某种专业性质的尖塔……大学生活的大量自由正是他们需要、喜爱，并且真正懂得其宝贵价值的东西。”

对于这种精英教育体制下的大学学生，读书学习与斗剑、饮酒和旅游一样，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不是通向某种生活的先决条件。充裕的家庭背景保证他们可以不受时间尺度的限制，随时思考转换自己的方向，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完成毕业论文获得学位，或者，发现自己并不真心喜欢这种学院生涯，转向其他更为实用的职业。在《海德堡岁月》一书中，尼古劳斯·桑巴特（Nicolaus Sombart）曾半开玩笑地开出一张成为知识公民的基本条件列表。

1万本书

3打哲学体系

2000种音乐作品

2万件造型艺术作品

1万条历史数据

5000本传记

20001条自然科学知识

要获取这样的基本知识，大概要花20年的时间，而且不只是记忆技巧的问题，还是如何有效工作的问题。以培养这种以知识公民为宗旨的古典学院，与工业革命后帮助青年人做好职业准备的现代大学，根本是两种不同的事物。

然而，当时代开始加速度前进，根植于缓慢优雅的古老社会的精英式教育越来越受到挑战。当周围的世界都已改变，不变的缺陷变成靶子高悬在半空，显得那么触目突出，让人忘了它原本并不是凭空而来，也曾是大地上鲜艳明丽的一朵花。

1918年底，在《以学术为志业》的著名演讲中，对着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一群面对当时仅现轮廓的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试图寻找未来方向和意义的新一代，马克斯·韦伯冷静地做出这样的陈述：“在本质与外观两方面，旧时大学的构成方式都已成为幻影。”

他是什么时候发现这是个幻影的？这种发现本身，是否就构成了曾经令他痛苦纠结多年的原因的一部分？

韦伯屋：学者的志业

周日下午，齐格豪斯兰德街（Ziegel-hauser Landstrabe）17号，灰色栅栏门向内敞开着，院子里却静寂无人。顺着扶梯登上二楼，赭红色的铁艺雕花大门紧闭，所有的窗户都垂着百叶帘。

站在阳台上，河对岸的古堡在西晒的阳光下呈现一种火焰的赤彤之色，圣灵教堂的钟声适时响起，婉转悠长。花园里暗香浮动，泉水琤琮。这样岁月静好的时刻适合吟哦诗句，比如歌德当年在海德堡写下的这首诗：

只要我们不丧失自我，

什么样的生活都可容忍；

我们尽可以失去一切，

只要我们依旧是我们。

一个世纪前，几乎就是在与我到达这里时同样的季节，马克斯·韦伯夫妇搬进了这栋原本属于他外祖父的地中海风格的大宅。虽然只是租住，他却平生第一次对身外之物产生了深切的依恋之情。在经历了漫长的几乎看不到尽头的病中流放时光后，韦伯撑了下来。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它（疾病）将生命中人性的一面重新展现在我面前……这是我以前从来想象不到的。我可以借用伯克曼的话说：‘一只冰冷的手使我得到解放。’过去数年，我病态的性情表现在我痉挛地抓住学术研究工作，好像这是一道护身符，但是我却不晓得我要用学术工作祛除什么东西。回顾既往，这已十分明白，以后，不管生病或健康，我知道我将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我已经不再有需要去感觉到自己被繁重的工作所压倒。现在，我最大的希望，是过一种充满人性的生活，并且尽我所能使我的宝贝快乐。我不认为这样子一来，我的成就会比从前我心中的机械劳动所生产的少。”

春天到来时，韦伯和玛丽安妮在花园里种下雏菊、丁香、报春花、郁金香、黄杨树和山毛榉，他们一起开辟了一个小菜园，在里面栽上豌豆和蚕豆。韦伯不再那么频繁地外出旅行了，他忙着在花园里侍弄玫瑰，给烟斗藤和枸杞修剪枝蔓，每天都要花上一个多小时的时



海德堡3位重量级科学家：基尔霍夫（左）、罗伯特·本森（中）和亨利·罗斯可爵士

间。一个美好的初夏，他给母亲写信说："在一直多云的天空下我们现在拥有了圆满的灿烂春光；夜莺在树丛中歌唱。晚上我们坐在狮泉旁边，沐浴着月光；喝茶的时候和特勒尔奇夫妇坐在一起的一个朋友边拉小提琴边唱——我们非常快乐。"

他又能够重新阅读和写作了。在学生及好友埃德加·贾菲（Edgar Jaffe）——埃尔泽·贾菲的丈夫——接手重组的《社会学和社会政治学文献》杂志上，韦伯发表了许多长达数万字的文章，话题从俄国革命到罗马帝国的衰亡，从美国的新教伦理到中国的老庄。与此同时，他还为《法兰克福报》等报纸撰写时评和政论。《韦伯大全集》的主编施鲁赫特说，韦伯之所以身故后才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人所认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他生前仅正式出版了一本书，《经济与社会》《中国的宗教》《印度的宗教》 《古犹太教》《支配社会学》等重要著作都是在他去世后由玛丽安妮整理出版的。这些书中的章节系列发表在《社会学和社会政治学文献》杂志上，种种证据显示，韦伯心中早已有了它们被汇编成一本书的布局结构，但他却不愿为自己设定一个必须完成的时间。

"韦伯不是那种一本接一本按流水线计划出书的人，"施鲁赫特说，"他喜欢同时思考几个问题，想清楚之后才写出来。如果想不清楚，他就会在朋友间的聚会中反复与人谈论这一话题，听取各方面的看法。"

从1910年开始，韦伯的家开始变成一个和当年他父亲在柏林的家一样的“开放屋”。“每天都有一个来访者，至少有一个寻寻觅觅的灵魂。但是通常总会有好几个：孤独的女人和姑娘、前程似锦的学者、多年的老朋友纷纷来到这里。”玛丽安妮在1910年12月的一封信中写道。而在韦伯的笔下，在某个宾客如走马灯般纷至沓来的日子，从上午10点半到晚上10点，他和朋友们“讨论了整个世界加上3个村庄”。

这便是如今闻名于世的“韦伯圈”。在近10年的时间里，位于齐格豪斯兰德街17号上的韦伯的家成为海德堡学术界和文化界交流的一个中心。访客名单上的名字如今大部分已不为人所知，但在那个时代，他们是足以撼动德国政治界、思想界和艺术界的精英。这些人中有日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20世纪20年代最著名的诗人，奠定美国妇科癌症研究格局的医生，以及欧洲最有才华的女钢琴家——事实上，她是韦伯在艾尔泽之外的另一个秘密情人。但为数最多的，还是海德堡大学人文学科的教授及学生。通过这个圈子的放大作用，虽然此时的韦伯已经脱离海德堡大学的教学体系，他对这所学校和这个城市所产生的影响，却达到了巅峰。

1903年10月之后，韦伯与海德堡大学的联系，仅剩下一个名义上的荣誉教授的头衔。他不再拥有教师编制，也失去了在系务大会上的投票权。从1898年到1903年，持续的身心疲倦和频频发作的精神崩溃令韦伯无法继续承担教学任务，海德堡大学允许他带薪休假，但这种“领着一份薪水，可是在能够预见的未来却一事无成，同时还感到……只有承担一项天职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状况却让韦伯感到痛苦不堪。他数次提出辞职申请，终获通过。虽然求仁得仁，可是这种与自己职业生涯的割裂仍令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情绪低落。直到1904年美国之行后，韦伯才逐渐恢复过来。

1904年早些时候，韦伯第一次参加了海德堡另外一个著名学术社交圈“伊拉诺斯圈”（Eranos Circle）的活动。事实上，虽然时至今日“韦伯圈”已是20世纪初最著名的德国学术社交圈，但在那个时代，仅在海德堡范围内，便同时存在多个大大小小的学者圈子，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除了“伊拉诺斯圈”和“韦伯圈”，还有围绕在“左翼”青年犹太学者斯蒂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周围的“格奥尔格圈”。

“这种圈子文化是非常有海德堡特色的一种东西。”施鲁赫特说。那个时代几乎每个欧洲的大城市都有各自文人聚会的场所，“在巴黎或维也纳，地点是咖啡馆，但在海德堡，一定是教授的家”。这或许是因为当时海德堡大学的教授通常都来自充裕的家庭背景，本身的薪金也相当高，几乎人人拥有一栋看得见风景的大宅。韦伯虽然在1903年辞职后经历过一段窘迫的时光，但很快，他和玛丽安妮各自继承的遗产便使两人不再需要为了谋生而外出工作。正因如此，当他在美国纽约看到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住在“所有房间都很小，盥洗设备和厕所在同一个房间里，不可能举行超过4个来宾的宴会，进城的车程需时一个小时”的郊区住宅里时，才会发出罕有的感叹。



罗伯特·本森的铜像。立于海德堡大学心理学院弗里德里希楼前。为了留住他在海德堡任教，巴登州政府曾斥巨资为他建造了当时整个欧洲最好的化学实验室

这些圈子各有特色，参加者互有交集，有时也因政见不一相互攻击。“伊拉诺斯圈”的宗教色彩最浓，最为严肃正式，每月一次的聚会事先定好议题，韦伯对宗教学尤其是新教伦理的兴趣便始于参加这个圈子的活动。不过，“伊拉诺斯圈”的过于正襟危坐和学术上的不宽容逐渐令韦伯和他的朋友们所不喜。保罗·霍尼希施海姆在韦伯回忆录中记下了一桩趣事：当时“伊拉诺斯圈”的活动在不同成员的家中轮流进行，有些教授的住处较小，未免显得拥挤。聊起此事的时候，韦伯促狭地笑着说，是呀，光是W教授（当时在海德堡执教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和他的气场，就得占两间屋子。至于“格奥尔格圈”子，虽然韦伯一直与这个圈子中的成员保持着密切的个人关系，但他很少参加圈子中政治色彩浓厚、意见激进的聚会。1910年之后，韦伯夫妇开始在内卡河畔的家中举行周日下午的茶会。这一安排的初衷本来是为了减少韦伯每日频繁接待访客的时间，集中在一天进行，但没

过多久，便演变为周日的定期聚会上，准备与韦伯继续就某一问题深谈的人可以预订好下周到访的时间，两套体系并行。

虽然此刻大门紧闭，但从玛丽安妮·韦伯、雅斯贝尔斯和霍尼希施海姆的叙述中，我却能想象出100年前屋子里的景象。很多的食物，很多的酒，很多的笑声，偶尔有舒缓的钢琴或小提琴作为背景音乐。韦伯坐在大厅里的某个角落，很多时间在专注倾听，但也经常站起来就某个话题一口气发表一个多小时的即席演讲。话题有时极其深奥，有时愉悦轻松，但绝大多数天南海北，远远超出学科的界限：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怎样与德意志的社会状况发生联系，如何从李鸿章日记里窥视中国儒家社会的价值观并由此理解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这里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当有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列席时，韦伯总是尽量避免就政治发表意见。“我没有权利在学生面前谈论我的政治主张，因为这样或许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主见。”他说。

这样深入而广博的讨论和演讲，与大学里的学术研讨活动及授课有何分别？拿这个问题向施鲁赫特请教，他发出意味深长的微笑：“或许韦伯只是不喜欢那种一定要在每周一上午9点到10点必须谈论某个范围内的某个话题的确定性罢了。这违背他的天性，在他看来，也违背学者的天性。”韦伯最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志业》，“志业”一词，对应的是德文的Beruf，虽然它也可以简单翻译成“职业”，但自从马丁·路德在其著作中为其赋予了“奉神所召去从事某事”的特殊意义后，在韦伯用到这个词的时候，其含义远远超出了一项可以带来收入的工作的范围。而当面对理性化、效率化、标准化逐渐主导了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进步方向时，这种价值的激烈冲突，无可避免。韦伯的幸运在于，在那个传统所带来的确定性开始离析崩散的时刻，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他营造了一种游离于职业之外的现世安稳——虽然，不过短短数十年。可是，这种正视生命中的现实，承认我

们其实就是这个愚蠢浅薄的世界的一部分，但努力不让这种愚蠢浅薄左右心灵的努力，不管后果如何，都足以令人感到幸福。

在海德堡停留期间，我去旁听了几节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研究所的课。开设“马克斯·韦伯与尼古拉斯·卢曼研究”这门讨论课的是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尤里希·巴赫曼（Ulrich Bachmann）博士，一个拥有典型雅利安面容的年轻学者。巴赫曼说一口流利的美国东部口音英语——事实上，他的哥哥便在美国执教。这是一个优势：1999年，“博洛尼亚进程”欧洲高等教育改革方案公布后，越来越多的德国大学开始开设英语课程，力求与美国和英国的教育产业实现充分竞争。想到德国读大学的人不再需要痛苦地先学满800学时或1000学时的德语——忘记提起，内卡河畔的韦伯故居，如今的主人是海德堡大学国际学生中心，主要功能是帮助海德堡大学的国际学生强化德语，通过取得毕业文凭所必需的语言考试。或许是看出我对韦伯的兴趣，巴赫曼提出一个听起来相当诱人的方案——来海德堡读个社会学的硕士，在新的德国大学学制下，可能最多不过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呢？然后我就可以宣称自己继承了韦伯的衣钵，获得某种权威的叙述他的资质？

海德堡之行的最后一日，我再次走进齐格豪斯兰德街17号。绕到背靠“哲学家小径”的房屋后进，隔窗可以看见一楼的教室，一位老师正在向一群肤色不一的学生介绍某个德语学习俱乐部。韦伯和玛丽安妮曾经在书信中多次提到屋后的狮泉，据说，每当韦伯的母亲海伦妮离开这里时，总要喝一口狮泉中的水，以确保自己还会回来。这口泉如今已经干涸，两个狮子头的出水口也已残破。但是，即便那泉中依然有水，我真的会俯身啜饮吗？

每个时代的人都希望回到从前的某个古老年代，但每个人终究都会在生命中的某一刻认识到，不管多么努力，我们都回不去的残酷现实。生活如潮，兀自滚滚向前，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没有人能够幸

免。我在海德堡找到的依然是那个我已经在文字中所熟识的韦伯，但寻找和体验本身赋予叙述以意义。我知道我将走上一条与韦伯完全不同的道路，但那也是同一条道路：我们要去做我们的工作，承担应付属于我们的这个时代所提出的要求。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再无旁顾。

（参考书目： *Max Weber: A Biography*, Marianne Weber; *On Max Weber*, Paul Honigsheim; *Max Weber: A Biography*, Joachim Radkau;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Reinhard Bendix; *The Iron Cage: A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Max Weber*, Arthur Mitzman; *The 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Max Weber's Developmental History*, Wolfgang Schluchter、G Roth; 《韦伯作品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马克斯·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法律出版社；《欧洲大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 *Mark Twain's Guide to Heidelberg*, Werner Pieper。感谢歌德学院冯硕女士、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金郁夫先生、海德堡大学图书馆执行馆长莱克·鲍茨怀特女士、海德堡大学档案馆、关山先生在采访过程中的大力协助。）

海德堡：哲学家路过之地？

以一种宁静而有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并对所看到的世界感到满足，对于求知事物的渴望，以及对各种限度的疑问——所有这些都是哲学。

哲学家小路

哲学家小路是一条很美的山间小路，正对着海德堡的老城区，中间隔着一条内卡河——德国的诗人之河。



哲学家小路，位于内卡河北岸山丘之上，被称为“欧洲最美丽的散步之所”

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安德里亚·凯莫林（Andrea Kemmerling）说，他年少无知时，被一些愚蠢的问题迷惑，开始亲近哲学，幸而得以通往真正的问题。“这是一个心灵治愈的过程。在阅读的过程中，思维越来越清晰，忘记愚蠢的问题，面对真正有趣的问题。”



哲学家花园，旁边立着的是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艾兴多夫的纪念碑

我问，愚蠢的问题是指哪些？教授笑而不答。

在哲学家小路上散步的时候，我不禁想到那些曾经迷惑我的问题，比如爱情、死亡、宇宙的奥秘、人生的意义等等。有人警告过我，向一位职业哲学家追问人生的意义，会招人笑话，这是一个太大而无当的问题了。另外，非得跑到哲学家小路上思考哲学吗？如凯莫林教授所言，小路是用来散步的，不是用来思考的。真正的哲学思考需要纯净而强大的专注力，需要桌子、纸和笔。

凯莫林教授是个有趣的老头。刚到海德堡那天晚上，我们被邀请参加哲学系教授的一次聚餐。一大桌子哲学教授高谈阔论，一顿饭吃了3个多小时。凯莫林教授风趣幽默，烟酒不忌，雷司令喝了一杯又一杯，一双锐利的蓝眼睛时时闪烁着恶作剧似的嘲讽之色。我们谈论啤酒、德里达、艾未未、海德堡一家餐厅的美味牛肚。几天后，面对面

采访，他却换了一副庄严的教授风范，说出来的话都是一丝不苟、逻辑严密的长句，透着德国人特有的学究气。他是分析哲学的大行家，也研究哲学史，但他拒绝与我谈论他的研究。因为他认为，无论分析哲学，还是笛卡儿，都不是三言两语能向一个门外汉解释清楚的，任何简单的解释都只能是虚伪的陈词滥调。

哲学家小路是一条很美的山间小路，正对着海德堡的老城区，中间隔着一条内卡河——德国的诗人之河，如银色曲线一样缓缓折向远方。一座古朴的老桥跨河而过，歌德曾赞："从此地远眺的景色远非世上任何一座桥所能企及。"

当然，此桥已非彼桥。"二战"快结束时，盟军没舍得轰炸海德堡，但德国人自己炸毁了包括这座古桥在内的几座桥梁，大约是为了阻止盟军的进攻。战后，海德堡市民发起重建，新石桥于1947年6月建成。

"海德堡就是这样，很多东西看似很老，其实没那么老。"海德堡大学的地理学教授兼校史专家彼得·默斯伯格（Peter Meusburger）教授告诉我："这个城市一次次到达顶峰，又一次次被摧毁，旧人散去，新人又来重建。"



内卡河畔，绵延数百米的大草坪，是学生们派对、休闲的场所

夏日清晨的空气清澈明净，极目远眺，老桥、古堡、尖塔、河流，华严世界，尽收眼底。再往前走，渐渐进入森林，气象逐渐开阔。森林里光线瞬息多变，随便挑一张山间长凳上长坐，闲看青山白云，倾听对岸教堂的钟声，突然想起在哪本书里读到的卡尔·雅斯贝尔斯（Carl Jaspers）的一句话："以一种宁静而有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并对所看到的世界感到满足，对于求知事物的渴望，以及对各种限度的疑问——所有这些都是哲学。"

雅斯贝尔斯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他从小多病，身体孱弱，与他人之间难以逾越的距离感，以及面对世界的恐惧感，是贯穿他一生的基调。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哲学的任务不是去说明客观世界的意义，而是对人的探究，引导人们了解自身生存的本质与真相。

雅斯贝尔斯年轻时游历甚广，但绝大部分的求学时光是在海德堡度过的。他不觉得自己的智力足以成为一名哲学家，于是先学法律，后转为学医和精神病学，因为他觉得这两门学问可以帮助他理解生存之谜，认识自然与人的本质。毕业后，他在海德堡大学讲授心理学，38岁那年才成为哲学教授。因为不是科班出身，他在海德堡哲学界一直处于边缘状态。但“二战”后海德堡学术重建，他是文科的领袖人物，殚精竭虑，力图恢复一个世界的秩序。

有人说海德堡是一个“路过之地”——由于地处南北交界，往北有马堡、柏林，往南有图宾根、弗赖堡，都是哲学重镇。作为历代大哲学家的必经之地，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海德格尔都盛赞过海德堡的美丽，或者在这里停留过，但这里都不是他们的归宿。即使雅斯贝尔斯，他的一生与海德堡如此难分难解，终究也在晚年离开海德堡，去了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并在那里终老。

根据伽达默尔《哲学生涯》的记载，在他离开海德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街的斯科特书店还展示着一张小板凳，雅斯贝尔斯每周都要极其严格和认真地抽出一个上午的时间来书店，就坐在那个小板凳上把新出版的所有书都翻一遍，离开时每次都挑走一摞子书。

除了康德一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之外，德国的大小哲学家似乎都是在不断迁徙之中。从中世纪开始，德国学者之间就有游学之风。他们相信，旅行是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所以，整个德国大学系统就是一个流动的驿站。康德的柯尼斯堡、黑格尔的柏林、尼采的魏玛、海德格尔的弗赖堡，伽达默尔的海德堡……哪里有大师，哪里就是哲学的中心。为了追随名师，学生们经常在不同的大学和城市之间辗转。

在中国，很难想象一个学生能够随随便便从北大转到复旦，或者从南开换到中山大学。但在德国，一个学生在求学期间换几所大学很正常，有时候为了追随心仪的导师，有时候仅仅是为了换个城市生

活。不像法国，一切最好的都在巴黎，德国的城市无论大小，都有一些独特的好处：慕尼黑有10月啤酒节，而且离意大利很近；柏林有更好的音乐、博物馆和夜生活；弗赖堡和海德堡城市虽小，却有漂亮的建筑和森林，随处可见年轻人。天气也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校史记载，19世纪海德堡夏天的学生总是比冬天多，就因为这里的夏天长而迷人，晚上9点还可见晚霞满天，而冬天阴冷难熬，不到下午4点天就黑了。

虽是旅游旺季，但到哲学家小路散步的人不多，只偶尔有结伴跑步的大学生，或者郁郁独行的老人经过。我想象着几百年来在这条小路上走过的人，因为各自思想、心性与境遇不同，眼中的世界是多么的不同。

因为海德堡，我第一次意识到“看”是一个多么神奇的词。德国古典唯心主义（Idealism）中的idea源于拉丁语idere，意为“眼见为实”。整个西方启蒙的思想都是沿着idere的概念，通过光，事物被呈现，被认知，成其所是的过程。强调“眼见为实”，即已暗含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性——若没有“我”，没有思维之光，世界只是一片蒙昧不清；而在此之前，人类只能“耳听为虚”，倾听上帝的教诲。

来德国之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歌老师给我上过一堂哲学课。她说，“启蒙”的全部精髓可以归结为康德的一句话：人的职责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康德之前，人们问：世界由什么构成，本体是什么？康德之后，问题变成：我们怎么能看到时间，看到空间？牛顿认为，时间空间就是上帝；康德则说，时间空间是主观形式，是人所具有的能力。世界之所以是这样的构成，取决于你的认知能力，取决于你的范畴，取决于所有的智性能力。如果人再加一种能力，也许就能看到X空间。

我想起那年在剑桥大学采访天体物理学家马丁·里斯时，他有非常相似的见解，甚至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也许这个世界存在一

些非常重要的真相，是超出人类的理解范畴的，比如，我们通过望远镜所能观察到的宇宙，可能并非全部的物理事实。很可能有另外的完全不同的空间维度，被完全不同的法则所规定，但我们无法感知或理解，就像一只猴子不可能理解量子物理学一样，只能留待后人类，或者超人类，他们也许会拥有更加高级的智慧，能理解这些东西。”

很奇妙，隔着200多年的时空，发现一个哲学家与科学家如此强烈的共鸣。当然，在康德的时代，他就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星云假说”是关于天体起源的，而牛顿的伟大著作叫《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

在海德堡听到这么一个故事，很能说明近代以来哲学家与科学家之间的隔阂之深：纳粹时期，雅斯贝尔斯在困顿之中曾托人请爱因斯坦代为斡旋，在普林斯顿大学求个教职，爱因斯坦却迟迟不肯，因为他觉得雅斯贝尔斯的哲学与黑格尔的哲学一样，都是“醉汉的胡言乱语”。

在人类知识的探求上，现代经验科学追求的是知识的确定性和可控性，它能给我们一个肯定的，没有争议性的答案，一个安全的研究结果。哲学却不能。任何一门科学，只要关于它的知识一旦可以确定，这门科学便不再称为哲学，而变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比如物理、天文、化学、生物，甚至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那么，“哲学”作为一门学问还剩下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几千年了，为什么还要为了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争论不休：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存在的本质？身体和心灵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世界永远会有一些人，天然地被这些问题吸引、迷惑，尽管他们心里清楚，这些问题很可能没有答案，或者超出了他们的智性能力。”凯莫林教授告诉我，“但这些问题如此重要，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努力就将持续下去。”

“从某种角度来说，哲学跟象棋很像。象棋的历史够久远了，人们发明了关于象棋的各种理论，这些理论变得越来越具体和复杂，但今天的象棋大师未必超出古代的象棋大师。在这一点上，哲学也是一样的状况。哲学家的工具越来越先进，思维越来越精密，但对于那些古老的哲学问题，今天的哲学家未必能比柏拉图给出更好的答案。”

这可能是哲学与科学最大的区别——经验科学的知识是不断前进的，物理学的洞见可以锁定在数学公式里，代代相传，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今天的物理学家比牛顿、爱因斯坦懂得更多；但哲学思想却是难以固定的，很容易在时间的流逝中遗失，就哲学的核心问题而言，康德可能比今天的哲学家懂得更多，思想更深刻。所以，哲学必须不断地回到经典。

伽达默尔，现代阐释学之父，曾经忠告他的学生：如果要走上哲学之路，不能从海德格尔开始，而至少要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今天在海德堡哲学系，最核心的学术训练仍然是在经典哲学文本的精读与讨论中完成的。通常是讨论课（seminar）的形式，老师带领学生阅读经典文本，逐字逐句地讲解，澄清概念，疏通论证逻辑。

精读精到什么程度呢？

一本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可能要读上1个学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恐怕要2年。三四本著作读完，本科学年也差不多结束了。

“一本哲学经典，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是看不懂的。不是说你看不懂文字，而是你的思想不够专注，不够精密，捕捉不到很多细微的变化。这是哲学学习中最为艰苦的基础训练，没有这种训练，读再多的哲学书也没用。”凯莫林教授的助教蒋运鹏告诉我。

“但是，一旦进入状态，你会发现思维的训练过程是充满乐趣的。”他补充道。

这让我想起苏联作家阿尔森·古留加在《黑格尔传》中提到的一个叫鲍里斯·乌克斯库尔的俄国骑兵上尉。这位年轻军官打败拿破仑之后，追女人也追腻了，于是跑到海德堡，要追随黑格尔学哲学。受到黑格尔的亲切招待之后，他立刻跑到书店，把哲学家所有的书都买下来，却发现一句也读不懂。他越是努力，越莫名其妙。他去听黑格尔的讲座，却连上课的笔记都看不懂。于是他又去找黑格尔诉苦，哲学家耐心倾听，劝他先自修代数、自然科学、地理和拉丁文。据说他第三次来请教黑格尔时，教授对这个学生的勤奋和学识非常满意，才引导他真正研究哲学。后来，乌克斯库尔在俄罗斯当外交官，无论走到哪里，总是随身携带着黑格尔的《逻辑学》。



海德堡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东·科赫，他的教席曾经属于雅斯贝尔斯与伽达默尔
现实、自由、时间之箭

目力好的人，能从哲学家小路上眺望到黑格尔当年居住的那条小街。

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教过两年书，据说最喜欢在这条小路上一边散步一边思考。从他在普洛克街的家走到这条小路，大概需要20分钟，但不知当年哲学家眼中是否真有这些风景。他一贯的人生态度是：“人的性灵应当超脱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而虚心接受那

真的、永恒的和神圣的事物，并以虚心接受的态度去观察并把握那最高的东西。”

19世纪，法国人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经这样描述德国人对于精神世界的迷恋：“在精神文明方面出的力，谁也比不上德国人：渊博的考据，哲理的探讨，对最难懂的文字的钻研，版本的校订，字典的编纂，材料的收集与分类，实验室中的研究。在一切学问的领域内，凡是艰苦沉闷，但属于基础性质而必不可少的劳动，都是他们的专长；他们以了不起的耐性与牺牲精神，替现代大厦把所有的石头凿好。”

至于为什么，他的解释是：“他们身上，理智的力量大得多：因为外界的诱惑比较小，内心的爆炸比较少。而在外界的袭击与内心的反抗较少的时候，理性才把人控制得更好……”

有时候，德国哲学家如此执着于对世界的本质追根究底，给人感觉简直就是一群完全与现实脱节、毫无生活可言的呆子。就像康德，他一生不曾离开自己出生的城市，从来没有碰过一个女人，每天在同一时间开动大脑里某个思想机器的小齿轮，50年不变。他的早餐只有两杯茶和一烟斗烟，晚上干脆不吃饭。而且他的茶，据某位学者考证，只是点缀着几片叶子的淡茶，而烟斗也是用来抽成真空的……

但正是这群尘世中人眼中的呆子，以强大的抽象能力，创造了一个个离现实那么遥远的概念世界——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世界精神”、谢林的“自然”、叔本华的“意志”、海德格尔的“此在”……却又直指现实世界的症候，为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设定最基本的价值观。这得需要多大的创造力？



骑士酒店，它的正墙是17世纪末期30年战争后海德堡唯一幸存的建筑，后来由一个法国丝绸商人斥资重建

为了不至于走火入魔，我决定把这些概念先都搁置起来。正如凯莫林教授一再告诫的，拥有一点点肤浅的哲学知识是危险的。

安东·科赫是我们在海德堡拜访的第二位哲学教授。他今年60多岁，很瘦，穿一套浅灰色的西装，一头短短的白发，棕色眼睛，耳朵很有特点，很尖很长，像《指环王》里的精灵族人。他身上有一种纯净的书卷气，在德国教授中很常见，但他的随和却很罕见，据说他喜欢招世界各地的学生，对中国学生也很有好感。

与雅斯贝尔斯一样，科赫教授也是在海德堡度过他绝大部分的学生时代。当时正值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汹涌的学潮，柏林、海德堡、法兰克福闹得最凶，学生们整天为政治争论不休、打架、谈恋爱，但那仍然是海德堡哲学系最好的时代之一——伽达默尔虽已退休，但仍作为荣誉教授留在海德堡，偶尔也给学生上课，但更多是邀

请各种思潮的人物来海德堡演讲和讨论。那时候，哲学系除了逻辑课是必修之外，学生们享受着绝对的自由，他们可以去旁听任何教授的课，参加任何讨论课，完全跟随自己的兴趣走上哲学之路。

科赫教授的席位曾经属于雅斯贝尔斯和伽达默尔。不过，三代人从事哲学的方式完全不同。雅斯贝尔斯从心理学进入哲学，伽达默尔被历史吸引，科赫教授则更多被数学吸引。多年来，他一直试图利用分析哲学的工具来探究形而上学中的“现实”（reality）问题。

“‘现实’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不是当下的现实，而是已经存在了亿万年的现实。通过深刻而清晰地思考‘现实’，我希望揭示‘现实’的深层结构，以及真实（real）到底意味着什么？”科赫教授说。

我再次意识到自己与哲学世界之间的隔阂。比起科学，以哲学的纯粹、抽象、非经验，恐怕更难找到一种方式与普通人交流。年轻的时候，谁不曾疑惑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谁不想知道，真实意味着什么？但更舒适的方法难道不是去旅行、交朋友、阅读美妙的书、观赏艺术？

科赫教授的办公室朴素而整洁。一面书墙，一张书桌，几把椅子，便是全部。从洁白的百叶窗望出去，就是海德堡老城的中心——大学广场。夏天是海德堡的旅游旺季，广场上人流熙攘，狮子喷泉静默不语。500年前，马丁·路德曾在这里进行过一场被后人称为“海德堡之争”的神学大辩论。他提倡信徒自己阅读《圣经》，自己解释《圣经》，抨击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威，主张教义必须与科学相结合，在欧洲大陆播下了自由和批判的种子。

“与英美哲学相比，德国哲学始终有一种反自然主义的倾向，正是因为在德国，确切地说，在欧洲的德语国家，启蒙的传统更多是从

神学内部发生的，而不像法国和英国，是作为神学的对立而出现的。”科赫教授告诉我。

从17世纪开始，德国神学家开始对基督教教条进行有效的“去神秘化”，从而将神学变成一种历史与哲学科学（在德国，人文科学也被称为“科学”，即“精神科学”）。他们把《圣经》视为一种历史文献，发明了各种解释和阅读的技巧，追溯文本编写的源头，希望找到上帝存在的证据。最终，他们不再相信教会的某个教条，但仍然称自己为基督徒，只因为他们仍然接受这样一个信仰：自然科学无法穷尽整个宇宙，现实存在自有其深意与神秘。

虽然在一个虔诚的新教家庭长大，但科赫教授不是一个基督徒，更不认为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事实上，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认为自然科学能解释一个完整的现实，他所追求的恰恰是一个世俗化的全知全能的神。这是柏拉图、基督教、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一脉相承的迷思。

“在我看来，今天人类社会最大的危险是，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用数学的方式描述出来的现实（reality）就是全部的现实，从而失去那些物理学家们无法处理的，与现实更深层面的联系。今天我们目睹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都与这种狭隘、抽象、贫乏的思维方式有关。”

“其实，物理学家很清楚，他们描述的宇宙从一开始就是基于一种对‘现实’的巨大的抽象。在科学的物质世界中，不仅颜色和声音不存在，就连我们通过视觉和触觉所体验到的空间也是如此。时间更是一个从实存中被抽象出来的概念。虽然我们对于世界的所有感知中都贯穿着线性的时间感，但在物理学中，既没有时间之箭（即时间从过去向未来的流动），也没有临时模式（现在、过去、未来）。热力学第二定律提出了熵增理论，作为区别过去与未来的工具——现在的世界比1000年前的世界更加不规则，但这只是一个统计学上的趋势，

不是基本的物理法则。物理学家无法回答：为什么长期来说不规则在增加？到底是什么使现在成为现在？是什么赋予2016年6月30日下午5点10分这一时刻以独一无二的特性，使它有别于过去的任何时刻和未来的任何时刻？”

茫然感再次浮上心头，为什么我要关心什么使现在成为现在呢？

“因为它与自由有关。”教授告诉我，“只要你在大图景之中引入一个自由的行动者，时间之箭就不再那么神秘。”

与凯莫林教授深入到一个个具体哲学问题的逻辑细节不同，科赫教授试图以真理、时间、自由三个概念为基础，构建一个宏大的综合理论体系。他相信，这三个概念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内在关联——时间的结构（过去、现在、未来）、自由的结构（三种特性：独立于自然法则、不可证伪的自由法则和替代性选择）和真理的三个层面（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开放性）可以连接起来，而且必须连接起来，在一个综合的结构里，你才能真正理解真理是什么，自由是什么，时间之箭是怎么回事。

“在今天，西方哲学的状态不是太好。在欧洲的德语地区，哲学家埋头注释经典哲学家，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而英语国家则倾向于攻克一个个孤立的哲学谜语与谜团。今天哲学研究所缺失的，是一种有力的尝试，将今天的哲学谜团纳入一个统一、复杂的理论框架。”

这原本是德国哲学的精神传统——他们一直认为，应该有一门学科，用一个统一的有关世界的图景把人类所有的知识结合起来，而这个学科必须是哲学。但是，学科的专业化不仅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制造屏障，即使在哲学内部也已分裂出无数的分支。每一个分支都深入一个具体问题的细部。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难题：专，难免狭隘；通，又欠深入。

就一直不肯放弃这样一种哲学的大视角而言，科赫教授自认是一只孤独的恐龙。

“作为最基本的一个哲学概念，‘真理’很难定义，但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理论中抽离出它的三个核心层面——第一，现实主义层面：当我们对于客观现实的信念或陈述与现实本身相符时，则该信念或陈述是真实的；第二，实用主义层面：对我们有益的，值得行动的就是真理，所以真理必须经过理性程序的核实，或者是经过长期的民主讨论得到的结论；第三，认知层面：现实不是封闭的，不可知的，而是向人的认知能力开放，向自己显示自己（人是现实的一部分）。这三个层面环环相扣，现实的独立性与真理的核实程序在认知的开放性中整合在一起——我们向现实开放，现实亦向我们开放。”

“若从真理的层面来构想时光之箭，则过去是固定的，无可更改，恰好与真理的现实层面对应，即‘现实’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未来是开放的，向我们的决定和行为开放，因此它对应于真理的实用主义层面，即我们能做什么？过去之所以与未来不同，是因为过去已成事实，只能回忆，而未来有待决定，只能想象或期待。只有当下可以被感知，它对应的是真理的认知层面——现实向人的认知能力开放。没有这种开放性，我们将永远处于怀疑主义的迷雾之中。”

至于自由，在哲学里，它与上帝、灵魂不朽一样，一直属于既无法证明，又无法被反驳的概念。最近几年，基因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似乎终于要给自由之谜一个确切的结论：自由意志只是大脑制造的幻象，世上并无自由意志这回事。谈到这些，温文尔雅的科赫教授突然变得激愤起来，说“自由”根本不是神经学家的专业词汇。当一个神经学家谈论自由时，他的身份只能是一个哲学的门外汉。

200多年前，康德给后世的哲学家留下一个关于“自由”的难题。他说，时空中发生的一切都有自然必然性；人是自由的；自由与自然法则相互矛盾。

那么，到底什么是自由？人类究竟有没有自由意志？对科赫教授来说，自由首先是选择，没有选择就无所谓自由；第二是自由的先验层面，即康德所说的，自由独立于自然法则；第三是自由的实践性，即人根据纯粹理性法则的自我决定。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时光之箭的自由理论’。”科赫教授告诉我，“过去与未来的不对称是人类自身在时间中实现的，因为我们是自由的主体，用我们的选择和行动来决定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最近几年，他又试图将“幸福”的概念纳入这个体系，幸福与时间的结构之间的关系远比他想象中的更深刻——“幸福是得到你一直追求的东西和目标，但因为目标总是在未来，而我们总是活在当下，所以不幸福是人性的基本设定。如果我们能到达时间的终点，并且留在那里，是否就会永远幸福呢？”

“自从牛顿以来，我们太经常被这样的自卑感诱惑——如此浩渺的宇宙中，人是多么渺小的存在！但这样一个理论体系重新将人类置于宇宙图景的中心位置：现实‘渴望’被认知，就像火山渴望爆发，或者枯土渴望雨水一样，是一种内在的张力。从纯粹哲学的立场来看，现实必须有一小部分是具有认知能力的存在。如果宇宙真有开端（比如宇宙大爆炸或其他），它必然在内部进化出认知者（Knower）。我们不需要上帝来造人，也无须任何有意的计划，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绝不是偶然的意外。”

哲学家小路上，唯一留下名字的，是一位诗人。

一个僻静的角落，几枚熟透了的李子，在清晨的阳光中散发出淡淡的酒香，红砂岩的石碑上刻着荷尔德林的名字，还有几行诗，可能是他赞美海德堡的那首：

灌木丛繁荣其上，直铺深谷，

背靠山丘或怀抱河滩，

蔓延你欢乐的小巷，

它们休憩在你芬芳宁静的花园之下

……

茨威格写过一本关于荷尔德林的传记，提到诗人当年充满孩子气的哲学努力。一个完全灵感型的、非逻辑性的人，非得强迫自己去接受抽象概念、智力辨析的束缚，试图形而上地解释本来幸福地感受到的天堂，用各种学说来证明他的诗歌创作计划。歌德对拜伦的评论：“只有在写诗时，他才是个大人；当他思考时，只不过是个小孩子。”用在荷尔德林身上也许更合适。他的后半生在疯癫孤独中度过，死时完全被世人遗忘。

按茨威格的说法，遭遇哲学，对荷尔德林来说是一场灾难。但百年后，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却说，对他一生的思考具有指导意义的，并非他的导师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而是荷尔德林的颂诗，甚至临死之时还命他的儿子为他最后一次朗读荷尔德林的诗歌。

科赫教授一再强调，通往真理的道路并非只有科学，而关于现实更深的维度，哲学也不是唯一的提醒者。“文学、艺术也试图从更深的层面把握现实，只不过方法不同——文学和艺术创造的是图像和故事，而哲学创造的是思辨。”他说，“但我深深相信，无论以何种方式靠近现实，都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以我的浅薄，无法理解那种沉浸在哲学思辨中的“幸福”为何物，但从形而上的现实中获得的幸福，真的能弥补一个人在尘世中必须面对的苦涩吗？

黑格尔——荷尔德林在图宾根神学院的好友，在得到海德堡大学正教授席位之前，哲学之路走得也并不顺当。从神学院毕业之后，先在荷尔德林给他介绍的一个家庭做家教，后来又经谢林的引荐在耶拿大学做编外讲师。拿破仑进攻耶拿之后，失业的哲学家不得不另找工作，先是在一家报纸做编辑，又去纽伦堡做文科中学校长。这位性情古怪的哲学家是如何教育孩子的，有诗人克莱门斯·布伦塔诺的信件为证：“我在纽伦堡结识了诚实而笨拙的中学校长黑格尔，他一边读英雄史诗和尼伯龙根，一边把它们翻译成希腊文，只是为了欣赏。”



歌剧《海德堡的学生王子》，描写一个王子在海大读书，爱上一个酒肆少女，终因身份悬殊，含恨分手的故事。该歌剧在美国百老汇久演不衰。据说当年盟军之所以没炸海德堡，与此剧的影响有关

即使到今天，若非出身富贵，或者娶到有钱人家的女儿，在德国选择哲学生涯仍然是一场旷日持久、风险极高的赌博。一个哲学系的学生，一路从学士读到博士，再参加教授资格考试，即使顺利通过，也只能以相对微薄的薪水在不同的大学之间辗转。如果运气不好，或者才华不够，很可能到40岁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无望得到教授席位，改行又为时太晚，最后落得开出租车为生也不是不可能。

在老城普洛克街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安德里亚·韦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与我谈起过这种人生的可能性。这位金发帅哥刚刚拿到哲学博士学位，很快就要离开海德堡。在德国，一个年轻人博士毕业之后不能在自己所毕业的学校里教书，是件不体面的事情。

韦伯已经30多岁了，已婚，有一个两岁的儿子。他在海德堡读了十几年书，本来主修数学，中途改为主修哲学，所以毕业时比别人大几岁。当年的同学都已经过上体面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只有他一个人还在读着别人看不懂的书。

“有人会说我浪费了自己的才华。”他笑着说。很淡定的样子，但眼神中有掩饰不住的孤独。

那个眼神让我想起水若。她在海德堡留学多年，正在攻读德语文学博士，哲学是她的副专业，但她对哲学的痴迷，几乎从她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神情里都能感觉得到。那天傍晚，我们在内卡湖畔绵延不尽的大草坪上一起散步，我注意到她头上与她年龄不相称的白发。她说是学拉丁文的缘故，但我猜想必然也有生活的压力。在德国走学术的道路，要真正耐得住寂寞和清贫，如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中所说：“灵魂不经过寂寞与清苦之火的锻打，完全炼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来。”但结婚生子，为家务琐事分心，对一个一心以学术为业的人来说，是无可回避的痛苦。

夕阳西下，草坪上已经点起了烧烤的篝火，年轻男女光着脚打排球，有人挥舞着高尔夫球棒，情侣旁若无人地亲吻，衣衫褴褛的老乞丐坐在一群喝醉了的学生中间，悠悠地吹起了口琴。小鱼儿——水若两岁的儿子，正在草坪上快乐地跑来跑去。小家伙不知从哪里找到两个容器，不厌其烦地把一堆沙子从一个容器倒到另外一个容器里。不知为何，那个动作让我有种很震动的感觉。

如今回想起来，如果说这次海德堡之旅有什么收获，大概就是发现哲学中一种类似孩童的耐心——学会如何耐心地面对一个问题，而不是急切地寻找答案。如果你提出一个很难的问题，就不可能指望得到一个简单的答案。为了理解这个问题，你必须不断地追问、质疑、反思，然后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多么的困难，而我们寻求的答案又是多么的不完美。

《明镜》杂志的记者问伽达默尔，我们可以从哲学中期待什么？

他的回答是：“学会继续问问题，而不是认为一切一开始就规定好了，就是一个伟大的责任。”

海德堡大学：一所“很好”的德国大学

1855年，一位美国观察家曾经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德国人那样对自己的大学教育制度的发展付出了如此多的思考和艰辛——没有一个民族从大学提供的服务中获得如此大的益处，也没有一个地方能使它们在国民的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从来没有一个德国城市，得到过像海德堡那么多的赞美。

歌德说，这里是他把心遗失的地方。

荷尔德林说，海德堡是他见过的最美的德国城市。

海德堡大学的校史档案里还记载了茜茜公主的两首诗，也是赞美海德堡的，可惜我看不懂德文。

在描述自己的欧洲之行时，马克·吐温写道，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地方，如此充满平静与迷人的魅力，海德堡给人一种不可超越的美感。他本来计划只在海德堡停留一天，结果在这里待了整整一个夏天。

当我们到达海德堡的时候，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海德堡大学正在庆祝625周年校庆。海大新楼（海德堡大学文科的主教学楼）刚刚进

行过一次大整修，一群诺贝尔奖得主开完林道大会，专程赶来，与这里的年轻学生交流。美军基地即将撤离的消息也是人们热衷的话题，据说学校正在考虑把它改建成学生宿舍。另外，一个盛大的校庆派对即将在内卡河畔的大草坪上举行，每个人都被欢迎来参加。正如《海德堡的学生王子》中的一句台词：海德堡的夏天，是浪漫和音乐的季节。



海德堡大学副校长托马斯·裴弗

德国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大概只有在海德堡这种大学城，才能看到那么多让人赏心悦目的年轻人。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太爱学习了，露天食堂的长凳上，随便哪块草坪上，都能看到一两个年轻人卧在那里，前面摆开一堆书。但也是同样的地方，一旦派对开始，你会怀疑他们是否从来不学习，也太惬意了。

这里学生的那种自由姿态竟让我震惊。有一次经过内卡河畔，见一个学生一边抱着一本书，一边将脚泡在水里，旁若无人地读着。

不过，海德堡大学一直是一个以自由闻名的大学。1849年，海德堡神学系曾经给一个逃难到海德堡的美国黑奴詹姆斯·彭宁顿（James W. C. Pennington）颁发了荣誉博士学位。而那时候的美国，教黑人读书写字都是非法的。

来德国前，按照中国人的惯常思维，我一直将海德堡大学视为德国最好的大学，比如德国的“哈佛”，或者德国的“清华”之类。当我向海德堡的教授们问及这一点时，教授们要么一脸惶恐，要么哈哈

大笑。“不不不，谢谢你这么说，但我们只是很好的大学，不是最好的。”

在德国，“精英”是一个可疑的概念。从2006年起，德国政府为了提高大学的竞争力，陆续选了9所“精英大学”出来，海德堡大学名列其中。

“这只是政治家的选择。”海德堡校史专家彼得·默斯伯格教授告诉我，“德国人真正引以为豪的是，他们的每所大学固然都有独特之处，但总体的教学和科研水平都很相似，并无优劣之分。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能得到最好的教育。这与美国大学体系不同，你没法拿哈佛、耶鲁与美国中西部的一所大学相比。在我们看来，不公平的教育体系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侵犯。”

这种“去中心化”也与德国历史的高度不确定性有关。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德国近现代史上诸侯分立，教派斗争激烈，新旧秩序的更迭太快，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类似于伦敦、巴黎那样的中心，占据一个国家大部分的资源。相反，每个独立的小国都想有自己的大学、剧院和博物馆，于是很多小的文化中心发展起来。

正如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在《海德堡语丝》一书中所描述的：“在德国，最大的图书馆在法兰克福，最盛的印刷业在汉堡，最多剧院的是慕尼黑，最多博物馆的是柏林，最全的国家档案在柯伯尼兹，最丰富的文学资料在内卡河上的小城玛白。科学的中心不止一个，而是分散在杜斯道夫、哥廷根、海德堡、曼兹各地。”

除去625年的历史，美丽的山水建筑，以及种种关于海德堡的浪漫主义迷思之外，海德堡大学唯一优越于其他大学的地方可能在于，它所属的巴登－符腾堡州很有钱，对教育的投入更大，付给教授的薪水也更高，还可以建更好的实验室。100年以前，为了留住著名的化学家、光谱分析的发明者本森在海德堡任教，州政府曾斥巨资为他建造

了当时整个欧洲最好的化学实验室。后来，本森在海德堡大学当了6年教授。

除此之外，它只是一所“很好”的德国大学，而这是最让我欣赏的地方。

德国没有大学入学考试，一般说，学生只要通过中学会考，就可以申请任何大学的任何专业。与英美系的名校相比，海德堡大学不会得到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最好最聪明的学生，但它得到的是参差百态的学生，有很聪明的，也有平庸的，但参差才是真实的社会形态。

“美国人这些年在许多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在阿富汗、伊拉克，都是因为精英的同化。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上的是哈佛或耶鲁，接受同样的教育，他们内部没有质疑的空间。”默斯伯格教授这样告诉我。

1855年，一位美国观察家曾经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德国人那样对自己的大学教育制度的发展付出了如此多的思考和艰辛——没有一个民族从大学提供的服务中获得如此大的益处，也没有一个地方能使它们在国民的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那时候，德国大学是美国人的榜样。19世纪大约有1万名美国青年赴德留学，影响美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几位关键人物都曾在德国大学做过学生，而位居美国大学排行榜前列的几所大学，大都是按照德国模式进行改革的成功范例。

美国教育史家认为，19世纪美国留德学生从德国大学获得了3种智力财富：智力习惯（intellectual habit），智力方法（intellectual method），智力的和道德的信念（intellecual and ethical conviction）。智力习惯代表学者个人及其学术的独立性，它是三种财富中最为宝贵的；智力方法代表在思想和研究上的全面性

和准确性，这似乎是日耳曼人的一种独特的财富，即掌握全部能够知道的有关的事实材料；智力的和道德的信念，深信自己所做的事情，将为美国的知识和学术增添财富。



海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曼弗莱德·伯格教授

即使如此，有一些独属于德国的东西仍然保留在德国。海德堡历史系教授曼弗莱德·伯格教授（Manfred Berg）在谈到美国与德国大学教育体制的根本差异时，这样告诉我："美国大学生将教育看成人生的投资，而对德国大学生来说，大学是一种权利。州政府有责任让每个年轻人接受良好的大学教育，只要他满足基本的条件。一个哈佛商学院的学位可以基本确保你未来的人生成功，德国却没有这份精英的归属感。"

德国大学最注重的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在德国人的概念里，大学生应是独立自主、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他们已经成熟到不需要教师的引导，因为他们能把自己的生活掌握在手中。他们有选择地去听课，聆听不同的看法、事实和建议，为的是自己将来去检验和决定。

相比之下，英美大学像一座规划得很好的城市，有时候连学生的私人生活都是有组织的。但德国大学，你乍一进来，可能觉得空荡荡的，什么都抓不住。没人关心你，也没有人告诉你应该做什么，聪明人得自己找到方向。你没有指导，但同时也意味着没有束缚。

海德堡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在一本叫《什么是教育》的书中提到："大学应该培养精神贵族，而不是精神附庸。前者会昼夜不停地思考，并为此形销骨立；后者则要求工作与自由时间分开。前者敢冒风险，静听内心的声音，并随着它的引导走自己的路；后者则需要别人引导，要别人为他定下学习计划。前者有勇气正视失败，后者则要求在他努力之后就有成功的保证。"

后记

一

7年前，我初到剑桥大学的时候正是黄昏，站在剑河边上，看着几只白天鹅从远处飞过来，沿着水面缓缓着陆，姿态优雅万分。我心中顿时百味杂陈，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活着：在幽静迷人的后花园找一个安静的角落遐想一个下午；花3个小时划一艘小船到格兰切斯特草地喝一杯苹果酒，再花上3个小时划回来；只要骑3分钟自行车就能到达一个图书馆，可以看到全世界几乎任何一本书。

之后的几年，为了大学专题，我又陆续跑了麻省理工学院、海德堡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再也没有遇到像剑桥那样惊心动魄的美丽。就像苗炜在他的主文开头引用的一段话：“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块石头、彩色玻璃、溪流、草地、树木和花朵都被安排得如此错落有致，以便于更好地学习。面对这么一座城市，你怎么能无动于衷？”

出发之前，主编朱伟交代说，这个专题的关键是找到剑桥大学的精神气质。

“美”可以构成一所大学的气质吗？

我记得看过一部英国电影，讲一对情侣走在墓地里，遇到很多有趣的幽灵（比如奥斯卡·王尔德），一起谈天说地聊人生。在剑桥，你会产生一种恍惚感，觉得这种事情没准儿真会发生。800年漫长时光所凝固的智性生活的尊严与魅力，提供了无数平行世界的入口：砸过

牛顿脑袋的苹果树、拜伦游过泳的池塘、维特根斯坦深爱的后花园、图灵走过的石板路、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经常光顾的酒吧……校长办公室的蒂姆先生还特地带我去国王学院的后花园，那里新立了一个诗碑，上面刻着徐志摩那首著名的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蒂姆先生显然不知道徐志摩是谁，也并不如何欣赏他的诗，但据称是一个很有钱的中国人捐钱在这里建的。

在哈利·波特式的古堡中采访剑桥大学的女校长爱丽森·理查德时，她专门提到剑桥的美，说这种美会渗透到学生的灵魂里，多年后变成他/她的一部分。那是我第一次采访大学校长，问了很多大而无当的问题，比如剑桥本科教育的特点是什么？剑桥作为一所大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剑桥在何种意义上仍然是一所英国大学，它与英国作为一个国家的长久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剑桥如何保持与外面世界的距离等等。

这些问题女校长估计早已回答过一百次了——800年校庆是大日子，当时的剑桥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像我这样的记者。但对我来说，在此后四五年的大学报道里反复遭遇这些问题之后，如今重新回头看她的回答，才觉得深有共鸣。比如，"大学关心社会正义，也促进社会正义，但它不是社会正义的引擎，也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它有自己的目的"。

"一所大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它是教育者，是研究者，它通过教育和研究，改变世界思考的方式，改变世界运行的方式。"

"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就来自于日益增长的对大学实际效益的需求，但实际效益的概念往往是狭隘的。"

"剑桥的本科教育因其深度而享有盛名。这植根于一种思想，即发现、创新和探究新的领域是以教育和知识为前提的。剑桥的意愿很明确，那就是让本科生接受教育抵达乃至超越知识的边界。学习的重

点不仅是关于已知的东西，还包括学术研究和发现，不仅要学习知识，还要培养批判性的、逻辑性的和刨根究底的思维方式。”

二

在过去的150多年里，麻省理工学院的发明和创造编织了现代社会的整个经纬：电话、电磁铁、雷达、高速摄影、复印机、计算器、计算机、互联网、GPS（全球定位系统）、癌症药物、人类基因图谱、激光、太空旅行……我们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赋予了这所大学如此强大的创造力？

麻省理工学院的创造力，一方面固然可以从历史中去追寻，但更快捷的方法则是直接从个体的故事中去寻找。当时我的采访本上记着这么一个问题，每个采访对象都要例行问一遍：“你所在的学科前沿是什么？对你来说最难的难题是什么？”这是一种很典型的麻省理工学院思维：寻找世界上最难的难题，然后攻克它。宇宙、深海、大脑都是人类所剩不多的未知领域，于是你会看到很多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扎堆进去。

在媒体实验室，我得到一个更有趣的回答——“仅仅为既有的问题找到答案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提出新的问题。”比如在媒体实验室成立之初，人们提出的问题是，怎么让机器变得更聪明，让它们像人一样思考，具有深刻的感受力？但现在看来，他们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怎么利用技术让人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独立？所以，媒体实验室的整个研究方向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向——从原来的“人工智能”转向“拓展人类”。

University（大学）的词根是universus，意指世界的不同部分相遇之处。所以，大学从一开始就有宇宙论的概念在里面，我至今认为

这是大学所代表的最纯粹的意义——它是一个世界相遇、讨论、生产知识的场所。在媒体实验室，这种相遇来得更加激烈、疯狂和有趣，因为这里崇尚“博学者”——你随随便便遇到一个人，很可能精通五个领域的研究；而且，他们相信21世纪人类面临的挑战将无法在单独的领域里解决，而是必须由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艺术家、生物学家，彼此互相关联，在一种开放互动的环境中共同解决。

在亚历山卓女士（媒体实验室的媒体负责人）的安排下，我在媒体实验室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参观权限，以及与研究员自由交流的机会。我在报道里重点写了几位“疯狂发明家”，比如托德·曼库弗教授是一个大提琴家，他发明了100多件不同的“超级乐器”，彻底颠覆了人们对音乐和乐器的固有观念，音乐可以“骑”出来，“捏”出来，“摸”出来，节奏可以像土豆一样地丢来丢去，小孩子可以通过线条和色彩“画”出复杂的音乐。

还有赫尔教授，他17岁失去了双腿，从此致力于发明比人的肢体更高级的假肢。他属于我最害怕的那种采访对象，沉默寡言，每次提问都只有寥寥几个字的回答。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坐在堆满了假肢的沙发上，我问他：“你会不会担心有一天，有人觉得您的假肢太酷了而宁可砍下自己的腿？”他很冷酷地回答：“这有什么不好？你以为人的身体是进化的终极吗？”

三

2011夏天，主编刚从德国回来，对海德堡大学赞不绝口，认为海德堡大学是德国最具诗意的一所大学，于是定下了我们第三所要考察的大学。这一年恰好是海德堡建校650周年。

记者鲁伊已经在我之前去了海德堡，她是追寻马克斯·韦伯而去的。海德堡是韦伯的故居所在，也是他的心之所在。韦伯则是“海德堡精神”的最佳诠释者。对鲁伊来说，这篇文章大概也是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自我追寻之旅。

我负责写哲学。其实，很难说海德堡大学与哲学有什么特殊的渊源，只是那里有一条哲学家小路，因黑格尔经常在此地散步而得名。于是很多人谈到海德堡，都会自然而然地谈到哲学。

一个对哲学一窍不通的记者，怎么去完成一个完全没有边界的题目呢？

万分焦虑中，我借了一堆哲学书恶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入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每一本都读得我昏昏欲睡，尤其是读到分析哲学的文章时，更是完全不知所云，自我评价降到最低。这次经历让我痛感记者这个职业的简单粗暴之处——我们总指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将别人耗费大量时间与心血累积的知识，以最简单的方式打包呈现在读者面前。至少哲学是一个无法这样操作的领域。

当然，要等到了海德堡才明白，才理解，要真正读懂一本哲学经典，是要经过艰苦的思维训练的，绝不是在哲学家小路上散散步就能顿悟的。在海德堡的哲学系，最核心的学术训练仍然是在经典哲学文本的精读与讨论中完成的。通常是讨论课的形式，老师带领学生阅读经典文本，逐字逐句地讲解，澄清概念，疏通论证逻辑。一本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可能要读上一个学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恐怕要两年。整个本科学年，不过三四本书而已。

经过了一个月的临时抱佛脚后，我决定搁置那些抽象艰涩的哲学概念和理论，而带着一个简单的问题去海德堡。今天的世界，科学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进步，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世界与自我的理解，而哲学2000多年来几乎在原地循环，为什么还要学哲学呢？对一个门外汉而言，这至少是一个诚实的问题。

我在海德堡重点采访了两位哲学教授，凯莫林教授是分析哲学的大家，他的工作是深入到一个个具体哲学问题的逻辑细节；科赫教授则秉承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传统（他们一直认为，应该有一门学科，用一个统一的有关世界的图景把人类所有的知识结合起来），试图以“真理”“时间”“自由”三个概念为基础，构建一个宏大的综合理论体系。他相信，这三个概念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内在关联，只有在一个综合的结构里，你才能真正理解真理是什么，自由是什么，时间之箭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整整聊了三个多小时，回来后光整理录音就花了一个星期。其实，我到今天也没真正明白他的“时光之箭”的意思，但我记住了他的那句话：通往真理的道路并非只有科学，而关于现实更深的维度，哲学也不是唯一的提醒者。文学、艺术也试图从更深的层面把握现实，只不过方法不同——文学和艺术创造的是图像和故事，而哲学创造的是思辨。他说：“我深深相信，无论以何种方式靠近真实，都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确切地说，海德堡并不是德国哲学的标志或者高峰，它只是一个“路过之地”。德国历代大哲学家如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海德格尔都盛赞过海德堡的美丽，或在这里停留过，但这里都不是他们的归宿。就像我以一双路过者的眼睛，沿着哲学的边界游荡了一圈，瞥见了它的吉光片羽，却无法进入它的森林。

四

有一种心理症状叫“耶路撒冷综合征”，真正的信仰者进入某种狂喜状态，他们穿的跟先知一样在耶路撒冷街头狂奔，自称目睹了哭墙的砖石打开，救世主弥赛亚出现。在斯坦福大学的路上，在加州金灿灿的阳光下，在坐满了身穿套头衫、牛仔裤、脚踩人字拖的年轻人的咖啡馆里，我觉得这里也有一种让人疯狂的空气，一种类似大麻和摇滚的味道——人们都染上了一种“改变世界”狂热症。

我们最初来到斯坦福，就是冲着这种“改变世界”的激情。斯坦福大学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硅谷的心脏，也是整个硅谷的母体，而硅谷不仅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的面貌，而且正在孕育着未来几十年里更深远的变化（生物工程、纳米技术、认知科学）。所以，用我们一位采访对象的话说：“这里已经变成宇宙的中心。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19世纪的巴黎、20世纪的纽约……这个时代，如果你不曾来过硅谷，总难免有种失落感，仿佛错过了点什么，类似于时代脉搏的东西。”

很不幸的是，我们挑了一个错误的时间来到斯坦福大学——这里实行四学期制，每个学期三个月左右，等我们风尘仆仆赶到时，才发现刚好赶上一个学期的结束。那段时间，我跟蒲实、蔡小川住在斯坦福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白天在空荡荡的校园里到处找人采访，晚上狂喝纳帕山谷产的葡萄酒，抱怨在这个沐浴在加州阳光之中的校园里竟找不到一所大学的灵魂。

我们可以把“创业精神”视为斯坦福的灵魂吗？毕竟他们的现任校长约翰·亨尼西都说了，“创业精神是斯坦福大学最根本的精神气质”。这里发生过太多传奇性的创业故事，谷歌的算法是在计算机科学系几百米之外的实验室里写出来的，雅虎的第一台服务器就在工学院的教学大厅里摆着，校园里几乎每一栋教学楼都顶着一位创业者的

名字——盖茨、保罗·艾伦、比尔·休利特、杨致远、黄俊生……除了捐钱盖楼之外，他们还会经常回来给后辈们上课、聊天、交流创业经验。苹果公司的设计师会亲自过来跟学生们谈苹果手机的设计，马克·扎克伯格给他们讲当年自己是怎么为脸谱网编程的。英特尔的创始人安迪·格鲁夫、思科的前任首席执行官约翰·莫格里奇都在斯坦福任教多年。就在这一年春季，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计算机科学系新开了一门创业启蒙课，两年后在中国掀起了“从0到1”的创业热潮。校园西边的沙山路（Sandhill Road）则是风险资本扎堆的地方，号称西部华尔街，吸收了全世界28%的风险资本。作为斯坦福的学生，在大学两英里以内，随时可以找到风险投资公司为他服务。一旦他有一个好的想法，总是被导向“我们能不能开个公司，做点有用的东西出来？”

“大学的灵魂”或许是一种矫情的说法，但我的意思是，一所真正伟大的大学是否应该有比“创业精神”更深远的价值？无论创业是关于金钱、自由，还是改变世界，它都是一种太过实用性的目标。难道大学的存在不是为了让年轻人在一生求知欲最为旺盛、心智最为开放的时间里，得以远离社会求速成的压力，自由地漫步、思考、阅读、交友吗？而且，“改变世界”真的是一种毋庸置疑的美好理想吗？随着技术改变世界越多，对于技术的疑虑也越多。斯坦福在激情万丈地创造未来，但那个未来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我可以到6英里之外的谷歌总部采访那两位著名的斯坦福毕业生，问问在斯坦福为他们设计的知性路径中，是否包含了一种灵魂的教养与道德的训练，让他们在设计谷歌的未来时如履薄冰？

或者，我可以坐上前往旧金山的火车，敲开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家门，请他聊一聊他的斯坦福岁月以及他对硅谷新的科技潮流的思考。布兰德1957年进入斯坦福大学生物系，当时的硅谷才初具雏形，

他立刻被深深卷入其中，此后半个世纪一直扮演新技术探路者的角色，同时不断反思科技与人类的关系。他是一位典型的斯坦福人，极富创造力，高度网络化，并且心怀天下，三次将所有的财产都捐出来，用于他认为能改变世界的一些事情上。来斯坦福之前，我给布兰德发过邮件，问是否可以去旧金山拜访他，但被礼貌地拒绝了。他说：“谢谢，有太多事情要忙，也许下次。”

五

“21世纪怎么才能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斯坦福大学的时候，这个问题很自然就冒出来了。那里离硅谷太近，两种文化之间的割裂感尤其强烈，而按照西方博雅教育的传统，大学的目标是要培养“完整的人”。但等到我们真正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却是在哈佛大学这一期。

从2013年开始，哈佛的本科生全面推行一套新的通识教育计划，以取代20世纪70年代末设计的“核心课程”（core-curriculum）。通识教育是博雅教育的“公共面孔”，是大学主动为一个年轻人的4年求学生涯开出的一张关键处方，代表了一所大学对于知识与教育最基本的哲学与态度：一个人在大学期间应该学些什么？什么知识或方法是每个学生都应掌握的？大学最希望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当世界发生巨大变化时，大学应该如何帮助它的学生应付这种变化？

因为怀孕，这一次我没能亲自去哈佛实地采访，但哈佛的网站上有一个专门关于通识教育改革的专题，很多教授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撰文讨论这个时代的通识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此外，我还阅读了大量关于西方博雅教育理念的书籍：作者包括艾伦·布卢姆、玛莎·纳斯鲍姆、罗伯特·赫钦斯、欧克肖特、怀海特、杜威、纽曼……

在密集的阅读中，过去几年做大学专题时一些混乱未解的思绪渐渐清晰起来。我意识到，无论时代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提出什么样的新要求，在“博雅教育”的视野之内，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必须理解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文化的与自然的——从而追求一种富有意义的人生。它要求一种历史性的视角，让一个人不至于陷溺于一时一地的现实考量，活得像一只“夏天的苍蝇”（埃德蒙德·博克）。这样的“教育”必然包含英国19世纪著名的诗人和学者马修·阿诺德所说的“曾经被了解过的与被述说过的最好的一切”。它必须理解整体——人类世界与它的历史，我们的文化与那些不同于我们的文化，自然世界与探究的方法，量化的与语言的技巧，还有活泼的艺术。

在现代社会，精英式的博雅教育是一种奢侈品（斯坦福和哈佛的本科生每年的学费都近4万美元，剑桥也在最近几年暴涨到9000英镑）。记得最初在剑桥采访时，苗炜对我说：“在剑桥这种地方，你会有一种向上走的欲望。但一回到现实，你就只能走下坡路了。”

事实上，每次从一所大学采访回来，与自己的“下坡路”迎面相撞时，我都痛苦地意识到人生的各种局限性，但同时我也一次次告诉自己，突破的可能性永远都只存在于自身。读书求知，这个自我提升的过程也许并不依赖于外部环境，不在于你在哪里读大学，而在于这种智识生活的愿望是否能长久存在于你的内心。

就像大卫·丹比，一位《纽约杂志》的影评人，两个儿子的父亲，一个生活宽裕的中产阶级，48岁那年却突然决定回到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修习两门通识课——“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他跟18岁的学生一起坐在不舒服的橡木椅子上，阅读荷马、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伍尔夫的著作。这些都是最戏剧性地建构了“西方”的作者，他们的书包含了人的心智赖以获得洞察力、理解力和智慧的最佳材料，也是最直接地涉及什么是人以及

人可以是什么的书。在重读的过程中，他发现失落的自我一点一点地苏醒过来，回到他的意识中；与此同时，这个自我还在扩大，伸展着自己。正如马斯洛所说，“教育就是让一个人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

作者名单

《美国的镜子》

作者 陈赛

《处于守势的帝国》

作者 蒲实

《在哈佛学什么》

作者 陈赛

《以政治为业——一个专业学院的样本》

作者 蒲实

《哈佛人劳伦斯·萨默斯》

作者 蒲实

《精英主义、公民使命与自由教育》

作者 蒲实

《精英主义、自由教育和领袖的摇篮》

作者 蒲实

《友谊与权力的传奇：耶鲁的秘密社团》

作者 蒲实

《梦想家的孵化器》

作者 陈赛

《从工程师到企业家》

作者 蒲实

《谢青：斯坦福与硅谷岁月》

作者 蒲实

《麻省理工学院的魔力》

作者 苗炜

《麻省理工学院的人物》

作者 陈赛

《下一站，火星》

作者 陈赛

《牛津的时间》

作者 蒲实

《莫德林学院的时空》

作者 蒲实

《基督教堂学院：消失的时间》

作者 蒲实

《墨顿学院：关于创造力》

作者 蒲实

《财富的精神：牛津与世界》

作者 蒲实

《走向开放的大学精神：寻找以赛亚·伯林》

作者 蒲实

《牛津式的学问》

作者 蒲实

《剑桥神话》

作者 苗炜

《800年造就的精神地图》

作者 苗炜

《理解一只蝴蝶的智力挑战甚于宇宙》

作者 陈赛

《真正理解任何一种现象都是很难的》

作者 陈赛

《剑桥的女孩、女士、女教授》

作者 陈赛

《寻找马克斯·韦伯》

作者 鲁伊

《海德堡：哲学家路过之地？》

作者 陈赛

《海德堡大学：一所“很好”的德国大学》

作者 陈赛

后记

作者 陈赛

（本书中所有图片均来自《三联生活周刊》）